

易旭东
著

回溯公园城市
金沙城之谜

下

以新闻特写手法记叙
史志旧闻

回溯公园城市的
前世今生

系统破解三星堆、
金沙城之谜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雪山

山下的
公园城市

成都传
下

易旭东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易旭东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2.3

ISBN 978-7-5504-5101-8

I. ①成… II. ①易…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09628号

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

Chengdu Zhuan:Xueshan xia de Gongyuan Chengshi;Shang,Xia

易旭东 著

总策划:冯卫东

策划编辑:何春梅

责任编辑:廖 韧

责任校对:植 苗

封面题字:刘 光

装帧设计:张赟成

朗诵配音:唐 鑫 张欣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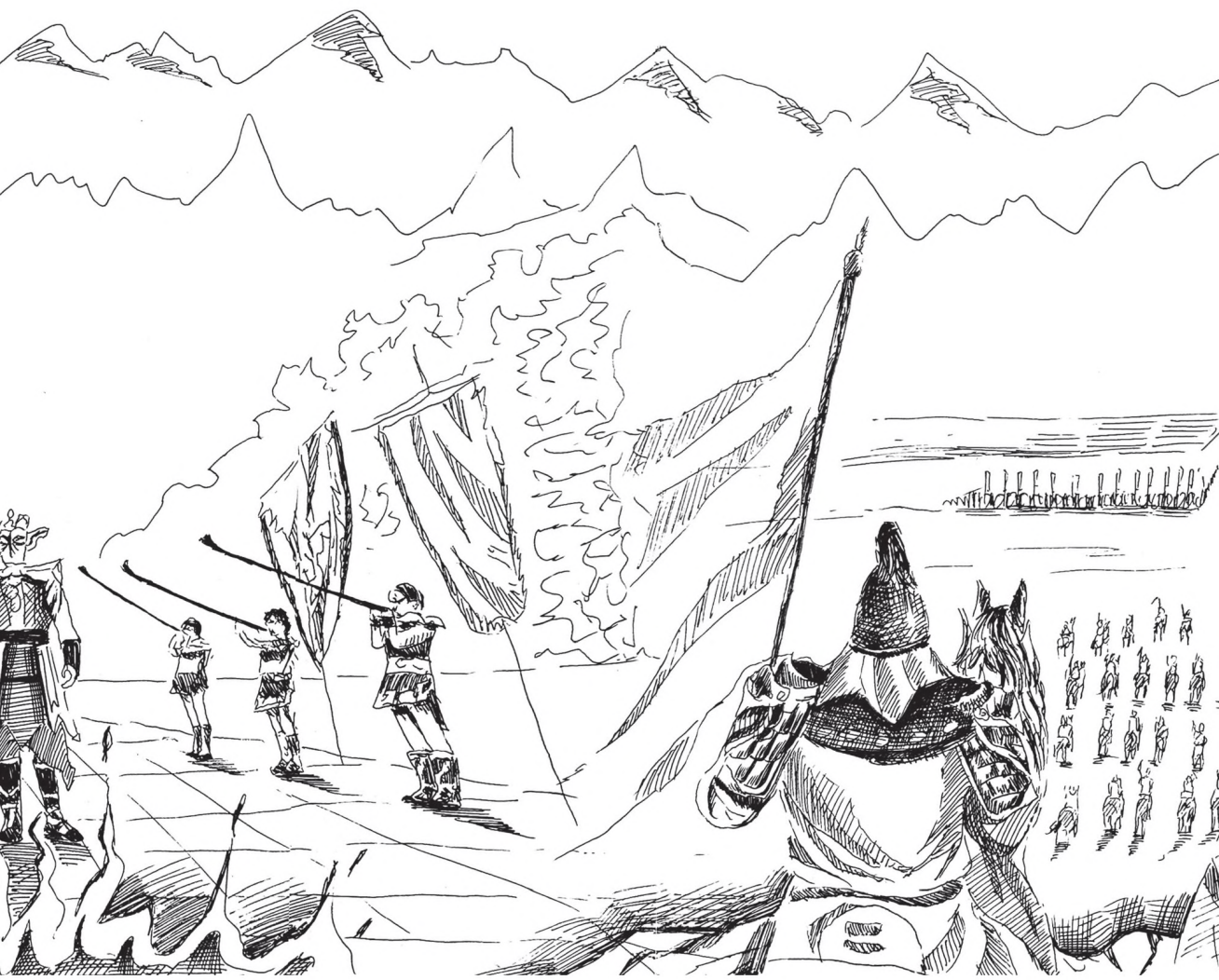
责任印制:朱曼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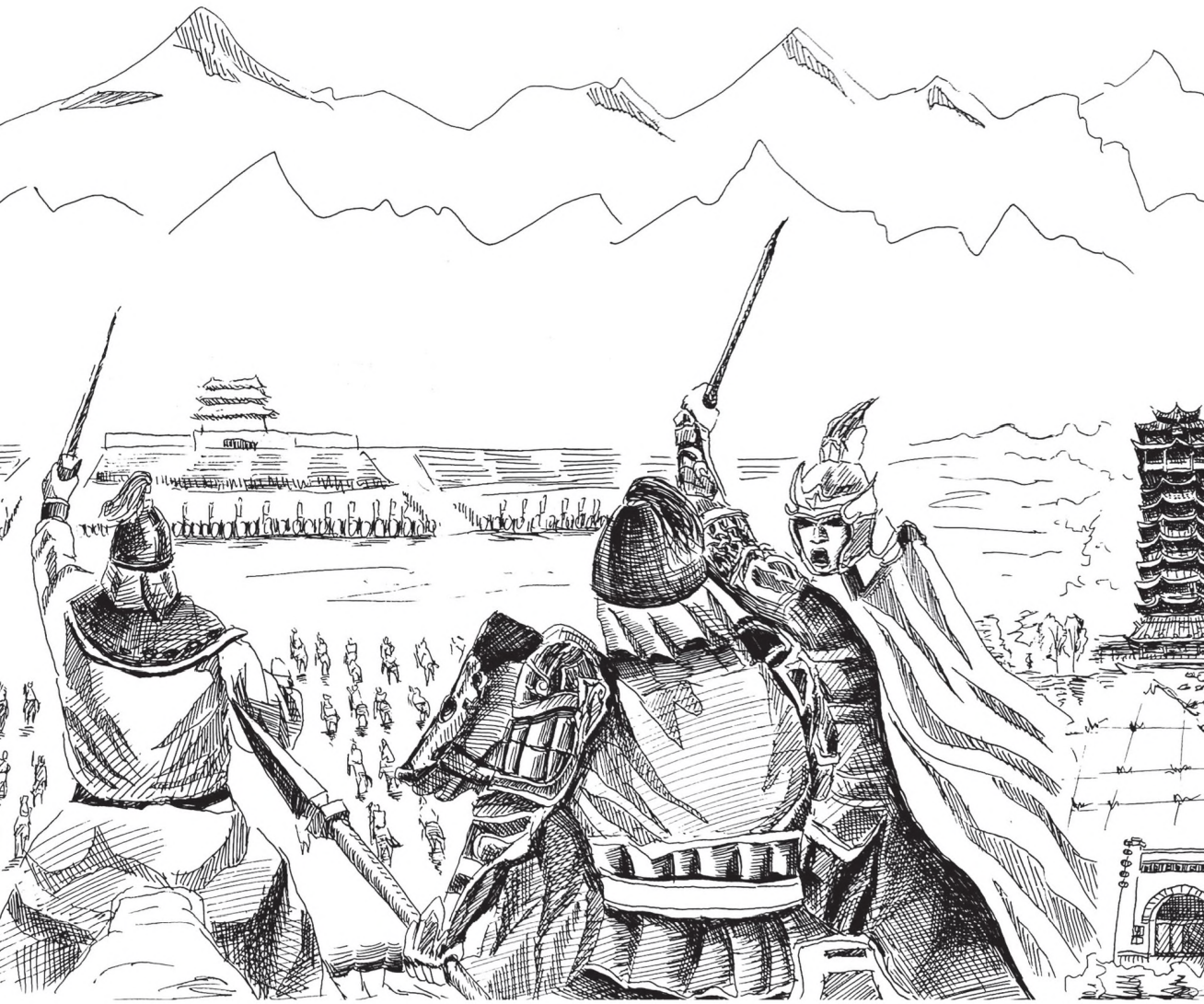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
网 址	http://cbs.swufe.edu.cn
电子邮件	bookcj@swufe.edu.cn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印 刷	四川新财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40
插 页	14 页
字 数	631 千字
版 次	202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4-5101-8
定 价	168.00元(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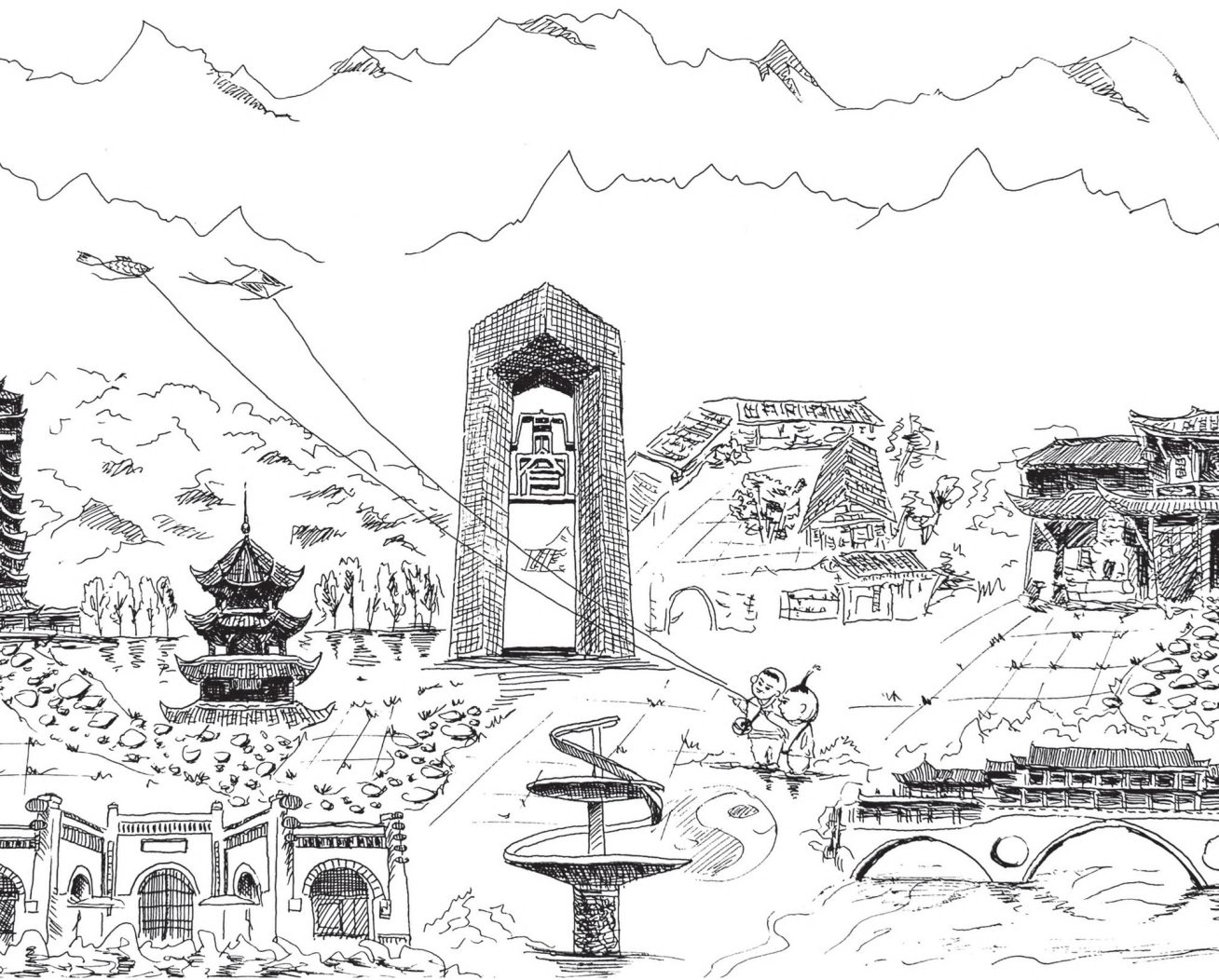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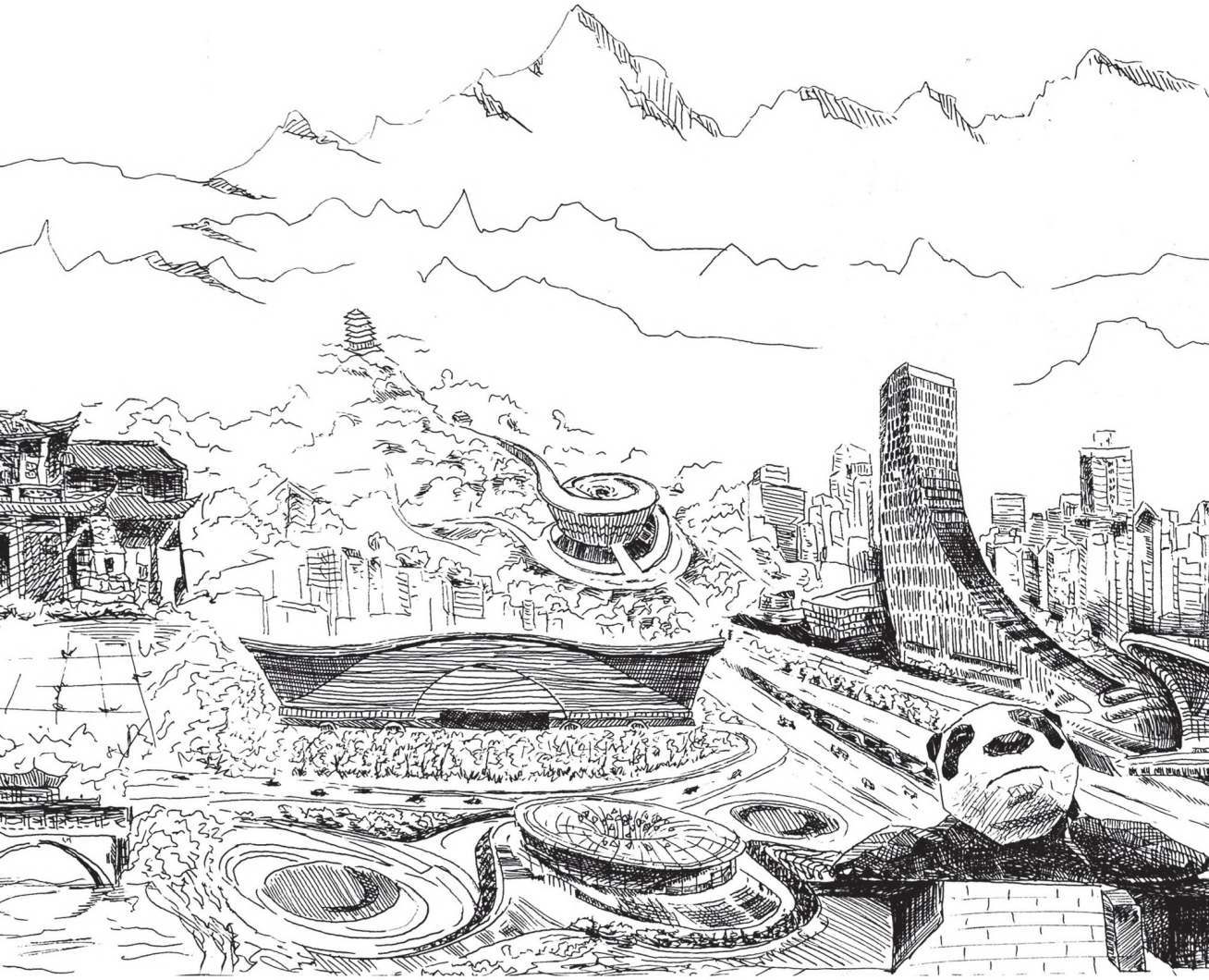














楼兰美女：神秘的「小河公主」	4
「西北走廊」上的「黄金带」	12
妇好：史载「中华第一女将」	20
文化碰撞，活跃的民族大熔炉	28
亚欧大陆最优质的宝地	36
抛妻，两个男主都爱上萝莉	44
千年「游子」带回先进文明	52

欧亚草原广袤，诞生的很多民族、发生的很多故事，都在华夏体系内。

以长城为界，北方游牧族群，都把欧亚草原，作为疆场、马场。

公元前1260—公元前1200年，三个文明古国被连续毁灭，使雅利安人充分相信自己的力量。雅利安人纠结北方各游牧族群的力量，南下发起进攻，激烈的“西北战争”打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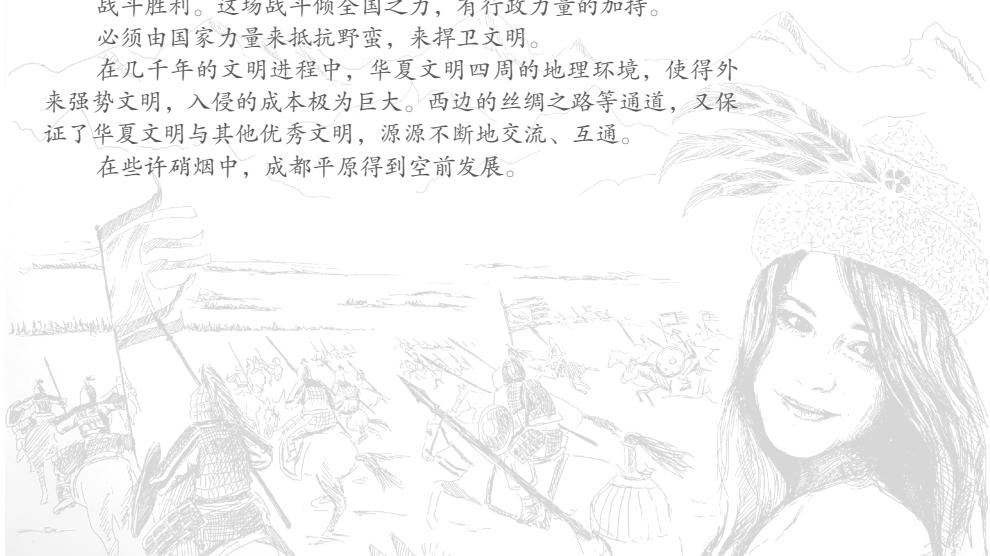
中华文明保卫战。

战斗胜利。这场战斗倾全国之力，有行政力量的加持。

必须由国家力量来抵抗野蛮，来捍卫文明。

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华夏文明四周的地理环境，使得外来强势文明，入侵的成本极为巨大。西边的丝绸之路等通道，又保证了华夏文明与其他优秀文明，源源不断地交流、互通。

在些许硝烟中，成都平原得到空前发展。





060

第七章

「川军」第二次出川

「内循环」核心：「逐鹿中原」	118
东西并立，广域王权文明与城邦文明	110
开传承数千年礼制文明先河	102
东方西方的圣贤横空出世	94
中原不是「中心」，大地只有「中国」	86
孔孟倾情打造「仁者无敌」	78
「封神大战」，经典的斩首之战	70
一场盛大而凄凉的告别仪式	62

“大一统”，中国历史的底色。

“轴心时代”。在世界四个迥然不同的地区，中国、希腊、以色列与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超越和突破原始文化，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独立形成。

“中国”，在文化区域聚合而成的大空间当中展开，超越中原，包含中原、草原、西域、高原诸地理区域的大空间。“中国史”，几个亚区域聚合成一个大的空间体系的文化演化史。

西方传统是“分”，从中世纪到现在，一直小国林立，即使合起来，也合中有分。文化基因、传统一直影响着他们。欧洲国家认同希腊，希腊城邦的特点，小国寡民。

驾驭“一体”与“多元”，世界政治的永恒课题。

欧美，国家产生文明。

中国，文明诞生国家。

「全域成都」富饶辽阔	128
大堡子山躺着秦人的先祖	136
匹匹雄劲战马孕育统一伟梦	144
蓝色星球馈赠中国的珍贵礼物	152
华夏认同是文化认同不是血缘认同	160
「孤秦」走上强国之路	168
攸关古蜀生死的「南郑之争」	176
「五丁」开辟「古金牛道」	184

秦岭山脉，中华的“父亲山”。

统领东西南北方的中华芯脉。

牵手两大母亲河的中华脊骨。

唯有跨越秦岭的王朝，才算真正的大一统。否则，半壁江山，甚至偏安一隅。有志于统一中国的政权，必然要争夺军事屏障秦岭，谁先控制秦岭南北，谁就拥有博弈的主动权。

关中平原，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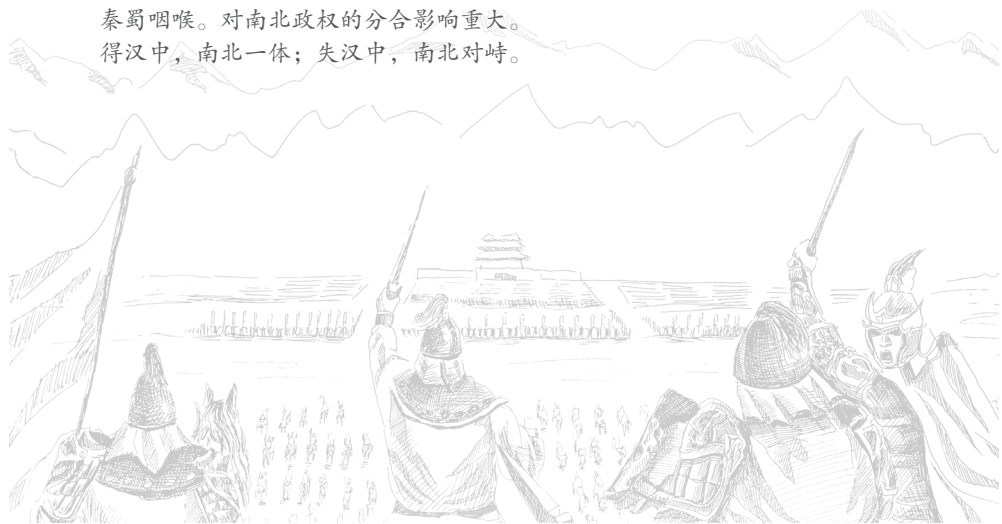
文字记载上，比成都平原早800多年。

天佑大秦。“变法”期间，六国之间打得难解难分，成都平原的古蜀国自娱自乐的“内循环”，正好为关中平原的秦国提供战略安全期，着力“外循环”。

南北文化，在古汉水一带，争夺与融合。

秦蜀咽喉。对南北政权的分合影响重大。

得汉中，南北一体；失汉中，南北对峙。



192
有去无回的文明出访

与「5·12」同等的地震·····	194
命似古希腊，城如雅典城·····	202
抗震救灾，开明王溃败「葭萌之战」·····	210
神秘莫测，「灵关古道」与「巴蜀图语」·····	218
异乡成故乡，新蜀国在交趾崛起·····	226
「乡愁」把成都少城搬到广州「泮溪」·····	234
「古成都人」南迁终点到底在哪儿·····	242
「南越王」奠定汉代中国新疆规模·····	250

中国之中，不在天下之中，而是文明之中。

越南冯原和成都平原相隔不远。

金沙城到越南河内，1 000 多公里。

用“成都模式”来治理。

“古成都人”积极地将成都平原实践多年的农耕灌溉技术传入红河三角洲。靠摘果子、打猎为生的土著部落，为了能够过上相对轻松的生活，开始走出丛林，加入了“古成都人”行列。

“瓯雒国”重复上演“箕子朝鲜”的故事。

“把成都少城搬到广州”。“泮溪”上的行宫，古成都城“少城”中一个“社区”的规模，模式也与“蜀王宫”的规制相同，纵横二三百公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国国都该有的都有。

文明世界从东向西，第一次“联通”。

中华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与征服”行动启幕。



“天下之中”的向心力。

开放性、发展性、创新性。历史上，成都经历过很多磨难，成都城甚至在洪水后的瘟疫中“毁城”，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奋起，砥砺前行……

自然条件优越、历史积淀深厚、文化底蕴独特，一种以文化、美学为优先的生活方式，孕育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贯通历史、当下和将来。

从5 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开始，优先、富庶、巴适、安逸的成都生活就已成习惯。1 000年时间做探索，2 000年时间打基础，2 000年时间做传承，历史的沧桑，仍旧焕发着迷人的魅力。

“汤继强线”柔性突破“胡焕庸线”。

引领世界城市3.0时代的一次重要机遇。

258

第十章

「双循环」的「摆渡人」

300

后记

史无前例的三百年移民潮	260
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	268
「蓉漂」一次次地变成了成都人	276
「古成都人」的微尘飘荡在故纸之间	284
打造中国「公园城市示范区」	292



欧亚草原广袤，诞生的很多民族、发生的很多故事，都在华夏体系内。

以长城为界，北方游牧族群，都把欧亚草原，作为疆场、马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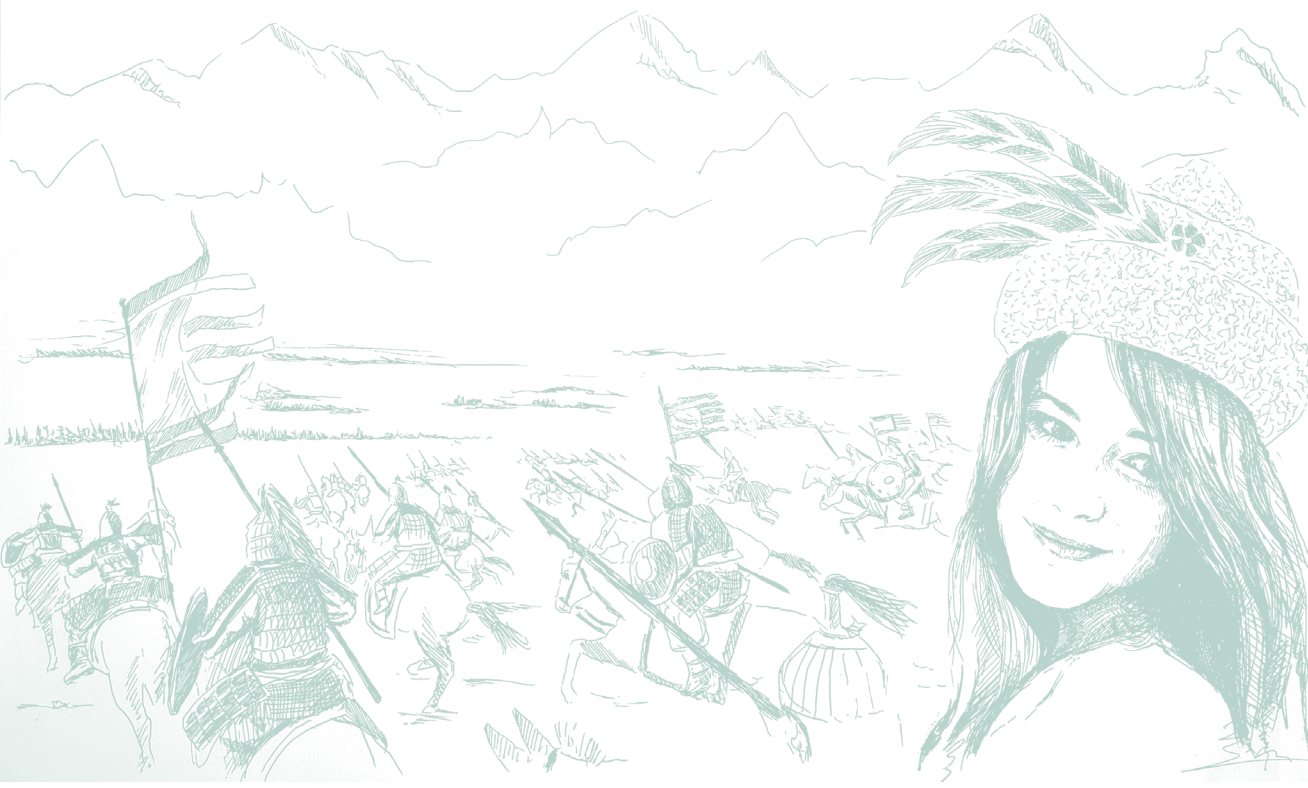
公元前1200—公元前1200年，三个文明古国被连续毁灭，使雅利安人充分相信自己的力量。雅利安人纠结北方各游牧族群的力量，南下发起进攻，激烈的「西北战争」打响。

中华文明保卫战。

战斗胜利。这场战斗倾全国之力，有行政力量的加持。必须由国家力量来抵抗野蛮，来捍卫文明。

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华夏文明四周的地理环境，使得外来强势文明，入侵的成本极为巨大。西边的丝绸之路等通道，又保证了华夏文明与其他优秀文明，源源不断地交流、互通。

在些许硝烟中，成都平原得到空前发展。





两个「超级大国」的较量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崛起，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成为世界霸主。苏联则在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美苏之间的较量，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肆

柒

捌

玖

拾

三星堆“首都”，金沙城“副都”。

血色青铜。就在成都上演“双城记”之前，中华文明遭遇第一次灭亡危机。

殷商武丁时期。

向东迁徙。从“内陆亚洲”，一支白色人种，浩浩荡荡，一路越过天山，沿着绿洲，穿过河西走廊，跟着黄河，走到河套地区，来到商朝腹地，接近现在四川区域的边缘，气势汹汹……

“匈奴”，先秦时期“北方诸族”的代词。

欧亚草原广袤，诞生的民族、发生很多故事，都在华夏体系内。

以长城为界，北方游牧族群，都把欧亚草原，作为疆场、马场。

在南下农耕区受阻，都会通过欧亚草原通道。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千年冲突。

游牧经济、部落社会。除了中亚的河中绿洲之外，历来是苦寒之地。游牧族群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生计不稳定，既有与农耕定居社会共生的结构体系，也具有机动迁徙、群居与擅长骑射等特点。

骑兵战斗力，远远强于大刀长矛的步兵战斗力。

游牧军团或国家，基本由多种民族组成的群体。

成为在现代枪炮出现以前最为优良的作战部队。

中国西北地区面积广阔，西部深入亚洲内陆。

“内陆亚洲”，泛指以欧亚草原为中心，东起中国东北，

西抵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北至俄罗斯南部，南达伊朗北部。包括蒙古、中亚五国、阿富汗等，多个游牧帝国的中心地带。

极为广阔。面积约800万平方公里。

也是如今“一带一路”的中心区域。

游牧族群折腾出一部华丽的诗篇。

从蒙古高原、西伯利亚高原，向西抵达东欧、中亚、南亚地区。

大江大河、高原、山脉、平原，交错纵横。

四种自然地理特征，包括：北方西伯利亚针叶林地带，南部又可分为东部的蒙古高原、西部的天山南北麓；更南方，青藏高原；西半部南端，包括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西边的伊朗高原，甚至远及两河流域与北非；西半部北端，西北欧亚草原，东侧起于哈萨克大草原，向西，延伸至喀尔巴阡山脉东麓。

雅利安人属于古印欧人。

公元前3000年以前，还是一个部落联盟。

古印欧人发源于欧亚草原的欧洲部分，原来生活在黑海、里海以北地区，主要在天气寒冷、耕地贫瘠的横跨亚欧大陆的高加索山脉地区。当时地球进入小冰河期，处于高纬度的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气候极为寒冷。游牧族群虽无发达文明，也无文字，却拥有先进的战争武器。他们武力强盛时，为了寻找水源、食物与女人，获取更多生存资源，就开始了搅乱世界文明的南下征程。

温带的农耕地区，吸引着各路北方族群。

规模巨大，世界性的游牧部落迁徙浪潮。

开启了一段影响亚欧大陆文明的大迁徙。

靠着尚武天性，游牧部落相继摧毁了三大文明古国，史称“印欧大迁移”。

同一纬度。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分别位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长江—黄河流域。四个大型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

游牧部落的漫长迁徙，长达2 000多年。

一路征伐。直到公元前500年才结束。

兵分三路。依靠发明的轮式马车、驯化的野马，古印欧人：向南，进入北高加索；向西，奔赴欧洲；向东，翻越乌拉尔山脉来到阿富汗高原，侵入印度地区和现在的伊朗地区。

温带的农耕地区，吸引着各路北方族群。规模巨大，世界性的游牧部落迁徙浪潮。开启了一段影响亚欧大陆文明的大迁徙。靠着尚武天性，游牧部落相继摧毁了三大文明古国，史称「印欧大迁移」。

大约公元前2000年，欧洲中部和南部、莱茵河到里海的广阔区域，古印欧人的一支雅利安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生活在广袤的草原、丛林开阔地，生活比较简易，经常游弋，迁徙不断。

满欧亚跑时，他们突然学会青铜器的制作。

到了大约公元前1500年时，科技再次提升，出现了铁器。

已知最早学会冶铁的民族。

而且，学会驯服马匹，攻击力发生巨大变化，开始了无往不利的扩张。

浩浩荡荡。雅利安人从小亚细亚东部分几批次，横穿安纳托利亚高原进入欧洲。

迁徙到地中海一带，冲击当地文明，希腊人被迫从多瑙河，迁徙到马其顿，取代克里特文明，进入西方学者所谓的“黑暗时期”。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将数千年的文明一扫而空。

还成功迁到欧亚草原的中亚地区。

大航海时代前。来自东亚、南亚和西亚的商团、使节、移民，都会通过内亚来交流和进行贸易。东南亚的香料、东亚的丝绸、西亚的贵重金属货币，都须经过内亚商人之手。

内亚西边。雅利安人最开始居住的高加索山脉。

道路艰险，沿途密布各大险峻山脉、干燥的沙漠地区，使原本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到中亚后损伤大半，面对数量、种类繁多的游牧族群，只得以“间歇性”的方式，不断向南方迁徙。

无论高加索山脉，还是中亚地区，都属高纬度寒冷地区。

适者生存。这里的居民必须具备强健的体魄、优秀的打猎能力。

通过漫长的演变，逐渐形成以骑马、打猎为日常活动，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喝牛羊奶、吃牛羊

肉的饮食结构；长期通过在马背上迁徙，日夜防备周边民族，发动战争来生活。

拥有健壮高大的体形、较为先进的作战技术。

成为漫长历史中，令华夏族群头疼的游牧族群。

内亚地区，先后出现过尚武的古印欧人，骁勇善战的匈奴人、羌人，作战实力强悍的蒙古人，即使到了唐朝，还有中原统治者视为心腹大患的游牧民族等。

为在中亚生存、发展，雅利安人不得不与同样强壮的民族争斗，对外扩张。

一支，向东迁徙。在中亚附近分开，发动对南方文明的入侵。

公元前1500年左右，最初来到印度次大陆。

征服印度。雅利安骑兵从西北方向进入。面对印度次大陆上一盘散沙的国家，白皮肤的雅利安人，击败了当地棕黑色皮肤的印度人，来到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平原。

在印度河、恒河流域定居，建立“吠陀”文明，产生了婆罗门教。

以肤色为界限，雅利安人把自己列为最高种姓，肤色越浅的人地位越高，创造印度文明的印度土著，则成了地位低下的人。印度最出名的释迦族，就是雅利安族的一个支脉。

建立种姓制度。

最低等级“首陀罗”，被征服的居民、零散的部落成员，主要从事农、牧、渔、猎与各种低贱的职业，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参加宗教仪式，高种姓者杀死他们，只不过像杀死青蛙或乌鸦一样。

排斥原住民，到如今还保持白种人特征。

在政治上，印度取消了种姓制度，但其依旧根植在整个国家的终端末梢。在如今的印度军队中，低种姓的贱民，没有机会成为军官，高级指挥官只能由高种姓中的贵族种姓担任。

种姓制度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法律。

“婆罗门”在印度各地，仍然处于社会金字塔结构的最高层。

雅利安文明在印度生息约200年后，记述历史、赞美雅利安人辉煌的诗歌集《梨俱吠陀》，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陆续写成。“吠陀”本义，是知，知识；“梨俱”，作品中诗节的名称。

既是宗教经典，又是史料总汇。

至今，被称为完整文献体系的“圣书”。

诗集对“雅利安”描述得相当清晰：外来部族，主要定居在旁遮普与邻近地区，使用共同的语言，信仰共同的宗教，自称为“雅利安”（梵语音译）。名字含义为“高贵的”“尊敬的”。

比中华文明起源更早的印度文明，在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逐步衰亡。原住民被禁止学习，意味着文化的匮乏，印度历史上也基本没有统一的局面，这是其没有国家、民族认同感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雅利安人也有部分人独辟蹊径，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来到了如今的伊朗高原地区，第一次出现的记录——被公元前九世纪亚述人所记载。

向西，达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时，被两河流域的物质文明震撼。

在《圣经》中，美索不达米亚，称为“示拿地”，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开始，没有和古巴比伦人发生战争冲突，在周围建立许多小国家。古巴比伦起初也并没在意。后来雅利安人的政权形成统一的波斯帝国，劫掠一番后，遂向东开拓，并把小麦种子、绵羊带走。

公元前538年，通过战争，吞并古巴比伦文明。

然后，以阿拉伯半岛为跳板，征服埃及文明。

首次征伐。古埃及和雅利安人，确实没有发生过冲突。

如法炮制。出现一支足以对抗埃及文明的帝国——庞大的波斯帝国，一次饮马尼罗河，埃及文明已经是日薄西山，如同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的病人。少数埃及上层靠着尼罗河提供的丰厚产出，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手腕，对如何真正提升国力却很不热心，完全无力对抗强大的波斯帝国。公元前525年，埃及被并入波斯帝国。

有的文明被同化，有的被毁灭而消失。

文明断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被伊斯兰教文明取代，只留存下金字塔、巴比伦神庙之类的遗址；古印度被雅利安人入侵，古老文明断绝，本土的土著居民，也成为下等人。

以至于如今，从印度到欧洲地区的语言，叫作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语言是其中一种。

英语，也是印欧语系的一种。

“地理阶梯”的选择。没有天然屏障，四通八达，最容易被灭亡。印度、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开伯尔山口，进入的最好通道，雅利安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都是从这里进入印度。

底比斯与埃及，宛若周秦时期的关中之于华夏。

不同之处，关中地区曾长期担负天下粮仓的责任，直至经济重心完全南移成都平原后。古埃及的三角洲与底比斯“劳燕分飞”，埃及政权南北来回迁移，使得龙兴之所与国本之地始终无法重合。

游牧族群跨越高山大河，一路进化，从游牧状态进化到青铜文明，征服迁徙路上遭遇到的其他文明。迁徙过程漫长，后来的迁徙者，同样也会对前期迁徙的印欧人建立的文明，进行毁灭、征服。

迁徙、征伐中，古印欧人中的雅利安人，也称为斯拉夫人种，沿着欧亚草原继续向东，居然翻越了高耸入云的喀喇昆仑山脉，奇迹般地翻越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的最低洼处的“小河”一带——著名的“城廓之国”。

曾经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家——楼兰，位于罗布泊西部，处于西域的枢纽位置，疆域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东通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

连绵60公里的罗布泊大河谷，湖泊纵横，水草丰美。

《汉书》记载：“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

罗布泊，又名罗布淖尔，位于新疆东南部。长约60公里，宽30公里，明暗相间的半环状线条，一圈一圈地向中心收拢，形状宛如人耳，被誉为“地球之耳”，又被称作“死亡之海”。

这一带被水滋润。一个密布的湖泊群。四周山脉中孕育出的河流，孔雀河、车尔臣河、中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等，甚至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纷纷奔流而来，形成数十个大小湖泊。

河网纵横，水草丰美，绿洲繁茂、胡杨成林。生命绽放，美丽的胡杨或独木自赏，或三五为伍，或成行成排，或与一波清水相映，浑似江南水乡，包括候鸟在内的各种动物栖息其间。

迁徙、征伐中，古印欧人中的雅利安人，也称为斯拉夫人种，沿着欧亚草原继续向东，居然翻越了高耸入云的喀喇昆仑山脉，奇迹般地翻越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的最低洼处的「小河」一带——著名的「城廓之国」。

直到今天,罗布泊有记录的鸟类仍有151种,爬行类17种、鱼类11种、哺乳类33种。

野生双峰驼,一种比野生大熊猫还要稀少的动物,当地种群数量占全世界的60%以上。

早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吐火罗人在此已经定居500年以上。

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新疆先民,欧亚混合族群。

北面的孔雀河(库姆河)、南面的塔里木河之间的小河流域,先民的活动区域。传统领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疆界以北,天山;以南,昆仑山;疆界以东,戈壁滩;以西,帕米尔高原。

青铜时代。已经掌握灌溉、制铜、纺织技术,开始大规模开发家园。他们从中原引入黍,经欧亚草原,向东欧传播;从西亚引入小麦,向中原传播,开垦出大面积的农田,饲养牛、羊。

切皮革为鞋靴,纺毛绒为毡帽。

还有如短裙般的女式腰衣。

与周边东方人群混血,形成相貌俊美的混血儿,女性白肤栗发,眼大窝深,鼻梁高而窄,下巴尖翘,头戴尖顶毡帽、斜插禽鸟翎毛。考古学家通过人骨鉴定,发现其父系普遍为西方谱系,母系则为混合。

亚欧混血。遗传学上,却是东亚人种。

融合通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

在夏朝,伊朗和中国之间就有一条商路,吐火罗人则是此商路上的主人。

他们信仰灵魂不灭,以保护好祖先灵魂寄寓之所为头等大事,频繁举行隆重的原始宗教仪式。充足的胡杨,提供了最佳的原材料。他们打造数量众多的船形木棺,祖先们面向沙海,踏上黄泉之路。

生殖崇拜。棺上立柱者,象征男根,代表墓中为女性;棺上立扇形木者,象征女阴,代表墓中为男性;男根、女阴,立木高达3至5米,组成神秘而惊世骇俗的生殖崇拜的文化景观。

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融入当地文化,形成“小河文化”。

“小河墓地”。新疆楼兰古城遗址。

位于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60公里的罗布沙漠中。

“小河公主”,最美的楼兰美女,一具年轻女性的木乃伊,头戴尖

顶毡帽，双眼微闭，眼睫毛楚楚动人，像一排幼松似的挺立着，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勾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凝固、永恒的微笑。她是具有欧洲白种人特征的美人。

从3 600年前的随葬品中，鉴定出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奶酪实物。

牛奶，第一次进入新疆先民的食谱。

“七”，一个频繁出现的神秘数字。

对天、对太阳的观察，与早期人类萨满崇拜中的天、地、人三界九层观念，存在关联。



陆

柒

捌

玖

拾

定居活动很久，形成了斯基泰人。

气候变化，“小河人”一路逐水草，向内地迁移，沿着塔里木河向东游牧，沿途分散部分族群。雅利安人继续向东前进，沿着祁连山，来到了黄河河套地区游牧。

夏朝、商朝，都曾在罗布泊地区，对入侵的古印欧人发动过大规模的征伐，无数战士被埋于黄沙之下。结合发现的大量尸骨来看，能证明《山海经》与甲骨文里的记载的真实性。

中原处在龙山文化时期，内部混乱。

雅利安人从陕西、晋北，挥师南下抢掠，野蛮地摧毁晋南的陶寺“尧都”，逼迫尧舜族人南迁，对中原文化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整个山西、陕西和内蒙古南部，相继落入其控制中……

《辞海》中解释，雅利安人远古在中亚地区的部落，从事畜牧，擅长养马、骑射，有父系氏族组织，进攻性强，喜欢征服别人的土地。信奉太阳神，以辐射形状为象征，如十字、卍字。

天生适应寒冷气候。

由于日照稀少，体内只需少量黑色素吸收紫外线，有了金发、碧眼、白肤的体征。从面部结构上看，非常漂亮，五官端正，皮肤白皙，鼻子坚挺，眼睛凹陷，闪着蓝光。

苦寒之地的族群，没有一个不向温暖地区入侵。

游牧族群进入中国，或从蒙古高原南下，或从中亚阿尔泰山脉东进，或从印度平原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或翻越葱

岭，途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广袤无人的西北大戈壁地区。路途本就遥远，还涉及后期补给、运输工具、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在路上就有不少人病倒，或者死亡。能够真正进入中原地区的，人数、实力，也可能会大打折扣……

夏朝末期，教化未始，集中力量“内循环”，似乎有些无暇顾及。

雅利安人定居活动很久，在西部建立了一支强大部落——“鬼方”部落，商朝初期严重的外患，武丁时代不断“南下”“东去”，经常发动劫掠战争，还要掠夺人口，奴役百姓……

公元前1400年左右，统治中原地区的殷商王朝，在中国的西北方，即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一带，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败侵略到中原地区的雅利安人。

“西北战争”。

一场局部战争。雅利安人暂时后退。

积蓄力量，伺机进入“河西”。

200多年后，卷土重来。

继续东扩。借道印度、中亚，进入西藏、新疆。

活动范围渐渐到顶峰，到达了黄河河套地区。

在燃烧的废墟之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秩序。

雅利安人又一次进入中国中原政权的势力范围。

阻断商朝与西域的玉石贸易之路，无异于断粮。

陆地上的“马六甲海峡”。

河西走廊，一片堆积平原，东为乌鞘岭，西为新疆与甘肃的交界，南为祁连山，北为合黎山，长约1 000公里，宽约200公里，因地形狭长，犹如一条大自然为人们修建的走廊。

民间交往的“过渡地带”。

高山、谷地、绿洲与荒漠，域内外族群携带着各自或共享的文化，沿中亚、新疆、甘肃的贸易通道，进入河西走廊腹地，农牧文明交融。中华文明和汉文化，经过河西走廊西向传播；西方的科技、艺术、语文、宗教、饮食、服饰，也经此东向，传入黄河流域……

黄河中游的中原，通过华北北部、河西走廊的过渡带，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等地区“循环”。体现在青铜技术与器型的传播上，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对铜、青铜技术，在西北地区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有互动；南西伯利亚地区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工具、兵器等，与

雅利安人来了后，「西北走廊」的河西地区便成游牧乐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足以拦住雅利安人隆隆向前的脚步。咄咄逼人。西方史学家认为，雅利安人在此盘踞达200至400年之久，对殷商政权压迫巨大。生死存亡。第一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危机。

蒙古高原、华北殷商王朝的青铜器相似，与卡拉苏克文化中，有着大量华北类型蒙古人种人口互相印证。

横在“西北走廊”上的“黄金带”。

小麦、黍的“中介”。一面，原培育于黄河流域的黍，在俄罗斯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尔泰和天山东部、西面的东欧大草原等地分别被发现；一面，小麦沿着草原通道，也传入中国北方。

畜牧业强大，九州中的雍州之地。

“天下要冲”。西汉称“凉州”，简称“河西”。

一条远古的丝绸之路，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系统，人文宗教荟萃，族群环境复杂，生活方式多样，多种文化和文明源头、通道。从新石器时代前后，这条路一直存在于东欧和中原、华北之间，黑海与里海沿岸是必经之地，华北的农牧结合地带，文化的边缘，远处可能达长江流域。

边疆族群与华夏部族的交互中心。

雅利安人来了后，“西北走廊”的河西地区便成游牧乐园。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足以拦住雅利安人隆隆向前的脚步。

咄咄逼人。西方史学家认为，雅利安人在此盘踞达200至400年之久，对殷商政权压迫巨大。

生死存亡。第一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危机。

古印欧人、雅利安人的长相，与中原人区别很大。

华夏民族将“西北部”笼统地称“鬼方”，鬼住的地方。

“鬼”，说文解字，异种之人，如鬼方、媿、隗等。

“鬼方”本意，“在一个叫隗的地方”。

与突厥类似，发源在北方蒙古高原的本土游牧族群，最终，从西北跨越千里，曾经抵达西南，在云

贵一代定居，最终融合在当地族群之中，与“鬼”没有关系。

曾与黄帝联姻的大隗氏氏族的后裔，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商周时期，入侵印度的古雅利安人，有了“鬼方”“西戎”“鬼羌”的名字。

大致在今天的漠南，势力延伸到了陇西、渭水。

不容忽视。中国历史上不少时期，都存在内亚性。

高地的半月形地带。亚欧大陆北边通畅，交流至少一万年。

炎帝，行走最常规的北方丝绸之路，黄帝走更北的草原丝绸之路。

欧亚白人定居中原地区，实属正常。

白人游牧民族也存在于中国的古籍中，有人认为“大月便是”。隋唐时期，粟特人通过河西走廊来中国经商、定居的人很多。

内亚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重要纽带。

“边缘”地带的历史推动力量。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以农业地区为中心的中原，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文化交流的结果，有内亚民族“汉化”彻底的一面，也有华夏被“内亚”文化影响的一面。

奔驰在欧亚草原上的野马，远比家马强壮、轻捷和桀骜不逊。马是古代战争和交通的重要工具，又是肉食品的重要来源之一；属于战略物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来为人们所高度重视。

在中国，与“五谷丰登”相对应的，便是“六畜兴旺”。

六畜，以马为首。

三字经中，有“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在中国，“商”的本义是长途交易、贸易。

与“行商坐贾”有别，商人就是流动商旅。

商朝，一个长途贸易集团组成的国家商团。

商朝的青铜文化在西伯利亚，与欧洲的青铜文化联系在一起。

东西方文化交流由游牧族群的迁徙来实现，偶然性大、规模小、持续时间长。

公元前1260年至公元前1200年，三个文明古国被连续毁灭，使雅利安人充分相信自己的力量。雅利安人纠结“北方诸族”各种游牧族群的力量，南下发起进攻。

华夏文明还处于雏形时期。

面临极具压迫感的劲敌。

文明形式脆弱，如同一棵小树苗，一场暴风雨就能将其摧毁。

雅利安人组成的“鬼方”、北方游牧族群，不但人种、文化都和商朝格格不入，还保留着强烈的侵略、毁灭惯性。尽管没有自己的文字，战斗力却非常强，不仅有精良的青铜兵器，而且有驯化的家马、两轮战车技术，沿着欧亚草原东迁，势力已经南下到了河套平原一带，进入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山西北部……

史无前例。严重威胁到商朝和中华文明的生存。

武丁之妻妇好主动提出，统率士兵，抵抗外敌。

商王不仅是一国之君，更是宗教里的最高领袖。

中国唯一“政教合一”的朝代。

绝大多数宗教，天然具有扩张性，多半还有血腥扩张。

商王朝也正是如此。

缺一不可。国土安全与文化安全。

明线，侵略与反侵略；暗线，对本位文化的戕伐与自卫之争。

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很胶着。

焦头烂额。武丁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群臣议论纷纷。

皆无良策。对于让女子统率上战场，武丁犹豫不决。妇好有勇有谋，建议聚全国之力征伐。《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羌患不除，商无宁日。”

商国内，众志成城，募集兵员，厉兵秣马。

妇好，举足轻重。

面对外来入侵，多次率领商朝军民与入侵者作战。

肃穆的宗庙内，烟雾缭绕。

公元前1200年左右，商朝的都城中。

占卜官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正进行一次极为重要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将决定一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商朝的西北方向，不断有外敌骚扰，掳走人口，抢掠财物。而派出征讨的队伍，已经数次大败而归。要不要继续派兵？

牛骨发出裂开的脆响。

占卜官认真研究牛骨上的裂纹，露出了欣慰的神情——今天，我们可以在一片牛骨残片上窥见这次占卜的结果：辛巳这天，大王征兵，命令妇好率众讨伐土方，神灵会保佑吗？——吉利。

应该继续派兵，尽管派去统兵作战的将领们已屡次失败。

最终通过占卜预测，武丁同意让王后妇好出征。

妇好，商王武丁的妻子，难道要让王后领兵远征？

国家的大事，除了祭祀与占卜外，就是保卫边防、开拓疆土与掳掠奴隶的征战。武丁在位59年中，频繁出征作战，先后征服了西北、东南的周边部族，极大地扩充王朝的版图。

卜辞记载：“辛巳卜，争贞：今者王共人呼妇好伐土方。”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比沚戠伐巴方，王自东亳（薄）伐捍，陷于妇好立（位）。”

贞：王令妇好比侯告伐尸方。

在甲骨文中，有“己酉卜，宾贞：鬼方易。亡祸五月”“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妇好其比沚戠伐巴方，王自东亳（薄）伐捍，陷于妇好立（位）”“王令妇好比侯告伐尸方”等记载。

“鬼方”就在西北，位于如今的新疆、宁夏、陕甘等地区。

被称为“鬼方”的雅利安人，武丁妻子妇好领兵征伐。

合情合理。白人属于外族，又不时入侵商朝，被称为“鬼”。

决战外族，取得胜利，仅靠决心、信心不行。

不但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强有力的指挥者，还要有强大的军事技术的支持。

灿烂辉煌。“武丁中兴”时期，中国的青铜文明达到鼎盛。已经出现斧、钺、刀、戈和箭等青铜兵器，还配置了马拉战车等野战装备，在技术与装备上，可和雅利安人媲美，甚至还略高一筹。

商朝早早就开始战争准备。确保武器装备优势。

对武器装备大规模的升级换代。

虽然农耕各族上层文化开始趋同，政治上仍然彼此分明。从这一刻开始，商作为部落联盟统领，需要承担起更大责任，向其他农耕部落提出的要求更多。政治中心化，中央集权化自然启动。

面对被称为“鬼方”的外来者，商朝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剿灭的征兵命令。

中央政府把征兵命令，发布到统治范围内的每个部落，一旦征战，即可招募入列。

商朝不仅军事技术上不逊，还有更大的人口优势。

虽然农耕各族上层文化开始趋同，政治上仍然彼此分明。从这一刻开始，商作为部落联盟统领，需要承担起更大责任，向其他农耕部落提出的要求更多。政治中心化，中央集权化自然启动。

自古，战争的胜负归根结底在“人”。

妇好挂帅。公元前1219年，妇好带领商朝的军队同雅利安人开始决战。

越过太行山，渡过黄河……

大军长途远征，除自己带的口粮之外，粮草补给也得跟上。

武丁发动数十万奴隶，保障这支万人远征军的后勤。

“以士为兵”。妇好率将领沚、侯告等，兵卒约13 000人。

3 000人，妇好的私属；10 000人，商朝的半常备军。

“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弇旅万，乎伐羌”。

甲骨文中殷商出兵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热兵器发明以前，骑兵，威力最强的兵种。

商朝，一个流动的朝代，迁都多，对外影响也大。商朝造出马车，用马挽车，通过战争、商业交换，使得各地的人进行交流。游牧部族居住营幕，把整个营幕驾在车上，成为“行屋”。

上阵打仗。马拉的一种轻便的车辆，称“戎车”。

大草原西部游牧族群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已经开始入侵西亚各国，战车成了所向无敌的武器。上古时代，马仍是贵重的畜类，一般车辆，用牛或用驴拉，只有中国用马拉车比较普遍。

商朝自制的战车，并非学自游牧部族。

他们骑在马上，来去如飞。

在此以前，无人骑马征战，骑驴的也不多见。在边境，游牧族群能够经常向农耕部族袭击、侵掠，可主动地选择比较弱的据点袭击，也可以少胜多，甚至一掠而逃，使农耕部族较大而集中的队伍，处在措手不及的被动状态下。

“骑射”，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出现，一种新的作战技术。

训练有素的骑兵，既能发动排山倒海般地正面突击，也能实施昼夜不停地长途奔袭，出现在战场上，往往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商代就有官办的马匹饲养管理制度，称为“马政”。

“马政”一词，《礼记》最早记载：“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

马政制度延续了近3 000年。

殷墟发掘过一人一马和随身武器装备的骑士坑、大量的殉葬马坑。

在古代战争中，骑兵本身就是一个“BUG”般的存在，对战传统农业文明国家时，军事上优势巨大：骑兵对战步兵时，获胜往往是歼灭战；步兵获胜，击溃战。骑兵机动灵活，可以长途奔袭，对游牧族群，作战时往往不需要补给线，可以携带大量的牛羊，打到哪儿就在哪儿放牧。对于传统农业文明国家，士兵多数为步兵，一旦补给线路被切断，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游牧族群在军事上有天然优势。

商周时期的游牧族群，不仅有匈奴的祖先“鬼方”，还有巴方、朔方、土方、羌方等。

山地狩猎、种植、畜牧三合一的族群。

到了周朝，“鬼方”后裔北狄隗姓诸侯国，依然长于步兵，短于驯马。

华夏诸侯反倒比游牧部族还会驯马，“鬼方”中一部分最终成为骑马民族，是因被华夏族人持续地挤压生存空间，不断地向北、再向北迁徙，然后，慢慢地被匈奴同化、融合。



陆

柒

捌

玖

拾

来自东方西方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较量。

一场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今天中国大西北。

战争在河套平原、冀州北部多个地方打响。

商代骑兵不仅投入战争，还广泛参与各项军事活动。

守卫边境和巡逻，“贞令马卫于北”“贞令马卫，亡盖”。

骑兵队的长官“多马亚”，有时还奉王命巡视，“氏多马亚省在南”。骑兵也投入围猎，一如后世各类游牧民族军团的军事演习。

在围猎中，骑兵们“多马逐鹿”驱赶野兽，或纵马射猎野兽。

“其射豕，唯多马”“其令马亚射麋”“唯多马乎射，擒”。

商朝的士兵装备精良，有青铜盔、皮甲、强弓大矢、青铜戈、斧钺、卷头大刀、兽头小刀和磨刀的砺石。马拉战车，一般15人一组。车上配备驾车人、弓箭手。

还喜欢戴一种夸张可怕的铜面具、铜盔。

既有效保护头部、面部不被重创，又能够在气势上压过对方。

能远距离骑射，用弓箭杀伤，也能抽戈执刀，进行激烈的近身搏杀。武器装备，已经不亚于后世持鹤嘴斧、弓箭作战的轻装斯基泰骑兵，超越同期或者稍晚出现的叙利亚阿拉米人骑兵。

骑兵编制并不小，“贞肇马左右中人三百”，100辆战车上的300名甲士，在妇好统一号令下，以三个骑兵百人队为基础编制的作战部队，“马其先，王兑从”“三十马允其执羌”。

“马其先”。在战役开始前，骑兵队开路先锋进行侦查；战斗爆发后，“来告方大出，伐我师，唯马小臣（执行作战行动）”；当敌人反攻时，骑兵部队要“共马乎伐（灭）”。

一个人倒持斧钺，作欲劈砍状。

甲骨文上的“伐”，战斗进入短兵相接阶段的象征。

军队排列前进，从右、中、左三个方向，将敌人合围。

冲破侧翼，直奔“鬼方”主帅的位置。

这时，英武的主帅妇好挥动大钺，发出总攻信号。

战象军种。一群大象从旗帜下冲出，象背上的弓箭手，居高临下射击。

“鬼方”从来没有见过庞大无比的动物，纷纷退避。

商军趁机发起猛攻……

“贞唯马亚乎执”“三十马允其幸羌”，追击溃逃队伍，捕捉俘虏。

强大的殷商王朝，“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战争持续时间长达3年，投入兵力数万人，超大规模的动员。

战斗胜利。这场战斗倾全国之力，有行政力量的加持。

必须由国家力量来抵抗野蛮，来捍卫文明。

最后决战。侵略者“鬼方”大败，入侵者成为商朝奴隶。

按《周易》中记载：“鬼方，国名，古代西北地区部落之一。”

《竹书纪年》中有记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即武丁三十二年时讨伐鬼方，三十四年将其打败。最后，鬼方对殷商俯首，再未敢犯。

有史记载，第一场由女人指挥并取得巨大胜利的战斗。

商王武丁曾经花3年多的时间集中讨伐鬼方与土方。

战争条件极为艰苦。

武丁曾经7次征兵，先后征召2万多人参战，几乎竭尽商朝的全力。

妇好一路追击，从现在的陕甘宁一带，把鬼方赶到今天新疆和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

被逐至此的雅利安人，便在此繁衍生息。

一边面对兵强马壮，综合实力强大的殷商，一边被严苛的生存环境、频繁发起战争的游牧民族所折磨，即使有着卓越的作战才能，最后，也只能败于殷商铁骑之下。

战争条件极为艰苦。武丁曾经三次征兵，先后征召10万多人参战，几乎竭尽商朝的全力。妇好一路追击，从现在的陕甘宁一带，把鬼方赶到今天新疆和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

内亚地区，分布着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众多艰难险阻的山脉，适合居住的地方极少。雅利安人属于外来的民族，抢占不到最好的土地资源，只能居住在寒冷且食物稀缺的草原地区。

苦寒的居住条件，注定繁衍速度颇慢。

一旦出战彻底失败，中亚雅利安人就会受到重创。落后的医疗条件、极端的生活环境，使得那些受伤的战士难以存活，还要面对众多游牧民族几乎不间断的偷袭。

“鬼方亦牧我西曷田”，按照由甲骨文编成的殷历年谱，殷高宗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朝廷获报鬼方从东西两面同时进犯。经过九个月的动员准备，次年春，战争正式在内蒙古、河套地区打响。

《易传》：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惫也。”

《汉书》高宗彤日说：“内举傅说，授以国政，外伐鬼方，以安诸夏。”

征服“鬼方”。战争旷日持久，彼此筋疲力尽。

战争的胜利，让北方游牧族群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

拉开中国文明系列决战的序幕。

中华文明得以相对生存与延续。

战争的重要性，不亚于史学家歌颂的黄帝的阪泉、涿鹿之战。

“妇好墓”里存在大量欧亚人殉葬，结合甲骨文记载与“鬼方”作战的内容，成为奴隶的雅利安人等北方游牧族群，最终都进入商朝贵族的殉葬坑中。根据殷商王朝“奴隶殉葬”的风俗，殉葬坑里的头骨属于与殷商王朝作战失败，沦为俘虏的雅利安人。

“中华第一女将”。

唐平阳公主、南宋梁红玉、明末红娘子、太平天国洪宣娇等女将，相比妇好逊色很多。

武丁改变战略，由消极防御，变为主动出击。

岁月激荡。妇好为三军统帅，手使一柄大钺，即大斧子。钺重8.5公斤，青铜打造。率领军队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先后击败了北土方、南夷国、南巴方，以及鬼方等20多个游牧部族小国。

还曾率兵镇压奴隶反抗斗争。竭尽全力维护商王朝的统治，不仅为商王朝解决边疆的威患，而且还为商朝，甚至华夏族开辟新的疆域，为继后的周朝促进民族大融合，做出奠基性的贡献。

华夏民族的骄傲，更是女子的楷模。

现存的甲骨文献中，名字被提及200多次。祷告的内容，体现了武丁对于妇好无微不至的爱，几乎涉及妇好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征战、疾病、生育，甚至包括去世后的状况。

有次，妇好打个喷嚏，但这在武丁眼中非比寻常，举行大型祭祀，急切地询问上天，妇好的身体是否有恙？牙疼也是小病，又召集文武百官举行大型祭祀，询问上天，对身体是否有大的影响？

用情至深，妇好身为皇后，独得恩宠。

33岁那年，妇好因战时的旧伤复发，不治身亡。

妇好为武丁留下一个儿子，叫孝己。

妇好在艰难中，为武丁生育的女儿是谁呢？

武丁至少有两个女儿担任过商政府的官员，与妇好一样拥有自己的封地。她们是子妥、子媚，即子妥鼎、子媚鼎的主人。谁是妇好的女儿？也许除了子妥、子媚，还另有其人。

“妇好”的死，有两种说法。

难产而死。甲骨上记载：“……出贞……王……于母辛……百宰……血。”这是产后大出血，即民间所说的“出红”。

因战争中的伤病而死。“大将难免阵前亡”，或是战伤复发而逝。那时的战争，就是大规模的械斗，很难不负伤。妇好为国捐躯，死于阵前，也并不让人意外。

武丁十分悲痛，主持盛大葬礼，率领儿孙们为妇好举行多次冥婚，将她的幽魂，先后许配给三位先商王——武丁的六世祖祖乙、十一世祖太甲、十三世祖成汤，护佑另一个世界的妇好。

有三位伟大先人，共同照看妻子，妇好在阴间定能过得快乐安和。

拥有国王武丁一世的深爱。

穿越千年，仍震撼人心。

妇好墓内所出玉石以新疆玉为主，多为透闪石，也有阳起石。

《竹书纪年》记载：“妇好率军西出，斩白首两万余”。

“白首”，即“白色的头颅”，指的就是“鬼方”人。

新疆离河南相隔数千里，妇好打到新疆。

击败东进的白人后，顺便采集大量玉石。

妇好将一批白人俘虏，带回朝歌，或用于祭祀，或用于殉葬，或用于奴隶劳工。后人在殷墟中发现白人头骨原因所在。黑人头骨，可能是这批白人征服非洲时的俘虏。

战利品还有小麦种子、绵羊。

华夏民族的农耕生产，有了高产的小麦种子。

急风暴雨中，初具规模的华夏文明屹立不倒。

成为整个人类接下来近3 000年文明的灯塔。

“玄鸟熊罴犬狼雄凤鸟(雌，凰鸟)”。

商朝的图腾为“玄鸟”，西方人惧怕“玄鸟”源于商朝。

打败“鬼方”后，武丁把自己的妻、子、功臣与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被征服地区，被分封者称为侯或伯，也成为后世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商朝“八百诸侯”典故的来源。

对“鬼方”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周朝。

公元前979年，孟凯旋时向周康王献俘，周王欣喜不已，当场下令铸造小孟鼎，铭记胜利。周朝末年，臣服的“鬼方”已断崖式衰落，无法再同中原王朝相提并论。幽王、平王时期，“鬼方”被周人蔑称为“戎”“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将“鬼方”蔑称为“獫狁”；到了秦汉时期，人们干脆都不知道“鬼方”了，“鬼方”早已被吞噬在浩瀚的历史之中。

周取代商后，臣服于商朝的“鬼方”继续臣服于周朝，不断内迁。

周成王“桐叶封弟”，分封给晋国的怀姓九宗，出自“鬼方”的隗姓。

据苏联、俄罗斯与我国的考古发现看，商朝时期，确实有一支文明不断向北迁徙，在西伯利亚地区定居。“鬼方”演变成“丁零”（高车）族，始称“狄历”，成为匈奴族的先祖之一。

西域地区族群部落众多，争斗不断，一个部落的崛起，往往伴随另一部落的陨落。被抓住的失败者，会沦为奴隶；逃跑的残部，也往

往会被大的部落兼并，带来民族、部落的融合。

落败后的“鬼方”，真正下落如何？

远遁、隐匿，抑或迁徙，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

人口凋敝。雅利安人的“鬼方”，逐渐分成三派。

一派选择臣服商朝，仍居原地，利用殷商的贸易政策，换取生存的必备物资，逐渐被商朝同化、吸收；一派被打得解体后，退守河西走廊深处，隐藏起来，重新变为北方游牧部落，重组后变成匈奴的一部；一派选择迁到南西伯利亚、东起贝加尔湖、西至巴尔喀什湖的地带。他们和商朝也有联姻关系，时打时和，与后世汉朝和匈奴的和亲关系非常类似。

后两派成为匈奴的主体部落。

中原人统称北方的游牧民族为“胡人”，后称为“匈奴”。

身处中原北方的燕国、赵国，开始修筑长城，防止“胡人”南下牧马。

“铁打的漠北，流水的游牧民族”。

一个部落联盟，匈奴并不是一个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匈奴人也在草原上相互攻击。

直到战国末期，已统一漠北高原，也准备南下牧马。

“北匈奴”。从淳维，到匈奴首领头曼千余年，部落时大时小，流离不断，到首领冒顿时，匈奴最强大，打败所有北夷，与中原汉朝为敌，王族的世传、国名、官号开始流传、记载。

汉人的兄弟，匈奴人也承认。

南、北匈奴的分裂，势力再次受到削弱，由盛转衰并西迁的转折点。

在汉朝的帮助之下，南匈奴打败北匈奴。

俯首称臣。“南匈奴”以示诚意，迎娶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

“北匈奴”的残余人马向西北逃窜，与内亚及欧

一个部落联盟，匈奴并不是一个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匈奴人也在草原上相互攻击。
直到战国末期，已统一漠北高原，也准备南下牧马。

洲的许多部落融合,形成匈人,建立匈人帝国,向罗马帝国宣战。强悍、勇猛,让整个欧洲都为之颤栗。

与汉族杂居,一个混合的部落联盟,在征服西域、河中地区时,俘虏了大量的白种人,把他们编在一起,由于受歧视地位低,只能抱团取暖,最后形成一个新的部族——羯族。

“南匈奴”依附中原王朝后,逐渐再被汉人同化……

根据匈奴墓葬的文化、NDA分析,南匈奴、北匈奴区别较大。

“北匈奴”,源于蒙古国的石板墓文化,Y染色体大多是Q、R、J、E、N等,和西亚、中亚、东欧民族联系紧密;“南匈奴”,始于源头为河套文化的鄂尔多斯文化,Y染色体主要是O3和C2,其中O3比例很高。汉族的主体就是O3。

河套文化离不开五个自然人文元素:黄河、草原、阴山、战争和移民。

河套匈奴文化,鄂尔多斯文化的重要内容。

欧洲匈人的白种人成分比匈奴人更高,欧洲人依然将他们看作是黄种人。

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分布颇有规律。

往西,白种人的比例越高;往东,黄种人的比例越高。

游牧部落的人种十分复杂,有黄种人、白种人,甚至棕色人种,相互通婚,混血频繁。

退守河西走廊深处一派的雅利安人,变成战国时期的大月氏部落。

向西迁徙。大月氏人生活在现在的青海、甘肃分界的祁连山群山中,通过欧亚草原通道,抵达中亚,到了南亚,建立赫赫有名的贵霜帝国,版图一度囊括中亚、西亚(阿富汗)、南亚(巴基斯坦、印度地区印度河流域)。现在大月氏一个分支,还生活在青海一带。

后来,大月氏人、乌孙人,遭到了匈奴人的追杀。

首领的脑袋,也被匈奴王砍下来做成酒壶。

在历史上,雅利安人后裔以其他身份,继续扮演一些角色。在元朝时,元人所说的“色目人”,其中也包括雅利安人的后代,同样金发白皮,凶悍好斗,身材高大。

元朝时,少数“色目人”与汉人友好共处,有些还获得官职。

随后,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商朝与汉朝，还是有区别。

商朝是一直压着“鬼方”打，逼得进献美女给商朝。

汉朝强势时、弱勢时，都曾与匈奴和亲。

打出华夏族的自信心。

打出国威，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际地位。

天下共主。历史第一次的南北大战，以农耕文明胜利结束，为中国的政治军事发展奠定基调。在这条路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战争，还会继续下去。

历史的连续性、变异性。

中国古代周期性遭遇游牧族群入侵，近代的西方入侵则是一种延续。在新的历史周期，西方列强不过是新一代蛮夷。抗击蛮夷的明确记录出现在商朝，公元前1220年妇好领兵讨伐“鬼方”。

直到农业社会的基础崩溃，迎来新的工业时代。

神秘狞厉的殷商王朝，迎战嗜血的“鬼方”……

手持头骨的商朝巫师，在战象背上长啸狂舞……

满面涂血的武士，在马车里拉弓控弦……

中华文明开始与古印欧人的文明碰撞。

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的农耕民族相遇。

中华文明保卫战。



陆

柒

捌

玖

拾

野蛮的力量，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从上古时代，到中古时代。

游牧部族一次又一次，向农耕部族的世界涌进。

公元前2000年以前，东西方就已经有了族群融合。

新疆米兰佛寺发现2到3世纪的壁画中，楼兰美女的容貌，与2003年阿富汗的选美小姐十分相像。现代阿富汗的部分民族，由曾经生活在兰州至敦煌一带的大月氏人与希腊移民融合而成。

一画千金。画这幅画，需向画师支付3000印度般摩迦钱。

壁画由希腊、罗马裔的画师所画。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与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人。

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亚欧大陆畅通，中国的“西北走廊”上，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相杀、相融、相爱……具有鲜明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特征。

农耕部族都在固定的疆界内生活。

一国一地的历史，轮廓比较分明。

居民永世不移，变动面、固定面，比较容易捉摸，辩证统一性可寻。游牧世界尽管也有规律性，但至少在表现的形式上，与农耕世界不同。

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和民族、文化区域。

中古内亚相对于东亚的优势，类似近代西方相对于

东亚的优势。

“中国弧”区域中部。由中国经中亚、印度、波斯而达西亚、东欧的广大原野，大大小小的游牧族群，通过欧亚草原东进，进入蒙古高原，再进入农耕部族区，出没无定、相互激荡、由远东到欧洲，往往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世界。

蒙古高原上，出现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回鹘、契丹、蒙古等政权。

传统的中国历史，基本上以长城以南的华夏族为主线。

线性“历史的地理枢纽”。

长城以北，地理单元广阔。

阿尔泰山的南边，天山山脉，山脉南北分别有一个盆地及沙漠，都位于新疆。阿尔泰山的东边，三不管的戈壁沙漠。蒙古高原，古称“大漠”。戈壁沙漠以北称“漠北”，以南称“漠南”。

更北边，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

南边的阴山以南，西南边的贺兰山旁边，一片肥沃的土地，叫“河套”。

曾经也是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

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的分界线，就在楼兰和敦煌之间。

欧洲白色人种多次迁徙东方，数次到达楼兰一带。

神秘、独特的西域美女，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也引得征战连连。

雅利安人，最具侵略性的民族。雅利安人往西，演变成欧洲人；往南去，演变成波斯人、印度人；往北去，成为塞种人；往东去，被商王打败，后演变成大月氏、乌孙、吐火罗等古代民族。

一个所谓世界上血统最优秀的民族。

“吠陀”记载，雅利安人身材高大，属高加索人种，蓝眼睛，高鼻子，肤色白皙，长头多须，浅色头发，典型的白种人特征。他们是原居于今天俄罗斯南部乌拉尔山脉附近的古代族群，被誉为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祖先。

又据《法医人类学》记载：“白种人颧骨不高突，口裂宽度较小。”

往昔荣光无上。

四大文明中的三个，都被雅利安人征服。

1935年时，希特勒的野心日渐膨胀，坚信自己就是雅利安人

之后,不惜代价,寻找纯正的雅利安血统,希望打造一支由“最优秀人种”组成的军团。雅利安人其中一支遗族,被认为在中国西藏地区。

希姆莱曾两次派员到此寻找,找没找到,不得而知。

核心观点。二战时期,希特勒将雅利安人神话推向高峰,到处宣布:雅利安人就是日耳曼人的祖先,日耳曼人拥有最纯净的血脉,应该像古代雅利安人那样四处征战,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获得土地。

雅利安人的光辉历史也被传唱。

希特勒既像一个政治家,又像一个传教者,传播疯狂的信仰,改变雅利安人的原始定义,将其定为最优秀的种族。同样金发碧眼的犹太人,却被排除在外,迎来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真正的雅利安人,是指印度、巴基斯坦信奉太阳神的白人。

印巴白人在血统上,才是从南俄罗斯大草原三大游牧民族之一演变而来的真正雅利安人的后代。她们,神秘而美丽,五官、身材同时符合欧洲、亚洲人的审美观,女子普遍十分靓丽动人。

巴基斯坦白人中,美女如云,她们有比较纯粹的雅利安血统。

宝莱坞明星大多拥有白人面孔,在印度大街上“鹤立鸡群”。

俄罗斯、波兰人拥有最多的雅利安人基因,比重占到50%左右。

其在德国人中的比重,仅有20%左右。

雅利安人并没有征服印度人、伊朗人,只是与他们“混血”了。

在印度人口中,浅肤色族群占了10%,其拥有的雅利安人基因也不过40%左右。

雅利安人基因在伊朗人中的比重,仅为18%左右。波斯帝国的建立者伊朗人,只是“混血”了少数雅利安人。

中国的塔吉克人,拥有20%的雅利安人基因。

雅利安人分布在亚欧大陆很多地方,支脉很广,现在的许多文明正是受其影响,延续至今。如果按照民族大融合的观点来看,雅利安人长期与当地入混居,血统早已不纯。

民族只是个概念。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单一民族、纯血统民族。

“鬼方”被武丁击败,选择向北迁徙。

甲骨文记载,不少属于“鬼方”之民的雅利安人大迁徙:有些西

去出现在中亚一带，更远的到了欧洲；有些追寻祖先的脚步，东去北美洲，与以前先迁至此的族人，汇聚成现印第安人的祖宗。

入侵殷商的雅利安人，现在欧洲人和印度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部分远离商势力范围，与夏末商初，由夏朝故土北迁而至的薰鬻（夏桀的儿子）后裔与部族通婚混居。夏后氏遗民，从没想过要放弃“故土”，但为免被征剿，与“鬼方”相同，向北迁徙。

这些雅利安人，融入周边少数民族，最后成为华夏族的一员。

他们先从戎狄之地迁至豳地，后又迁至岐邑才安定下来。

在“武王伐商”中，也出现了游牧民族的身影。作为“小邦周”的邻居西戎，能不助周人一臂之力？西戎人有了襄助之功，为了安抚这些西戎人，周人采取通婚政策，一批西戎人在晋中南定居。

蛰伏若干年后……

雅利安人混居在北方游牧民族之中，通过几代人的通婚，最后融入了中国北方游牧族群，成为后来的匈奴人的一支，或一部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产生惊天动地影响的民族，“匈奴”形成。

匈奴人的崛起，与蒙古铁骑的远征，对亚欧大陆产生了划时代的深刻影响。

亚欧大陆的史学家，谈及匈人领袖“上帝之鞭”阿提拉、蒙古铁骑“黄祸”时，尽管已过去成百上千年，仍心有余悸。内亚的一些游牧民族，只要向西远征，就会引起西方世界的惶恐。

除了古印欧人中的雅利安人，从欧亚草原西端向东发展，进入华夏核心区，被商朝击退、远遁外，北方游牧民族的匈奴、大月氏、突厥、蒙古，都是在华夏北部游牧区的欧亚草原中部发展，在进入长城以南受阻或被驱赶后，由东向西发展。

「中国弧」区域中部。由中国经中亚、印度、波斯而达西亚、东欧的广大原野，大大小小的游牧族群，通过欧亚草原东进，进入蒙古高原，再进入农耕部落区，出没无定、相互激荡、由远东到欧洲，往往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世界。

古印欧人后裔中的俄罗斯人，唯一成功地由西向东扩展的游牧民族。

惟其如此，才使华夏和欧亚草原的天然联系，被有意与无意地淡化。

从战国开始，游牧民族的崛起，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清朝。

见诸典籍记载的就有允姓之戎、大月氏、匈奴、鲜卑、突厥等。

特别是“戎狄”中的塞种人。史料记载，距今3 000多年前，他们就已活动在中帕米尔高原(葱岭)、天山、新疆北部大部分地区；同众多的游牧民族一样，“随畜逐水草”，兼冶炼、加工铁器。

“戎狄”的分支，也称“允姓之戎”。

公元前1000年，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成功地驯化出体型更大的马，适于人类骑乘。居住在富含优质铁矿的欧亚草原的斯基泰人，汇同雅利安人在草原上的遗民和同族，成为南方农耕文明的噩梦。

斯基泰人，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游牧集团。

公元前八九世纪，已经横跨亚欧大陆，西部从欧洲德国东部边境，一直到东部赤峰小黑石沟；从南俄草原，到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都有分布。公元前7世纪前后，以最早的国家形式开始出现。

早期崛起于欧亚草原的族群之一。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与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威胁西亚近70年，骑兵驰骋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寻找掠夺物。

世袭制。国王和各级首领的继承制度。

作为其社会基础的氏族部落，战时为作战单位，平时各部族每年春天大会于王廷。战时则全民皆兵，分成三部分：贵族首领卫队组成的主力，参加过战的部落民组成的部队，老弱者组成的辅助部队。

他们以多杀敌为荣，习惯将敌人头骨作为饮器。

武器装备有战斧、矛、弓箭等。

其特长为骑马、射箭，有“马上弓手”之称。

欧亚草原原始文化，基本要素为马具、兵器与“野兽风格纹样”。

善于养马。其文化最有特色的是黄金工艺。

地盘东起中国北方，西到中欧。随居地从今俄罗斯平原：向西，到柏林的城东；向东，到赤峰的小黑石沟；向北，到贝加尔湖；向南，

到吐鲁番盆地、河套地区、鄂尔多斯沙漠……

《史记》《汉书》中称其为“塞”或“塞种”，古波斯语中“Saka”（萨迦）的音译。斯基泰人或赛西亚人，又称为“尖帽塞人”“萨迦人”，还有“铄迦”“烁迦”等译法。白色人种的泛称。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300年，位于中亚、南俄草原上，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

彼时，在今天的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河西地区）、北方草原地带，居住着许多游牧民族，依靠强弓劲马，纵横驰骋，经常与在河东之地定居的华夏族发生冲突。

北方草原地带，远离海洋，气候异常干燥，昼夜温差、季节性差异很大。亚洲大陆冬季最冷的地区之一，冬季的大风雪后，往往满目疮痍。春秋季节短暂，常常还沉浸在秋高气爽中，突发性狂风带来的飞沙走石就令人兴致全无。只有阴山山脉作为天然屏障，把蒙古高原南端封闭成水草最为肥美的天然牧场，也成为游牧民族的乐土。

草原令人神往，特别是阴山南麓。

一望无际的蓝绿色随着清风吹过，忽隐忽现的牛羊在其中闪烁。明媚的阳光下，一匹嘶鸣的骏马飞驰而过，消失在蓝绿色之间……移动着白色的羊、黄色的牛，都在感受着大自然的节奏。

早期的斯基泰人，与中原交往的主要是商业，被希腊人称作“丝绸贸易中间商”，赶着马、骆驼，把丝绸运到西方。在陇西、河西走廊与东北辽西走廊的斯基泰人，与中原华夏族群最为亲近。

中原的葡萄、核桃、苜蓿、石榴等作物，都从斯基泰人那里获得。

斯基泰文化受到内蒙古夏家店文化的影响。

夏家店文化晚于中原，基本独立发展，成就不亚于仰韶文化。

4 000年前的夏家店文化的范围，大体指西拉木伦河以南、燕山以北、七老图山以东和医巫闾山以西的区域范围，处于辽宁、河北、内蒙古三省区的邻境地带，东北与中原的连接通道。

“长城原型”。夏家店一带的方国强大，文明程度可与同时代中原发达地区媲美。赤峰沿阴河、英金河北岸，土石筑的“城堡”密集分布，东西横贯数百里，恰与1 000多年后燕、秦长城平行、重合。

夏家店文化发展到商代，成为商王朝北部的“孤竹国”。

斯基泰人在东扩过程中，首先遇到匈奴人的祖先的狙击。

斯基泰人在被商朝军队打败后，成为奴隶，并没有完全消失，暂

夏家店一带的方国强大，文明程度可与同时代中原发达地区媲美。赤峰沿阴河、英金河北岸，土石筑的「城堡」密集分布，东西横贯数百里，恰与1000多年后燕、秦长城平行、重合。

时退出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后裔在中亚、西域地区生活繁衍，建立属于他们的国家，被后来的中原王朝称为“塞种”。

他们从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无法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塞种人已逐渐融合在新疆的各民族中。

现在的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裕固族、撒拉族，都有其血统。

现代新疆的维吾尔族等民族，由塞种人和众多民族融合而成。

塔吉克族是仍在使用塞语，保留习俗最完整的民族。

“混血”的塞种人，在陕西北部、陕西南部与河套一带活动，与羌方接壤，与古蜀国相邻。

对于西部的异族，商人称为“羌”，其甲骨文的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地、以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并不仅是一个泛称，“羌方”包含着西部无数互不统属的族邦、部落。

西部游牧文明与东部农耕文明的碰撞。

战争频繁。商朝人与羌人的“互动”，经常处于敌对状态。

殷商时期，停留在西北的古羌人的部落众多，有白羌、北羌、马羌、竹鬲羌、焱羌、玉羌、羌舟、羌龙、羌目、羌立、羌宫等方国。羌方，是除商朝外方国中最大的，一直延续到商朝被灭。

境遇悲惨。羌人被蔑视，在殷商的地位低下。

在商朝后期，羌人实力在逐渐发展、壮大，形成“羌共同体”的自我认同，“羌”也成为一些西方部落的专称。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取得发展，各部落或其中的一部分结成部落联盟，有着自己的首领。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其武力日益增强，追求自身领地的扩大，或主动侵扰商，或被商征伐，与商王朝进行反复的较量。

一方面，商朝在常年对“羌共同体”的攻伐、防御中，逐渐与周边方国成为一个共同体。另一方面，“羌共同体”的自我认同，也逐渐加深羌人与古蜀国的联系，成为周人灭商的亲密盟友，融入华夏。

西周时期的羌人，与商代的羌人一脉相承。

“羌”字在文字记载中消失，另一个“姜”字记录颇多。

商朝甲骨卜辞中，“姜”字出现。

“羌”“姜”，古音一致，互通互用。

羌人族群。男性羌人，称为“羌”；女性羌人，称为“姜”。

商王小乙去世后，商人就找三个女羌奴陪侍。

商代羌人，就是周代姜姓族群。与商朝甲骨卜辞中羌人地位卑下相反，周朝的金文与史料记载中，零星出现的“羌”与大量出现的“姜”，地位都很高。

上古时期，炎帝和黄帝联手，打败蚩尤。

黄帝又打败了炎帝，一举成为当时最强大的部落。

在炎黄时期，邻近部落间就已经存在矛盾。

为了生存空间、资源、财富等，中原“兄弟”间都会争斗，何况是中原族群与“西北走廊”的游牧族群。历史上与中原民族争斗的部族不少，如鲜卑、突厥、女真，还有让许多朝代都头疼的匈奴。

匈奴先人，迫使种地的周人四处流浪。

周人联姻商朝贵族。

生活在“戎狄”间，不过是老家在陕西咸阳，然后搬到宝鸡而已。

“戎狄”所在地，是指周朝的甘肃庆阳、宁夏固原与甘肃平凉。

人类文明早期阶段，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的先民们，与周边的其他民族，进行着资源、土地与女人的争夺。凭借着战略的正确、文化的引力，华夏民族取得最终的胜利。

带来的有可见的屠戮、交通、交流。

还有隐形的技术、思想、文化的转变。



陆

柒

捌

玖

拾

炎黄子孙。

中华文明史上，伏羲、炎帝、烈山氏、共工氏、四岳氏、金田氏与大禹等，都是古羌人。

广袤的高地。羌人是最早生活在西北的土著居民，主要分布地点在今天的青海、甘肃、新疆等西部地区，重点活动区域在青海河湟地区，以水为居，繁衍生息。

先秦时期，中国古籍对居住在西部的游牧民族以“西戎”“戎狄”“西夷”“西羌”等称呼，体现出西部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密切关联。古羌人文明程度较高，不是那种披头散发、袒胸露腹、腰裹兽皮、手持木棍、茹毛如血的原始人。

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姜姓之本。

羌人是“古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左传》记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后汉书》同意记载：“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

甲骨文中记载的“羌”“羌方”，大致据有今甘肃大部、陕西西部、山西南部与河南西北一带，商王朝“四邦方”之一。岷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古羌，已经与蜀山氏融合，成为蜀族。

周人主动联盟先前被殷商击败的“夏氏遗族”。

蜀夏一家，姜夏同源。

夏周通好，通婚联姻，有了清晰的血缘继承。

羌人部落，在首领姜子牙的带领下，加入周武王推翻

商王朝的联军。

《后汉书》记载：“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师会于牧野。”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髡、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在《牧誓》中，武王友邦中，“蜀”后是“羌”。

羌人功臣中，就有姜太公。司马迁写道：“莱侯来伐，与之争营邱。营邱边莱。莱人，夷也，会封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受封元勋。西周建立后，姜姓封国的数目，仅次于姬姓。

《史记》记载：“齐、许、申、吕四国，皆姜姓也，四岳之后。”

《诗经》记载：“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人的母系，基本上都是姜家女。

公亶父，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周王朝的奠基人。昔年，带领周氏族人来杜水、沮漆水之处，最终到了岐山，迎娶姜女为妻，氏族也渐渐发展壮大。姜女，即周人子孙所称的“太姜”。

周人的身体里，流淌着羌人的血液。

长期联姻。周王室与羌人联姻：文王的元妃周姜，武王的元妃邑姜，幽王的王后申姜等。周族支系与羌人联姻。齐桓公与文姜、卫庄公与庄姜、晋献公与齐姜、郑武公与武姜等。

地位显赫。周宣王时期，为抵御不断北上的荆楚，申、吕、许等几个姜姓国，从关中移封于河南许昌、南阳一带，挑起屏藩周王室的重担。《国语》说：“当成周者，南有申吕。”

姜姓“羌人”位高权重，彻底接受华夏文化、风俗习惯与礼仪制度，融于华夏族。西周起，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是否华夏正宗，甚至，春秋时的齐桓公，还被诸国推举为中原霸主。

带有贬义的称号，被羌人与羌人的同盟周人回避。

没有融入华夏的羌人，成为“姜姓之戎”。

西周的“戎”字，代替商朝的“羌”，成为西方异族的概念。

姜姓之戎，规模大、战斗力强。《国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姓之戎”。千亩，国王的

籍田,在周朝京师附近。

姜姓之戎与周交锋,活动范围距离京师不远。

春秋时期,秦国开始向东发展,姜姓之戎被迫向东转移。

正在中原发展的晋国,乘机接纳姜姓之戎。被晋惠公安置在晋,称“南鄙之田”。

在汉代,“羌”则是泛称河湟地区的土著游牧部落。

周朝是华夏文明的顶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顶峰之一。

周朝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经常在道德、道理、天理等层面评论战争行为,评论时经常引经据典。集中体现在三类文献中:以《牧誓》为代表的军事盟誓;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65件与军事有关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典籍,记叙了政治家、军事家的观点。

三种文献互相验证,勾勒出周朝战争法的基本面貌。

讲礼的战争、不择手段的战争。

“双循环”有别。“诸夏”之间的战争,都彬彬有礼、讲规则;华夏与蛮夷的战争,偷袭、埋伏、欺骗,什么手段都有。周人的战争法,仅仅适用于“华夏”的内部。

正如《日内瓦公约》:签约国互相宣战后,就受该公约约束。没有宣战,或不是缔约国,便不受该公约约束。

中国的历史,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融合史。

延续了3 000多年。

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华夏文明四周的地理环境,使得外来强势文明入侵的成本极为巨大。西边的丝绸之路等通道,又保证了华夏文明与其他优秀文明,源源不断地交流、互通。

亚欧大陆上最优质的一块。中国,国土面积广大,平原地区较多,无论地理环境,还是气候环境,相比于亚欧大陆的其他国家都要好很多。亚欧大陆的几大文明古国,大都早化为烟尘,连原住民都消失不见。

唯有中华大地、中华民族,一脉相承。

正是得益于先人占据这块宝地。

中国以南的印度、越南、老挝等国家,气候比较极端,夏天高温炎热;中国以北,俄罗斯、蒙古境内,冬季太冷;中国以西,中亚、西亚一带,沙漠广布,耕地面积少,人口稀少。

无论中原文明衰弱到何种程度，其他的古文明都不太可能，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轻松地入侵。至于周边的一些小型文明，都是中原文明的衍生文明。

自西向东，长江、黄河的海拔高差均超过5 000米，流经的地区，拥有高原、沙漠、盆地、平原等多种地貌形态，调控、选择、互补、重组的空间和余地大，可变性与适应能力强。

长江、黄河水流方向相同，形态相似，呈镜像对称结构。

如同生物基因的两股链条，呈双螺旋平行结构。黄河流经甘、宁、内蒙古、陕、晋5省区，形成向北的“几”字形大弯，长江干流金沙江流经云南、四川，形成向南转北的“几”字形弯道。

长江、黄河的长度，分别只有6 397公里、5 464公里。在历史时长上，中华民族的基因不只5 500年，而是万年、亿年以上。长江、黄河的支流无数，满足分形(fractal)结构。

地理位置，恰好能维护中华文明的成长。

华夏文明的主体区域，主要在北温带、亚热带区域，保证了四季分明，使得中国的农业文明，很早就形成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传统，有利于文明的发展。

中国的地理位置令人羡慕，东边大海，北边荒漠，西边高山，南边丛林，中间以黄河、长江为核心，有适合耕种的华北平原、两湖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等，中原、草原、海洋、高原、西域的“体系”，五种不同地理形态上的文化，在同等地位上，碰撞、摩擦，持续擦出文明的火花，构筑了形形色色的政权，有利于华夏民族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逐步向四周稳定地扩张文明，形成足够庞大的人口基础。

地理环境满足屏障定律，抵御外来侵略和冲击

无论中原文明衰弱到何种程度，其他的古文明都不太可能，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轻松地入侵。

的能力强。

长江、黄河全流域均在中国境内，犹如基因在生物体内，有构成文化遗传基因的基本条件，同时极大方便整体开发、综合治理、统筹利用。

文明发展，既要扩张，也要保护自己。

亚欧大陆，有两块优质的土地。

第一块，欧洲；第二块，中国。

面积差不多，各有优缺点。

欧洲耕地面积大，单位面积的可承载人口，超过中国。

三大文明古国，古埃及优质的土地，集中在尼罗河流域狭窄的区域，其他地方，似乎都是沙漠；古巴比伦优质的土地也不多，也都集中在两河流域；古印度比较平顺，但是天气显然太热。

重要的是，还多次遭到破坏、殖民，或被其他文明所替代。

文明多次被推倒重来，没有一个很好的延续。

除了文明古国，其他地方发展得都比较晚，文明史并不长。

美国的崛起，也离不开优越的地理位置。

欧洲人发现美洲后，诞生美国。

地形的多样性，欧洲地区远不如中国。

欧洲面积1 016万平方公里，地形以平原为主，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占到60%。山少，高山更少。

超过40%的面积，都属于俄罗斯，剩下的分为44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高山巍峨，平原广袤，盆地巨大，有低缓的丘陵与高耸的高原。生物多样性，远超同等面积的欧洲，文化特色极为丰富。欧洲地缘破碎化，地理单元上彼此份量相当，又相对独立。

伊比利亚半岛、西欧平原(高卢地区)、中欧平原(日耳曼尼亚)、亚平宁半岛与英伦三岛，分别对应当今西欧五个大国：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其他小国，实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国，一如同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蒙古国一般。

易守难攻。欧洲许多国家彼此之间有山脉、海峡相隔。

天然具备单独建国的条件。

欧洲的主要河流，都脾气温顺，不像中国的黄河、长江，一“高兴”，就改道造成大洪水，威胁华夏文明核心区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欧洲也没有必要动用“强大的国家能力”治水。

与欧洲相比，在中国渡河进攻要比翻山越岭、跨越海峡容易。

欧洲每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没有大一统的概念，相互征战，相互征服，虽然大多认可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后裔，但不会有人认为罗马帝国会重新建立。

欧洲国家以血缘关系、宗教关系，作为纽带来维系国家的凝聚力。都明白统一整体利益最优，只是“势均力敌”，谁也没法服众。

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草原文明、游牧文明，不从事生产，通过战争和掠夺，实现社会财富积累。在古代，战争和掠夺，文明之间交往、互相汲取养分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唯一高效率的手段。

创造辉煌。内亚产生的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等游牧民族，只要向西远征，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惶恐：他们有的是因强大，为了扩张领土向西行进；有的是被华夏王朝赶走，不得不向西迁徙。

外伊朗十字路口感冒，东亚内地就要发烧。

中国政治传统对内亚政治文化传统的改造。

面对一望无际的草原，最大的屏障是燕云十六州。

秦始皇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抵抗北方民族的入侵。

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长城，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中原王朝也就再没有天然屏障。

整个古代，中原王朝一直都是在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斗争。

华夏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形成之初就极为开放，5 000年前炎黄部落来到中原，虽然和九黎部落发生领土争夺战，胜利后并没有赶尽杀绝，而和九黎部落联合到一起。

强强联手，让华夏部落越发强大。

文化包容，让各民族愿意被融合。

军事的先进性，在文明的交往中，发挥作用重要。

中国始终秉持一种整体性、连续性的宇宙观，庞大的农业社会导致人们对大自然的特别敬畏，因农时之需对天文历法的格外重视，本身就包含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

在古代，通过几代人的时间，就会形成对华夏文明的认同感。

中国土地上，基本包括所有的土地类型，孕育出了许多粮食作物、动植物。

天然屏障，又保护着这片土地，不受外来文化、民族的侵扰、破坏。

古代两河文明，如今伊拉克一带，经历罗马波斯之争、阿拉伯帝国入侵、蒙古帝国横扫，历史的烟尘中泯然众人。虽然文明古老，但没有任何存档、备份，几千年来，一直都是战火连天。

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黄土高原、成都平原，绝佳的天然粮食产区，巨量的粮食产区，可以保证养活巨量的人口；新疆、内蒙古、青藏高原，对中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国家的战略纵深层面，虽然生态条件并不优越，但得益于面积广大，为核心的人口密集区，提供足够的战略纵深，以保证国家的国防安全。

三大区域自然资源丰富，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至今，中国依然保持着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

两河文明，西方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人类最早发现文明之地，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才仅仅初露曙光。

古代两河文明，如今伊拉克一带，经历罗马波斯之争、阿拉伯帝国入侵、蒙古帝国横扫，历史的烟尘中泯然众人。虽然文明古老，但没有任何存档、备份，几千年来，一直都是战火连天。

古埃及文明，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你方唱罢我登场。金字塔依然在，不见当年法老王。如今的埃及人连象形文字都看不懂。亚历山大的白种人，欧洲侵略的混血结果。金字塔时代的后裔，只有些许血统留在少数民族中。

古印度文明，受到了雅利安人的打击。也许雅利安人冷怕了，来到印度发现挺暖和，干脆就定居下来。无数次的中断、无数次的灭亡，几千年前的种姓制度遗毒，至今还产生负面影响，坚如磐石，牢不可摧。

中国，长期的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印度，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印度文化强调，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在一个范围里增进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统一。

各古文明走向衰亡时，中原文明没有衰亡，反而越来越繁荣。

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商朝无法铸造青铜器、抗击外侵。

一个政治权力集中与社会阶层分明的社会，控制面积广阔，势力范围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中游的政权。周围虽然也有许多方国频频威胁，文明发达程度，难与地处中原的商朝媲美。

“月明星稀”。中原文化，耀目的月亮。

周围的文化，光亮较弱的星星。

中原文化深刻影响了“内亚”。

当我们伫立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角，那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岗前，一缕透过3 200年历史烟雾飘逸而出的巾幗气概、红粉佳人的气息，仍令我们悠然向往。

妇好不会知道，她和将士们的浴血奋战，让孩提时代的华夏文明，免除了一场血光之灾。

世界古文明树的硕果，华夏成为仅存的一颗。

历经5 000年桑田沧海，依然枝繁叶茂，傲立东方。



陆

柒

捌

玖

拾

商朝的本土，不比今河南省大太多。

夏朝虽被后世奉为中国正统，国家的实际控制范围，只是北到山西长治，南达河南伊水流域，西到陕西华山一带，东至山东河济之间。势力和影响，只能达到黄河南北、长江流域。

夏朝灭亡真相，“昔伊、洛竭而夏亡”。

伊洛平原遇到连续数年的大旱，伊河、洛河枯竭。

严重旱情，民不聊生。伊水与洛水相交的流域面积，仅为2万平方公里，伊洛平原不足1 000平方公里，难以承载54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也没有高配的农田水利设施、发达的农业生产能力。

《尚书》等文献记载，商汤与夏桀决战于鸣条。

战争经历了三年。夏军溃败，夏朝灭亡。

商汤建立新的政权，背后有伊尹的“指点”。

伊尹被后世称为“中华厨祖”。

伊尹的母亲，居住在伊水之上的养桑蚕的奴隶。

伊尹被庖人收养，长大。庖人，屠夫+厨师。

自小聪明异常，勤学好思。

他在田野之间耕种，却乐尧舜之道，包含礼让、节俭、重贤、仁德、爱民、诚信等诸多治国道理；跟随庖人学习烹饪之术，却能举一反三，悟出“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治国之理。

与有莘氏联姻，作为陪嫁奴隶来到汤王身边。

一次谈话，以烹调、五味为喻，分析天下大势与治国之

道，认为民心离散，天命在商，治大国如烹小鲜，“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劝教商汤承担救民大任，效法尧舜的以德治天下，制订为救民而伐夏的方略。

被商汤任命为右相，辅佐治理商国。

经天纬地。充当类似后世军师、近代参谋长的角色。

商汤成为国君的第三年，伊尹申请去夏都卧底，探取重要情报。

前往斟鄩，进献宝物，麻痹夏桀，联系因失宠被夏桀遗弃在洛水的妹喜，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三年后，回到商都，宣传夏桀暴虐无道，扩大敌人内部矛盾，同时辅佐商汤以仁德治国。

妹喜，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

“有施妹喜，眉目清兮。妆霓彩衣，袅娜飞兮、晶莹雨露，人之怜兮”。有施国，夏朝西南方今湖北恩施境内的一个方国。巴人的发祥地。公元前1736年左右，被夏朝征服后，国王便将国内绝世美女妹喜当成“礼品”，奉送给了夏桀。

妹喜的美貌让人惊为天人，凡见过之人，都以为是仙女下凡。

《烈女传》记载说：“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

妹喜不仅美貌绝伦，言行举止超凡脱俗，还是个异装癖，喜欢戴着男人的帽子，把自己扮成勇士，佩剑戴冠，去朝堂上过问朝政。偶尔，又变成娇滴滴的小姑娘。外表野蛮，心地很好。

后宫佳丽三千，没有这种百变女郎。

妹喜成了宠妃。

一位“环保主义者”，喜欢“天体游泳”。没有天然海滩，夏桀就建造一个大池，里面装满酒，可游泳，可划船。闻着酒香，抱着美人。又集合三千壮士，将整个池子里的酒喝得干干净净。

夏桀上朝时，就把她抱在怀里……

伊尹为不让夏桀怀疑，与商王上演一出苦肉计：商王亲自追射伊尹，以示伊尹有罪逃亡。

妹喜知道伊尹的真实意图，就与他配合。

分工协作。妹喜主要从事破坏和离间活动，伊尹则负责通风报信。

夏朝原本已经“上下相疾，心心积怨”了。

时机成熟，妹喜、伊尹向商和各诸侯国传播谣言，说夏桀做个梦，天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西方的太阳陨落了。

东方的太阳，最终战胜西方的太阳。

商在夏的东边，上天的旨意，夏朝必须被商朝取代。

伊尹相比于妹喜，棋更高一着。

看到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齐，建议商汤实施“剪夏”战略……

“创造三首”。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情报收集应用到战争中，首次将人心向背作为战争的指导因素，首次将舆情工作应用在战争中。

“汤欲伐桀”。为测试九夷之师对夏桀的态度，劝说商汤停止贡纳。结果夏桀大怒，“起九夷之师”攻汤。看到九夷之师还听指挥，又献计恢复对夏王朝的贡纳，同时积极准备攻夏……

共作战11次，都取得了胜利。

还曾两次至夏王朝进行战略侦察，政情、军情与民情。

战略家、军事家，一代名相。

八大王朝“王佐之师”，姜子牙只列第二，伊尹被尊为第一。

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毛泽东总结伊尹：“伊尹之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生于专制时代，其心实大公也。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

夏桀，名癸，与“鬼”同音、同义，通假字。

夏朝南迁后的名字，“癸夏”“鬼夏”。

“桀”（凶猛之意），是谥号。

夏桀生得高大威猛，力气惊人，跑得比马还快，百米飞人，在镇压反叛力量过程中，遇到一个女汉子妹喜，有男人气的女人，偏偏生得貌美，被深深地征服。

要击败前朝，首先要对其妖魔化。

商汤灭夏前，在都城会盟诸侯，指出夏桀的罪状有三条：大兴徭役、重加盘剥、民众怨恨。

裸身嬉戏、酒池肉林……都是从汉代以后才有的传说。

后世的文人墨客们，为了证明“红颜祸水”的观点，臆测、编造的故事。《国语》上，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末代君王一般都难以善终，权力更替斗争的结果。

亡国之君失去权势，与待宰羔羊无异。

夏朝末年，被描绘成无药可救，正常。

吃前朝的肉，骂前朝的祖宗，普遍，也正常。

「创造三首」。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情报收集应用到战争中，首次将人心向背作为战争的指导因素，首次将情报工作应用在战争中。

夏桀、商纣、秦二世、隋炀帝等。后世，末代君王往往会得到类似的评价：吃喝无度，酒池肉林；荒淫无度，贪恋女色；乖张无度，残害忠良……

无论王朝如何更迭，新朝都会收纳前朝遗产。

文明成果。都直接认可华夏子孙，就连匈奴也认为是当年黄帝的一支，被迫迁往西边苦寒之地。欧洲的维京海盗、罗马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等，各有神话和先祖，没有统一的文化。

《竹书纪年》中说法不同，夏桀宠的是两位以玉为名的美女，并非妹喜。

出土的清华简《尹至》，已做证明。

后世，多把妹喜与惑乱商纣王的妲己并称。

《韩非子》中有：“桀索岷山之女而天下离。”

姻亲故国。岷江上游的岷国献美女琬、琰。

夏桀非常宠爱古羌“二玉”（琬、琰，美玉之名），名字刻在苕华之玉上。抛弃结发之妻妹喜，留在洛地，修了一座瑶台给她居住。

上古故事。一个男主爱上萝莉，抛弃结发之妻。

清华简的出土和释读成功，为“夏桀宠二玉”的说法提供了证据。

伊尹从夏国回到亳都，去见商汤。

商汤问到：“有什么消息要对我说？”

伊尹说：“大王，我回来有好多天了，有夏的国民，都说他们的国王昏庸，宠信二玉，不听众人之言。国人都说：我要与你（夏桀）一起灭亡。”

与《吕氏春秋》中说，伊尹在夏国三年回亳汇报情报时说的话相似。

三年后，伊尹入夏。

再过三年，到清华简中记述伊尹归商时，妹喜在洛已孤独待了7年。

人生中，一个女人有几个七年。

就算14岁嫁给夏桀，真是元妃，到夏帝癸（桀）14年，也已28岁了。

已过最美之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丈夫夏桀又得到两个更年轻、美丽的古蜀小萝莉。

七年之痒。一句口角，一个玩笑，夏桀就拂袖而去，把她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失去水源的故都洛城。到伊尹“潜入”时，名义上虽是王后，其实已经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7年，到了35岁的年纪。

半老徐娘。再也无法和两位古蜀玉女争夺丈夫的爱。

伊尹再次回到夏国，见到妹喜时，妹喜就把夏国的“秘密”泄露。

在妹喜的指点下，商汤恍然大悟。

于是，商汤以一支尖兵，直指夏桀的防御弱点，一战而胜。

夏桀败亡。这年，妹喜至少已经45岁。

舆论攻势。实际上，夏与古蜀国为兄弟之亲、血脉相连，关系亲密，韦、顾、昆吾、尹国、葛国、有洛等部族，是夏朝的忠实捍卫者。精锐的“九夷之师”，也是由九个少数民族的勇士所组成。

追随夏桀的部族、亲近部族，如九夷之族、三苗等。

九夷之族，活动于今豫东、山东半岛，里面包括“古成都人”。

在《左传》中，记载了位处东方的一个“蜀”字地名。晋代经学家杜预注称：“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鲁国境内的“蜀”地，失散的“古成都人”聚集后的发祥之地。

三苗部族庞大，与尧、舜、禹的部族都发生过战争。

大禹父子曾经攻破三苗部族。

夏桀之时，降服三苗。

九黎起源于东夷。三苗为九黎之后。

夏商战争中，三苗成为夏朝的盟友。

在联盟过程中，一些与三苗通婚的夏部族成员，就留在东夷。钱穆《古三苗疆域考》说：“古者三苗疆域，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黄河以南区域。”

商灭夏后，后裔逐渐迁到平安的成都平原，被“古成都人”融合。

“汤始居亳”。

山西南部的桓曲商城，商汤灭夏桀前的都城。

附近有景山，桓曲商城也被称为景亳。

鸣条之战的发生地，就在景山附近。

商汤精心挑选6 000名敢死队、70辆战车，配备最先进的武器，总兵力1万人以上，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突袭，绝敌后路，出其不意。

仓促应战。夏桀发布一级动员令，召集留在斟鄩的军警、狱卒，先与商军战于蒲州(今山西运城)一带，然后，放弃都城斟鄩，主动退守鸣条。

心理战、宣传战、间谍战……

大规模战略迂回行动、断敌后方退路等战术，都闪现其中。

《淮南子》说：“汤败桀於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在数百精兵的护卫下，夏桀带着妹喜等妻妾，带着不少夏族民众，向“南巢”逃窜……

得知消息，商汤派兵进行追击。

《尚书》中《典宝》，今仅存序言。序言说：“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脛，俘获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三脛，属于九夷之族，随夏桀南迁，被商兵追上，夺取了宝玉。

宗庙礼器。用玉祭祀神祇，可避免水旱灾害，故称玉为宝玉。

一路追杀。从夏都斟鄩到成都，“妇好”带兵的追击路线，从二里头南行，越普救关(今汝阳王坪乡)，直抵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湖湘地区，溯江至成都平原，并降服沿途氏羌部落。

也是后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中道，洛阳通掸国(缅甸境内古国)的第一段。

商王朝建立后，不仅与“羌人”为敌，还视“古成都人”为肉中刺。

武丁即位时，古蜀国已在成都平原立国350年左右。

独立自主。既为防御，也为进攻。

古蜀国发展军队，长期与商朝对峙。

王后妇好率军征讨“鬼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成都平原边缘地区。

富裕的古蜀国顽强抵抗。

商人只想军事征服。和西部羌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的军事和行政机器，高度分工的文明。

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方国。

一路追杀。从夏都斟鄩到成都，「妇好」带兵的追击路线，从二里头南行，越普救关（今汝阳王坪乡），直抵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湖湘地区，溯江至成都平原，并降服沿途氐羌部落。

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性战争。

但对古蜀国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鸣条之战”中，夏桀并未死，剩余势力除了主要留居中原，还有两支分别向南方、北方迁移。北支进入蒙古高原，与当地诸族融合，便是后人所称的“匈奴”……

《史记》等古籍记载，匈奴先祖之一，夏朝时期是大禹的族人，与汉族同为一族，夏朝灭亡后，最后一任君主夏桀的儿子淳维收纳父亲妾女，带领族人逃亡西北，居于北部草原、荒漠，汇入一个包含匈奴、东胡、塞种、吐火罗与羌人的巨大黄白人种部落联盟，与他们杂居，生活在现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的苦寒地带。

生活在河套一带的，称为“南匈奴”。

留居漠北（又称岭北）的，称为“北匈奴”。

与汉族分道扬镳，过上游牧生活。

“百蛮之长”，匈奴的人口数量显然多于“西域”各国。结合《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强盛时期，匈奴骑兵的真实数量小于40万人，超过30万人，人口数量在146至177万之间。

秦汉之际，与中原政权展开你死我活的拉锯战。

北匈奴被汉朝打得解体，许多部落重组变为鲜卑人。

在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同时，众多打着“匈”旗号的游牧民族，用狂飙式的肆虐，将亚欧大陆几乎所有的显赫王朝都掀翻在地，创造了世界的匈人时代。

大禹部族出自古羌人，与鲜卑人源远流长，“五胡乱华”后，匈奴人基本消失不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走上民族大融合的结局，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甲骨卜辞记叙，“鬼方易”逃走远方，称南支。

商朝晚期，除了古蜀国外，多次对南方采取军事、政治行动。

这时的武汉，已是商朝的方国都邑、南征的据点。

进入青铜时代，铜矿是必争的战略资源。

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盂方鼎”“酋方鼎”等，具有典型商文化特征铜器的发现，均表明晚商时期商人对江南铜矿的争夺，卓有成效。

经过江汉平原向东，就是江南丘陵地带。

安徽地区，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整个江南丘陵地带，也有各种矿藏。

商王、周王很早就意识到矿产资源的宝贵。

各种矿藏。商周文献，将湖北、安徽地区的贵金属，称为“南金”“吉金”。还在铜矿运输线上建造要塞，保护运输线路。

武汉的盘龙城遗址，商王护送运输通道的要塞。

商朝青铜冶炼技艺更发达，为控制南方铜矿、转运中原，在鄂东北地区建立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殖民据点。控制了江西瑞昌铜岭、湖北黄石铜绿山和湖南麻阳九曲湾等地的铜矿……

为了遏制楚王的发展势头，防止楚国控制战略资源。

周人也在汉水流域，依托汉江、涢河设置了两道防线。将以姬姓随国、姜姓申国为首的贵族封在这里，联络楚国西部的巴国、庸国、郟国等少数民族小国，想把楚国锁死在丹阳山地中。

夏商周三代对鄂东铜矿的控制、争夺，激烈程度不亚于现代的芯片之争。

加速了南方文化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



“南巢”，大禹在成都的老家、故地。

《尚书》记载：“成汤放桀于南巢。”

《竹书纪年》《淮南子》《帝王世纪》等文献也说，夏桀带着妻妾主动逃至“巢山”。

安阳殷墟，世界性的大都市。

青铜器、牛、马、羊、小麦等物品，都已进入贸易体系。

文明的丰富性，使得文明的界限变得模糊，富有弹性。

在成都平原，古蜀人已经早早地建立了国家。

文明中心。成都平原出现早期城市，原始形态的刻画文字、青铜器，“三代蜀王”角逐争雄局面的结束，一个植根于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产生。这就是早期的三星堆王国。

拥有强大的力量、辽阔的疆域。

武丁时期，甲骨文卜辞中曾多次提到“蜀”。

彭州出土了“覃父癸”“牧正父己”铭文的铜觶。

“至蜀有事”。商军从武汉盘龙城，追至岷江中游的武阳（今眉山彭山区牧马镇、武阳镇、成都双流区黄龙溪镇一带），进入古蜀设下的水军埋伏圈，猝不及防。

妇好中箭受伤，商军群龙无首，退兵……

商王闻讯，发出“征蜀”的“伐岷山”令。

《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伐岷山”，走的道路称“岷山道”。秦时李冰守蜀，壅江作棚，多得湔氐之力，开建龙溪、娘子岭，通往冉駹的山道，又称“冉駹山道”，即后人所称“松茂古道”。

“岷山道”，唐以前成都平原北上的主干道。

商朝与古蜀国怨恨，再次加深，不可调和……

“巢山”在哪里？

历代感念杜宇的诗词，至少有上百首之多。

李白、杜牧、李商隐、苏轼、黄庭坚等，都曾经感怀过。

曾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等闲职的陆游，在成都七年，常在“巢山”吟诗、垂钓、下棋……

写下《剑南诗稿》和《天彭牡丹谱》。

《剑南诗稿》中，有五首关于巢山的诗，即《巢山》二首和《山居》三首。

“晚造平淡”的田园诗作。

《巢山》诗说：“巢山避世纷，身隐万重云。”

《山居》诗说：“平生杜宇最相知，遗我巢山一段奇。”

陆游吟咏的“巢山”，并非合肥巢县的巢山。

在《天彭牡丹谱》中，陆游开篇就说：“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洛花见记于欧阳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欧阳修记载的珍异品种不稀奇，成都彭州全部有。

成都官员，在彭州湔江河谷有山居别业。

“悔作东吴万里归”。陆游坚信自己“前生定蜀人”，称成都为“吾蜀”，希望在成都终老、长眠。以杜宇自比，也在湔江河谷“海窝子”修“山居”，期许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彭州至广汉一带的湔江，“成汤放桀于南巢”之地。

离三星堆很近。

文献中记载的“南巢”，夏朝遗民迁徙到成都平原的聚居地。

夏王朝“南土”的毗邻区。“南土”，指今天南阳、江汉平原、鄂西北一带。据不完全统计，南阳目前已发现夏文化遗址8处，鄂西北和江汉平原发现夏文化遗址15处……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绿松石，正是来自十堰、襄阳。

《烈女传》说：“汤遂放桀，与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

无法割舍。“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3800年前的相爱相杀，妹喜真正地爱上夏桀，并没有随伊尹归商，坚定地选择陪伴夏桀走完人生最后的路。

地名也是随着人群的迁徙转移。

《国语》里的伊水，可视为今三星堆遗址旁鸭子河的古称。来自「洛阳」的「雒城」。当年，夏桀由洛阳迁往湔江河谷故地时，看到三星堆一带的地形地貌与二里头斟鄩出奇地相似，就毫不犹豫地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行宫。

跟随夏桀迁徙的夏朝遗民，也将中原的一些山名带入四川。

《史记》中，岷山皆作汶山。洛阳附近也有汶山。

《国语》说：“齐桓公伐楚，过汝河，望汶山。”

钱穆说：“汶山，即岷山，在今鲁鲁山。”

洛阳的洛河，古称“雒水”，三星堆旁的鸭子河，古名正是“雒水”。

今山南藏语的khyung tshang，意思为神鸟之居，古代戎族对三星堆城的称呼，汉语直译，即为“雒邑”“老丘”。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一直就有“雒城”之名。

“雒城”一词，汉语和古代彝语的混合词，意思为“城市”。

三星堆一带的“洛”字，在《山海经》中已有记录。

汉语中记载的“雒城”，西汉时期即已存在。

《中次九经》说：“岷江之首，曰女儿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

洛水，亦作“雒水”。《汉书》上，广汉郡雒县下条说：“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与湔江、绵水，同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原雒水应从罗浮山沿着龙泉山，一直流到乐山。

“乐”在四川话里也读“luo”，沿途颇多带“luo”音的地名，罗江，雒城。雒水改道涪江，是因大洪水，或因大禹治水，“东别为沱”。

湔江，今又称“青白江”，即今流经三星堆遗址旁的鸭子河，古称“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为邻纽旁对转，音本相近。《国语》里的伊水，可视为今三星堆遗址旁鸭子河的古称。

来自“洛阳”的“雒城”。当年，夏桀由洛阳迁往湔江河谷故地时，看到三星堆一带的地形地貌与二里头斟鄩出奇地相似，就毫不犹豫地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行宫。

“越南蜀朝”的首都，称为“螺城”，“螺”字古音与“雒”亦颇相近。

按照《竹书纪年》等文献的记载，夏桀在位51年，以斟鄩为都31年，“流放南巢”20年。根据对甲骨文的释读，夏桀在湓江河谷的“南巢”生活的时间更长……

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成都平原断断续续迎来一批批远方的“亲戚”“游子”，有从祁山道、古陈仓道南下而来，也有逆长江而上、经嘉陵江北上，他们都是夏桀在位时的“夏氏遗族”。

同宗同源。有着关于共同祖先的古老记忆。

古蜀文明跨出成都平原。大禹率领的“北漂大军”，怀着对远方的向往，背井离乡，于4 000多年前，翻过茫茫岷山、龙门山，沿着奔腾的岷江河谷，来到了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

那是“川军”首次大规模出川，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

大禹世系与古蜀人同出一脉。

夏朝共14代17王，统治时间471年。

大禹，上连尧舜，下接启和太康。

成者为王败者寇。

殷商取代了夏后氏。

商灭夏，直接捣毁一切宗庙、墓葬、宫室，销毁为夏朝歌功颂德的档案。攻克王城，捣毁一切、寸草不留，是那个时代的行为准则。陶寺遗址的贵族女子，受尽折磨而死。

夏后氏一族，自然是要被驱逐、流放。远古时期的原始争斗规则，战败一方会被战胜一方，无条件全面接管地界、各种物资，战败方的女性被收编，男性或为奴，或被驱逐、流放。

夏后氏族分裂成三支。

一支，逃亡去了北方荒漠，最后融入了威胁中原王朝近2 000年的匈奴民族。因与北方民族混血，与中原民族越行越远，一直被中原民族当作异族，视为死敌。

司马迁同情这支夏后氏遗族，他在《史记》中提出，匈奴是夏后氏一支。遇到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匈奴主力被重创，一些部众成为蒙古人来源，千年后再来，打到欧洲多瑙河边。

夏朝遗族，有天生的军事才华。

一支，被招安的夏后氏部落，接受商汤册封，领地在杞，商汤需要这面旗帜，继续祭祖大禹王，安抚天下，以示道统。

一支,既不去北方,也不留在中原之地。

《汤誓》宣布:“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表明态度,夏后氏一旦被俘获,除了被殛杀或被奴役外,别无可能。

去东夷(山东一带)之地?

夏后氏把成鸠国彻底得罪,难说会收容,给立足之地。

去边陲之地?西垂和北地大漠,夏桀之子淳维已经去了大漠……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一些族人继续往南,追随夏桀,流放到成都平原。做遗民也要保持夏后氏贵族姿态,不食商粟。帝王不兴赶尽杀绝,商汤、周武王也是如此,亡国之君仅把势力除去,不抄家灭门。仁道。

夏桀已经到了“南巢”的消息,不胫而走。

有部分族人,沿着长江流域一路往西,荆楚之地不会热烈欢迎。艰辛跋涉。经过许多年,一路走,一路散,历经万难才到成都平原。

娴静蜿蜒。平原上,袅袅炊烟,人丁兴旺,聚落成群,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饰,河道上竹排木筏,往来如梭,一派烟雨江南的婉约,大小坊市,人头攒动,又具有王都之像,让人又惊又喜。

夏氏族入本着垦荒,带来种子,农耕技术。

还有中原的手工技术,特别是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

还带回大量史料记录、科技文献……

夏朝的有关史料和商朝的甲骨文中,保留了中国最早的日食、月食记录。

世界现存最早的记录。

干支纪日法,商朝历法的最大成就,世界上延续至今的最长的纪日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创造的铸铁柔化处理技术,比欧洲早2 000年以上。

《春秋》记载,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

世界上公认的首次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比欧洲早600多年。

春秋时期的历法已形成固定系统,基本确立十九年七闰的原则,比西方早160年。

丰富的天文记载。楚人甘德、魏人石申各写一部天文学著作,合

称《甘石星经》。

“蜀夏同源”。历史上，古蜀自始至终都是多部落、氏族的融合之地，对外来者一直包容、开放，时至今日，成都平原也延续这样的特质。何况是“同宗同源”光宗耀祖的“夏氏遗族”。

相当于“海外游子”，漂泊千年后疲惫地回到“故地”。夏桀在位时的“夏氏遗族”，一支已经融合中原各族生命基因，跟随夏桀迁徙的夏朝遗民，带回了中原的政治遗产、先进文明。

作为故乡的古蜀国表示欢迎。

“北漂大军”后裔“夏氏遗族”，带回的中原民族神秘、虔诚的祭祀仪式，用青铜为古蜀国锻造出一种虚无而神秘的力量，被“南迁部队”的后代“古成都人”，虔诚地全盘接受。

让“夏氏遗族”担当起古蜀国的巫师。

神权与王权并驾齐驱。“夏氏遗族”攫取神权，取代本土巫师。

祭祀坑中，“辫发”铜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笄发”铜像。

数量与权力的分享，联系不大。

青铜人像中，有4个戴着黄金面罩，代表着两个阶层之间签下了协议。

青铜时代，青铜固然珍贵，黄金更为贵重。4个青铜人像，代表古蜀国的最高权力。两个梳“辫发”，两个梳“笄发”，数量恰相等。制作者在刻意维持两种力量的平衡。

在出土的一把金杖上，刻着一幅神秘的图画：4根羽箭平行射穿两颗人头，箭头分别穿入两条鱼的头部，箭尾是两只展翅的飞鸟。两颗人头，代表着梳“笄发”和梳“辫发”两个阶层。

鱼和鸟，各自的图腾。

羽箭，相当于誓言。

两个阶层刻下的契约，代表着庄严和肃穆的

「北漂大军」后裔「夏氏遗族」，带回的中原民族神秘、虔诚的祭祀仪式，用青铜为古蜀国锻造出一种虚无而神秘的力量，被「南迁部队」的后代「古成都人」，虔诚地全盘接受。

誓言。

神权、王权，终究不能和平相处，必然分庭抗礼。

对权力的渴望，注定会让“两权”族群爆发冲突。

异曲同工。商朝早期，神职集团决定着卜筮权，假借鬼神的意志，聚顶国家的方向，被臣民尊敬、信仰，是一个比商王还有权力的统治阶层。武丁继承王位后，王权才慢慢压过神权。

大同小异。古蜀国与商王朝。

王权、神权，互相依存。只是，拥有世俗世界最高地位，却要向拥有神权者低头的王族们，不满的情绪日益严重。何不自己掌握神权，让权力更大？王权拥有者权欲进一步膨胀……

三星堆文明，在夏朝灭亡后出现。

金沙文明，在《竹书纪年》中，被称为“夏启杀益”。

在《左传》中，被称为“后杼复国”。

三星堆城址，夏代晚期至商代，古蜀王国都城。

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发达。开明王朝迁都成都后，“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处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全盛时代。

“成都造”漆器，精美绝伦。

还出现官方市场“成都市”，个体商贾的贸易近至汶山、笮都和夔，远至夜郎、滇越。

农牧文明和手工业经济。

没有文字记载，主要因时代久远，夏朝文字成为天书，没人能看懂。

二里头文化中有文字，也有符号，合称为字符。陶字符在河南一系列遗址中均有发现，基本字符形不少于64种。二里头文化骨刻字符与陶刻字符之间具有相似性，属于同一系统文字。

陶寺遗址的两个朱砂体，分别是“文”与“？”（未知）。

二里头的出土文物中发现的24个“符号”。良渚文化中的“郑”字。距今6 300至4 3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中的“美术体”？距今约8 000年前的“贾湖遗址”发现“类文字”。

文字可能有哑示语成分，难读。

春秋时期的《虞夏书》《禹王书》，相继失传，唯独《尚书》还保存部分夏史，后又被人整理，剩下的残留夏史部分，很多人还是读不

懂，夏朝就这样慢慢飘渺化……

清末民初，王国维、顾颉刚等学者，无视《尚书》《左传》《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史记·夏本纪》等的描述，与丰富、神奇的民间传说《山海经》的记述。

夏商文明并没有消失。

一直存在于中国的语境下，一直存在于成都平原民间。

世界史惊人相似。各古代文明的成熟文字都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被发明和使用。

从苏美尔文字，到古希腊语，到拉丁文，走的是象形到表音之路。中国文字除一直象形外，也集表音表意之大成，夏朝文字可能早期复杂难读懂，后期那些天书，想必会陆续得到解读。

文化统一，文化传承中关键一步。

夏，曾经与商王朝进行战争最频繁的国家。

古蜀国，与商王朝军事摩擦最频繁的方国。

商朝地域非常广大，领土最大时，东北已达辽宁，西北进入黄土高原的渭水下游，南抵长江流域（武汉盘龙城），地域涵盖寒带、温带、亚热带等多种地带，高原、山地、平原等多种地貌。

商王朝的后半期，对陕、甘、青一带羌人的战争，没有间断过。

被打败的羌人回撤至天水陇西，部分流落到松潘、茂汶一带，落脚成都平原。

消息一个接一个。

不断南下的氐人羌人、边境武装冲突，让“古成都人”闻到些许硝烟的味道。

「大一统」，中国历史的底色。

「轴心时代」。在世界四个迥然不同的地区，中国、希腊、以色列与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超越和突破原始文化，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独立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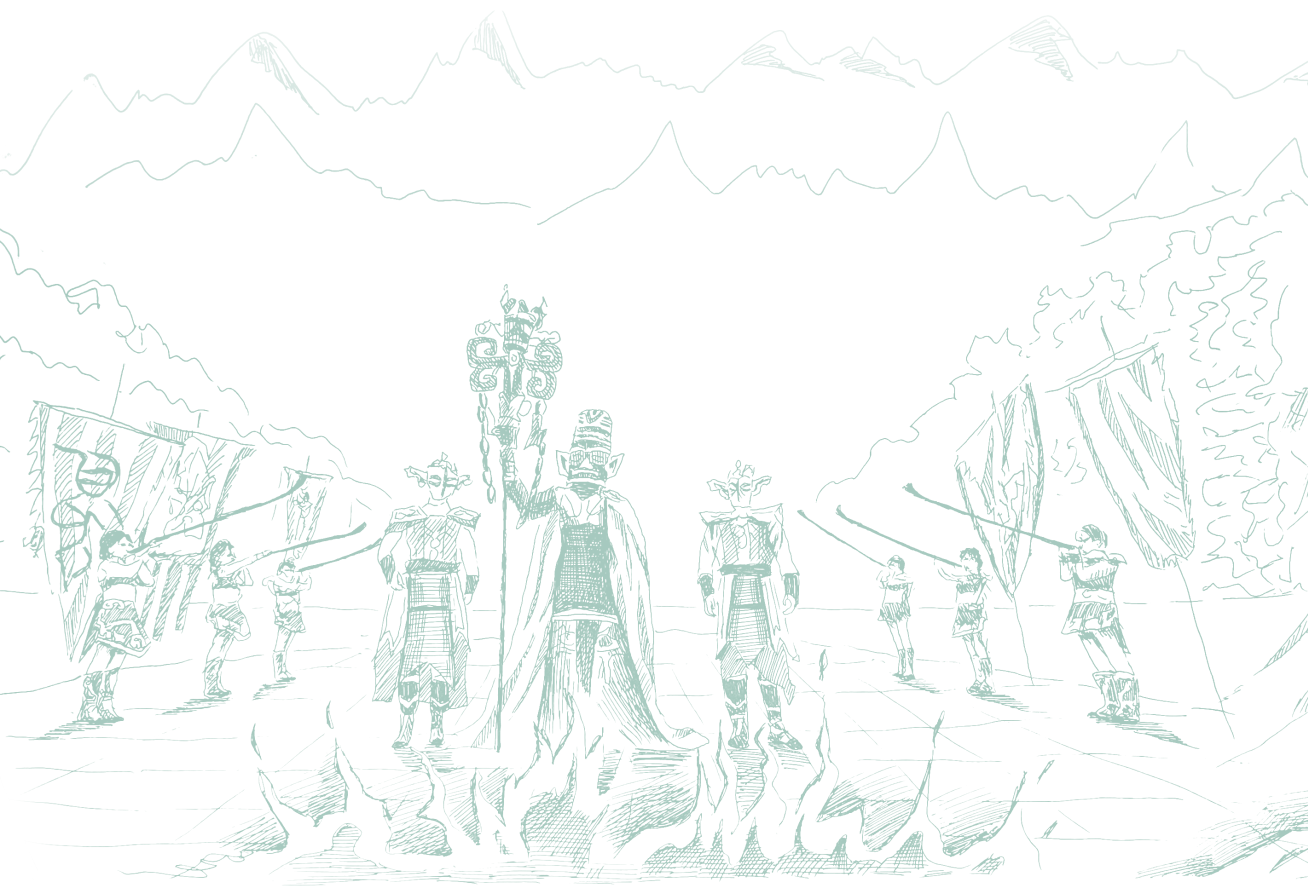
「中国」，在文化区域聚合而成的大空间当中展开，超越中原，包含中原、草原、西域、高原诸地理区域的大空间。「中国史」，几个亚区域聚合成一个大的空间体系的文化演化史。

西方传统是「分」，从中世纪到现在，一直小国林立，即使合起来，也合中有分。文化基因、传统一直影响着他们。欧洲国家认同希腊，希腊城邦的特点，小国寡民。

驾驭「一体」与「多元」，世界政治的永恒课题。

欧美，国家产生文明。

中国，文明诞生国家。





「川军」第二次出川



陆

柒

捌

玖

拾

公元前1226年秋，商王朝第一次大规模入侵成都平原。

殷卜辞记载：“利贞，吴弗其伐羌、蜀。”

“汉中之战”。征集军队讨伐褒、蜀、巴方，战于汉中。

商代，汉中属褒国（汉江以北）、古蜀国（汉江以南）。殷卜辞中，有“伐缶（褒）与蜀”的记载。既是古蜀国的北方军事重镇，也是殷商向西南扩张的前沿阵地。

打了几天几夜，不相上下。

没有预料，竟然到比雅利安人的“鬼方”还难打。

除了“藏羌彝走廊”上的古蜀国外，“西北走廊”上古羌的势力也比较雄厚，占有千里之地，人口不少。不是所有羌人都与商朝为敌，记事刻辞中，也有“多羌”向商王朝进贡卜骨的记载。

甲骨文中，涉及“执俘”“获羌”的记载较多。

既有在征伐诸羌时的俘虏，也有商的属国，还有参与战争的各族抓来进献的俘虏。武丁却非常重视，在从抓的俘虏中，都要挑选出古羌战俘，甚至专门组建了一支军团——“多马羌”。

武丁命令“多羌”去打猎，还占卜羌是否有灾祸、死亡。马羌被武丁征伐过，后来臣服，从奴隶中选拔出来，因此有“命多马羌”和“多马羌臣”“小多马羌臣”的卜辞。

“多马羌臣”，管理马羌的官。

“小多马羌臣”，管理马羌的小官。

国力强大。在协调一致、号令得当的正规军队面前，东

进羌人（西戎）就像被猛虎追逐的羊群，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以大败结束。大量的羌人被俘获后，成为奴隶、人祭。

心生覬覦。伐氏羌后，商的将领领着军队，沿着祁山道、陈仓道，南下入汉中，与褒国发生严重冲突。褒国不敌，向南撤退，并向古蜀国北地驻军求援。

唇齿相依。北地将领一面派出军队驰援，一面向古蜀国报告情况。

蜀褒合兵一处，击退商军。

褒国臣服古蜀国，疆土再次扩大。

富裕、安稳的成都平原，吸引西北羌人不断南下。

商朝不时南下，频频侵扰，严重影响古蜀国的农耕、商贸，也让“古成都人”怨声载道，诅咒之语一个比一个形象。现在四川人的咒语“瘟丧”的起源，指商入蜀就会带来瘟疫、死亡。

武王伐纣时，“川军”将士将“丧”改为“商”。

“蜀射”，古蜀战争舞台上耀眼的明星。

机动性，骑兵最大的优势。冲锋排山倒海，气势宏大，步兵根本挡不住。持续作战能力强，善于长途奔袭，对后勤补给依赖性小，能连续作战，只要带少量补给，就能奔袭千里投入战斗。

安营扎寨。军营里帐篷林立，军旗飘扬。

强盛时期，衣冠楚楚，队列整齐，军旗飘舞，战士着高头大马，手握制式兵器。古蜀人挥动长鞭，驱赶满载货物的牛车，双手推动独轮车（俗称“鸡公车”）。一支强大的成建制的武装力量。

已经具备远距离、进攻型的作战能力。

定都三星堆的古蜀国进入全盛时期。

古蜀王雄心勃勃，东征西讨，威风八面，挑战中原霸主商王朝，带着几万大军从中心都邑三星堆出发，沿着汉中、襄樊线路，进入河南，披荆斩棘，一直打到商朝的都城安阳郊区……

“登人征蜀”“丁卯卜，王敦缶于蜀”。

两句甲骨文，记载了蜀国与商国的两场战役。

“登”，意为征集兵员，商王纠结兵力准备伐蜀；缶，今山西永济一带的缶人部落，“古成都人”与缶人曾经联合抗商，缶人战败，落至成都平原投蜀。商王难解心头郁闷，最后御驾亲征。在殷墟和周原的卜辞中，多次出现“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的记载。

是一场意外，三星堆崩塌的宗庙，带走古蜀国的稳定。在大多数「古成都人」心目中，曾经养育自己的土地被神诅咒，变成不祥之地。是「副都」金沙城，还是诗与远方？

爆发多次战争，商王才会进行占卜，向上天询问吉凶、对策……

打不下，就和谈，就“和平相处”。

“蜀射蜀御”。商朝派使者到古蜀国谈判，射手和驾车的驭手，都与“古成都人”同祖。

“古成都人”多为古羌后裔，具有骑马的技能。

至少4 000年以前，古蜀先民就骑马挥刀，驰骋疆场。

骑兵，陆战之王，最强大的兵种。

马，游牧世界革命性的一个交通工具。

草原世界的文化，可称“马的文化”。

马为游牧世界驯服的畜种。马的使用，游牧生活方式出现前就已开始，潜在力量的彻底发挥，公元前3000年后游牧部族的贡献。农耕部族国家的用马，都是从游牧部族学来……

成都平原常驻的殷商特使、商人，作威作福。

“古成都人”怨气越积越深，对神王开始质疑、唾弃，演变为切齿痛恨。平民对殷商与王公贵族高人一等的做法，敢怒不敢言。促进了民间巫教的欣欣向荣，“官方”祭词祭制，逐渐“民间化”，美好的祭词、理念，逐渐变得扭曲、负面。讲不明、听不懂的“巫词”“巫语”在民间蔓延，光怪陆离的神话、传说，开始遍布成都平原……

天不助蜀。特大洪水，不期而至。

一场意外，三星堆崩塌的宗庙，带走古蜀国的稳定。

在大多数“古成都人”心目中，曾经养育自己的土地被神诅咒，变成不祥之地。

是“副都”金沙城，还是诗与远方？

该向哪里迁徙？

继续过幸福生活，就该离开。

仓猝、彷徨、犹豫不定，没有确定的目的地。古蜀国内部出现剧烈的争吵、对峙，“辫发”的一支族

群，要去“副都”定居，“笄发”的一支族群，执意要向中原迁徙。谁也说服不了谁。

一场盛大、阔气而又凄凉、无奈的祭祀。

佩戴“三金”的祭司主持祭祀活动，命人们将五谷投入坑中，覆盖在玉器、钱贝之上，投入火把进行焚烧。等到坑里的火焰熄灭，象征王权的各种青铜器进入献祭程序，献祭方式是摔。

摔，与焚烧类同。青铜器不易焚烧。

将青铜器进行毁损，充分表达献祭的态度，还要奉献纺织品。将各种纺织品铺盖在青铜器上，再一次举行焚烧仪式。焚烧过程中，祭司手舞足蹈地与各方神灵进行沟通，确保过程顺利。

与此同时，有人将金库里搬出来的象牙投入火中。

象牙，国库储备物资。金库里，有钱贝、黄金、青铜、象牙。

等到火焰熄灭，对先祖的祭祀完成。

最后，祭司将自己的“三金”也投入坑中，令众人回填覆盖……

祭祀告别仪式后，“辫发”与“笄发”分别踏上旅途。

三星堆王朝解体，“古成都人”迁移过程中，“辫发”族群迁到成都金沙；“笄发”族群迁入陕西宝鸡，“投亲”随大禹治水的“北漂大军”，已在甘肃天水定居的柏灌遗民，这就是周人。宝鸡的一些出土文物，证实与古蜀国的亲密关系。

迁到金沙的“辫发”族群，开拓创新，奋发图强，重新建立一个堪与三星堆媲美的国度。

远上陕南的“笄发”族群，命运多舛，在异国他乡，必须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铜，甚至是强大的周王朝的信任。与已经先到，曾经参与过武王伐纣，后又神秘消失的巴人不期而遇。

巴人的发源地在三峡地区，商朝早期就向四方扩展。

向北来到宝鸡，向西来到成都平原。

向北迁徙的巴人，翻越来到陕南的城固、洋县地区。

被殷商军队打败，又分成两支。

一支，沿嘉陵江南下，进入长江流域，与三峡西进的巴人会合，进入成都平原，开枝散叶，融入“古成都人”，共同建设三星堆、金沙城；一支，顺着嘉陵江北上，到凤县一带暂住，逐渐发展壮大，又翻越秦岭，在渭水以南的清姜河流域定居。

“笄发”族群迁徙的路线同故道(周道、陈仓道)一致。

在渭水河畔，这群顽强的“古成都人”，建立了“弓鱼国”。

一个活在过去的“故国”。

对三星堆有着无限追忆、缅怀的王国。

“蜀周同源”。

中原已是周朝的天下。

弓鱼国投靠周朝，被册封为诸侯，在“竞争”中拼下先到的巴人建立的矢国，在寸土寸金的周畿，获得一方蕞尔之地，迎来一个风光的政治婚姻——周王室重臣井伯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

婚姻带来的和平终究短暂，最终挡不住衰落脚步。

周穆王时，矢国逐渐强大。

弓鱼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茹家庄一带，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周旋。弓鱼国墓地那个被缢死的古人，最后一位国王的骨架。在矢国势如破竹的军队面前，弓鱼国消亡。传说归于平静。

三星堆的金杖上，雕刻着一张弓箭、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还出现在金沙的金带上。都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箭头深插于鱼头内。

金是古代重器，将图案刻在金器上，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

弓鱼文化，“三星堆文化”的非典型、不完全延续。

“夏周同源”。

夏人、周人同源，周人也来自成都平原。

在殷代甲骨文中“蜀”称，“古成都人”协助周王讨纣作战。

文献记载，“周先祖从梁山止于岐下”。

“葬于都广之野”。周人也自称是“后稷”（周始祖）的后代。

“神主”，指宗庙中的前代国君的铸像。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中，共有各种青铜人像50多个，包括人头像、大型青铜立人像。实际上，都是夏代宗庙中的“神主”。

《左传》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一个城邑，有陈列前代国君铸像的宗庙的是都城；没有的，是一般城邑。汉代以降，“神主”用画像、书写先君名讳的牌位代替。

《史记》说，大禹“河目海口”。夏代建立者大禹，父亲鲧，爷爷颛顼，颛顼的爷爷黄帝。面相有共同特点，有形状像河一样的眼睛，上下眼眶平而长，有像大海一样的嘴，非常宽阔。

夏朝王族的标准形象。

三星堆四尊人头像上，都贴有金箔，用黄金来表现除了眼睛、眉毛以外的脸上皮肤，“神主”的特殊身份。正是夏王朝的先祖，即黄帝、颛顼、昌意、鲧、大禹——“神主”。

“神主”大禹，头顶花冠，河目海口，身躯瘦高，一袭长衫细布礼服，手臂和手粗大，两只手呈抱握状。《论语》说：“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宫室而尽乎沟洫”，不讲究衣服，却追求礼服礼冠；不讲究宫室殿堂，却追求沟洫水利。

《说苑》说，大禹“衣裳细布”，礼服是华贵的丝绸细布所做。与青铜立人像表现的形象完全相同：两只手呈抱握状，一只手握的治水用的耒耜，另一是呈抱握形的手势，引导性动作。

与青铜像类似。

在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大禹的形象正是一手执耒耜，一手作手势。

大禹的“神主”所握的耒耜，筒状包金箔的木耒耜，与大禹的“神主”同时出土，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目前解读为金杖。

双手紧握、把握，一高一低，解释为把握、拥有，普通百姓通过双手创造美好未来；统治阶级，把权力地位牢牢抓在手中。也标示着金沙村、三星堆统治者在族属上，同一性或连续性。

“神主”大禹，身躯瘦高，与文献记载的大禹身高相同。

《竹书纪年》说，大禹高“九尺九寸”。

同时代的尧舜，身高分别“七尺二寸”“六尺一寸”……

两人相似。夏桀与商纣，夏朝与商朝的最后一位国君。

两个朝代的灭亡，也是十分相似。

夏朝从大禹开始，历时400多年。商汤灭夏，商朝建立，传到商纣，被周武王所灭。大禹与商汤，都是有为的明君；后代夏桀、商纣王在传说中都是臭名昭著的暴君。

同样修筑宫殿，夏桀作瑶台，商纣王作鹿台，寻欢作乐。

同样的商汤伐桀、武王伐纣。

商汤伐桀时，夏桀兵败逃跑。夏朝灭亡。

武王伐纣时，商纣王登鹿台自焚。商朝灭亡。

牧野之战，又称“武王伐纣”。

发生在3 000多年前的“现代战争”。

史载,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次战役。

《尚书》记载,周武王曾经对着殷商贵族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你们都知道,殷商过去有典籍记载,商朝推翻夏朝,为何我的周,就不能推翻商朝?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

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曾观兵于孟津(今洛阳孟津),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商纣王的反应。不少方国国君赶来,史称“六师”。

大搞联合军事演练,宣告灭商革命正式开始。

《牧誓》记载,伐纣大战前,周武王在牧野作战争动员誓师词,“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在列举一些重要大臣后,历数一同征伐殷商的国族,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蜀”排在第二。

号召八个族群加入战争。

共同抗敌。希望八族举起戈,排好盾,竖起矛……

公元前1047年,继“六师”之后,古蜀文明再次跨出成都平原。

与时俱进。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

中国历史上,“川军”又一次大规模出川。

距大禹带领古羌部落联盟出川,已经过去1 100多年。

“履霜,坚冰至”。

“川军”这次仍然沿着当年大禹走过的那条北上“秘道”,至少走了一个月时间。

他们是推翻商纣王的重要武装力量。

《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

常璩所说的《尚书》,当指《牧誓》这篇。

援周的古蜀军队奋勇当先,个个骁勇善战,充当整个盟军的敢死队和肉肉盾牌;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盟军一起,彻底摧毁了商王朝的精锐部队。

不同于中原“华夏族”,被后人称为“蜀族”。

中国发生的文明的更替,过程与东地中海地区截然不同。

诸神黄昏。南欧一片黑暗,全处于氏族公社时期。

文明的火花只在爱琴海的岛屿上,来源可能是埃及和两河。

地中海沿岸地区，“海上民族”腓力斯丁人带来的飓风，令埃及、希腊、土耳其、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等众多辉煌的古文明中心，突然走向衰亡，为新秩序的建立打开空间。

腓力斯丁人的铁器文化，也被带到被征服的地区，引发一场铁器文化代替青铜文化的技术革命。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家，与另一股新兴势力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发生激烈的斗争。

以色列犹太王国的扫罗王，也战死疆场。

阿拉米人建立的大马士革王国，直接瓦解了亚述帝国的统治，以首都所在的城邦最为强大，建设发达的供水系统，确立作为地中海与东方贸易的重要枢纽的地位，商业繁荣。

古埃及进入历史上的“第三中间期”。埃及北方的尼罗河三角洲、中部地区由第21王朝的法老统治，南方以底比斯为中心由阿蒙祭司集团统治，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南北分立局面。

经由西伯利亚、阿拉斯加之间相连的陆地，由亚洲迁移至加拿大的土著居民，除一部分定居在加拿大之外，继续向南迁移，到了美国一带。现在加拿大因纽特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祖先。

一切文明都（部分地）植根于战争。

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

公元前1047年，继「六师」之后，古蜀文明再次跨出成都平原。与时俱进。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中国历史上，「川军」又一次大规模出川。继大禹带领古羌部落联盟出川，已经过去100多年。



陆

柒

捌

玖

拾

天刚蒙蒙亮。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十三）日。

天象清晰，岁星上中天。

出兵东征。一开始就自带强烈的“天象”印记。

坐在大船里，周武王渡过黄河时，看到舟楫整齐，卒伍士气高昂，心里高兴。

船行到中流时，有一条银白色的大鱼一跃，正好跳入船里。

为鼓舞士气，指着大鱼宣布：“殷人崇尚白色，这是要自取灭亡的象征。”

大军上岸。一颗红色的流星划破长空，声音震天动地，增加战前悲壮、森严的气氛。

统一天下。不是叛逆，天命所归，讨伐有理。

为增加号召力，在军中供奉周文王的神主牌，表示奉父命才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出发前，对司马、司徒、司空等官吏训话说：“你们都认真、严肃地听着：我这个人很愚笨，没有什么本领。但我的祖先为我留下了许多德高望重的贤臣、灭商之势已成的大业，我只不过是完成先人的未竟之业而已。我，一定赏罚严明，你们，要努力多立战功。”

创造历史的机会到来，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空虚。

商朝的精锐部队，还陷在东南方向至少250公里以外，与东夷族战斗。

亲率的灭商大军精锐，在离商都仅有35公里的牧野，摆开决战阵势。

“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

戎车，即战车；虎贲，骑兵；甲士，步兵。

倾国之兵。西周灭商，军队包括战车350乘，也就是14个师，共计35 000人。

每师2 500人，战车25乘，战士（带甲之士）75人，徒兵（无甲冑）1 925人，运输队500人。

再往前的商汤伐夏，出动战车70乘，敢死队6 000人，也就是三个旅（师）的军队。极为强大的一支军队，夏桀自然打不过，要逃窜至“南巢”。

从殷商时期的一旅2 000人，到西周时期一师2 000人（加运输队500人），再到春秋时期一军10 000人，古代中国的军队规模越来越大。

战国时代，负责粮草、辎重的运输队人数也计入军队。从商末周初的一（旅）师2 000人，变成战国时期的师2 500人，旅500人。

“诸侯兵车会者四千乘”。

司马迁为制造悬念，故意没有说参战诸侯的总兵力。

黄帝、大禹时，诸侯有上万个，每个诸侯的兵力1 000左右。

夏朝末年，只有约3 000诸侯了，每个诸侯的兵力达到几千。

到商朝末年，只有约800诸侯，诸侯的兵力超过万人，势力日益强大。

“中央政府”名存实亡。

联军东渡黄河，兼程北上，折而东行，在牧地誓师后，进至牧野。

《诗经》记载：“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駟騶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大敌压境。商纣王骤闻，王朝主力军队却远在东夷作战，只得临时武装17万奴隶、俘虏，驱使到牧野，仓促应战。《诗经·大明》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

“民”心所向。周军货真价实的“国际联军”，屡次参加周方国对外扩张战役，经验丰富，改朝换代的兴奋精神，为士气注入“高昂”的强心剂。各诸侯参战，也自认是“正义之战”。

经过长途跋涉，入境作战，疲惫。各诸侯部队，“各自为政，不听调遣”，注定其出工不出力的现实，一旦战场风向有变，墙头草般的反复变幻，容易产生引导战局走向的“倒戈”。

周方有军队纯粹性的优势，有入境作战的劣势。商方有队伍不纯的劣势，也有本土作战的优势。商军厉兵秣马，周军士气如虹。牧野之战过程，简略得令人大跌眼镜。

商方本土作战，反侵略斗争，士气不低，熟悉地形，便于发挥。只是部队多为临时征召，待刑的死囚犯、晃荡的无业游民、没地位的奴隶，充斥其间，稀释队伍本身应有的纯粹性。

周方有军队纯粹性的优势，有入境作战的劣势。

商方有队伍不纯的劣势，也有本土作战的优势。

商军厉兵秣马，周军士气如虹。

牧野之战过程，简略得令人大跌眼镜。

商朝军队的玄鸟旗，整齐地排成一列，阴影洒在地上，构成一道黑色的城墙。

“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

周武王先派姜尚率领100人，试探商军阵型的薄弱之处。随后，冲锋部队，“虎贲三千”，原野尽头响起雷鸣般的马蹄声。

甲兵、战车配合，有如神助。周军的战车，驷马三士的配置，多出的那名甲士，赫然举着一把幽光闪闪的长柄戈，一鼓作气冲击商军本阵。再后，周王亲自带兵冲杀，士气大振。

“进厥虎臣，阞如虓虎”。

“商师大崩”。商军拿着木棒，黑色的形如燕子的玄鸟旗倒下……

大势已，无可奈何。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临时拼凑而起的商军，在周军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

商纣王返回朝歌。

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战争，血的鲜红。牧野之战，打得简单而激烈，商人为保家卫国而战，周人为新王朝而战，各不相让。刀剑是最好的说话道具，没有仁义，没有道德，只有生与死。不是生，就是死。

第二天，周武王在大营内临时设立的文王宗庙

前举行“燎祭”，架起柴堆把玉帛、牺牲之类的物品，放在上面焚烧，通过上升的烟气，将成功的消息昭告上天，上告先祖，祭祀文王。乘胜追击。下达一连串对商人的追剿令。

那么，生死之战何以在朝歌展开？

早期的商，迁徙不定。

商人善迁，商朝对迁都有种迷之爱好。从始祖契，到成汤未得天下前，十三世中有八次迁徙，相当于每一代，都要来次全族大搬家。除最后一次成汤定居的南亳外，其余七次都不可考。

约公元前1300年，第20位国王盘庚带领臣民，从山东“奄”西渡黄河，来到时称为“北蒙”的安阳，在洹水岸畔建立稳定的都城，有“盘庚迁殷，更不徙都”一说。

公元前1101年，帝乙即位后改沫邑为朝歌。

商朝后期，“武乙迁沫，文丁又都之；帝乙迁沫，纣又都之”。《史记》记载：“沫邑，殷王武丁始都立。”再迁北蒙（今安阳），沫都废置。

武丁城，朝歌的前身；沫都，武丁城的前身。

朝歌原叫沫乡，又改为沫邑。

神话《封神榜》中塑造的城市。

位于今河南鹤壁市区南部淇河边。

作都城近500年，具有3 000多年的古都史。

殷纣王扩大武丁城，建立行都，在淇县城太行东麓，建了著名的鹿台。

整整用了七年时间，工程才算告竣。楼榭斗拱、飞檐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四周，群峰屹立，白云萦环，婀娜多姿。台前，卧立几排形似各种走兽的巨石，犹如守候鹿台的卫兵。

因城西朝歌山，改沫都为朝歌。

公元前1075年，帝辛即位后，仍袭朝歌为都。

历史记载，“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

一座陪都，军事重镇与田猎、游乐地所在。

安阳殷墟，国王和贵族的宗庙、祭祀所在。

最后都城。一共有四代商王，喜欢待在朝歌。

分工不同。殷墟正式都城，朝歌一座陪都。

《竹书纪年》记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

丘,皆为离宫别馆。”

朝歌,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小可。

武王伐纣、周起商灭的历史中,还蕴含着丰富的姓氏文化之根。中华民族从百家姓到千家姓,全国有61个姓氏,或源于朝歌,或同朝歌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

密不可分。殷墟与朝歌,安阳与淇县。

殷商都城,人口众多,工坊密布。

本就没有城墙,不太利于直接的军事防御。

北有洹水、漳水,西有太行山,东有大河阻隔。

“淇县古城垣是典型的商城”。

南面虽有一片开阔地,却有一座巨城朝歌,安全有保障。犹如秦都咸阳,依靠独特的地理位置,采用“非城郭制”格局,周边有军事重镇守卫。刘邦攻下武关后,让咸阳彻底失去东面的屏障,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秦王子婴无奈之下,只能主动出击,而不是坚守咸阳城。

咸阳只有宫城,无外城墙可供坚守。

朝歌古城,坐落淇县城北的淇县古城遗存。

东有淇河为险阻,西有太行山作屏障,城池南北各有三道城垣。

最外城垣,南至淇县的常屯村,北至淇县的淇水关,南北相距25公里多。

王城为第二道城,北城垣在今淇县工业路东至三海村北部,南城垣在今淇县难关一带。

《淇县志》中,记载“淇邑北门出,西过纣王城”,指纣王的二道城。

宫城即第三道城,坐落于今淇县三海村和西坛村一带。

至今仍称“纣王宫”。左有宗庙,右有祭祖、祭天的社稷坛,西坛村因有社稷坛,得名。

朝歌城垣,巍峨绚丽。

古城垣遗存,部分城墙高约10米,顶宽约130米,基厚约150米;城垣东西宽2公里,南北长3公里,城周10公里,总面积12平方公里。表现了《诗经》记载的“版图千里,维民所止”。

淇河,史称“淇水”。

发源于山西省陵川,经辉县、林州、鹤壁到淇县,于浚县淇门入

卫河，全长161公里。

沿岸风光旖旎、风光俊美，被誉为“北方漓江”。古往今来，在淇河抚育的陈旧的土地上，演周易、说封神、话春秋、道列国……尽管算不上大江大川，但也是一条稀有的文明河、诗河。

天然太极图，位于淇河南山段，河水形成反“S”形流向，两岸青山如同阴鱼、阳鱼，惟妙惟肖，成就一幅天然的阴阳太极图。相传，周文王在此夜观天象，日研神图，发现太极的神奇天然图形，演绎八卦，成为周易玄学的文化基础。

天赐诗经，地赐淇河。

《诗经》中，至少有44篇源于淇水“卫地”。

6首18次，直接咏“淇”。

刺秦王的荆轲，入朝鲜建国的箕子，文曲星比干，变法强秦的商鞅，培养出纵横家苏秦、张仪等的鬼谷子，军事家孙臆、庞涓，都从淇县走出。

古灵山，女娲修真处、商纣王降香处。

正因商纣王对女娲出言不逊，才直接导致“封神演义”发生。

由于殷都没有城墙，而朝歌墙高城坚，在武王起兵后，商纣王就自然选择驻守朝歌抵抗。但为何不依靠朝歌坚城，而选择在牧野决战呢？

根据《尔雅》记载：“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牧野，并非特指一地，一种区域划分。牧野，应该介于“牧和野”之间。

《说文解字》解释：牧邑在“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武王与纣战于牧野”。

汉代的70里，约合25公里，卫辉市区所在地。

兵力不够，背靠朝歌坚城，打不过，可退回。

只是没想到“内鬼”临阵倒戈，导致一败涂地。

儒家宣传。“武王一夜克商”，真实历史至少需要2天时间。

“二月甲子”，正值冬季。

临河布阵。《周语》记载，“王以二月癸亥夜阵，未毕而雨”；《吕氏春秋》记录，“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六韬》介绍，“武王东伐，至于河上，雨甚雷疾”。

如今中原偏北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冬季干冷，少有淫雨

霏霏。在商周之际，远比现在温暖湿润。当时的黄河北岸属于亚热带气候，全年不结冰，冬天不降雪，而是降雨。

大雨下个不停，战斗冒雨进行。

在暴雨之中，临河交战，血水被雨水冲入河流，染红河水。混杂着血水的河水上，漂浮着木杵（木质盾牌）。残酷的场景被《武成》篇记载，留下了“血流漂杵”的文字……

牧野之战的规模与后世许多战争相较，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

一次没有战争的战争。

战功最大的是“利”。70万、或17万刑徒之说，夸大、附会、臆测。“武王伐纣”，被后世赋予浓重的神圣色彩，成为解决天命更易、朝代更迭重大“历史难题”的满分“标准答案”。

武丁时期，国都朝歌附近能征召的军队数量，最多就2万人。

到了商末，实力大减。

商纣王临时能征召2万人已是极限，前提是朝歌人口必须得10万以上。临时拼凑出2万人的军队，对抗周武王的3.5万“国际联军”，临时组建的队伍无法与久经战阵的精兵对抗，惨败在情理之中。

夏商时代的国家，并非后世想象中的泱泱大国。

灭夏时商汤的部众，不会超过10万人；灭商时周武王的部众，最多不到30万人。

武王伐纣出兵3.5万，已是倾国之兵。

正义之战，统一国家的历史战争。

聪明、胆略、思想高超。

周文王暗地进取、以进为退，夺取战略主动权，胆略卓识，先发制人，选贤任能，既是用人之道、也是用将之道，重将、选将、用将。以治为胜，教诫为先；总文武者，军之将帅。周太公望运筹帷幄，调大将南宫适、洪锦各率5000人马，左右两面夹击商军，商军哪里能抵挡训练有素的精锐的猛攻，一触即溃。

强弩之末，商纣王借健硕的体魄，杀出一条血路，逃回朝歌。

商军溃败，不堪一击……

攻占朝歌之后，“国际联军”随即兵分四路，向东南方进发，征讨商的残余势力、忠于商的方国。剩余的商军主力，又处于东夷的包围下，两面受敌，大部分商军被消耗殆尽。

武王克商后，兵抵朝歌，迁九鼎于朝歌。

“封神大战”，蓄谋已久。

犹如“二选一”，没有中间路线。

战场上靠实力说话，软弱、气馁、老残，都将被淘汰。

物竞天择，自然界规律，也是战场定律。

蜀周同族。武王伐纣，并不仅是“替天行道”，还含有报仇之意。仇恨实是古羌、东夷两大族群长期敌对的产物。带有一些民族解放战争的意思，与后来女真族、契丹族的战争类似。

汤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牧野之战也不是穿插着大型乐舞的宝莱坞大片。

脱去赋予的神圣光环，利用商纣王自负的心理，打商纣王个措手不及。

本质上，灭商之战是一场两军主力的野战，更是一场经典的闪电式的斩首之战。

商纣王自焚于朝歌。

战争情节和明朝朱棣用武力篡夺皇位几乎一致。



陆

柒

捌

玖

拾

纣亡国灭，600年社稷毁于一旦。

得人心者得天下。

百姓政治上的拥护，对国家作战重要。

联合作战消耗大，需“同盟国”人民共同作战，合作多赢。

“武王伐纣”，中国军事战争开辟新的战略，战略要点、作战方式都为后世学习，在决战前夜，以“车战”为主占据朝歌，出其不意，抢夺马匹，使朝歌城里无一马匹可用。

有主有辅，高度重视战争策略。

车战技术，用兵思想，方位进攻，创新了中国古代战争的形式。

战车，西周时期的主要战争工具。

车战，也成为西周时期的战斗特征。

“驷乘”，车战以22人为编制与4人共乘之法，车上随带兵器，輿侧接敌，左右旋转。迂回、长途追击等各种形式实行，两线配置改为环形配置。

延古至今。周氏父子“以进为退”“伐谋”“伐交”三者并用，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从整体上全面看待战争，从军事理论上看待对方的性质、范围和内容。

中国象棋的起源。

明代《五杂俎》介绍：“象戏，相传为周武伐纣时作，即不然，亦战国兵家者之流，盖彼时重车战也。”春秋兵制模仿武王伐纣时的军队建制，即将、帅、车、马、士、兵、卒等。

常态，漫长的历史中，落后文化战胜先进文明。

科学技术决定生产组织的选择空间，意识形态对暴力

组织起控制作用。虽然落后族群的科技水平低下，但是采取更有凝聚力的意识形态组织军队，便可在暂时落后的情况下翻盘“上位”。

周灭商，犬戎灭西周，秦灭六国，五胡乱华，辽金西夏，元清两朝，都是落后战胜先进，游牧或半游牧文明战胜农耕文明。落后文化军事组织制度的不断“优化”，先进文明处于守势。

鼓舞士气，采用“外循环”。从周边小国入手，拉入阵营，扩大范围，“同盟”作战。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提出“联吴抗曹”的思想，“同盟”的延伸运用。

黄帝，“外循环”的鼻祖，建立军队部落联盟的首领。

最初的军队，来自自己的族人。从部落里专门选拔一支脱离农业生产的队伍进行训练，南征北战。与蚩尤的大型军事部落联盟作战时，黄帝自身的军队不够，不得不从其他部落征兵。

在《史记》里，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开篇，有一段冷峻的描述：

“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笔调平淡，故事的背后，却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知多少部落消散于时光深处。战争中残存的部落，失去独立性，成为黄帝大旗下的一员，就连前朝天子炎帝都不能幸免。

内外“双循环”。黄帝打败神农氏炎帝，最后又骑着貔貅（大熊猫），击败东夷的蚩尤，最终统一华夏腹地，即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与山东地区。

炎黄子孙。

炎帝、黄帝第一次混血。

打败战神蚩尤，融合远古的东夷人。

中国人血统的真正开始。

尧舜禹时期、黄帝时期类同。

史料记载，尧攻三苗。

大禹也率部，攻三苗。

军队，部落里选出来的强壮男子组成。

《竹书纪年》记载：“帝启，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

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都。”在带兵打仗过程中，大禹有了自己的亲信。儿子启，跟随大禹进行征战的武士，才有“大禹死后，夏启带领诸侯攻进冀都（陶寺），夺取政权建立夏朝”的后事。

商朝建立前的黄、唐、虞、夏之时，五帝之国已经形成以部落中的勇者，为兵源的半常备军制度。到夏朝晚期，商族首领成汤崛起，先后征服了韦国、顾国，又大败昆吾国。

商汤以70辆战车，6 000人的军队伐夏。

《吕氏春秋》记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遂有夏。”

商汤的军队规模已经较大。内外“双循环”，部队里除了商部落里的本族人，包括被征服的“葛、温、韦、顾”等部落降民。军队里，分为两类士兵：“众和庶”。

《尚书》记载：“格尔众庶，悉听朕言。”

众，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商族人。

庶，被征服部落尚未完全融入商族的降族。

与后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进攻中原时，军队分本族军、降族军，性质同样。

“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商汤伐夏的军队，大半为临时征召。

处于半军事民主制、半统帅制阶段。军队里的众人，有的不愿意出兵，想安心种庄稼。

有的认为，夏部落的事情与他们无关，不想出征，“夏罪其如台”？

商汤还需要做好思想工作，恩威并施。不过，对不听话的人，以“杀你全家”恐吓：“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商汤的兵制，选兵于民的民兵制阶段。

降族，属于半强制性征兵的民兵制阶段。

军队尚未形成军、师、旅的概念。

到了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征伐的记录。

“旅”的概念出现。甲骨卜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

妇好的部众3 000人，已经出现西周时代“以士为兵”的兵制。妇好就是受封于商王的统帅，要带领自己的3 000人出征作战。“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半专业性质的半常备军。

目前所见甲骨文中，殷商出兵人数最多的一次。

武丁之妻妇好，统兵出战，相当于御驾亲征。
周人再一次成功采用“外循环”。

字斟句酌。历史上，史官们记史颇为认真，斤斤计较。

帝王和史官的关系，复杂微妙，一要“自称我长”“掩恶扬”，一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要文过饰非，一要“君举必书”；一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要对后人“申以劝诫”。

大相径庭。两种目的，两个标准。
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较量。

《史记》以一位历史见证者的角度记叙。

战争支柱，以仁为本，仁义才是战斗力、凝聚力、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础。战争准则，师出有名，《礼记》主张“师必有名”；师出无名，一定会遭到众人反对，结局必定失败。

“仁者无敌”。按照这个模式，“武王伐纣”被后人打造。

《牧誓》，一篇简短的战前动员令。大战前，周武王一手拿着明晃晃的大钺，一手持着指挥大军的白旄旗，走上战车——前线指挥台，面对排列成战阵的军队，举行庄严的誓师典礼。

将士为决战做好准备，手中的戈褶褶生辉。

周武王目光如炬，声洪如钟，每一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天下诸侯三年前，已决心从周灭商，共建新的国家。商朝还有几个好人在位，人民还有幻想。过了三年，微子、箕子被逼走，比干被害死，人民希望破灭，周武王发兵。

不断证明，讨伐商纣王的合法性。

列举四条罪状：妇人干政、不修祭祀、不任用亲族、收容并任用罪人。

《牧誓》说：“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勗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

科学技术决定生产组织的选择空间，意识形态对暴力组织起控制作用。虽然落后族群的科技水平低下，但是采取更有凝聚力的意识形态组织军队，便可在暂时落后的情况下翻盘「上位」。

止齐焉。”前进六七步，就停一下，刺几刀，就停一下。

“戒其贪杀”，禁止“追逐”。

“恭行天罚，不妄侵掠”。

周文明的境界：宣战、约战。

禁止偷袭、禁止不宣而战，不许埋伏，不许谎报参战人数。

《左传》记晋楚大战，晋败，“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碁之脱扃。少进，马还，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晋军逃跑，楚军不能追击。

一如《牧誓》所说，“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

晋军一个笨蛋逃跑时，车被路障卡住，楚军帮他脱困。再跑，军旗被卡住，楚军再帮他拔掉被卡旗子。逃出后，晋军幽默地回敬：你们楚国的逃跑技术厉害啊。

类似案例，充斥于周代文献。“穷寇莫追”“五十步笑百步”“不顾不成列”，成语流传至今。还有不扰平民，及时释放俘虏，不伤害受伤者。商朝屠杀俘虏，祭祀坑动辄几千人。

《牧誓》要结束残暴的丛林社会，以“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包括战争。

宣布商王的罪行：“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妇好帮助夫君治国，值得推崇。但是，王朝处理公共事务，“王十政治协商会议”的体制。王家的女人参与政务，就会侵犯各国诸侯派来的“政协委员”的权力。

宣布商王的罪行：“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不敬先祖，不重用兄弟。不敬祖的人，断子绝孙，做事无所畏惧，没有底线，可怕，可恶。兄弟亲属，互相不合，至少一方的人品有问题。商王与微子、箕子、比干等亲戚，闹得你死我活，里面肯定有问题。孝顺，家庭和睦，这样的人，才可靠。

战争、家庭、家族的“礼制”思路。

周朝建立，“制礼作乐”的手绘草图。

有专家学者，得意洋洋地评价：《牧誓》对华夏文明的意义，类似雅典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之于欧洲文明，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之于美国。

夏商周三代，近两千年的文明积累，跃迁至文化的高级阶段。中国人被孔子的哲学义理连接，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感化人心、颠覆王

朝的宗教，更没有西方历史上血腥尖锐的宗教对立……

事实真相。颠覆人们往来的认知，令人不敢想象。

“(纣)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在《史记》中，司马迁这样记载。

商纣王，既聪慧又任性，靠自学占卜技术，将祭司赶出权力之坛，将只让贵族上任的不成文规矩破坏，让平民掌握职权。贵族离开掌控政权的舞台，成为第一个得到中央集权的君主。

商朝最后一位君主，从小学课本，到小说故事、影视剧里，了解的是暴政、昏庸无道——历代昏君的经典教科书。六项罪状，分别是：酗酒、近女色而听女人的话、不认真祭祀、自大、不重用亲戚贵族、任用身份低微的人。

种种“罪恶”，大部分为杜撰、附会，并非史实。

许多文献称赞商纣王聪颖勇武、才华横溢，难得的英主。

《史记》里称，“长巨姣美，筋力超劲，手格猛兽”。

《帝王世纪》称，“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

一场国与国之间，由“国仇家恨”引发的复仇。

英雄行径。商纣王“帝辛”并没有逃跑，在眼见事不可为、无力回天，决心与社稷共存亡，豪迈地走上了鹿台，自焚而亡。同时自杀的，还有纣王唯二的两个夫人，其中一个就是妲己。

不惜抹杀史上真正事实的孟子，也不得不承认，商纣王在位期间一直善治遗风、重用贤者，商朝才能被统治较长时间。酒林肉池，夜夜笙歌，是因商朝特有的文化导致。商朝的女子比较开放，夜夜笙歌，自己的兴趣、爱好，纣王酗酒是因酿酒技术并不高超，喝酒感觉与喝饮料无异，既然不会醉，自然不会妨碍朝政。

被黑三千年。

残暴荒淫，多为后世的污蔑。商纣王在身处的王族斗争时代中，做了加强王权、抑制族权的事，操之过急，具体行为或许存在过激不当之处，最终落到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下场。

实为王权、族权的斗争。

“箭垛式人物”，前朝的亡国之君，成寓言的典型案列。

与暴君毫不沾边，一些性格上的特质，还是明智的选择，即便拿奴隶来生祭，也只是商朝特有的文化。因为不给祭司、贵族权利遭到嫉恨，“失利者”才会四处散播谣言。周王朝强行夺取国家，自当

仅是「仁者无敌」，还不能建立伟大的社稷。以「家」为核心的思想，民族统一以文化的统一为前提。融入北方游牧民族的阳刚、血性，中华文明才会平衡。

把末代帝王描述得越坏越好。特别是《封神演义》，把纣王描写得越来越坏，许多看过书的人，直接信以为真，纣王名声也是越来越差。

无论是《殷本纪》《周本纪》，还是其他文献，都提到商纣王宫中的荒唐不羁。后世误解，实是引入上古中亚地区流行的“株离之舞”，引入胡风文化的目的，为政治改革营造社会氛围。

《甲骨文合集·630记载》：“癸酉卜，贞，多妣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帚。”

殷商的西部敌人中，有吐火罗人、白狄、义渠、犬戎等，来自中亚。之前，战俘一般用来殉葬，纣王改革制度。俘虏而来的西土战俘，纣王组织起来表演歌舞，代替原先的祭祀仪式。

统一祭祀。并非图谋一人享乐，而是为统一天下。

自我神化。采用某种祭天帝的仪式，祭祀祖父、父亲。

将自己神化为与天帝等齐的神祇。

极为“大逆不道”。信仰神灵的时代，祭祀重要，国家宗族延续的象征。殷商初期，也封了夏人后裔杞、缙两个国，继续祭祀祖先社稷。改革祭祀制度，“存其祀”自就消失。

改革超前，行为超常。

人心惶惶。引发既得利益者贵族阶层的不安、四方诸侯的恐惧。

周武王举兵反叛时，八百诸侯反叛，纷纷起兵响应。

挖掘历史文献下隐藏的历史真相，寻找最接近客观事实的历史。

天下从来没有不流血的战争，不管正义，还是非正义，即使是无需动刀、动枪的政治斗争，也是血流满地。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追溯始作俑者，儒家学派拥有“亚圣”头衔的孟子。

战争非常惨烈，人员死伤很多。

孟子以不可置信地口吻来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认为仁义的人无敌于天下，否认事实：“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倒戈只是一部分，血流漂杵却是大多数。

支持商纣王的有许多，大都成“血流漂杵”的那部分。

商纣王的“至不仁”，未必更甚于秦二世。

周武王作为附庸国，以下犯上，从外部入侵中央，“至仁”“正义”，未必高于刘邦、项羽进攻秦二世。孟子却说周武王在战斗中，兵不血刃、不犯杀戒地颠覆商王朝，实为遮蔽众听。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王充曾经强力反驳，在著作《论衡》中提到：“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哪个朝代取代前朝时不流血，“兵不血刃”的真实缘由，就是为凸显周武王的美德，增加美誉度。

古往今来，看透武王伐商的实质，王充当为第一人。

仅是“仁者无敌”，还不能建立伟大的社稷。

以“家”为核心的思想，民族统一以文化的统一为前提。

融入北方游牧民族的阳刚、血性，中华文明才会平衡。



陆

柒

捌

玖

拾

商纣王几乎成为历史变革的经典“祭品”。

周人崛起的历史，一部对戎狄血淋淋的征服史。

灭商前，周人自称“小邦周”“小国”。

农耕小国，经济、文化落后，只有百里的土地。

周文王，姓姬，名昌，俗称“姬昌”。

继位后，请来渭水支流磻溪垂钓的72岁的姜子牙，拜为“太师”，统帅三军，继续争夺地盘。《后汉书》记载：“乃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不但征服周边的戎狄，还替殷商讨伐反商势力。

在《论语》中，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人只是赢得天下大多数的民众，作为周朝的臣民，孔子一心想当周朝的官，忠实拥护周礼。

为周人灭商的正义性，寻找合理论据。

为正统的地位辩护，为武王伐纣唱赞歌。

周文王并不是殷商的忠臣。

《诗经》也证明：“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翦商，就是灭商。武力打天下，几代周王都是杀戮戎狄人口无数，占领大片戎狄的土地。

战争血淋淋，没有正义可言。

周灭商、秦灭六国，性质相同的灭国战争。

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

牧野之战前，周武王在战场上列数纣王帝辛的罪行，鼓舞士气，用以稳定军心，治兵之道。战争的目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孙子兵法·谋攻篇》指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善于用兵，便可大获全胜。“致人而不致于人”，注重于战场上的灵活性，夺取主动权，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制胜方法。在战争中，曾采用车战与人力相结合的战法，符合孙子“强调奇正”的思想。

从迁徙史、战争史、居住地看，周人的民风，更接近于西戎。

战争中，“钺”有军事权力。

朝堂上，“钺”有政治权力。

祭祀中，“钺”又拥有神权。

《尚书》记载：作为周族军队的最高统帅，周武王伐纣时，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拿着牦牛尾装饰的白色旗帜，用这两件“标志性”器物作为权力的信物，行使天子最高指挥权。

威风凛凛。率军向商都朝歌前进。

商朝的奴隶主们，早已跪在城外迎接。

让大臣们安抚吓得魂飞魄散的贵族：“你们不要怕，上天给你们带来福音。”

惩罚暴君。来到纣王烧死的地方，恨从心起，亲自射了三箭，还不解气，用轻剑砍杀，又用黄钺斩下头颅，挂在大白旗上示众。再到纣的嬖妾处，二女也都已自杀，对着纣王的姐己的尸体，也射三箭，然后割下她们的头，挂在小白旗上示众。

殷商是武王的姥姥家，纣王还是老表，更是他家的恩人。

离开商都。武王为祖父、父亲、哥哥报仇雪恨，回到军营里。

周公对康叔说，有一群人在一块喝酒，你不要放纵他们，把他们全部逮捕，押送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他们杀掉。对那些有意犯罪者，即便犯的罪很小，也要把他们杀死。

对殷商遗民说，我分给你们土地，是为了让你们敬事我们周国，如果你们不敬事我们周国，不但要收回土地，而且要惩罚你们。强力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

君权谁授？

孟子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农耕文明，安土重迁。「不假求于外」，中华民族的性格底色。在大河流域赐予的天然沃土上，农人只要辛勤付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求空间扩张，唯望时间绵延，生活小康。

“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

周人共识：文王受命在前，武王伐纣在后。

“受命”与武力无关，与是否一统天下无关。

受命的唯一依据，人民“愿意往”“虞芮质阙成”。

“近者悦，远者来”。

只有得到人民爱戴的才是王。以仁政，德政，让人民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如果被人民厌恶，抛弃，人民他往、叛变，王没有权力，以武力胁迫人民“往”。

“万邦有过，罪在朕躬”，只能反省自己，承认“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自己要“禅让”，对新王“避诸海隅”，让人民有“诛一夫”“迎王师”而“他往”的权力。

正如纣王军队前徒倒戈，邹人不管邹鲁战争。

权力天授，统治者无权私相授受。

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子贡读前人之事，发出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商纣王，根本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坏，原来好多事，被后人安在他身上。通达世故的君子，绝不让自己沦落到那样的境地，一旦落到，所有的坏事，就都会被安在你的身上。墙倒众人推。

子贡，孔子得意的学生，儒商鼻祖。

众人都在向商纣王泼脏水，却能独立发声。

简单的历史循环。

惊人地相似，也惊人地巧合。

夏王朝能够延续，并非个个帝王英明、神武，只是其他部落，未能形成强大势力；等到商部落悄悄地成长、壮大、难以抵挡，夏王朝的寿命，就进入倒计时，商汤伐夏是大势所趋。

现在轮到了商王朝。

商纣王有智慧、聪明，越是有智慧，越是痛苦。

“荒淫无度”，可能是因深知商王朝，病入膏肓，必

将在自己手中灭亡，并不会因为自己贤明、有智慧，或者各种各样的“罪恶”改变大势。

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

细节上的“巧合”，都是“人为”制出。

目的就是抹黑上一个朝代最后的继承者。

当商部落强大到足以吞并时，夏王朝最后的帝王，注定会被“预定”成荒淫无道的昏君。

如出一辙。等到周部落强大，商王朝也“同此冷暖”。甚至，用来抹黑夏桀的“执行文案”，被周王朝再次复制，只是更换了人物：夏桀换成商纣，商汤换成周文王，妹喜换成妲己。

到了春秋时期，子贡发现惊天“秘密”，才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儒家倡导“文德”。孔子尽管赞成西周灭商、为民请命的大义之举，但对不得使用武力，多少还是持保留态度。对牧野之战中“血流漂杵”的惨烈场景，孟子特别耿耿于怀。

农耕文明，安土重迁。“不假求于外”，中华民族的性格底色。在大河流域赐予的天然沃土上，农人只要辛勤付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求空间扩张，唯望时间绵延，生活小康。

关键差异：中国重文、西方尚武。

西方的文明源头，古希腊、古罗马，典型的海洋文明，受制于肥力不足的半岛盐碱地、雨热不同期的地中海气候，为了弥补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缺口，只能向外部的农耕区不断扩张。

重中之重。古罗马人征服埃及后，掠走面包、面包师。

直至古罗马灭亡，欧洲形成封建领主制。

“领主”，古代英语词源“守护面包的人”——生怕别人抢回去。直到如今，从扩张、殖民、霸权主义，一路走来的西方世界，仍然难以理解中华民族的对外关系中传统的“不假求于外”。

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容纳性、开放性的特质。

文明的过程，本质上不断否定野蛮的过程。

中国古文明在青铜时代，并没有为外部力量或内部因素所中断。

整个东亚史是“文化归汉史”。数千年中，周期性遭遇蛮夷入侵，抵抗、崛起、复兴，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轴之一，形成“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基本文化理念、史观。

周代虽是封建割据，但与欧洲不同，一直是宗周一大家与楚吴越东夷几小家。宗周文化承袭商文化，语言、文字有统一潜质，就算吴国强大，也知道攀附姬家，对华夏的认同感远远强于现在欧美彼此间的认同。

周武王追封父亲姬昌为文王，分封各路诸侯。

霸权更替。周朝并没有完全消灭商朝，受降殷纣王的嫡系、太子武庚的部族，封在殷商故地，分封周王室的管叔、蔡叔与附近驻军，以监视叛乱行为。殷商故地的封国仍是商朝的延续。

更多的残余势力仍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姜子牙想要杀光所有殷人，建议：“臣闻之也；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胥余。”周公说：“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两全其美。周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都，延续商汤的宗祀。姜太公也有道理，为防止叛乱，将殷商王畿之地一分为三，封给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武庚与殷人，史称“三监”。

商纣王叔父箕子，不愿臣服，率领5 000族人逃向燕地，进入河北，向更遥远的辽东进发，后入朝鲜，随同带去诗书礼乐、医巫阴阳的知识与百工技艺。在公元前1120年，箕子建立朝鲜国。

史称箕氏朝鲜。在大同江流域今平壤一带。

箕子，本名胥余，与微子、比干齐名，史称“殷末三仁”。

箕子东渡，“外循环”建立国家的第一人。

一如公元前257年，古蜀王子“蜀泮”在交趾复兴“蜀国”一样。

一场史诗般的迁徙。尽管已是840多年后。

“教以礼仪田蚕，又制八条之教”。箕子以礼仪为治国之本，以礼仪教化民众，纯化民风，组织民众修建都邑，颁布八条法令，将朝鲜带入有成文法的文明时代，被人称为“君子国”。

顺水推舟。周武王“因以朝鲜封之”，使周室又多一个藩国。

西汉初期，燕王卢绾部将卫满灭掉箕氏朝鲜。

箕子在高句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朝鲜王朝，都被奉为始祖、神祇。

“殷人东渡美洲论”。英国学者梅德赫斯特，在1846年翻译《尚书》时提出假说，认为武王伐纣之时，可能有大批的殷人渡海逃亡，遇到到风暴后，泛海至美洲。

1968年，美国学者迈克尔·科在《美洲最初的文明》一书中，认为公元前1000年出现在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与武王伐纣的时间吻合，奥尔梅克文明很有可能是中国传播过来。

公元前1044年，武王去世。

成王幼小，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完成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不仅成功实现“以小治大”“以一治众”的目标，“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创造性地建立起一个“世界性”政治秩序，大治天下。

西周定都镐京（今西安西南）为宗周，又兴建洛邑（今洛阳老城）为成周。

东西两都，同为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开创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两京制。

公元前1000年，第二代国王周成王与诸侯四夷，聚会共庆。

“中”由“天”衍生。洛邑所在区域，与“天中”（天的中央）对应的“地中”（大地的中央）。周王只在“天地中央”的洛邑，接受“四方”诸侯朝拜，形如北天极形成同心圆结构。

北天极，地轴和天球于北方相交的一点，最亮的一颗星被称为“北极星”。北半球星空旋转的虚拟中心点。中国的天文学体系中，把它看作天上的宫殿，叫做紫微垣。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展示着王朝的威严、繁荣。

象征正统王权的九鼎，在洛邑明堂中放置。

坛上挂着红帐子，用黑羽毛作装饰。

天子周成王面朝南方，冠冕上没有垂珠，朝服八彩色，腰间插着大圭。唐叔、郇叔在左，周公、太公望在右，都有冠冕，也没有垂珠，朝服七彩色，都

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碰撞融合，结盟东进，
战胜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
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融合组成汉族先民华夏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腰插笏板，依傍天子站在坛上。

王公贵胄，盛装出席。

四方诸侯，远道而来，带着作为贡品的特产，分列祭坛四周。

“万邦来朝”。交通不便，能让天下诸侯云集，本就彰显中央王朝国力强盛，号召力强，能调动指挥天下军马。驻扎着西周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西六师”，周人的嫡系，“殷八师”（成周八师），投靠周人的殷人部队，关系类似清朝八旗和汉人绿营一样。

城市规模宏大。“郛（郭）方七十里”，郭城面积比王城大八倍。

3 000人为师，八师就是2.4万人。

城中还有大量的普通居民，以供养军队，人口规模有10多万人。

《逸周书·王会》记载了“成周之会”的盛景、到场各方国的贡献。

“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

“皋鸡似鳧”。到了春秋前期，古蜀国由采集文化转为农耕文化，赴中原参加“成周之会”，将“古成都人”视作珍宝的“文翰”（锦鸡）贡献，侧面映证古蜀国在周人眼中的重要性。

大开眼界。在国家的中心，古蜀国见证了想象不到的珍禽异兽。

东北的秽人带来了形似猕猴、叫声像小儿的“前儿”，青丘国带来了长有九条尾巴的狐狸，黑齿国带来了通体纯白的白鹿和白马，白民国带来了形似狐狸、背上长角的“乘黄”，区阳国带来了外形像猪、长着一前一后两个脑袋的“鳖封”……

来自沿海东越的诸侯们则带来了文蜃、玄贝、大蟹，义渠国带来了形似白马、能食虎豹的“兹白”，氐羌带来了鸾鸟，巴人带来了比翼鸟，禹氏国带来外形似马的“騊駼”，大夏国带来长着大象般长牙的兹白牛，犬戎带来有着白色身体、红色鬃毛、金色眼睛的文马，匈奴带来了体型巨大、四腿无毛的狡犬……

博览方物。中国历史上真正举办的“首届进博会”。

周成王光芒四射，让人不敢直视。终于完成父亲周武王“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的遗愿，而在场的所有人，也在新建的国家的中心，见证日常生活中想象不到的珍禽异兽。

在祭典上，需要用两头赤色的牛做祭品，先要用弓箭将两头牛射死，然后，用刀将牛肢解。不但要弓马娴熟，还要能见血。在诸侯的注视下，完美而精致地完成。

来朝贡的东方属国有28个。

诸侯国与部落联盟有63个。

地域范围涉及今东北三省, 安徽省、河南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台湾省与日本、琉球群岛, 湖南省、湖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域。

历史定义,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

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 碰撞融合, 结盟东进, 战胜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 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 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 融合组成汉族先民华夏族。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历代王朝最重要的大事, 便是修史。代表继承前朝法统, 告诉祖宗和人民, 本朝才是中国正统。每个朝代修的史, 传到清末便是“二十四史”, 加上《清史稿》, 构成连绵不绝的中国。

中国王朝的使命不是另起炉灶。

责任与义务, 是接过自黄帝以来的法统, 守护人口、土地和文化。

中原已不是“中心”。

大地上只有“中国”。



陆

柒

捌

玖

拾

周人取代商人成为天下共主。

农业文化对商业文化的征服，裙带关系对近亲婚姻的征服。

开始新一轮早期国家的演化。

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西周时代，以洛阳为中心，在中国建立第一个大公路网，驰道驿路，无远不达。

周朝结束野蛮，走向文明高峰。

仰观天象、俯观地法、进取诸身、远取诸物……

周武王并没有完全征服天下每寸土地。将兄弟子侄、功臣们，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姜子牙被封在齐国，砥砺前行，打下这片土地，其后代又花数百年的时间，才将夷民教化成华夏子民。

根本制度，“分封建国”。

“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

把没打下来的土地，也给提前分封。

很多诸侯带着军队去就封，用武力征服这些土地上的原住民，占有这些土地。

以开放包容的气度纳海内之士，“外循环”与“内循环”组合。

类似于一个联合起来的王国。

“以蕃屏周”。建立一个大小相系、上下递为藩屏的全国统治网络。

“分封建国”，把原本不属中原文明之地，一步步通过文明教化，转变为中原文明的“化内之地”。齐、鲁、燕、晋、秦等地，领先一步开化，楚、吴、越等地，紧随其后开化。

成功地统治汉地18省的大部分区域。

过去，这些土地上“夷狄”居多，多为游牧民族。

即便有农耕，技术也不如中原文明发达。

“外循环”。周以农耕立国，坚持“华夷之辩”，即不看血统，只看文化认同，让那些已转为农耕模式，接受周人文化的民族，彻底成为华夏族。土地，也永久性地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传统华夏文明的疆域，周代末年就已经基本定型。

“分君亿疆”。

各诸侯国的疆域之和，差不多是秦国统一六国后的实控面积。

先进制度，先祖得以占据亚欧大陆最优质的领土，传承至今。

“迁侯于宜”。原理一如现代集团公司，封个分公司经理头衔，开拓新地。周王室一如集团公司，把大臣派到各分公司当经理，依靠先进文化、制度，逐渐把适合农耕的地区全部占领。

辅以不断攻伐淮夷，用武力控制东方少数民族地区。

城池分为两道墙，外墙称为“郭”，内墙称为“城”。郭墙之外就是郊野，符合古代汉字“國”的形象。城郭，就是国。以农耕为主的民族便利用城郭体系，制定了赖以生存的“井田制”。

“内循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推行“明德慎罚”，务从节俭，强调人民满意与否直接关系到天下安危，主张“务令（百姓）家给人足，庶几教化可兴，此万世治平之基也”。

总结、借鉴夏商两代亡国的教训，继大禹发布世界最早禁酒警示之后，周公制定、发布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酒是丧德亡国的根源，构成中国历史上某些时代禁酒的主导思想之一，成为后世引经据典的范例。

推行“修其政，因其俗，简其礼”“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的十八字方针，制定“大农、大工、大商”的“三宝”治国方针，实行“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开放政策。

策略归结为两条：“协和万邦”“德治天下”。

“和而不同”，发明了高明的统治方式。诸侯国不是统一模板。各国的定位不同、治国策略不同。周天子分封给他们的人口不同、资

「外循环」。周以农耕立国，坚持「华夷之辨」，即不看血统，只看文化认同，让那些已转为农耕模式，接受周人文化的民族，彻底成为华夏族。土地，也永久性地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源不同。鲁国、侧重于手工业；卫国、侧重于农业。

“同则不继”，消灭了人的差异，人类就会灭亡。

保护差异，就是保护自己。

有差异，经济必须是“外循环”。

“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在精工制造层面、互相竞争。

打破各种贸易壁垒，促进统一市场形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终极利器。

“得民心者得天下”。周朝与商朝，价值观完全不同。遇到天灾，周王的职责是“敬天保民”，天不可惩罚民，如果天怒、就惩罚本王。“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王的口头禅。

中央政府行使“礼乐征伐”。

“天子+四院”共同决策。

“参政议政”的“四院”：“公卿至于列士”，现有执政者，各级官员，参政工具诗歌；瞽史师瞍蒙，诗人、“记者”、作家、文艺工作者。参政分两步，汇报所搜集的民意、研究的民心。百工庶人，劳动者、普通百姓、近臣亲戚，所有人发言后、负责整理。

敬畏历史与新闻的高度文明。

记载历史，始于周朝，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为太史，可随时出入朝廷，跟随周王。周王不敢得罪他。史官自身的资格、资历，就是传播管理的最后决策者。面对史官，君主只有尊重。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新闻的作者，被赋予“神的代言人”的意义。

只有记者有权发布新闻，任何人无权。

知识分子办报。中华民族3 000年以来的固有传统。

跨国交流、研讨，信息共享。

真实、客观，有卫国人读到新闻后说，“晋人三豕过河”。孔子的学生子夏笑着说：“应是晋人己亥过河”。子夏到晋国后探听此事，果然是“己亥过河”。

自成系统的“外循环”，提高新闻质量。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都是周朝“新闻记者”采编、发布新闻。《国风》部分，“记者”采访、编发的“时政民生新闻”，其余多为“文青”的“副刊作品”。

《尚书》解释商朝的合法性、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

“天惟时求民主”。

天，不定时地为人民寻找领导者。

“尧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纣之民比屋可诛”，价值截然相反。

还设立“采诗官”，史官从民风、民谣之中，分析民意，发现真相。如果禁止、打击人民表达，或诱惑人民拍马屁，则民意没有价值。有“乡校”，独立的学校，专门议论政治。

“为民求主、以民为本”，以“采诗官”划线，判断真假“执政为民”。

“采诗官”“记者”采风的同时，发现人才。

《周礼》等古籍，早已提到过赛歌赛诗会、选拔官员。

小“记者”采诗，大编辑陈诗。

农忙结束，“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农闲时间、底层人民“山歌大会”，真情直接表达。

作家、“记者”，也就赶过来采风。

既有文章，也有诗歌。

郑穆公的孙子、郑国大夫，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子产，熟知周礼，知识渊博，文学修养深厚，做过采诗官，碰到的“乡校”，既是诗歌场，也是议政之地。

“宽猛相济”。执掌国事期间，主张保留“乡校”、听取“国人”意见。

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胸怀。

孔子心目中“君子”的典范。

采诗官有深厚文化素养，深怀敬业精神，行走在笔直官道上，脚步矫健，手中摇动着的木铎，发出清清的脆响，穿越了树林、溪流。田野里唱歌劳作的父老，听到木铎声，愉快地招呼。

采诗官走近农夫，一起坐到柳树的浓阴下，请求父老将新歌唱出。

他，用一柄锋利的小刀在竹筒上，吃力却飞快地记录着。

回到王城，在一炬豆火下，整理那些似乎还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诗和歌。

担当“新闻记者”、“国家智库”、民意调查、诗歌记录与地方史志者的重任。

“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史官对接天子，“天子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具有职权的垄断性，不受任何人干扰地发布新闻。任命，也是自己定。世袭，也任人唯亲，不管他人评价。为了家族的荣誉，为了继承史官的合法性，坚守着真相，以命相搏。

天子诸侯不能管，百姓也无权抱怨“阶级固化”、无权要求“上升空间”。

史官据“风”作“雅”。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雅，就是正、政，《资治通鉴》的前身。

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诗歌——《诗经》。

不仅歌颂帝王祭祀，更多的是凡人田间劳作、情爱故事。

《诗经》里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

《野有死麋》前句意思，一个少女已经动情，“吉士”趁机挑逗……最后三句：“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龙也吠！”

二人走向密林深处。怀春少女告诉心仪的男子：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诗不直接写性，含蓄、自然、健康……

准确地再现男女幽会时，女方既欢愉急切，又紧张羞涩的心理状态。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纯净。

《诗经》中，充满生命的欢欣，荡漾着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

孔子评价颇高：“《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东周的前段，因鲁史《春秋》记载，得名“春秋”；东周的后段因列国争战，称为“战国”。“春秋战

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文化转折时期。

整个世界范围内，多地同处战乱时期。

当人们用野蛮、粗劣刀剑相向时，战争迫使人类开始思考如何搭建良善社会。

东方西方的圣贤，横空出世。

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

百家争鸣，一场触及中华民族根本的思想运动。

成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哲学与思想文化的高度。

“轴心时代”。在世界四个迥然不同的地区，中国、希腊、以色列与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超越和突破原始文化，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独立形成。

核心价值接近，“周朝天道民本”+“雅典天赋人权”。

表述也接近：人民的基本权益，雅典说是天赋，周朝说是天经地义、天道。

几个地区虽隔千山万水，文化形态不同，文化却多有相通之处。

宗教、思想、城邦、国家，使更多的人，以更有效的方式连接。

形成了人类连接模式的基本框架，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铺设道路。

延绵不断。各个文明都出现伟大的精神导师。

在希腊海边，古希腊的哲学家背手，思考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恒河岸边，印度的哲学家在打坐，考虑人和神的关系；在黄河岸边，中国的哲学家在散步，考虑人和人的关系……

中国哲学家都不太去考虑物与鬼神，印度哲学家认为神是“超验世界”，另外一个高层次的抽象天地。恰恰是中国哲学所缺乏的。因此，玄奘要去印度取经。

公元前600至公元前400年的200年间，中国出

「轴心时代」。在世界四个迥然不同的地区，中国、希腊、以色列与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超越和突破原始文化，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独立形成。延绵不断。各个文明都出现伟大的精神导师。

现老子(约公元前571年生)、孔子(公元前551年生),西方出现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年生),几位大思想家、哲学家,对后世影响深远。

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

孔子死后10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

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

阿基米德和韩非只差了7岁。

中国人根据老子、庄子的思想和民间鬼神信仰,成立道教;根据孔子、孟子的思想,成立儒教;印度根据佛陀的思想,成立佛教;以色列,成立拜上帝的宗教,后来再衍生为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

阶层分化,思想家基本来自精英阶层。

老子是图书馆管理员;孔子也是贵族,首创私塾;孟子、墨子衣食无忧,才有机会读书学习;释迦牟尼本身就是王子出身;古希腊推崇文明、思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哲人阶层;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深受欢迎,也处于社会较高阶层。

精英阶层保障充足,才有更多的时间思考。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与《老子》《论语》等早期文献,尽管不乏愤慨与焦虑、批评与抨击,更多的还是透露出雍容、华贵、高雅、宁静、从容、自信的气质。

战国中期后,通过《战国策》《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书,感受到的更多是战国时代的高强度、快节奏,敢于挑战的积极姿态,对于意志力、执行力、决断力的赞美、追求。

战国早期的人,崇尚个人意志、提倡进取精神。

未经“焚书坑儒”影响的“清华简”,不同侧面记叙。

《厚父》篇,反复强调敬天重德,周初的德治较商代有明显的进步。“民心惟本,厥作惟叶”一语,继大禹后,在古代文献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理念。

“民心是一切的根本”,王朝兴亡紧系民心向背。

《尹诰》篇,商汤、伊尹对“民”与“众”的珍视,延续了大禹的民本思想。

《邦家之政》篇,从正反两方面阐述将会导致国家兴盛与衰败的种种行为,告诫执政者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邦家处位》篇,从肃清吏治的角度,强调选贤任能的重要性,

用人失度带来的严重后果。

《治邦之道》篇，全面分析治理国家应遵守的准则，强调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思想。

《天下之道》篇，借用攻守之道，说明古代圣王得天下的关键，仍然在于得民心。

《算表》堪称最古老“计算器”，可计算乘法、除法以及开方，填补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

《心是谓中》只有七支简，充满思辨智慧。

首先，文章强调与身体各“四相”相比，心占据统帅地位。“心，中，处身之中以君之。”心是人的中枢，处于人身体的中心，支配身体。“心欲见之，目故视之；心欲闻之，耳故听之；心欲道之，口故言之；心欲用之，踵故举之。”心作为身体的君主，对其他器官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其次，文章马上就将身心关系引申到君民关系，“为君者其监于此，以君民人”。

统治者能够借鉴身心关系，就可以治理天下。

春秋晚期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关于心的论述支离破碎，“心”甚至被作为欲念象征遭到排斥。进入战国时代，“心”成为诸子论述的焦点，各家都争相将心论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

《心是谓中》敏锐地觉察到，大声疾呼：“君、公、侯、王、庶人、平民，其毋独祈保家没身于鬼与天，其亦祈诸心与身。”呼吁从上到下所有阶层，不要只是向鬼神、上天祈求家庭与自身平安，也要向自己祈求，命运归根结底掌握在自己手里。

《心是谓中》试图把古人深信不疑的“天命”，与本篇重点论述的“身命”概念辩证统一，“人有天命，其亦有身命”“断命在天，苛疾在鬼，取命在人”，最终提出了“人定胜天”的理念。

高调宣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动荡的战国时代，为有理想期待、政治目标、利益追求的人，提供活跃的空间、机会，是一个命运的不确定性、改变命运的可操作性，开始广受关注的时代。

洋溢着一种积极、刚健、昂扬、向上的气氛。



周公制定的“周礼”，把政治和伦理融合。

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奠800年的统治基础。

《礼记·祭法》记载，“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

确立标杆。《礼记·礼运》做了描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等景象，即道德高度发达、人民充分自律，这也成为后世统治者的共同政治理想。

“尽知天下第一人”。

西周末年的王朝太史公伯阳父，人称史伯。本是周王室记事、占卜、星宿的太史，后成担任掌管教化的司徒。

通晓五行变化，博古通今，善卜能断，能预知福祸。

助人无数，最后也拯救了自己。

誉为“和宗”。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最早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事物的本质与根本法是“和”。早于老子、孔子时期200多年。

和谐，创造事物的原则。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土元素与金、木、水、火元素相互融合，才有千奇百怪的物质。

“和”的内涵。相同一物补充相同一物，除了量的增加，不会产生质变。一如土加土，还是土，水加水，仍为水一样。



陆

柒

捌

玖

拾

如果土加水，就成了泥，再加火烧，就成砖瓦或者陶瓷等，产生质变，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土与金属融合，可以形成矿石，金属制品都是由矿石提炼，土与木头融合，可以形成煤炭，供燃烧提供热量。

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孔子之孙子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得以清晰、明确地阐述。

史籍记载，在和西周司徒郑桓公谈论周幽王朝政的“时形”，史伯就预言：荆楚和晋、齐、秦四国，将成为“春秋五霸”中的“四霸”；断言，不出三年周必亡的判断，果然应验。

周宣王庶弟郑伯友，郑国开国之君郑桓公。

幽王当政，重用佞臣，内政不修，外攻失利，又有褒姒之乱，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

众臣子情知不妙，纷纷谋求退路。找史伯商量，讨教落脚之地。

史伯认为：西方、北方的少数民族戎、狄会强盛，郑国不能靠近他们。南方合于民臣之心，功德超过先王，十代也废不了，也不能靠近他们。只有东方的黄河、济水、洛水、颍水之间，可以寄居。

条分缕析，头头是道，详细分析天下形势。

面对周幽王“任人唯亲”，还要废后废太子，史伯大呼：周要完蛋了。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泾水、渭水、洛水流域，发生大地震。

史伯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

蒸，升。镇阴，被阴镇住。天地有阴阳二气，要有序、调合；秩序被打乱，阴气压迫阳气，使阳气伏在下面不能上来，才发生地震。以万物一体的宇宙观，进行阐述。

3 000多年以前，科技并不发达，无法想象如何理解。

还提出：“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五色不同，交织而成章；五音各异，交响而成乐。一种声响不成音乐，没有听头；一种颜色不成文采，没有看头；一种味道不成美食，没有吃头；一种事物没有比较，无法品评。

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在孟子之前，儒学就是礼学，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中心是礼。制礼作乐的完成，标志着儒学的起源。

已经认识到二元，甚至多元的对立统一。

事物的不断生成，不断丰富、发展，“和”的不断展现，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不断展现。既要尊重客观世界自然的“和”，不能从根本上人为破坏，还要创造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和”。

延伸到人、事、物的各个层面，都应该理解“和”。

“和”的本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话语内涵。每种文明，都有特殊性、价值性，自我思维的方式、表达的话语，正是民族多样性、世界多样化本身的一种映射。每个民族在欣赏本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的同时，也应该去欣赏其他民族的文明，将其他文明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在互相欣赏的过程中，促进不同的文明达到一种和谐，呈现为持久、稳定的“和而不同”。

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话语表达……

躲避灾祸。为同僚好友谋定落脚之地，也要为自己谋划退路，史伯选的是晋国河上地，后来改称为“史伯村”。现在的山西翼城县隆化镇下辖村。

承上启下。中华文明历史上的关键人物。

哲学观念在今天，仍值得深入探究。

周公敏锐地意识到，音乐“和声”诱导和谐，“同声”诱导人性走向偏激、兽性、不择手段、野蛮杀戮，把音乐纳入“塑造民族特征”的六大工具之一。

和声，有你唱、我来和，你大声唱、我轻声和。

有互相答应和，你一句、我一句、问答发挥。

观点与态度，在“相和”中沟通；人性，在和声中平和、理性。

“和而不同”。建国纲领，也是创作音乐的原则。

不同，就是不要“同声唱”“高声唱”，禁止任何走极端的行为。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对厌恶之人，“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彬彬有礼，温润如玉。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西周初年，周公总结、继承夏礼、殷礼，在洛邑制礼作乐，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典章制度，礼乐文化成为以后几千年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

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在孟子之前，儒学就是礼学，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中心是礼。

制礼作乐的完成，标志着儒学的起源。

商承夏制，周承商制。

“制礼作乐”，周公在洛阳完成。

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周代确立以“敬天”“明德”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教化思想、以宗法为根本的国家政治制度、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规范等，形成一套相当完整的国家运行机制，开后世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礼制文明先河。

礼仪，伴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化丰富。

《左传》记载：“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礼仪囊括礼节、仪式两大范畴，前者是个人主观性的言行，后者则属集体性的活动。小至个人，大至一个家庭、一个集体、一个单位、一个国家，皆须注重和推崇必要的礼仪。

周人发明的“人文”，与欧洲话语体系中的“人文精神”吻合。

人，本来的样子，是“质”。

淳朴，混沌，像没吃禁果的亚当、夏娃。

文，事物隐藏的亮点。纺织品的亮点，纹；玉石的亮点，玟；云团的亮点，雯；人的亮点，文。没有亮点、找不出进化方向，“紊”乱。

提炼亮点，让原来的美好更美好，“文明”，使文“昌明”。最终的体现，“聪明文思”，“温其如玉”，教养、修炼，克制力、判断力、定力，智慧、善良。

第一生产力。艺术，就是发掘人的“文”，使“文”达到“明”，表现为先进的价值观、通透的为人处事方式、优雅的生活态度、独立的人格、士君风度。

科技，只是人文的工具。

孔子盛赞周代典章文化“巍巍乎大哉”“郁郁乎文哉”。

“孔子入周问礼”。

“周礼尽在鲁也”。孔子生于鲁国，向往周礼。

鲁国政府财源枯竭，咨询于孔子。

孔子传授了生财之道：税收降低到10%。

低税收、高责任。

鲁国国君反问：我现在征收20%，都入不敷出，降到10%，怎能增加收入？

培育税源。孔子回答：高税收使生产者转移，或者破产、灭失。没有税基，税率再高也没用，降低税收，人民富裕，税基大了，你怎会没钱？况且，降税是仁政，吸引天下人来投奔，自会财源滚滚。

管子“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税几而不征”，得到孔子高度赞扬。几，稽查，政府有义务在关口审核商品质量，审查违禁商品，比如春天禁止渔猎、不能买卖。稽查，却不要收税。

孟子说：“关市稽而不征。”

自然资源民营，“不专山泽之利”。

税收虽然低，但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

政府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福利。

社会救济由政府主导，家族与寺庙配合。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正宗的华夏政权，都会做到救济。

汉朝给老人发鸠杖：政府发给所有老人的“证书”。以皇帝名义发放，又称王杖。凭鸠杖，老人可定期领取粮食、肉、酒。鸠杖持有者摆摊设点，城管不得干预，税务不得收税。

若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孩子不交税、不服役、不做官，专门在家服务父母。

孔子不远千里到周王室学习。他倾毕生精力，丰富、发展周公奠基的儒家学说，整理编订《诗》《书》《礼》《易》《乐》等古代典籍，兴办教育，诲人不倦，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历代儒家尊周公为“元圣”。

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孔子55岁时，开始周游列国。

14年过去，治国理念仍得不到诸侯的认可。

68岁时，心灰意冷地回到鲁国，还是也没得到重用，做了个有名无实的闲官。

71岁那年，有人猎获一头麒麟。

孔子说：“丘，犹麟也！麟之出，因不遇明王而遭害；丘生不逢时，不遇明王，故吾道难行于世，而终至于穷矣！”穷其一生，“道”也没有实现，无处诉说，“乃因史记作春秋”。

想以一己之力改写历史。诸侯争霸时期，目睹了礼法遭到践踏的各种现象，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无一例外四处碰壁，另辟蹊径，把治国理念写进《春秋》，让后世的君主、掌权者都看到书，推行“道”，让大“道”不灭。生命终点渐渐临近，就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连崇拜的周公，都不到梦里。感叹追求的“道”，得不到实现。

十分推崇周公的周礼、儒家理念，年轻时“志欲行周公之道”。

以复兴周礼为目标，提炼成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你可以信鬼神，但要注意，别被忽悠瘸了。美好生活不是神的恩赐，得撸起袖子干，能有一点成绩，也要感谢祖宗积德保佑。

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

日有所想，夜有所梦，经常都梦见周公。

写作《春秋》两年后，公元前479年去世，享年73岁。

汉初的贾谊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以小见大。孔子也是个优秀的编辑。

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经典，在3 000多篇中，选订出102篇，益于推行教化的圣主贤臣的“小场面”，对少数内容进行与时俱进的编辑。《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

无与伦比。《尚书》是上古帝王之书，追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经典，记录了尧舜禹时期和夏商周三代国君的诰命、誓言和其他大事，历代统治者的“政治课本”，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汉同有“记者”经历的司马迁，为“老记者”孔子写序。

《诗》原存也是3 000多篇，择“可施于礼仪者”305篇，编辑成如今我们看到的《诗经》。

全文逐步发展成表意文字，中华文字系统的一次伟大变革。传统文化的精华，从「简单同一」，向「丰富多元」转化，为秦汉间学术文化从「多」到「一」的整合，奠定广阔的基础。

孔子认为，“和”是富有辩证意义的哲学范畴，一项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的重要准则，更是一种值得孜孜追求和恪守的人生境界。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在《论语》中，明确提出“和为贵”的思想。

《乐记·乐论》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有了礼乐的和谐，天地万物就能和谐有序，国家社稷就能和顺安宁，人际关系也就自然和睦了。孟子明确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认为：“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继承和升华。礼乐文明的起源。

以“仁”为核心，孔子儒家思想体系的创立，源于周公创制于洛阳的“敬德保民”，这是政治领域的概念，指一个阶级或阶层，对另一个阶级或阶层生命权和基本生存权的起码尊重。

施行德政，不再使被统治者的应有权利肆意遭到践踏。

以“爱人”作解，把“敬德保民”思想，从政治领域升华到伦理层次，超越了阶级或阶层的局限，扩大为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要求和处事原则，升华到更高的哲学层次：既区别于神，又区别于动物，既有低层次的动物性，又有中层次的社会性，更有高层次的道德性，舍利取义、泛爱一切同类。

“礼乐文明”。现存《周礼》《仪礼》《礼记》中，包括各种典章制度、礼仪规范。都在操作、实践层面，把礼乐提到了君子立身之本的高度。

确立以“仁”为内在本质和理论根据，以“礼”“乐”为表现形式的儒学思想模式。以“仁”统“礼”“乐”，以“礼”“乐”辅助“仁”，而又用“礼”约

束“仁”。

首倡将本属于贵族阶层的周礼，推广、普及到庶民当中去。

儒家思想谦逊温和。

法家思想严厉。

道家思想悠哉游哉。

还有纵横家、阴阳家和墨家等众多的思想流派。

金文逐步发展成表意文字，中华文字系统的一次伟大变革。传统文化的精华，从“简单同一”，向“丰富多元”转化，为秦汉间学术文化从“多”到“一”的整合，奠定广阔的基础。

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先进的政治管理制度。

周朝近乎完美地取代商王朝，用文化统一了中华大地。

百家争鸣，周文化的发展和升华。

成为中国历史上巨星云集的时代。



陆

柒

捌

玖

拾

华夏文明的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持续发展着辉煌的商周文化。

爱琴海文明的古希腊时代。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146年，传承着克里特、迈锡尼文化。

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几乎与“平王东迁”同步。

城邦时代。200多年中，希腊人口持续增长，开启向外殖民扩张的步伐，势力逐渐遍布小亚细亚、北非等地中海沿岸区域，城邦林立，人口流动频繁。城邦中的佼佼者，斯巴达和雅典。

周人优化、升级商朝的文字和分封制度。

大规模分封，将大量周室宗亲派驻各地。

诸侯林立。周天子实力虽强，但却先后面临南方楚国、东方齐国的挑战。

同一时段，波斯帝国在“高地亚洲”崛起。

公元前550年，波斯首任皇帝居鲁士统一波斯全境，开始大规模的军事扩张。短短50年间，征服现西亚、中亚的广袤地区，北非东部和东欧的少部分地区，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

唯独古代中国的文明，一如既往地流传不息。

西至埃及，东到印度。波斯帝国生产的地毯，通过“西北走廊”、早期北方丝绸之路，送到了春秋时代的中国地

区。与此同时，波斯人也惊叹于中国所传来的丝绸。

向西，威胁欧洲，与希腊人展开长达40年的恶战。

城邦林立，并不意味着不想重现迈锡尼覆盖全希腊的霸业。雅典首先出手。刚被波斯人覆灭的吕底亚故地上的米利都人掀起反叛，史称“爱奥尼亚起义”。雅典、厄瑞特里亚出兵援助。

趁火打劫，激怒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一世。

公元前492年，“希波战争”爆发。

深远意义。战争使世界文明格局，发展为东西并立的态势。

最终以波斯失利而告终，保卫欧洲东部的希腊文明。

与东方的“武王伐纣”相同，雅典人也是“以少胜多”。

在爱琴海边的“马拉松战役”获胜后，一位名叫费里皮德斯的士兵跑回雅典报捷，因为极速跑了大约42公里，报捷后倒地身亡。用生命传捷报，马拉松长跑的来源。

西方史学中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

《希波战争史》与《史记》，并称为东西方史学奠基之作。

迅速崛起的波斯，走向下坡路。

“厉始革典”的失败，标志着周朝王权持续衰落……

异曲同工。东西方新一轮更为惨烈的战事即将爆发。

希腊半岛，再起内战。

公元前478年，雅典凭借在“希波战争”中的威望，巧借“抵御波斯人复仇”之名，顺势组建“提洛同盟”，欲构筑一个势力庞大的海上帝国。最终，在西西里海域被科林斯重创。

公元前404年，雅典向斯巴达投降。

雄霸爱琴海的时代，沦为历史的回忆……

东方的“春秋争霸”，同样日益激烈。晋楚争霸100多年，虽以联姻的形式告一段落，却依旧难以消弭双方的“警惕”。晋国通过扶持吴国，牵制楚国的做法，曾险些造成楚国的灭亡。

楚国始终支持越国崛起，意图包抄吴国。

吴越争霸，成为晋楚中原争霸的副本。

公元前482年6月5日，在吴国国力达到鼎盛之际，吴王夫差，北上黄池(今河南新乡封丘县南)，称霸中原，如火如荼的军容，逼迫中原各国承认其霸主地位。不久，吴国就被越王勾践所灭。

中国已经是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分晋……

希腊神话肯定「分争」的价值观念。华夏传统思想强调「统一」和「合」，与自身一直以人伦为本关系极大。古希腊各个民族、城邦、个人之间，以对立、竞争、斗争，甚至战争为主轴。

大敌退去，罗马帝国解体后的遗产真正的继承者，拜占庭、阿拉伯。文明的传承，东地中海地区远比西地中海地区，更具传承人的资格，更带有文明的连续性。

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巴格达。

腓力二世走帝国扩张之路，一如秦国，也搞类似的“商鞅变法”。

亚里士多德，一如同一时期的商鞅，“外循环”到马其顿“应聘”，当了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教授“形而上学”和“植物学”。马其顿大搞军事化，对外扩张，在希腊半岛引起惊慌。

“帮主”雅典组织反马其顿同盟，类似“合纵连横”。

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却经受不住“马其顿方阵”冲击。

公元前431年3月，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曾自信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雅典人体制优越，绝不可能去羡慕别的国家。这，不是由少数人统治别人的体制，而是大多数市民参与的体制，就叫民主制……”

公元前405年的夏末，最终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获得战争胜利。

“民主投降”。在东方“世袭制”体系下不可能有的激情、豪迈的演讲，却被如期而来的27年漫长的战争诘难、拷问，璀璨繁荣的雅典，被根本没有民主却野蛮、骁勇的斯巴达人所摧残。

斯巴达在希腊半岛南部，也是古希腊城邦之一，喜战好斗，类似中国的秦国。把战火燃遍希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得整个希腊由盛转衰，最后被北部的马其顿王国所征服。

马其顿王国是希腊的终结者，还是类似秦国。

只是，意想不到，马其顿是通行希腊方言的城邦

国家，却被希腊人视为蛮族。

命同秦国。“国际弃民”，秦国被中原不理不睬，视作戎狄，“孤秦”。

公元前403年，雅典投降的第二年，周天子正式承认赵、魏、韩三家的诸侯地位。

相对弱小的魏国奋发图强，广纳天下贤才。

雄霸中原。魏国在经历“李悝变法”“吴起改革军制”后，立足于三晋同盟发展。

霸占河西之地，迫使野心勃勃的秦国，80多年不敢出函谷关。

崛起的楚国的北伐，齐国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的打击，魏国逐渐被周边大国的军事威胁所笼罩，尤其陷入对秦国东出函谷关的恐惧中，再难重现当年雄风……

吴起先后参与魏国、楚国的变法。命运相同，两国并未彻底改变原有的贵族旧秩序。

希腊城邦霸主的斯巴达，缺乏海军力量，为获得波斯舰船的支持，出卖了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利益，导致陷入孤立状态。最终，在底比斯的攻势下，迅速丢掉了泛希腊地区的领导权。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招聘”商鞅入秦。

国力大增。“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步形成以耕战体系、军功制度为重点的举国体制。

山东六国，再难阻挡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

公元前352年，马其顿军队攻占希腊北部，为征服全希腊、建立霸业扫清障碍。

公元前338年，商鞅去世的那年。

在凯洛尼亚城附近，雅典联军惨败。年仅18岁、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出风头，击溃了希腊盟军中最精锐的底比斯神圣军团，正式敲响了希腊独立城邦、民主体制的丧钟。

前337年，腓力二世亲自主持召开“泛希腊会议”，相当于秦始皇登基，宣布自己的希腊霸主地位，璀璨的希腊城邦时代到此寿终正寝。希腊的兴起和衰败，基本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

从“荷马时代”到爱琴海文明，希腊半岛、爱琴诸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连成一片。万千的岛屿中，古希腊文明主体形成。产生了财产私有制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巨额财富与恃强凌弱。

城邦之间,生死存亡竞争激烈,贫富贵贱分化剧烈。

竞争,社会生产生活的根本特征。

战争,显示各部族首领英雄威武勇猛本色的大舞台。

提高声望。英雄们渴望通过奋勇大战,打败或杀死对手,掠得财物和女人。

大部分个体的生产实践能力很低,需要一种权威来维系:华夏先民心目中是作为天、地、人中枢的天子;在古希腊现实中缺乏强大的“主观意志”,便将这种权威力量赋予万能的神灵。

华夏不同,在长期定居农耕中,逐渐形成“聚落”。

中心意识。广场象征性极强,团结和凝聚力的标志。

贵族的聚集地,在含有亲缘关系的聚落群中,具有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等中心的地位,建有太庙、大室一类的庙堂建筑物。与中心聚落周围的普通聚落,形成半从属的主从关系。

中心意识的各个聚落,奠定了华夏不同于古希腊社会的国家起源特征。前者明显地体现尚“一统”的价值观,后者的城邦形态表现尚“分争”的价值观。

殊途同归。沿着同一个规律,从低配向高配发展。

既不可能出现东方的西方化,也不可能出现西方的东方化,东西方只能是互相取长补短的汇合。

神本思想与民本思想。

文明特色,体现在作为中西民族最初思想系统之中。

西方,只有神才有智慧。与古希腊神话价值观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先秦的民本思想,没有绝对无限权威的神灵。华夏先民推崇的英雄,主要是那些德披日月、功盖天地与“政在养民”的圣人。

《管子》：“圣人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察于地。”

《墨子》：“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

崇尚“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正在于“得道”。

民贵君轻。《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黄帝、尧、舜和禹等领袖人物，都被作为远古盛世的得道圣王来崇拜。价值取向就是无私爱民，以百姓的意志为他的意志。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不是一家一姓，不是一派一帮。

《尚书多士》：“天命靡常，唯德是辅。”

先秦诸多文献记载、文物强调，圣王是受天命而代行天职者，获得上帝眷顾的条件不是勇力、血统，而是仁德。有仁德者，才能受天之命。在《论语》中，孔子诠释“仁者，爱人”。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都有智有勇，而华夏先民记叙中的圣王必须有德。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扮演的是普通人的监护人的角色，在《荷马史诗》和其他英雄故事中俯首可拾。华夏神话传说中的圣王，是以为人师表的高风亮节，教化、带领万民。

《荀子》记载：“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亲之，善班治人者也安之，善显设人者也乐之，善藩饰人者也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

《尚书》记载，周公对召公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提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利民，终极价值观。

国君，民望所在，行为好坏决定着民心向背，民心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若想国家强盛，国君必须“民为邦本”，在治理上下功夫，更要寻找有能力的贤能之人辅佐。

战争、掠夺，古希腊神话反复渲染的主题。

先秦价值观，却是对战争进行理想的区分。

一面，肯定必要性和作用，拯民于水火，为仁政的实行，开辟道路。《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商君书》记载：“国之所兴者，农战也。”

一面，慎战倾向。《韩非子》记载，“兵者，凶器也”，“主多怒而好用甲兵，简本教而轻攻战者，可亡也。”慎战中，带有鲜明的“民为邦本”理念。

希腊神话肯定“分争”的价值观念。华夏传统思想强调“统一”和“合”，与自身一直以人伦为本关系极大。古希腊各个民族、城邦、个人之间，以对立、竞争、斗争，甚至战争为主轴。

即使文化上的长期融合，政治经济关系的日趋紧密，逐渐产生具有共同祖先、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同一种族的思想，联盟仍以神

的自由独立与城邦的独立存在为前提。

先秦文明强调，天地人和谐统一观念。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尧、舜、禹，通德神明，作为伦理楷模，起着由上及下的道德教化作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唤起人的畏惧之感，先秦文献、文物中的圣王，唤起人的崇敬之感。圣王主政带来的太平盛世，君明臣贤，万民拥戴，政通人和，重点在于顺从或违背百姓的愿望。

时节有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圣王尽量把导致人际冲突的因素，融入到普遍的和谐之中，即使描写战争，也强调“正义之师”对暴乱的诛伐。华夏先民反对暴力战争的价值观。

黄帝讨伐蚩尤，大禹征讨三苗。

先秦文明传播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统治者、领导者通过发挥自身的凝聚力、向心力，使天下的臣民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一心一意，达到王霸天下的目的。

《管子》中讲：“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则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

《韩非子》：“人主者，天下一力共载之，故安，众同心共立之，故尊。”

《荀子》：“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

华夏文明，广域王权文明。

古希腊文明，城邦文明。

孔子的最高理念是礼法。

柏拉图的最高理念是理式。

都是中西政治思想的源头大师。

一个尚仁，一个尚智；一个靠仁者，一个靠智者。

孔子思想“仁”为核心，以“礼”“义”为两翼的伦理思想精髓，使人们行为温文尔雅；柏拉图在“善”的统辖下，以“正义”为准则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使人们行为相当严厉。

政治上，都存在以国王为轴心的君主制国家形态的阶段，不同之处在于古希腊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们拥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利，而且是一种城邦的集体领导制，军队由公民组成。

希腊的地理环境、城邦文化的鲜明个性。使古代希腊有关对人的价值的看法，沿着一条人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尊重人的个体价

值，从人的自然性上得出人生平等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民为邦本”，重要有两点：人与自然关系上，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人类社会关系上，强调民的作用。时间顺序上，前者体现于春秋时代，后者勃兴于战国时期。

春秋时的诸子百家研究，基本上围绕如何治国平天下、统治人民的经术，即“王道”和“霸道”之辩；中华文明的思维注重整体，考虑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一种整体观的思维。

文明策源地，古希腊文明唯一能与华夏文明媲美的文明。

前后历经近800年的塑造，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虽然人死地分，但希腊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亚非欧交接地区，后继的罗马延续古希腊文明的衣钵，一直深深地影响如今的欧洲文明。

“车同轨，书同文”。

秦国兼并六国的同时，统一度量衡，形成完善的中华文明。

四千年传承不绝至今。

古希腊文明多次被取代，多次长时间的中断、倒退。

现在的希腊人信仰东正教。

原生文明。西方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两河文明）为代表，东方则以中国文明为代表。

两大农业体系。中国黄河流域，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两大农业体，使中华文明拥有的基础更为宽广，两大体系互为补充，使文明传承至今。

两大原生文明中，只有中国具有融合一统的“国家能力”。

欧美，国家产生文明。

中国，文明诞生国家。

西方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两河文明）为代表，东方则以中国文明为代表。两大农业体系。中国黄河流域，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两大农业体，使中华文明拥有的基础更为宽广，两大体系互为补充，使文明传承至今。



陆

柒

捌

玖

拾

亚欧大陆，亚大欧小。

夏商周时期，华夏文明核心在洛阳一带，被称为“中国”。

西周时期，完善分封制，逐渐形成一个以宗周为核心的“华夏”“诸夏”，即“中国”“中原”。“分封”的意义，将华夏文化传播到周边各族，让南北各大民族集团开始接受、融合。

长城内外是故乡。

炎黄文化，经历许多改变。不同文化的加入，汉文化好像在华夏文明演进的最高位置上。史前文化的多元，经夏商周三代的不断滚动，越滚越大，形成“秦汉归为一体”的大一统局面。

“中国”，相对“四裔”而言，没有地理意义上的绝对的中心，对四裔具有吸引力。四裔对中国有向往，周边文化就进入核心地区，与中国融为一体。

循环漩涡，既有辐辏，也有辐射。

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大一统”。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作《春秋》，在记载列代周王即位时，总冠以“王正月”字样，《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春秋战国，周王朝崩溃，多个诸侯国崛起。

向“四夷”扩张，奠定中国传统疆域的基础。

秦国统一西戎和巴蜀；楚国统一长江中下游；齐国统一东夷地区；燕国向辽东扩张；赵国向河套扩张。华夏和东夷、

西戎、吴越、北狄、巴蜀、南蛮等融为一体，形成“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阔疆域。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称为“汉地”“内地”。为形成汉族奠定基础。

“汉地”的王朝，自称“中国”。

和而不同。中国自古“夏中有夷，夷中有夏”的多元整体。

没有内亚就没有中国，不管古代，还是现在，抑或是未来。

“中国”一词，本指天下至中的土地，被视为天下中心，也被称作“中原”“中土”“中夏”。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诸侯71国，指天子之国和各分封诸侯列国的整体疆界范围。

与传统“五服体系”一般，有许多方位层级。

“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的含义。

帝王所在的国都，首都。

天子直接统治地区，京畿。

中原地区，开始仅局限于关中、河洛一带，后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内地，《史记》记载：“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历史上华夏，自汉代始，朝野上下和文人学士，习惯将汉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逐渐由演变为指代建都于中原的政权与所辖的民众，最终成为国家、民族的专称。

内外“双循环”，不以与中国中心政治关系上的远近划分，根据内亚、中亚本土的“地理身体”来确定。内亚人口、文化，都是跨境，与外亚有亲族或文化、宗教的联系。

欧亚草原上“局限政权”此起彼伏，构造复杂，既有族群身份，又有政治体身份。政权更迭，只是统治阶层更换，底层百姓并没有随着政体的瓦解消失，新的族群身份，也随之诞生。

“内亚”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指内陆欧亚地理范围中地域、文化特征最为典型的蒙古草原地区；第二，政治体的典型特征是游牧帝国；第三，经历从野蛮落后的形象，到草原文明核心的过程。

中华文明在民间层面的交流，谁也拦不住，那些掌握双语甚至多语的人，可以游走在充满孔隙的边界两侧，开辟一个模糊的“过渡地带”，一个让双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公共空间。

从东边开始，东北三省有朝鲜族，与朝鲜、韩国同一民族；赫哲

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在西伯利亚、远东边境，有同民族亲属；内蒙古和蒙古国，曾同为一个政体，在20世纪才分异；哈萨克族，在蒙古国西部和哈萨克斯坦有民族亲缘关系；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有同族的关联。

在中国叫“鄂温克”，在俄罗斯称为“埃文基”。

中国的是柯尔克孜，境外的叫“吉尔吉斯”；还有国内的乌孜别克，外面叫作“乌兹别克”等。

诸多北方民族，在语言、文化上，与域外民族相通。

新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与对应的中亚国家有历史渊源。

维吾尔族是回纥人的后裔，在中国以外没有同族，但是穆斯林与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等伊斯兰国家，都有宗教上的关联。西藏与拉达克地区以及尼泊尔、不丹有宗教和民族上的联系。

贵州、云南的许多民族，在泰国、缅甸都有同族。

“追梦中国”。中原王朝的建立者中，除了来自中原地区以汉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治体外，还包含来自“内亚政权”的统治民族。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具备“文化政体”的特征。

天下文明的“本土文化体系”。

“三圈”。核心圈、中间圈与外圈。

“四海无虞”。每个圈都超社会，相互又重叠。

一个“文化政体”，由一个中心和围绕旋转的卫星国、属国组成。政体中的权力，不是通过武力对边缘领土的控制来实现，而是通过道德权威和声誉的累积，获得边缘领土人民的钦慕、尊重。

不是零和关系，“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和信任。

中国的内外“双循环”，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不是建立在消灭族性、文化，而是在承认、尊重多元的基础上，在“主体间”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追求与导致真正的和谐、和平。

中国或可真正成为中心，吸引并获得外亚的尊重。

“文化认同”，一个文明从秩序输出，转向秩序输入的一个转折点。希腊城邦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秩序生产和输出期。罗马帝国和秦帝国的成立，标志着由秩序从一方，输入到另外一方。

已经把原先的积累下来的秩序资源消耗殆尽，然后转入不可避

免的灭亡过程。意味着新一轮文明的开始，一种解放、重头开始，一如罗马灭亡以后日耳曼人重新启动文明。

只是新的文明，仍然是要以多国体系为起点，才能重新开始。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政治、文化相互渗透的程度，大大加深。

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开放、资源丰富、没有阻隔的世界性国家，一边吸引野心勃勃的游牧民族来猎取财富，一边又是一个吞噬猎人、异族文化的巨大漩涡，使外来的游牧民族有来无归，化为中国人。

文明吸引力，边缘趋向中心。古代强盛的中国，不存在东西方对立，北方游牧民族野心勃勃，中原王朝先送礼与和亲，如还不能和平相处，就怀柔游牧部族中认同农耕文明理念的人民。

天下居中、八方辐辏之地。

文明中心，财富、资源、人口等，高度密集地。

中原文化的强大，主要依赖于政治、经验的成熟，并不是军事、经济实力占有多大优势。

一些国家处在文明交流网络的边缘，信息来源狭隘，导致在政治上不成熟、社会运作方向偏斜，终在与中原文化的对峙中渐落下风，甚至有的还没来得与中原文化直接对峙，就先行衰落。

汉族本来就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汉”的字面意思，广汉、银河，所有的水、星辰集合在这里。汉，本来就是包容、汇聚的意思。民族主义、排外思维、本位主义，本就与汉无关。

“自觉认同”。中国和内亚之间的征战、贸易，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影响，无意识中形成中华民族，成为“自在”实体，长期不和的民族开始“意识”到“中国人”的身份，“自觉”地认同中华民族。

「中国」概念形成：地理，四周向中心的聚合；民族，多民族的不断融合；文化，多元化的凝聚。「最初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在持续不断的交流、融合中形成、壮大。

不是以征服、被征服的名义,纳入中华民族,而是内亚人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来实现,成为中华民族有机组成部分的原内亚征服者,被认为不再与汉人敌对,进而划清与外部世界的界限。

中华文化的连接信道。

把中原农耕文化与东北渔猎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紧密联系,通过不同文化间相互碰撞、交流、融汇,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同一性,奠定基础。

“中国”概念形成:地理,四周向中心的聚合;民族,多民族的不断融合;文化,多元化的凝聚。“最初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在持续不断的交流、融合中形成、壮大。

一以贯之。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延续的中华文明,从来都富有一种“天下”情怀。无论是儒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还是法家的“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主张,道家追求的“藏天下于天下”的境界,无不契合着“天下一家”的叙事逻辑。小处,追求家和万事兴;大处,追求协和万邦。

“天下一家”。

中华文明形成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文化传统。

文明的内核相通,文明的表征多样。

作为客观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折射出的欣赏者从不同角度,发现的各具特色的美,既不能粗率地以高低优劣来判断,更不能以对立竞争的心态来对待。

要融合,不要冲突。

要协调,不要对立。

要互鉴,不要敌视。

不同文明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多元一体格局,须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面对。

“内循环”保证凝聚。

“外循环”保证活力。

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通过“双循环”,不断发展自己的文明。

阶层开放、上下流动。

中华文明“内循环”开放性的重要体现。

先秦时期,提倡“明明扬侧陋”,让新生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战国时期,主持大国变法的商鞅、吴起等,大都不是本国人。

对外来文化，中华文明历来抱有开放、包容的态度。

输血西方。中华文明两次的哺育，历史上两次源自中亚、内亚的剧烈能量爆发，都有力地重构了世界，让西方实现弯道超车，早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蒙古军的西征，带去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先进的技术。火药炸碎骑士兵团，指南针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提供技术支持，印刷术为书籍廉价流转提供可能，引发欧洲的文艺复兴。

“逐鹿中原”。

华夏文明的延续，争夺核心都是中原。

内亚位居西亚、东亚之间，文化输出的方向，总是从西向东。小的王国，甘心接受依附的地位，羁縻、册封、朝贡；大的王国，觊觎皇位，逐鹿中原，时刻以大中华霸业为梦想。

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只要占据中原，就会称“中国”。

到了元朝，灭金国、西夏、吐蕃、西辽、大理、南宋，首次统一东亚大陆，“大中国”疆域的首次统一，也是东亚的农耕和游牧民族首次统一。

民族国家认同，不是族群同质性的产物。

独立性、连续性，由文化的包容性而产生。

“一超无强”。“一超”，在东亚地区的体量实在太大，政治、经济、军事资源，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大陆东端长期没有任何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权，能够与之分庭抗礼；“无强”，占据了东亚地区雨养农业区最为精华部分，周边所有政权，或偏居海隅，或避居雨林，或待在青藏高原上自成一统，政治、经济实力都很差，都没有威胁古代中国统治核心地区的能力。

“中国”，在文化区域聚合而成的大空间当中展开，超越中原，包含中原、草原、西域、高原与海洋诸地理区域的大空间。“中国史”，几个亚区域聚合而成的空间体系的文化演化史。

“西北走廊”地带，亚区域整合起来的关键。

唯一的一条同时连接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与青藏高原各个方向的走廊，可以把这四大亚区域同时收入视野，在一种远超越于中原的宏大格局中，审视这个多元体系的演化历程。

中国疆域的形成，由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创造。

“大一统”的国家。西周，靠血缘纽带、亲戚关系，实现“大一

西方传统是「分」，从中世纪到现在，一直小国林立，即使合起来，也合中有分。文化基因、传统一直影响着他们。欧洲国家认同希腊，希腊城邦的特点，小国寡民。中国历史的底色。西周大一统、秦代大一统，制度整合、学术整合、宗教整合，走向帝国的三件事，全部做到了。到东汉结束，就连造反的模式，也固定下来。

统”；秦靠法律制度、统一标准。两股力，一热一冷，共同锻造出“中国”的概念。“大”，国土大、疆域大；“一统”，制度、政令、文化统一。不管是周边征服内地，还是内地征服周边，没有一个统治者会采取种族主义的做法，把别的族群赶走。赶走，就没有“天下”“中国”。

“朝”和“朝代”不等同。

“朝代”的定义：建立国号的开国君主，世代相传的整个统治时期。一些诸侯领地或者小国，被称为“国”。秦国，在一统天下后，才叫“秦朝”。

朝，代表中央，既是疆域，也是时间上的延续，通常比国的范围更大。

“朝”在现代，类似国家、王朝；“朝代”，后人作的历史时间划分。

有“朝代”存续时间，与“王朝”国祚重叠的情形。

朝和朝代一样。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的兴亡，也是“朝代”的兴亡。

有时，朝与朝代不同。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朝”或小国的时代。

“南北朝”的“朝代”，明显不是只有一个“朝”。

“大一统”的模式，中国古代的世界化。

中国疆域的凝固，从春秋时代开始。

王朝递嬗，政权更替，不可胜数，却没有一个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

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

“中国”才是具有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

1949年，“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中国和西方，历史的路径不同，最大差别在政教关系。

中世纪欧洲，一如五胡十六国，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封建贵族与部落长老差不多。欧洲

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中国正好相反，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

欧洲都是小城邦。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两次“大一统”：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昙花一现，罗马帝国“摔碎”，再也粘合不起来，导致近500年来欧洲战争频仍。

驾驭“一体”与“多元”，世界政治的永恒课题。亚欧大陆两端的文明，在差异巨大的自然环境下，乘着迥异的历史洪流，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聚多散少，西方聚少散多。

西方传统是“分”，从中世纪到现在，一直小国林立，即使合起来，也合中有分。文化基因、传统一直影响着他们。欧洲国家认同希腊，希腊城邦的特点，小国寡民。

中国历史的底色。西周大一统、秦代大一统，制度整合、学术整合、宗教整合，走向帝国的三件事，全部做到了。到东汉结束，就连造反的模式，也固定下来。

周公之梦。孔子的梦，恢复西周大一统。

梦没做成，有人接着追梦。

真正再造大一统，不是别人，是秦始皇。

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与科技时代等四大阶段。

作为人类轴心时代的几大原生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完整跨越了四个阶段。

秦岭山脉，中华的「父亲山」。

统领东西南北方的中华芯脉。

牵手两大母亲河的中华脊骨。

唯有跨越秦岭的王朝，才算真正的大一统。否则，半壁江山，甚至偏安一隅。有志于统一中国的政权，必然要争夺军事屏障秦岭，谁先控制秦岭南北，谁就拥有博弈的主动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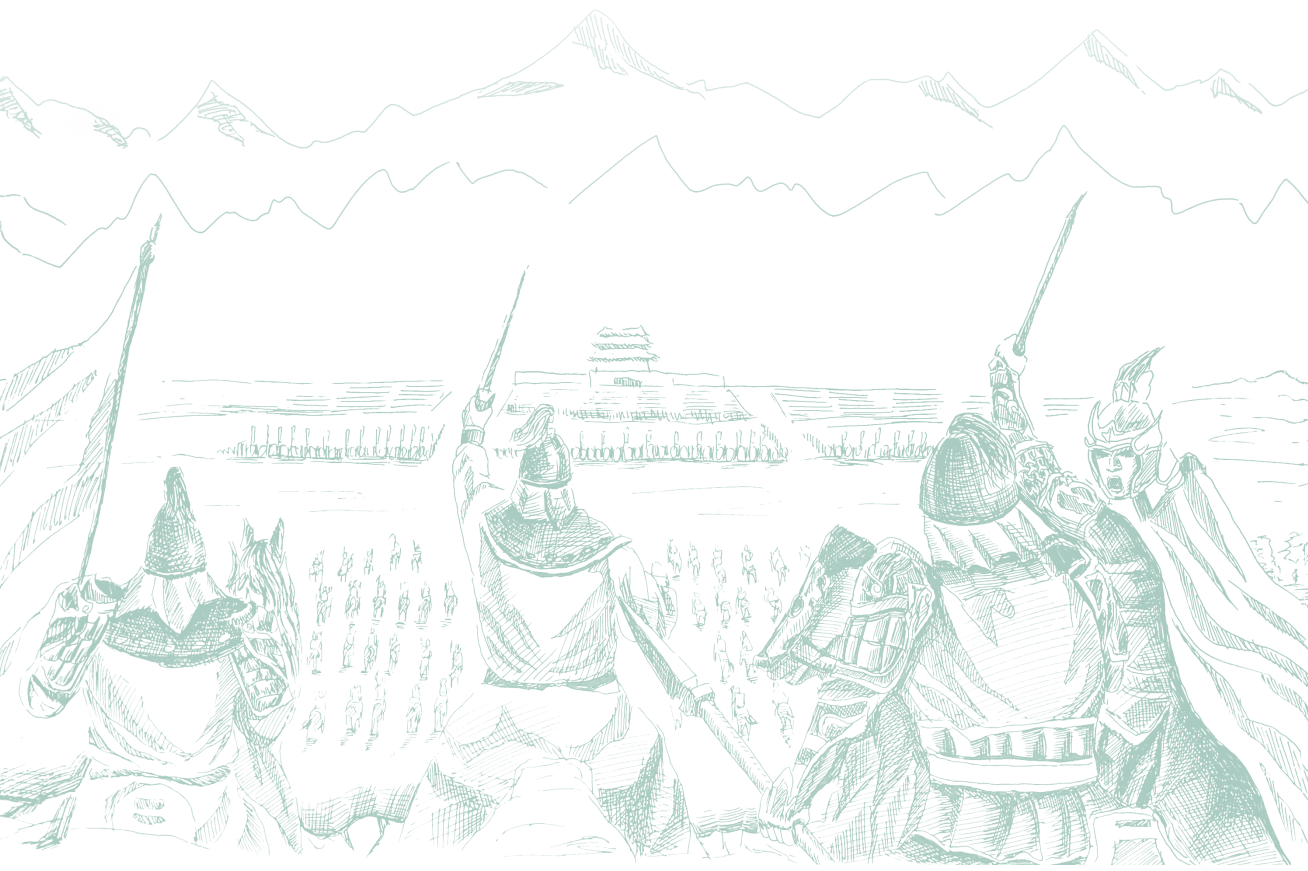
关中平原，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
文字记载上，比成都平原早800多年。

天佑大秦。「变法」期间，六国之间打得难解难分，成都平原的古蜀国自娱自乐的「内循环」，正好为关中平原的秦国提供战略安全期，着力「外循环」。

南北文化，在古汉水一带，争夺与融合。

秦蜀咽喉。对南北政权的分合影响重大。

得汉中，南北一体；失汉中，南北对峙。





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



陆

柒

捌

玖

拾

一部古蜀邦交史。

一部战争史、迁徙史、文化史。

在中原战区，秦国有胜有败，甚至胜少败多。

“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古蜀国的成都平原富饶，为秦国垂涎。《华阳国志》序介绍，“秦资其富，用兼天；汉祖阶之，奄有四海”，强调蜀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

周朝建立后，古蜀国仍然与周保持较好的传统交往。

埋头“内循环”，抬头“外循环”。

杜宇执政末期，正是商王朝接近灭亡之时。

几百年来就与商朝不合，在伐纣的洪流中勇往直前。

连绵淫雨中，戴着面具“前歌后舞，号噪欢呼”。

古蜀军队，“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骁勇善战，战斗力强。“前歌后舞”对商纣军队“歌舞凌之”，一种鼓噪夸张、类似歌舞的战斗方式，不是以艺术和审美为目的的歌舞。

神圣之战，从始至终伴随着舞蹈和歌曲。

大战前夕，古蜀士兵通宵载歌载舞，等待拂晓：大战冲锋时，伴随着舞蹈和歌曲，一边舞刀弄枪，一边发出吼叫，悠长宛转的嚎叫增添军威，用请神明附体的舞蹈仪式来增添勇气，在面具的变换中，制造出紧张恐怖的气氛，然后，向敌军战阵中冲去。

面具，“古成都人”狩猎时，带在脸上既吓唬猎物，又给自

已壮大的器物。面具后来用于战争前后的祭祀、庆祝，再扩展到庆祝活动的舞蹈之中。如今，大部分面具仍然保留在戏台上。

川剧、京剧、傩戏、藏戏里的面具，各具特色。

非洲人、亚洲人、南美人，都有久远的面具发展史。

阵前歌舞。戴着面具的嚎叫与怪异的舞蹈，一种激励士气、恫吓敌人的战前准备，只是动作夸张，声音喧嚣。一边舞刀弄枪，一边发出吼叫，对敌人的一种威慑。这，应是川剧的起源。

语言“活化石”。对“伐纣”的支持，深得蜀人民心。“死瘟商”，四川方言中至今还在流传的话语，谴责那些作恶“找死”的人。当年古蜀国，参与灭殷商的口号。

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方言，“口碑”的力量。“覃父癸”铭青铜觶，参加武王伐纣时的战利品，或是周王颁赐的掳获物。《尚书》记载，巴蜀之师参与灭商战争的见证物。

在“巴蜀之师”的强力帮助下，周人建立新的周王朝。

大厦将倾，总有迹可循。

西周的历代君王，自周武王建立政权后，起起伏伏。

后世君王良莠不齐。以穆王西征为起点，周王室开始埋下被“清盘”的缘由。

对西戎，纵然胜了，却早已不再是之前的“以德服人”模样，而是变成武力征讨。

再后来，周厉王把“德行”抛在脑后，导致百姓对王室印象坏到极点。王室能恢复，不得不说“共和行政”的两位功臣，周公与召公功不可没。

当历史的方向盘，交到周幽王手中时，没有看到国家的弊病，依然放飞自我，我行我素，最终引发了终极之乱，这是《史记》中司马迁的解读。

西戎，既与西周王朝的发祥有关，同时又亲手埋葬西周王朝。

从经济、科技发展来看，西周的灭亡也是必然的；从“地方”到“中央”，各个诸侯国在西周王室的大伞下，得到足够的发展时间、空间，劳动工具、经济实力发生变化，诸侯们权力、力量日趋强大，心态“水涨船高”；“天下大势”也在发生变化，当周武王的后代子孙，把先王们积攒的德行透支之时，天下之变，便是周王室为首的大势

核心还是成都城区。像一个诺大的摇篮，边缘延伸、排列，秦岭、大巴山、巫山、乌蒙山、峨眉山、邛崃山等，摇篮的轴心是成都平原，与江南同为显赫的富贵红尘之地，

所趋，已经不可逆转。

蜀夏同族。商革夏命时，古蜀人助夏攻过商。

蜀周同族。古蜀国与周王朝共起，却并未与周王朝同亡。

地方千里。到了开明王朝空前强大。

从开明二世开始，南征北伐，争城夺野，频频用兵。

到了开明三世，古蜀国边境西推至青衣江流域。芦山一带成为西方门户；大举向南兴兵，沿岷江南下，征服僚（指夜郎）、僰（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昭通地区）之地，成为蜀国附庸。

向西，“攻青衣”。

青衣，一个古地名，在今雅安市芦山、宝兴、泸定与阿坝州金川县附近。

促进成都平原农业经济，与青衣江流域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深度交流。

向南，“雄张僚”。

广大“南中地区”，已为古蜀国所控制，成为古蜀国的南疆。南中地区，即今天的云贵高原和川南地区，“西南夷”生活地带，资源充足，富于铜、锡、铅等古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朝东，与楚抗衡。

“经济梯递”。“伐楚，取楚兹方。于是楚为关以距之”。古蜀国势力范围到达鄂西地区，促进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稻作农业、水利灌溉技术的交流。

形成了“东接于巴（今重庆），南接于越（今贵州中部），北与秦分，西奄峨（峨眉山）嶓（嶓冢山）”的疆界。

泱泱大国，“西南诸侯之长”。

首屈一指。开明王朝还拥有附庸属国，丹犁国（今四川丹棱）、僰国（今四川宜宾）、獠国（寮国，今老挝）等，甚至，还分封下属的诸侯，苴侯（今广元昭化

一带), 享侯爵待遇。

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 并不弱于中原王朝。

对外政治扩张。不仅出于军事目的, 经济意图也明显。控制不同生态的地区, 占有不同类型的资源, 将政权建立在地理多区位、物资多资源、经济多样化的广阔坚实的基础上。

四处开疆拓土, 强化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

向北, 与秦争夺汉中平原。

汉中平原富庶程度可与成都平原媲美。

《华阳国志》赞美汉中: “厥壤沃美, 赋贡所出, 略侔三蜀。”

争夺汉中, 既出于军事目的, 更看重经济资源。

“以褒斜为前门”, 汉中平原曾纳入蜀国版图。

“攻秦, 至雍”, 与秦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对汉中地区激烈的争夺战。

对异族滋扰的打击, 毫不留情。

有一次, 面对僚人等异族滋扰时, 开明王领着军队自温江饮马河, 一直往西, 追到了天全、泸定一带; 一直往南, 杀到了荣经、汉源一带。僚人、乞人, 很长一段时间, 连临邛都不敢进。

到战国中期, 古蜀国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

“全域成都”。一幅壮阔、辽远的山水画面。

疆界, “东接于巴, 南接于越, 北与秦分, 西奄峨眉”。

山如城郭, 成都平原好似人们生活的城市空间。

平原的自然之势, 想象空间极大。

在《蜀都赋》中, 左思把成都之门, 延伸到玉垒(汶川与茂县交界的九顶山)、灵关(宝兴、天全一带)一带, “廓灵关以为门, 包玉垒而为宇”。《华阳国志》中, 更是把蜀都描述得四至完备: 北以汉中褒斜谷为前门, 中间以玉垒山、峨眉山为城郭, 西部以汶川、茂县盆地为牧场, 南部以云南、贵州的南中地区作为苑囿, 城前以岷江、渠江等为池沼。

成都之门在边缘, 在“古成都人”能够企及的地点。

北控汉中地区, 在汉水上游, 与楚、秦、巴角逐; 东边接于巴族; 南包凉山州、云南北部, 役使着氏羌与西南夷众多部落, 以今天青神、芦山一带为后门, 将玉垒山、峨眉山作为城墙, 以岷江、渠江、绵远等作为水池, 将岷江上游适于放牧之地作为畜牧资源, 以今天四

川凉山、宜宾一带与比邻的云南、贵州等地作为花园，与越族相邻。

以成都为轴心线，西边龙门山，东边龙泉山。

两座山脉，一西一东，透透迤迤，向南长来。

龙泉山脉，山脉长200公里，宽10公里，山体细长，南北走向，将西端的平原从整个平原区切割出，称为“川西平原”，地缘中心是成都主城区，也被称为“成都平原”。

龙泉山脉，北起安县，经绵阳、德阳、中江、广汉、金堂，绕开成都主城区，经龙泉、双流、简阳、仁寿、眉山、青神、井研，南达乐山，呈东北西南走向，长而狭窄，一如墙垣。

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

成都平原，两座山脉夹持出的一块平展、水滑的地带。

广义的成都平原，介于龙泉山和龙门山、邛崃山之间，北起江油，南到乐山五通桥，包括北部的绵阳、江油、安州间的涪江冲积平原，中部的岷江、沱江（绵远河、石亭江、湔江）冲积平原，南部的青衣江、大渡河8个冲积扇重叠联缀的冲积扇平原，总面积2.3万平方公里。

天府文化的主体区域。

狭义的成都平原，指都江堰、绵竹、罗江、金堂、新津、邛崃6地为边界的岷江、沱江冲积平原，面积8 000平方公里，构成平原的主体部分，为成都平原腹地。俗称“川西坝子”。

天府文化的核心区域。

中国古老的盐业中心。

《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凿广都盐井”“县有鱼田盐井之饶”。

盆地东部，地形明显复杂。与龙泉山脉形态和走势相类似的山体，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大巴山和云贵高原之间，叫作“川东丘陵”“川东山地”。巴人活动的核心地区。

平原与山地的分割线华蓥山，南端是巴渝文化的地缘中心重庆。

由于龙泉山，整个成都平原被看作一个盆地。

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独特自然条件的恩赐。西面成都平原，东面川中丘陵，南面平原、浅丘、深丘、低山，高低错落。北段，沱江切割成金堂峡，南段，岷江切割成的平羌三峡。

宽窄成都。龙泉山既是城区的防御，也是市际的边界。

“胡焕庸线”的屏障。富饶平原与方山丘陵的自然分界线。

“汤继强线”的原点，“T型经济带”的经济“发动机”。

远远超出区域中心城市的概念。

扩展至青藏、云贵的山原壮形。

像一个诺大的摇篮，边缘延伸、排列，秦岭、大巴山、巫山、乌蒙山、峨眉山、邛崃山等，摇篮的轴心是成都平原，与江南同为显赫的富贵红尘之地，核心还是成都城区。

远古来自各方部族迁徙的最后节点。

“生命走廊”。中国三大民族走廊的“枢纽”。

西北端，由甘青高原西行，进入“西北走廊”，连接北方丝绸之路。

东南端，经“燹道”与“南岭走廊”贯通，到达广州，会合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走廊。连同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像两个头向外、尾相连的巨大的Y字。

两端连接东方、西方两大文明。

拥有天然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

空间特点，决定封闭性和开放性。

平原西北缘，由岷山连接的龙门山脉包围着。东南缘，有龙泉山脉横亘。只留下岷江河谷，作为泄水孔道。平原地面并不完全水平，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有一条条鱼脊形的高地。

都江堰、郫都、成都城区，基本上三点一线，排列在冲积扇中脊线上；龙泉山脉南段山前过渡带，沿着平原与台地的交界处，又有成都、双流、新津三城一字排开，直抵岷江河谷。

城市之间，彼此相距大约20公里，相互沟通。

客观地理。“藏羌彝走廊”多条文化交流路线的自然归点：岷山山区南下的部落，落脚点郫都、彭州，归宿是成都；沿岷江北上的部落，落脚点是天

两端连接东方、西方两大文明。
拥有天然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
空间特点，决定封闭性和开放性。

府新区、双流，归宿也是成都。

盛产稻粮，人文荟萃的渊藪，也盛产英才。

既是物质上的富庶，又是文化上的昌盛。

经济实力雄厚。对内开展各项改革。

首先，效仿中原礼制，建立宗庙礼乐制度。

《华阳国志》记载：“……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宗庙礼乐制度，以世代定居的农业经济为基础。

“酒”，改用汉语“醴”称。中国古代祭祀用酒为醴，酒一宿熟为醴。“酒”或“醴”，说明开明统治时期，成都平原粮食丰获，有足够剩余酿酒用于祭祀。

其次，就是迁都。

《华阳国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

迁都成都，基于地理、政治与经济的原因。

成都平原水患经开明王鳖灵的整治，颇长一段时间，再没遭受洪水袭击，变得适合发展生产。湔、岷、雒、绵四水已无大害，越岷河而南营邑于成都与广都，便于疆理成都平原西北。

开明王朝沿袭杜宇王朝的君主制政体。

王位世袭制度。

《蜀志》介绍，“王蜀凡十二世”，王室立太子，别子为群公子，与诸夏同制。王朝的职官，有太傅、丞相、郎中令等，皆为朝官。效法西周分封制，封王室弟子边防重镇，以为屏障。

封君为一方之长。

阶层分为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

统治阶层，拥有一切权力，包括蜀王、王室子弟和姻亲、王朝大臣、封君，与各地大大小小的“王”“侯”（族长）。被统治阶层，主要是农奴、工商业者和其他平民等，奴隶只占极少部分，通常指的是王室和大小统治者的家奴。

到开明五世时，删去“中原人”妄称的“帝号”。

开明九世，从祭祀到礼仪，大张旗鼓的“变脸”。

“立宗庙，以酒为醴，乐曰荆，人尚赤”。

群雄之中，开明王不愿以“夷狄”身份出现。

用正统的“黄帝后裔”之名，与众王平起平坐。

盛世强君。从开明六世到开明十二世，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争阴影、对外扩张的理想中。秦国与蜀国对于汉中要塞的争夺，更是一场紧张而持久的拉锯战，双方屯积重兵，你争我夺。

既有军事攻伐，也有商旅往来。

交好，战争间隙的暧昧时光。

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蜀国与秦国两国边境相对平静。不仅战事稀少，还有使臣往来，互有馈赠，但又都希望对方在与对手的交锋中受损，以便渔翁得利，使自己成为“天下霸主”。

公元前387年的中国，大地一片宁静。

乌云翻滚。成都平原的古蜀国与渭水一带的秦国，战争一触即发。

与东北方被“吴起占领秦之洛阴、合阳”和其他五城相比，秦国在西南方的军事态度，更为坚决、强硬、积极。南郑（今陕西汉中）刚刚丢失，秦国便再次攻取，司马迁称为“伐蜀，取南郑”。

“据有巴蜀之地”。

到了公元前377年，蜀国从汉水南下伐楚。

尽管吴起已死，“变法”却已深入楚国的五脏六腑。虽然蜀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路高歌，占领兹方。兹方距楚都江陵（湖北荆州），还有400多公里，楚人就已经“为扞关以拒之”。

扞关，在今天湖北长阳县西。

取胜无望。东征受挫，不得不退兵。

非常满足。在对秦国、楚国的军事行动中，开明王一度战果辉煌。

大争时代。“凡有血气，必有争心”。

秦国变法图强。壮大军队，网罗人才。

在陈仓“故道”通往的成都平原战略上，秦国逐渐彰显强硬的国家姿态。



陆

柒

捌

玖

拾

冲突与较量。

秦国与古蜀国的军事磨擦,已长达300年。

同期中原,刀光剑影,硝烟弥漫。

各路诸侯,粉墨登场。

圈占土地,扯起大旗。

为了在史无前例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军营与军营间、帐篷与帐篷中,出没着许多足智多谋、踌躇满志的人,头戴方巾,身穿布服,转动着三寸不烂之舌,以足够的耐心、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不同的主子推售自己的强国计谋,试图实现人生价值,也让社会认同自己的价值。

中续百家争鸣,后启大秦帝国。

关东六国,合纵之战。

合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

从公元前318年楚、燕、韩、赵、魏首次合纵之战,到公元前246年赵、魏、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70多年间,六国合纵攻秦之战,发生了五次。六国合纵地域,广于秦五倍,兵多于秦十倍,名将辈出、雄兵百万,在五次大战后竟然没有使秦灭亡,反而秦国恒强、六国愈弱。

“以五国精锐,攻一城而不克,其无能可知”。

秦军发出鄙视的感叹。

五次合纵之战,六国不能灭秦,秦却看穿六国的虚实、懦弱。

秦国从孝公始共七世雄主,到秦王嬴政时,东出击六国,已是大势所趋。

“秦是西戎”。秦人的原始故乡，游牧民族。养马，大规模地饲养马匹，根本性特征，家马随同马拉两轮轮辐战车，一道被从欧亚草原南下的雅利安人，带入了“西北走廊”……

乌克兰南部，4 000年以前就是养马族的原始故乡。

养马习俗，逐渐从南俄草原向南，传入安纳托利亚和伊朗地区。

犬戎族一直活跃于“西北走廊”上，涉及地域，由陇东地区的泾水流域到渭水流域，到陇山以西的渭水以南，进入西汉水流域。围绕今甘肃天水一带，犬戎曾同秦进行过长时期的激烈争夺。

春秋时代，秦岭以南，非楚即蜀。

断断续续。国力难分伯仲。

秦国与古蜀国，围绕汉水上游重镇——汉中展开激战。

早在春秋初年，开明王朝建立初期，便已剑指北方。

公元前676年，秦国还没有正式迁都雍都。

“攻秦至雍”。鳖灵的儿子、开明二世卢帝便率蜀军北上，逆汉水，从“故道”杀出，越过渭水，从天而降，出现在“平阳县”（今陕西眉县西）附近。秦国为突如其来的“入侵”惊骇不已。难道是汉中的褒国发兵前来？可旗帜却明显不是褒国的。

两军激战，秦军退守雍都。

图腾时代，神兵天降，容易摧垮防守意志。秦军不敢久战，并非怕死胆怯，而是害怕亵渎神灵。雍都刚修筑不久，城高池宽，足以容纳10多万军民，秦军躲进城，一直到“神兵”粮尽退去。

雍都在关中西部，陕西宝鸡附近。

事后，秦人才知，汉中南方尚有一个古蜀国。

古蜀国灭了汉中的褒国，再北上攻击秦国。

雍地，在今天的陕西凤翔一带。

整个关中平原，实际掌握在古蜀国手中。

古蜀国的富裕强大，让秦国惊出一身冷汗。

公元前451年，世界史上有件大事。生活在爱琴海边的雅典人民主投票，通过法律，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者，才能获得公民权，法律使雅典公民的人数减少。奴隶主民主政体日益完备。

古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的杰出代表伯里克利，完全掌握国家政权，利用奴隶血汗和提洛同盟的的贡金，主持重建被波斯人破坏的雅典卫城，以纪念“希波战争”的伟大胜利，配套雅典在希腊的霸主

「天河注水」。秦国在陇西天水一带起家，并非「大漠戈壁，金戈铁马」，而是一块水木茂盛的风水宝地，山水灵秀，林木密茂，「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牧马养畜」。

地位，把希腊古典建筑艺术推向顶峰。

希腊文明，属于城邦文明。

城邦的属性，小国寡民与各自独立，各城邦缺乏本原文化，没有融合一统的“国家能力”。城邦居民探索世界时多遇海洋。远洋航行需要的勇气极大。与江河文化不同，海洋文化造就欧洲人喜欢冒险的天性。

与关注道德、伦理的东方文明不同，古希腊更关注数学、哲学和政治。在四万多有投票权的公民背后，数十万没有投票权的奴隶，参与运转的经济社会，逐渐成为哲学家研究的中心。

奴隶制经济、民主政治、海上霸权和古典文化。

在希腊的海洋文明繁荣之时，亚洲大陆上则是风云变幻。

在中国已是群雄并起，奴隶制尚占据主导地位。

“史官”闲得无聊，全年并无大事可记。唯一不安定，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渭水一带的秦国不断交恶。中国还未统一，因争夺土地而起诸侯间的战争，从未消停，人们早已司空见惯。

蜀国遇到挑战，必须迎击邻国秦人的攻击。

两国国力相差并不大，在“南郑”（今汉中）展开激战。

这一年，秦国率先出手，迅速拿下汉中，剑指古蜀国……

秦人的发祥地，在西汉水上游。

汉江之水天上来。

天际的银河，先秦称“汉”。

蕴含着天人感应思想。甘肃东南部，位于中国的几何中心，因与陕西略阳以北的嘉陵江上游同在上古汉水流域，对应着“银汉银河”的“天河之水”，山地，名为“天水”，大江，名为“汉水”。

大禹“治水”的主力部队“川军”，在这里曾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禹贡》中记载：“岷冢导漾，东流为汉。”

汉水又称“沔水”，古代人们寄托政治理想、激发生活情趣的河川。

关中西部，周秦文化之发祥地。

洋洋荡荡，一条汉水。

“天河注水”。秦国在陇西天水一带起家，并非“大漠戈壁，金戈铁马”，而是一块水木茂盛的风水宝地，山水灵秀，林木密茂，“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牧马养畜”。

在《诗经·秦风》中，《蒹葭》自豪地描述天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的水，指的就是流经陇南市西和、礼县的西汉水。

秦最早不是出自西戎，而是成都平原、山东曲阜一带。

如今的甘肃礼县，重要的祖居之地。

非子的封地，建城邑的“秦”地，在犬丘东北方，现在的甘肃天水。

祖籍，父系祖先、祖辈的家族长久居住过的地区。

秦始皇的祖籍，秦国世代居住的土地。

秦国始祖，名“秦非子”，商朝重臣恶来的五世孙。

三国中的典韦，号称“古之恶来”。

勇猛过人。在京剧中，被画为黄脸。

手中的短戟，为一双40公斤的铁戟，一长一短，长短互补，轮动如飞，因为驱虎过涧而出名，能攻能守，无人能及身五步。曹操唤典韦为“恶来”，还认出其铁戟是商纣王时期神将飞廉之子恶来的武器。

恶来，秦始皇的第三十五世祖。

飞廉同时是秦国、赵国的祖先。

往上溯源，蜀与秦当是“同乡”，秦与赵当是“同族”。

秦人与蜀人，渊源特殊。

秦人先祖之一的伯益，远古居于成都平原的“老成都人”，大禹治水战友，“北漂大军”中蜀族部落首领。“川军”北上中原中，柏灌氏其中一小支，早就在秦“故地”甘肃天水定居。

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嬴”，号秦嬴。

夏启继位，伯益“隐匿”，两个儿子被分别分封。

长子大廉，被封到秦地，开创廉姓，名将廉颇是其后世子孙。

次子若木，被封于徐，开创徐姓，后代数不胜数。

非常有名。大廉的后人飞廉与其子恶来，被商纣王赏识，嬴姓在商朝时成为显贵大姓。

殷商末年，飞廉父子都是商纣王的得力干将，一个善走，一个有力。“助纣为虐”的代表人物。武王伐商，牧野之战，恶来被处死，父亲飞廉因之前被纣王派到北边出使，逃过一劫，幸存下来。

《清华简·系年》第三章中，记载：“飞廉东逃于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虎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商朝覆灭，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东方大国商奄。

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

秦的先人，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

飞廉躲到奄国，不忘旧主，不断活动，鼓动大家反周。

周武王去世，商纣王儿子武庚和武王兄弟管叔、蔡叔一起叛乱。

周公带病东征，平定“三监之乱”，然后继续往东，把参与叛乱的东方部落也平定，把参与叛乱的嬴姓人、与飞廉关系紧密的族人，强制从山东迁到甘肃（今甘谷县一带）。

秦族本是东方九夷中的吠夷。

时居今山东省曹县境内，地名为垂，也叫“犬丘”。

上古时期部族迁徙频繁，地名也随族而迁。

到礼县境内后，名前冠以“西”，称“西垂”，西犬丘。

从山东曹县，到甘肃礼县，路程艰难、遥远，用两条腿丈量，需要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携妻带子走向先祖之一的“故地”时，支撑心灵，是生存的原始欲望，还是伺机雄起的宏图大志？

冬雪消融，春暖花开。

抵达关中槐里（今陕西兴平），作短暂停留后，带着后裔们辈辈相传的“我们来自大槐树底下”的悲壮、美丽故事，继续西进。鹰一样的眼睛，一直在进行着对理想与现实的搜寻……

西迁后，秦人最早的居住地“邾虎”。

根据《禹贡》和《汉书》验证，即今甘肃礼县西北。

商末战乱时西迁的华夏族。

到了恶来五世孙秦非子时，已经沦为为周王养马的官吏。

秦非子因善牧马养畜，受封于祖先生活的方圆五十里秦地犬丘。算不上诸侯，甚至不如士大夫，只是“附庸”，依附于大国的

小国。周王只是把秦非子派到千河、渭河的交汇地，继续驯马。

世代为周王室养马，马大蕃息，“分其土为附庸”，分封嬴姓的非子为周的诸侯。非子以秦地为城邑，开始重新奉祀“老成都人”伯益——光荣嬴姓的祖先之一，号为“秦嬴”。

周朝布置的任务：驻守边疆，防御西北的戎人。

子孙与戎族为土地展开长期争斗。

再建新功。西周时，威胁到中原王朝的是戎族。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击破西戎，有功之臣，被周宣王再次赏赐犬丘之地，即今天的天水，并获封“西陲大夫”，跻身大夫之列。

旅游达人。周穆王，了解西方风土人情的第一人。

远方神奇，让人向往。在回祖先后稷“母国”（西王母国）成都平原祭祀后，西巡历时两年多，行程35 000多里（古里），堪称继大禹之后，中国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一带一路”探索者。

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壮举。

史上著名“驴友”。《左传》记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风一般的任性男人，周游天下，到处留车马的痕迹，充满智慧，统御四方，威震宇内的君王。

“乐之忘归”。喜欢打猎，四处游玩，也好大喜功，找个“不进贡”的借口，征伐西戎，仅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白狼、白虎为氏族图腾），“自始荒服者不至”，威信大失。

直接导致与周边外族的决裂。

西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攻破都城镐京。

西周覆灭。周人恨西戎，蔑称为“犬戎”。

不得不东迁，直接“甩锅”，把关中“承包”给秦人。

周穆王，了解西方风土人情的第一人。远方神奇，让人向往。在回祖先后稷「母国」（西王母国）成都平原祭祀后，西巡历时两年多，行程35 000多里（古里），堪称继大禹之后，中国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一带一路」探索者。

秦人保护周平王迁都有功，赏赐岐山以西的土地，封为诸侯。取代西周地缘真空的秦国人，也开始强势挑战晋国。

秦国人居住在渭水中游，以放马和作战的形式，抵御戎狄入侵。

一边与西戎作战扩充实力，一面对关中的周遗民剿抚并用。

在族群构成上，秦国是由少数东夷、周人，大量底层西戎构成。在“文化认同”上，因为继承周朝的故地、遗民而自称为“夏”。继承周朝文化的秦国，顺便想继承周朝的地缘优势。

历经十几代秦国君主辛苦经营，到秦穆公时期彻底灭掉犬戎。犬戎流窜于陕北、山西北部。

“秦霸西戎”。西戎部落的一支义渠戎，与秦人爆发长达100多年的战争，缠斗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芈八子执政的时代。宣太后执掌秦国朝政数十年，是史上太后掌政的开端。

权力、荣誉、巅峰、低谷……

秦始皇的高祖母，抛除历史作品的升华，坚韧不拔的意志力、高明的政治远见、手段，身怀天下，传奇性的人生，极具有争议的爱情，完成一次为时人、后世连连惊叹的传奇逆袭。

功劳不逊于张仪、司马错攻取巴蜀。

“犬丘”，又叫“西犬丘”，非子在获封附庸国前居住之地。

礼县县名源于地名“李店”，元设李店文州元帅府，改“李”为“礼”。

群山之中。隶属于甘肃陇南，陇南市北部，长江二级支流西汉水上游；东邻天水、西和，西接宕昌、岷县，南连武都，北与武山、甘谷接壤。东与辽阔的关中平原相连，南面直通四川。

“秦皇故里”。秦族、秦文化的发祥地。

古老神奇。西汉水上游。

自然环境优越，文化底蕴深厚。

黄河与长江分水岭地带，仰韶文化和巴蜀文化交会。

甚至还出现齐家、寺洼等多种文化对峙交融、相映生辉的人文景观；也是蜀魏角逐、仇池割据的中心地区，更是氐、羌、吐蕃民族，与中原王朝军事对抗、商贸往来的边境重地。

礼县县城东面8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

一条连绵的山脉。西秦岭一支强悍的龙脉，自雷古山发脉，经礼县，北上驻蹕后东西展布，崛起少祖朱圉山，再掉头南下，直奔西汉

水而来。纵贯40余公里的悠扬进军中，即将探及河水之际，山列一伏一起，开阔的谷地开始收紧，分散的群山渐渐闭合。北南走向、长约800米的大堡子山，先缓缓下降，再突然高高举起，像连绵的群山中独独伸出的高昂龙头，矗立于北岸。

“土堡”雄浑博大，层层叠叠的黄土堆积。

稳稳地盘踞在连绵群山的最南端。

挡住了向西通往礼县的去路。

以东，为西汉水河谷地带，平坦开阔，一马平川；西侧山势险峻，永坪河自北而南，注入西汉水，狭窄蜿蜒。西面、南面石壁陡峭，不可攀登，东面较缓，北面与起伏的群山相连接，南岸隔河与山坪城址相对。

厚实圆润。两河夹一山。

环境优美，山水特异。

山顶宽阔而平坦，如同一方静卧的端砚，让人感到视野开阔、舒适。

站在山上，延绵的群山朝拜而来，广袤的秦川大地沃野千里，蜿蜒流淌的西汉水、燕子河交汇，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有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有千里龙脉归此地的神奇，气韵不凡。

水绕山环。肥沃川塬、林草茂密、牛马成群的丰腴之地。

大堡子山躺着秦人的先祖。

风水宝地。孕育出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



陆

柒

捌

玖

拾

秦,今陕西省的简称。

狭义的秦人,即指陕西人。

古秦国领土,不仅包括陕西关中,还包括甘肃天水、平凉、庆阳、陇南和宁夏南部等地。20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在秦国时期都属秦人。

周人崛起于庆阳,秦人肇基于天水。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熟悉风水,到过太堡子山的李白,心里涌现对历史、自然、生命、天地精神的认同和正在逼近的伟大,想象力丰富,在《古风》中,大胆形容秦始皇扫平六合的壮举为“虎视”。

早期秦文化的发源地。

在太堡子山出土的“秦公簋”,多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壶”“秦公作宝簋”等铭文,与《清华简》的记载相互验证。秦始皇祖先的第一陵园,位于礼县的西垂陵园。

秦人发祥地“西犬丘”在礼县。

秦人在陕西建立辉煌的伟业,也是陕西被称为“秦”,将横贯陕西中部的山脉称“秦岭”,将渭河平原称“秦川”的原因。“三秦”,指潼关以西的秦朝故地关中地区。项羽灭秦后,三分其地为雍、塞、翟三国,总称“三秦”。

并非独立的诸侯国,中原诸侯的附庸。

秦襄公采取与宿敌西戎的和亲政策,换来秦人得以休养生息和发展的良机。

平定犬戎之乱后,秦国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国,登上历史的舞台。活动区域,主要在甘肃东部、东南部的渭河上游

与西汉水上游的礼县、天水、甘谷一带。

秦庄公是第一个居住在西犬丘的秦国君主。

秦襄公是最后一个死在西犬丘的秦国君主。

历史比小说要精彩。被周所灭的商的忠臣的后裔，在几百年后也灭了周。

“关中”一词，始于战国时期。

函谷关成为秦国最重要的关塞，地理位置重要。

一条分界线，函谷关以中的区域，关中地区。

楚汉时的“关中”，以函谷关和崤山为分界点。

汉朝时，汉武帝下令将函谷关的位置，向东迁移150公里。还包括部分豫西弘农地区。迁徙和道路的改修，函谷关军事价值大不如前，军事要塞的名号逐渐衰落，西边的潼关开始兴起。

北宋统一全国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

关中地区被潼关以西区域所代替。

现代广义上的关中地区，泛指陕西的中部地区。

关中平原的广袤，号称“八百里秦川”，换算成现在的公里制，400公里。实际测绘，从黄河到宝鸡峡，东西直线距离，290多公里。换算成华里，580多里。关中平原南北最宽处，也就90公里，180华里。海拔约325至800米，长约360公里。南北宽窄不一，东部最宽达100公里，西安附近约75公里，眉县一带仅20公里，至宝鸡逐渐闭合成峡谷。

位于中国现有版图的中部，基本上处在圆心上。

测量中国大地坐标的原点，测量时间的原子钟。

中国时间、空间的原始点。

地处暖温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水草丰美，原始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年代，为防备敌国的进攻、进攻敌国，西面设大散关，东面设函谷关，南面设武关，北面设萧关，把围拢在四关之中的地方，就称作“关中”。

《鸿门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

《过秦论》：“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

地处潼关以西、宝鸡以东的平原地带，称关中平原、关中盆地。

介于横贯陕西的秦岭、渭北北山山系之间。

四面高山环绕，地势险要。

可进可退，可攻可守。「龙兴之地」。周朝、秦汉和隋唐都在关中的长安、咸阳等地区建都。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文字记载上，比成都平原早800多年。原始农业最发达地区之一。

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绵延，北有黄土高原和长城，东有华山、崤山以及晋西南的山地，更有黄河环绕。山川环抱，气势团聚，位置极佳。关中平原像一个巨大的水池，下水道则是东面的函谷关。

重要关隘。地理位置决定。

黄河从北往南，在潼关、风陵渡附近，遇到秦岭，转弯向东流。在黄河到达洛阳的这一段，南有秦岭，北有中条山。中间的黄河峡谷，古代中原通往关中的唯一通道。

沟通古长安与洛阳的必经之地，称为“崤函古道”。

《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自新安以西，历澠池、硤石、陕州、灵宝、阌乡而至潼关，凡四百八十里”的记载。守住函谷关，也就守住了东方国家进入关中的唯一通道。

“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

成为不少帝王选择在关中建都的原因。

黄河最大的支流。横贯华夏大地的秦岭之上，陇中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护卫之下，黄河飘逸的几字甩了一个优美的尾，在落笔转折之处，有一条贵气无比、身价非凡的河流——渭河。

绵延流淌。从发源地一路向东，流经甘肃、宁夏和陕西三省区，全长818公里，在陕境内502公里，流域面积6.71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难怪能够创造出壮美的一片平原，成为关中的“母亲河”，最终也使自己汇入黄河，归于大海。

呈东西走向，占陕西全省总面积不到20%，长约360公里，从秦岭到北山，从宝鸡峡到潼关。由于秦岭北麓的渭河常年冲积淤泥，从而形成平原地势。冲积而成的平原，又叫渭河平原。

“山河四塞，百二秦关”。几大高原中，长400公里，宽不足100公里的平原，土壤质量非常好，只占陕西面积的不到五分之一，但是生活的人口却是陕西

的一半以上。

“四塞之国”。被函谷关、大散关、萧关、武关四关包围，渭河平原正好处在四关之中。关中地区是盆地，包括渭河平原、渭河谷地、丘陵，在陕北高原和秦岭山脉之间。

极富战略色彩。

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龙兴之地”。周朝、秦汉和隋唐都在关中的长安、咸阳等地区建都。

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文字记载上，比成都平原早800多年。原始农业最发达地区之一。

在关中，渭河由西向东，横贯关中平原，曾以水草丰美而著称，被誉为关中平原的“母亲河”。中、下游渠道纵横，自汉至唐，皆为关中漕运要道。干流与支流泾河、北洛河等，均有灌溉之利，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都引自这些河流。肥沃富饶与秦岭，也功不可没，秦岭的北麓发源了6条河流。

自古自然、经济条件优越。

水热条件适宜农作物的种植。

公元前338年，战国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苏秦，到秦国游说秦惠王时，就称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刃，沃野千里，蓄积多饶”，“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前汉书》记载，秦末汉初杰出谋臣、西汉开国功臣、政治家，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的张良，劝说刘邦定都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从刺客到谋士，最终看破红尘。张良就像刘邦的幕僚一样，隐藏在他身边，多次挽救刘邦于险境，一路走来，从佐策入关、下邑奇谋、暗度陈仓等，似乎无往不利。

《禹贡》中，把关中的黄壤土，定为上上等。

最适宜种植农产品的土地。

经过周、秦、汉三朝的开发，加上大力兴修水利，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支援了关中都城的经济。西汉时，已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粟米的储备，牲畜的数量，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史记》中，司马迁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只占十

分之三，但却拥有全国十分之六的财富。

关中背后的河西走廊，通往“西域”。“外循环”。攸关华夏命运的走廊。

周穆王西游，与西部世界交流的神话版本载于《穆天子传》。

气候上，属于半干旱、半湿润的季风气候与大陆性气候。更接近亚欧大陆的内部环境，农作物产出不如中原、长江沿岸平原。需要贸易补充物产，帮助丰富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互动。

占据沟通东亚和中亚的有利地理位置。

游牧力量“贮藏地”。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荟萃之地。

内亚史和中国史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大幅度的重合、叠加。

文化概念，并非地理概念，边界具有易变性。

内亚经常处在各个部族、分裂政权的对峙、攻伐，军事技术的演变重要，各部族的竞争压力颇大，军事技术的进化速度极快。一拨人带着先进的军事技术进入中原，之后慢慢陷入停滞的状态，然后新一波技术更新引起下一轮对中原的入侵。

“文化递进”。在布达佩斯和大同之间来回移动，天然障碍很少。

“地理阶梯”。如果在西安和昆明之间来回移动，天然障碍颇多。

中国历史具有多元性、整体性。

双方彼此接触并对对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汉族，存在着相对独立、兼容、融合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内陆亚洲在草原社会、中原王朝的历史变迁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除了正常交流外，剩下就是争斗“中原”。中华民族早在夏商周以前就是一个整体，只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划分“敌我”的倾向性较为严重。

长城分隔两边的内亚人、中原人。

中华民族的形成，“文化认同”的结果。

“内亚性”与“中原性”的合并而致。

华夏文明的承载者，与来自内亚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对抗、交流、互动，构成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主线。由北而南，由西北往东南的“中原”战争，成为中国朝代更迭的基本规律。

千丝万缕。诸夏各地，与夷、蛮、戎、狄诸民族集团。

戎，秦汉以前对西北游牧族群的统称。

在大禹以前，尧帝就曾听从舜的建议，将战败的三苗部族，迁徙到西方去“归化”西戎部族。1 000多年过去，戎族以渭河上中游及其以北、以西地区为活动中心，向西、向东延伸。

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戎族的分支。

主要由羌人、少量东迁的印欧人组成。

活动中心位于农耕区与畜牧区的交接之地，兼备优良的农耕与畜牧条件。

秦国向内亚的游牧部族学习，减小君臣之间的权力距离。

缩小君主到民众的距离，举国上下如同身体一般连贯完整。

一个泛文化圈与贸易辐射路线之地。

“胡化”，较浅层次的文化接受行为，指代的许多具体事物、现象，都与“内亚性”有关联。如今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汉语词汇，如“马”“哥哥”“荷包”等，词源上可能就来自内亚地区。

秦国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西戎色彩。

面对游牧民族机动灵活的游动狼群抢食，绝对不会为所谓的尊严，在弱小时攻击比自己强大的族群。自知之明，明知自己只是狼，难挡猛虎利爪。懂得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回报。

一直把杀出关中、称霸中原作为主要使命。

嬴秦部族原本世代居住东方，在殷商后期和西周早期，几支秦人部族陆续迁徙到西陲之地，以流亡者、戍边者的身份扎根，在艰苦斗争中站住脚，逐渐发展壮大。

公元前677年，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不断东进的秦国，已经收复岐山以东的西周故土，占有关中的大部分地区。从收编的泾河、渭河流域的周朝遗民中，全盘学习、接受周礼和文字。

百里奚、伯乐等名臣都善于牧马。中原诸侯将人才比喻为美玉，将千里马与人才挂钩的比喻，出自秦文化。秦国祭祀的三牲，有着殷商文化特色、游牧特色的骠马、黄牛和羝羊。

在文化和认同上，继承周朝的故地、遗民而自称为“夏”。

继承周朝文化的他们，顺便想继承周朝的地缘优势。

戎夏混血的大国晋国，同样位于黄土高原上，地缘、民风与秦国比较类似。秦穆公以联姻的方式控制不了晋惠公，晋文公独立外交的意志，注定了“秦晋之好”的破裂。

华夏文明的承载者，与来自内亚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对抗、交流、互动，构成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主线。由北而南，由西北往东南的「中原」战争，成为中国朝代更迭的基本规律。

春秋时期，楚国多数时背对古蜀，满足于获得少量铜与土盐。

秦人有着区别于山东六国的习俗，喜欢配带游牧风格的短剑。

战国初期，经过一轮轮整合，集结成了大约20多个实体诸侯。

天水，秦人小试牛刀之地。

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缓慢过渡，游牧生活仍占主导。

“在西戎，保西垂”。

与西戎各族杂居，以保卫西周门户，攻伐相争，既能积极从先进的中原文化中吸收养料，促进自身社会制度进步、经济飞速发展，又能在同戎人的频繁接触中，融入游牧文化中剽悍、勇敢，长于骑射征伐的风格，不断壮大，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史诗。

地理文化因素，形成粗犷豁达、坚韧不拔的精神；尚武好战、积极进取的精神；广纳人才、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主动性强，服务于现实的务实精神。

西北牧马，欲王天下。

一匹匹雄劲的战马，孕育出秦人统一的伟梦。

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独特，一种草原文化，百姓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尚武团结：“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考古发现，秦国的大小贵族，几乎人人佩刀，北方草原风格的短剑，与山东诸侯区别较大。农牧业并重，贵族们的食谱以食肉为主，短剑不仅是贴身武器，也是食肉的工具和身份象征。

秦国战车与周、楚和晋的最大区别。

战车形制，没有中国式的战车部件：车轼。

考古证明，战车与中亚的亚述、波斯战车，阿姆河宝藏中出土的黄金战车形制相同。

“商鞅变法”后，在生活层面，秦国革除了戎狄家族混居，喜好私斗的旧俗，还大刀阔斧地加速社会制度的变革。向西方获取资源、战争策略的思路，却也早在秦穆公称霸时代就已经奠定。

戎狄的战马、尚武的作风，在山东六国中赢得“虎狼”的威名。

简单、质朴、粗放与功利主义的气质，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法家诞生于晋国故地，“法家故西北民族之精神”。

陕西话以天水话为基础，又叫秦州腔，简称“秦腔”。



陆

柒

捌

玖

拾

秦岭山脉, 中华的“父亲山”。

横贯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山脉。

与阿尔卑斯山脉、落基山脉, 并称为“地球三姐妹”。

狭义秦岭。位于陕南渭河、汉江之间的山群, 东起灞河与丹江河谷, 西止于嘉陵江, 绵延约500公里。横亘在汉中、宝鸡之间的主峰太白山, 海拔3 771.2米, 终年积雪。“关中八景”之一。

一寸高一寸险。

高度差约是泰山的2.5倍, 比“五岳”最高的华山还要高1 600多米。

广义秦岭。西起甘肃南部, 横贯陕南, 延及大别山, 东止张八岭, 众多山岭被纳入, 长约1 600多公里, 简称“大秦岭”, 涵盖岷山、米仓山、大巴山、武当山、伏牛山、桐柏山。

“命运共同体”。大小秦岭, 在漫长的地理变迁中。

壮美、巍峨, 恒久耸立在中国心脏地带。

渭河(黄河支流)与嘉陵江、汉水(长江支流)的分水岭。

蓝色星球送给中国的珍贵礼物。

“中国南北分界线”。被地理教科书, 轻描淡写为“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温带季风气候与亚热带季风气候分界线”。翻过秦岭, 江湖路远, 一不小心就成了生离死别。

寒潮被秦岭阻挡, 不易南下, 东南方向来的暖湿气流被秦岭阻碍, 湿润气流, 不易进入西北, 秦岭南面的汉中平原、成都平原, 没有亢旱之虞、霜冻之灾。也让西北地区越

加干旱。

远古时期，秦岭、淮河北南分别开启了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历史进程，对应不同的文明、文化，一面水田耕作，一面旱地耕作；一面多以船为交通工具，一面以马为交通工具；一面的人们表现出温婉、柔情，一面表现出豪放、高冷；一面“土壤硬实”“水脉畅通”，一面“政治梯递”“经济逆高”。

这些带来中国人文差异、文化的多样。长江、黄河的最大支流均发源于秦岭，汉江、渭河把秦岭南北的色彩、气质汇入中国版图，让秦岭成为中国特性资源的集大成者，统揽南北方迥异的风采。

座座山峰，大自然匠心妙手的传世杰作。

独特的象征之美。人，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连橘子都不一样。“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秦岭自西向东，气势磅礴，逶迤而东。

陕西是核心区域，止于河南境内。

“巴掌大”的秦岭余脉。

在河南西南部山区，孕育出灿若星辰的众多绝美风景。

有人把秦岭在进入河南后，形成的扇形余脉形容为手指状。再诗意一些，更像仙女散花的纤纤玉指。当秦岭把最为巍峨挺拔的脊梁，留在陕西后，又把所有的婉约、秀美全部留在河南。

大秦岭借九天仙女之手，洒下的片片花瓣。

是历史经纬，还是文化厚道？

从仰韶文化，到千古经典《道德经》，从秦王扫六合，到刘邦项羽的入关之约，从“大禹导洛自熊耳”的开天辟地壮举，到杜甫经行崤函古道创作《石壕吏》的凄惨悲凉。

深远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

统领东西南北的中华芯脉，牵手两大母亲河的中华脊骨。

密不可分。长江、黄河，共组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

双条性、同体性、贯穿性、同向性、同形性、阴阳性。

美美与共，天下一统。

唯有跨越秦岭的王朝，才算真正的大一统。否则，半壁江山，甚至偏安一隅。有志于统一中国的政权，必然要争夺军事屏障秦岭，谁先控制秦岭南北，谁就拥有博弈的主动权。

由北向南,翻越秦岭,可以迅速控制汉中盆地、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就可以顺长江、汉江东进,直至攻取荆楚、湖湘,进而平定江东。秦国翻越秦岭,灭巴蜀、设郡县,经营好巴蜀,进而扫平楚国,统一天下有了物质基础;刘邦初封于巴、蜀、汉中,后翻越秦岭北上,攻取陇西、北地和上郡,进而略取关中,最后东进击败西楚,建立大汉王朝。

三国末期,西晋控制大秦岭,经营巴蜀后,以楼船下益州,攻灭东吴,三国一统;隋代取代北周,控制大秦岭,经略巴蜀后,灭南陈,一统江山……

控制秦岭,不等于就能统一中国。

没有控制秦岭,一定不是大一统的中国。

长江、黄河,位于“秦岭—淮河”南北两侧,北面黄河,短而为阴,南面长江,长而为阳。一北一南,一阴一阳,整体构成“太极结构”,实现阴阳平衡。“阴”“阳”可以相互转化。

统一秦岭南北,拥有长江、黄河,才能够真正地稳定、繁荣,称为大国。

地理在中国是经世之学。

东西,以晋陕峡谷间的黄河为分界线;南北,由秦岭、淮河分界。

“地理阶梯”,天然地呈现。西高东低、由西向东俯冲的态势。

从大禹治水起,一统江山者就注意到中国二、三级地理阶梯的重要性。

东周时代,秦、晋、楚三强,依托地理阶梯线,俯冲向东方。

易守难攻。周人的成功本身,就是占据更高地理阶梯。

得益于古蜀、羌族联盟、西部小国的支持,利用居高临下的俯冲态势,击败殷商,主要势力向东,开始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传播。统治核心所在的第二级地理阶梯,维持武力统治的保证之一。

周人族群嫡系和主要同盟的领土,大都在第二级阶梯的黄土高原、关中地区。

在二、三级阶梯分界线的东西两侧,分封燕国、晋国、郑国、息国、邢国、卫国等姬姓诸侯国,组成一道面对东方的防线。防线后方,三门峡、汾河河口等地,都有两个、三个一组的姬姓诸侯防御。北起燕山南麓,南达南阳盆地。

确保主要的通信线路、行军路线掌握在“本家人”手里。

天然屏障。除险峻的太行山外，还包括关中、洛阳东西向的轴线，连接着东西洛阳、丰镐两大据点。通道崎岖、狭窄、林木茂密、高山耸立，有利于防御者出击，却不利于侵略者进入。

蒙古高原和河西走廊。是游牧民族迁徙、融合的内陆海洋，黄土高原是游牧海洋的南岸。不断地融合、征伐，源源不断地产出精兵猛将，保证晋地、关中一带统治者的武力优势。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通要道。南北干线，大同到洛阳、洛阳到荆州的古道；东西干线，沿渭水和南河（灵宝到郑州的黄河）去连云港的道。南北东西，构成一个“大十字”。

围绕“大十字”，合纵，晋楚合纵，连横，齐秦连横。

大禹带领军队，征伐“三苗”部落，中国的第一次大一统。

武王克商、周公东征，中国的第二次大一统。

秦灭六国，中国的第三次大一统，还是从陕西征服中国。

东方色彩。两大民族的对峙独特。

对四周落后的国家民族，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不断地反省、学习中，文德武功，实行“华君夷民”政策，周边民族融合与中原汉人，形成文化上的融合，民族习性发生质的飞跃。

时有战争爆发，总体上却能和睦相处，谁科技、文化先进，谁就占据富饶的黄河中游地区。失败者承认成功者的统治地位，成功者也没有残酷地迫害失败者；文化上互相学习、促进。

最终形成民族、文化上的彻底融合。

在《史记》中，司马迁总结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

辛亥之后，中国的再统一，还是从北方统一一南

有人把秦岭在进入河南后，形成的扇形余脉形容为手指状。再诗意一些，更像仙女散花的纤纤玉指。当秦岭把最为峻峨挺拔的脊梁，留在陕西后，又把所有的婉约、秀美全部留在河南。

方。

蜀道之难，难在秦岭。

巍然突起，地形极为雄伟。秦岭崖陡壁峭，山脉主脊偏于北侧，北坡短而陡峭，河流深切，形成许多峡谷，通称秦岭“七十二峪”；南坡长而缓，有许多条近于东西向的山岭、山间盆地。

山脉艰险，阻隔南北的流通。

探索、修凿、剔石……

无数代先祖为穿越秦岭，踏出一条故道。

遗留蕴涵丰富的历史积淀。

远距离的流动，自然有流动的通道。

中国古代，有两条著名的景观大道。

穿越秦岭巴山的蜀道、经过三峡的川江水道。

中国交通史上，值得骄傲的不仅有横跨欧亚、长达7 000公里的丝绸之路，还有由天梯云栈构成的汉中栈道、巫盐古道。汉中栈道早于万里长城的一项伟大工程，古代先民为穿越秦巴大山开凿出的生命之路。

如诗似画，有史有歌。

既险且奇，有声有色。

文献记载，在6 000年前，就有南北来往的古道。

商周以前秦岭山间，已有穿越秦巴山区的故道。

大禹从汶川到舜的帝都(山西省永济县境内)作司空、生活于崇州的父亲鲧赴中原治水，父子俩先后从成都平原、岷江上游，向北翻越龙门山、巴山、秦岭，到达中原地区治水。

大禹至少两次翻越秦岭，到汉水源头“蟠冢导漾，东水为汉”。

冷兵器时代。控制大秦岭，关键在于交通。

狭义蜀道，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四川、重庆)的道路。

广义蜀道，大关中区域(包括甘肃天水)与成都平原之间通行道路的总称。

大秦岭交通要道，称“秦岭栈道”。自西向东，依次分别是：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东段，还有两个通道：峪谷道、武关道。前四道，穿越川陕，后两道，穿越陕鄂。

川鄂陕三省的古栈道网络。

褒斜道最早开发，经过褒、斜两水河谷，得名。

傥骆道路程较短，仅次于子午道，最难走。

陈仓道路程较长，比较好走，如今的宝成铁路，沿这线路修筑。

子午道路程最短，也好走，因位于长安正南而得名。

还有一条连通陈仓道、褒斜道的短程栈道，称连云道。

祁山道大部分甘肃境内，也属关中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重要通道。

汉中属梁州之域。

《禹贡》记载，大禹时分天下为九州，“华阳黑水惟梁州”。

夏、商、周三代的“王化”之区。春秋战国秦、蜀、楚争夺的地带。

西周王朝的“南国”，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

分割南北。秦岭、淮河一线，隔开关中平原和汉江谷地。

“秦巴咽喉，襟陇带蜀”。

山川形胜独特。北面，横亘高峻险拔的秦岭，与宝鸡（古名陈仓）、关中平原相接；南面，经浑厚绵长的巴山（米仓山）与四川相接；西抵陇山，与甘肃接壤；东连熊耳山、伏牛山，与安康接壤；大巴山延绵于川、陕、鄂边境，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

群山环抱中，生长出南北窄、东西长的盆地。

镶嵌在秦岭、巴山之间。

一派成都平原风光。

不闻气壮山河的安塞腰鼓，不见古老沧桑的巍峨雄城。

长江最大的支流。在两道天险之间，发源于陕西境内的汉水，从西南部的宁强县发源，自西向东横贯汉中全境，在盆地中留下一块广袤的冲击平原，流经沔县（现勉县）称沔水，再往东，安康到丹江口段，就是“清可濯纓，浊可濯足”的沧浪之水，最后，在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

汉中的“汉”、武汉的“汉”的出处。

汉族之称，起于刘邦。

称“汉族”族群之前，名称一直是“汉人”。

《尚书》记载：“江汉朝宗于海。”

“汉”字与“江”字一样，原本用作河流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太多，便以各自的国名区分，鲁国的就叫鲁人，秦国的就叫秦人，齐国的就叫齐人（“齐人之福”）。楚国地处偏远南方，常常被中原诸国，鄙视为“楚夷”。

周朝时，遵循周礼。

《史记》，作用不容忽视。司马迁认定黄帝是天下共祖，各族皆黄帝子孙；宣扬大一统思想，崇尚统一，反对分裂，叙述汉族形成的历史，树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影响极其深远。

“汉人”称谓，始于汉代，沿用至今。

“汉”的起源，在楚汉争霸时期。

当时，天下群雄揭竿而起，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率20万大军于蓝田大破秦军，首先攻入关中（咸阳）。按约定，刘邦应为肥沃之地的“关中王”。

“鸿门宴”。项羽率40万大军，劫掠关中。

气势汹汹。刘邦只好忍痛让出到手的肥肉，退到汉江上游，当了小小的“汉王”。

汉水，亦称“汉江”。

古称宇宙，为星汉。

汉水的流向，与天上银河相同，提到“汉”，就联想到天。

秦巴间有水，形似星汉，称“汉水”；水边有城，称“汉中”；刘邦封汉中，为“汉王”；汉一统天下，称“汉朝”；汉朝境内子民，称“汉人”；形成文字，称“汉文”；所用语言，称“汉语”。

刘邦欣然以“汉中”为根据地，干起了“革命”事业。一统天下，便以“汉”为国号，延续了400多年。

民族的得名，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

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

“汉族”的名称虽始于汉代，民族当中的人民，早于汉代以前就存在。与朝代一样，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大融合，将不同来源、背景的中国人，熔铸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认同。

民族统一，是思想的统一、文化的统一。

诸侯割据，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理念不同，相互辩难，却普遍表现出对大一统的向往。《荀子》记载：“四海之内若一家。”

“大一统”观念，促进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

800多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

秦一统天下，周边各族、各国，开始称中国人为“秦人”。

真正意义上的国民身份认同感，产生在汉代。

因“秦”的统一，武力统一，思想上仍是百家争鸣，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貌合神离，原先六国民众并不认同秦人的身份，统治的时间又短暂，有人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

大一统观念还没有根深蒂固。汉武帝一定程度上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侵扰，致使汉朝民众民族情绪高涨，自我认同得到质的飞跃，国民不再以原先七国属地自称，真正意义上完全以大一统的国名为自我身份认同，凡天下汉朝国土之所在，皆为大汉臣民。

“汉”便取而代之，“秦人”的称呼，被人遗忘。

《汉书》评价刘彻：“雄才大略。”

司马迁评价刘彻：“孝武纂极，四海承平。”

《史记》，作用不容忽视。司马迁认定黄帝是天下共祖，各族皆黄帝子孙；宣扬大一统思想，崇尚统一，反对分裂，叙述汉族形成的历史，树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影响极其深远。

汉武帝推行思想统治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2 000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国家的统一。

身份自我认同的概念，被永远传承。

政治、经济强大的民族，才能促进人民的认同感。除了对思想上的统一，汉朝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成就，更使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愿意自称是“汉人”，以这个身份为傲。

齐头并进。

政治、经济、文化，造就大汉成为盛世王朝。



陆

柒

捌

玖

拾

中原之国人，即中国。

“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周武王话的实际含义：我在殷墟、镐京的中间，建立一个城邑、城郭或国家，自然能够起到安定两地民众的作用。我已经住在中间，治理我的国家，抚育我的民众。你们这些人没有知识，听王来教育你们。有爵位在天，完成了使命，敬受祭享。

“夏”，《说文解字》的释义为，中国之人也。

孔子第32代孙孔颖达解释：“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第三种解释：“夏者，大也。”

懂礼仪的族人，就叫夏人、夏族，统称为诸夏。

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深远影响。

古籍里“夏”，有“中原”之意，区分于四方的“蛮夷戎狄”。

“汉人”的称呼流行前，远古先民都以“华夏族”作为族群名字。“华”和“夏”同意，连发音都一样，互相通用。合在一起时，代指“中国”。

泱泱大国夏朝，人们将文化程度高的地区称为“夏”。直到周朝，才出现将“华”“夏”两字并用的情况，《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夷人、狄人，各方都有。

夷、狄、戎、蛮，并没有固定的地域分配。

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和发展，四个人功不可没。

大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源头和根基，安定“九州”，初定

“五服”。

周公，并下鸟夷，一直到了东方，到了海边。

秦始皇，并下南方的越，到了福建、广东、广西。

汉武帝，开拓西南，统治范围扩展到了云南、贵州。

礼仪之邦。中国人的服饰非常美，属于优雅的国度，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古籍中“华”字圣洁尊贵、崇高显赫，“华夏”合为一体时，展示出的就是大国风范，泱泱华夏。

沿用至今。即使“汉人”一词出现，“华夏族”一词也没有消失。

西周的礼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

历史层累叠加后的产物。

最早，中原指天下至中的原野。

逐渐演变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

黄河中下游地区所代表的中原，不是诞生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古中原”。

“中原”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意为原野，原野的中位。后在典籍、文献中出现，内涵逐渐改变，范围逐渐扩大，在历史事件中的出现频率逐渐增加，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诗经·小雅》记载，“兽之所同，麀鹿麀麀；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中原”，通过诗句描写的场景与动植物可以看出，一个河流湖泊纵横、鹿群遍地的广袤平原中的沼泽地区。

“漆沮”，关中北部的漆水、沮水，渭水支流的石川河，也称“姬水”，黄帝部落的重要活动区域，周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黄帝、周族都以“姬”为姓。指的是“关中平原的原野”。

“中原有菽”。中原是一个产豆类作物的地区，不同于北方产粟黍；“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两者都是南方昆虫，说明“中原”处于南方水稻主产区，也生产大豆类作物的南北交界地区。

古“中原”的原始自然环境，既不是干旱少雨的黄河流域，也不是长江流域地区。能同时具备上述情景的地理环境，只有南北气候分界的淮河流域——淮河以北的淮北平原。

上古历史名词，华、夏、南、淮、夷、天下、中国、中华，同义。

中国与淮夷、南淮夷同义。

《诗经》形成于南淮夷地区。《民劳》中，有“惠此中国，以绥四

方”，《荡》中，有“女媧怒于中国，斂怨以为德”；《桑柔》中，有“哀恫中国，具赘卒荒”。“中国”特指淮河涂山的淮夷地区，也是古“中原”的原始所指。

狭义“中原”，专指关中平原，随着周文化的传播，包含关中（陕西）、晋南和豫西。洛阳以东，不属于中原。唐代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文明，让位于以北京、南京、开封、杭州为中心的运河文明。清代以来，“中原”泛指“汉地十八省”“北方农耕区”，也代指整个中国。

广义的“中原”。《辞海》解释，“黄河中下游汉人居住地”，包括关中、陕北、宁夏、甘肃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含北京）、山东西部、河南、安徽、江苏淮河以北地区。

长江、黄河，中国的大“两河流域”。

渭河、泾河，中国的小“两河流域”。

夹角周原，华夏族的祖根地，中华文明之基。

文明不是单一的工业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发展程度。

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历史沉淀。

不同文明，有纵向的传承、横向的融通与纵横的互动。

南北融合，内外“双循环”。把古蜀、江汉、长江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把北方、中原和黄河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两者最终在中原汇成一脉，形成今天的华夏文明。

汉朝威名远播中外，汉人也因此得以扬名天下。

对于邻国的骚扰，更是发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树立了“汉人”前所未有的尊严。

政治上，汉朝开始给百姓编户，发放“身份证”；经济上，扩大商业交流，促进农业生产；军事上，击败匈奴，版图变得辽阔，威名远播，甚至连遥远的古罗马，都知道这个东方的强国。

威名远播。十分强大，军队又以勇武著称，外族人便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匈奴人常称赞汉人为“好汉”。

即便出现大唐盛世，曾短暂自称为“唐人”，依旧没有磨灭“汉”的称号。西方各国仍称唐朝使臣为“汉使”。

无论文化，还是历史，奠定汉朝国号作为华夏民族族称的基础。

汉族，把历史上不断进入中原的民族，融合到汉族中。

文化概念，不是血统概念。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左传》记载孔子的话语。意思是，除了血缘外，还要看文化的认同。通过思想的统一，以达到政治的统一；通过军事的统一，以达到版图的统一；通过文化的统一，以达到天下的统一。

入中国者为汉，入夷狄者为夷狄。愿意学习并发扬汉文化，为立身之本、行之准则的人，皆可算作汉人。汉人不是由单一部落发展而成，而是兼并诸多部落，形成的一个庞大群体。

5 000多年来，历代先人能够守住这片沃土，传统文化的滋养、凝聚，作用不可替代。人们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都认为自己是华夏子孙，才能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

历史上，也出现过外族入主中原，也都能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

华夏民族与华夏文化，历经4 000多年的政治变迁，统治中心的不断迁移，对华夏民族身份与华夏文化的认同，一直是中华大地上各地区人民共同的、唯一不变的认同。

精神纽带。“文化认同”，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

比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族群认同等，具有更深的内涵。

“天池大泽”。汉水上游略阳一带，有巨大的山间水道型湖泊，河道大多通航，交通便利。从汉中，逆流而上，舟行可抵达陇西入陕；顺流而下，行船可一直抵达荆楚，至东海。

联系陇南、汉中、荆楚间的重要通道。

精神纽带。「文化认同」，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比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族群认同等，具有更深的内涵。

顶端的关中平原，上游的汉中盆地，中游的南阳盆地、襄宜平原、下游江汉平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水稻农业区，还以南北交会、地居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有“江河淮汉”“维天有汉”之说。

连接中原、西南、岭南间的必经之地。

孟子用“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论述天下大势的治乱顺逆。

大禹从蟠冢山疏导漾水，东注汉水。茂密层林间，还能见到被古人认为是“汉江源头”的石牛洞，洞中横卧着石灰岩受流水侵蚀形成的“石牛”。大禹北上治水，牵来的“镇水神牛”。

南北文化，在古汉水一带，争夺与融合。

地缘，南北纵向，川陕之间的枢纽门户。

东西横向，有陆路和水路连通甘肃、湖北等。

既占有天然的地理交通特殊位置，还拥有气候、物产优势。

汉中不南、不北，冬暖夏凉，四季分明，稻麦两熟；大河横贯东西，汉江、嘉陵江流经，构成丰富的水系；群山四方环绕，土地肥沃，美丽富饶，“气候居南北之适中，物产兼东西之共有”；空气质量绝佳，养育出“一笑亡国”的高冷美人——褒姒，衍生了“烽火戏诸侯”的史话。

烽火台用的狼烟，应用到军事上，在秦汉时期。

周幽王娶来自申国的王后，生太子宜臼。

又娶褒姒，生了伯服。

周幽王宠爱褒姒，想废了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

公然破坏嫡长制行为，在极为重视礼乐的周朝，天理不容。

宜臼一看大事不妙，出逃到势力还比较大的舅家申国。

先下手为强。周幽王宠爱褒姒、伯服，害怕申国，一不做二不休，和伯服一起带兵攻打申国。无法和周王室抗衡，申国的盟友曾国，去联合西边的犬戎一起反击。

犬戎没想一锅端了西周王室，实属“用力过猛、误操作”。

周幽王更没料到突然会杀出犬戎军队。

公元前771年，正值周幽王统治的第11个年头，被杀。

梦魇之地。天子所住的中心之地，已成民众不敢面对的梦魇之地。男女老少在戎族的铁蹄之下，死的死，逃的逃，曾经无比信服的

周幽王，也在战争中身首异处。

大肆抢掠。犬戎满意地带着周幽王的宠妃褒姒退却了。

夕阳如血，镐京城外，骊山上的烽火台，依然在熊熊燃烧，滚滚浓烟还在向天下诸侯，传递着镐京生灵涂炭的战事。军队撤离后，徒留无数个烽火台，在寒风中无助地耸立着。

犬戎攻破镐京，带走褒姒，把周天子拉下了神坛。

镐京被洗劫一空，犬戎也退却了，生活却还得继续。

春秋乱世，就从犬戎攻破镐京那一刻，正式拉开序幕。

西周灭亡后，宜臼并没有顺利登上王位。宜臼和朝廷对立，大臣们拥戴周幽王的弟弟为王。叔侄之间又展开长达21年的战争，最终，在晋国国君的支持下，宜臼获胜，是为周平王。

落败的天子不如侯。跌落神坛，被周幽王废掉的太子姬宜臼，战战兢兢中登上王位。镐京已经残破不堪，根本无力抵挡犬戎的二次进攻，周平王决定把都城东迁至洛邑，中国历史迎来东周时代。

《清华简·系年》记载：“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界，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原太子宜臼继承王位，是为周平王。

次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由镐京向东迁至洛邑（河南洛阳）。

史称“平王东迁”。

春秋战国的历史正式开始。

政治斗争不断激化，还是实力说了算……

关中地区本是周王室的发家福地，东迁后，就把这块地拱手让给秦国。数百年后，正是自己无暇顾及的这块地，孕育出了让天下闻风丧胆的强秦，最终，周王室也倒在强秦的脚下……

褒姒，历史长河中，因昏君无道而导致亡国，一个最冤枉的替罪羊。

中国历史开国，一般没有女人的事。

只要一亡国，必定要扯出个美女来。

《史记》中，记叙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吕氏春秋》版本则为击鼓戏诸侯，“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不管点燃烽火，还是擂击大鼓，都只能应用在相邻城市之间的示警。

不可能传到很远之地，能让各路诸侯同时看到预警，并来勤王

中国历史开国，一般没有女人的事。只要一亡国，必定要扯出个美女来。（褒姒）命运跟妲己、西施类似，政治牺牲品，一如所有政治联姻的女子，一颗普通的棋子，如果不是遭遇亡国的危机，也不会在大浪淘沙中，被历史留下痕迹。

救援？

《史记》，一部历史作品，也是一部文学名著。

司马迁在撰写两周历史时，曾经感慨文献严重不足。唯一比较翔实的《秦纪》，也是“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不少“空白之处”，只能发挥文学家的文采，进行有底线的渲染。

为表现褒姒“亡国妖妃”，在“烽火戏诸侯”前，还“加”写一段故事。

曾有两条神龙，降落在夏帝的院子，说“我们是褒国的两位君主”。

夏帝开始占卜，根据卜者的要求，收集龙的唾液，放在木匣中保存。

夏朝灭亡，木匣子传给殷商，再传给周朝，直到周厉王打开盒子，结果，龙的唾液留到庭院中清除不掉，变成黑色的蜥蜴，进入后宫，被一个8岁的小奴婢遇到，在15岁时怀孕了。

生下一个女孩，小奴婢将其扔掉。

到了周宣王时期，有童女唱，“檠弧箕服，实亡周国”，卖桑木作的弓箭之人，即灭亡周国之人，周宣王发现有夫妻在卖，派人追捕，夫妻逃跑的路上，看到了被小奴婢遗弃的女孩，就收养，一起逃到褒国。褒国后来得罪了周王室，为了赎罪，把长大的女孩献给周幽王。

这，就是褒国公主褒姒。命运跟妲己、西施类似，政治牺牲品，一如所有政治联姻的女子，一颗普通的棋子，如果不是遭遇亡国的危机，也不会在大浪淘沙中，被历史留下痕迹。

“地形连楚阔，山势入秦豪”。

农耕基地，具备养民、屯兵，支援军事的有利条件。

相比于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

“风气兼南北，语音杂秦蜀”。

深居陕南，却深藏江南特有的妩媚与灵气。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反映了古人对汉水的赞美，对生活的憧憬，对美好的向往。

秦始皇以“汉水游女”为女神，立祠于汉中祭祀。

屈原将汉水女神转化为“湘君”“湘夫人”，纳入文学的畅想中。在汉代扬雄、马融、张衡、王逸，魏晋时期的阮籍、陆机、何逊，唐宋时代的李白、孟浩然、苏轼等的文学作品中，作为汉水女神的“游女”“汉女”，都是寄情的对象。曹植在《洛神赋》中，将“汉滨游女”“南湘二妃”与他心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宓妃，相提并论。

汉中中间是汉中平原，四周是崇山峻岭。

与成都平原相同，四周有山川之固。

适合关起门来过日子。

两个大平原，沃野千里，天府之国。



陆

柒

捌

玖

拾

战国是“风起云涌”的时期，许多诸侯国都是“外循环”，将“中国”的范畴，拓展到更远的地带，直接与逐渐强盛的北方游牧民族形成对峙，开启一段全新的历史时期。

向西扩张，与西戎交手，强敌多为半农半牧的游牧部落。

往北，到达六盘山，有的诸侯国已经与匈奴交手，开始修筑长城。

长城最早修建于春秋首霸齐国。《史记》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至东海。齐宣王时期，长城工程就已开始，全长达600多公里，防御周边诸侯国的入侵。被誉为“长城之父”。

赵国、燕国也都已经形成自己的长城。

《史记》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在长城沿线，修筑坚固的关隘，守卫的军队就地屯垦。虽然短时间内，会引起国家的经济压力，但从长远看，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成本上，这条坚固围墙的修筑费用，远远低于从中原调集粮草的高昂运输成本。只是，规模宏大的高墙，既断绝了极寒灾荒年代匈奴南下掠夺的机会，也灭杀了中原政权北上与草原部落贸易的欲望。

随着战国格局的到来，秦国与其他诸侯国一样，更加重视第二级地理阶梯……

地缘格局和文化遗产，深刻地影响了秦国的发展。

秦国是东周的开国诸侯。

诸侯国当中历史底蕴最浅、建国时间最短。

痛则思变。在公元前361年，秦国走上“变法”强国之路。

“孤秦”图强。“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七国诸侯，唯有秦国在黄河与崤山以西，经济、文明程度，较山东六国低得多。

“国际弃民”。秦国被排斥在“中国”以外，被当作“夷狄”。

为融入中原文明，摘掉戎人的帽子，秦国学习周朝礼制，安抚周朝遗民。

穷则思变。秦孝公发布《求贤令》。

只要谁能有计策，让秦国强盛起来，就做高官、封爵封地。

官员，需要识字，才能使行政文书系统运行。

能识字的人，多在中原地区。秦国地处西北，离中原较远，人才缺乏。为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面向国际社会，只有“外循环”，大力吸引中原的人才。

在原先分封制下，只有贵族识字，文字只在铸鼎时才用得上。

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都是各国的王族，依靠封地取得收入，才有资本，养活众多的文人当参谋。分封的官员已属居次要地位。

真正的行政官僚成主要力量。

铁器、牛耕日渐普及。

百姓不需要依附贵族庄园，成为独立的自耕农。

如何处理与自耕农的关系，是国君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相对于依然采用分封制的国家，魏国能动员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它们。春秋时期打仗，几万人参战，规模已经颇大。战国时期，动辄十几万、几十万人厮杀。

长平之战，秦赵合计投入兵力，超过百万。

变法，使国君能够动员的力量，相对于分封制时期大大增强。

政治上，战国形成分封制为辅、郡县制为主的结构。

“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都是礼贤下士、结交宾客之人，以养“士”著称，收养几千门客。对内，维护自己的势力以对付政敌；对外，与敌国作政治、军事上的斗争。除春申君以外，其余三人皆是君王后代，合称为“战国四君”。

春秋战国时期，500多年打了500年的仗，人才济济，人才流量巨大，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人有着各自的梦想，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想找到赏识自己的君主施展自己的才华，建功立业。

生产力的发展，贵族制瓦解，识字的人逐渐走向社会。文字的载体也变成竹简。比起青铜鼎来，容易携带、成本也低，进一步使文字、知识向社会渗透面扩大，社会人才多了起来。

“筑巢引凤”。好政策，产生人才的“洼地效应”。那些在山东诸国找不到机会、大材小用、受排挤的人才，纷纷来到秦国，商鞅、范雎、蔡泽、张仪、甘茂、姚贾、李斯等人，都是大才。

秦国也不食言，给高官位、高待遇。

“外籍人才”。除受重用、待遇高外，还获得秦王的格外尊敬。

秦昭王除封范雎为侯外，还公开对外宣称：“齐桓公得管仲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雎进宫每次都由秦王专车接；范雎到王宫，秦昭王都亲自起身迎接，并且还谦虚地向范雎行礼。

秦王嬴政，对吕不韦的尊敬达到了极致，称其为“仲父”。

主政后，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甚至容忍别人对他不敬。

想见善于搞间谍活动、敢于直言劝谏的顿弱，顿弱提出：如果见面不用参拜，就可以见，否则就不见。竟然答应。顿弱也很有谋略，向嬴政提出了经略东方诸国的建议，嬴政采纳。然后，顿弱亲自出马执行自己的策略，分化瓦解东方各国内部势力，为秦灭六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鬼谷子的弟子尉繚，曾经对嬴政语出不敬，并叛离。

嬴政反把他请回，封为国尉，见面时都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让尉繚与自己一样。

秦国几代君主都能善待人才，尊重、重用并信任人才。

等到统一天下，嬴政从国君变成皇帝。

嬴政认为自己功绩“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就

叫“皇帝”。同时规定：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创始皇帝称号，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很受用，全部一字不改，照抄下来。

秦始皇喜欢秩序、规则、精确和统一，推崇用严刑峻法治国，统一文字、度量衡，连皇帝的称号都要按顺序排列好。身上体现了典型理工男、秩序控的倾向。

人才，达到目标的工具，价值体现在实现目标前。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天下已经没有对手，发现没有必要像原先那样对待人才。尽管没有杀功臣，但对人才的态度已今非昔比。秦国君主与秦始皇的用人策略，彻底的实用主义。

天下无事，人才也不需要，一切听命令就行。博士，无用了；诗书，无用了；说话刺耳，贬黜或杀掉。秦始皇变得志得意满、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彻底暴露出完全实用主义的底色。

人才雇用的规则与市场经济原理相通。

多个雇主的市场上，人才可以自由进行选择；雇主为得到优秀人才的青睐，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工资高、福利好、提供房产之类的。供应多、需求多，供需双方择优互相选择。

最终，必定有某个雇主得到的优秀人才最多，在竞争中最后获胜，对手纷纷被打垮，破产解体。优胜者摇身一变，成为唯一的雇主，垄断整个人才市场，完全变成买方市场。

春秋战国时期，500多年打了300年的仗，人才济济，人才流量巨大，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人有着各自的梦想，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想找到赏识自己的君主施展自己的才华，建功立业。

从列国到大一统，人才面临的就是一种局面变化。

市场完全没有竞争，买方（皇帝）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垄断会导致王朝决策低劣、腐化堕落，将加速王朝的灭亡，这使人才又能迎来竞争性市场。帝王任用人才，天下治理得就更有效，王朝也更长久。

反之，天下会快速衰落、灭亡。

人才地位升、帝王地位降，天下得治。

人才地位降、帝王地位升，天下将乱。

进入乱世后的群雄或帝王，不得不再度任用、尊重人才，开启一个新的轮回。中国社会就像市场那只无形的手，当市场供需发生严重矛盾时，能让市场重新恢复、调整供需平衡状态。

中国古代人才与帝王博弈的模型。

在重点人才引进中，秦国主要接纳来自东方的改革家、军事家与外交家。

秦国所有著名丞相，几乎都是“外聘”。

商鞅入秦，年方“而立”，却已洞悉宫廷钻营术。首先，结交秦孝公宠信的宦官，“走后门”得以见君主；然后，依次拿出称帝、称王、称霸三种政治设计。秦孝公特别钟情“强国之术”。

“卒用鞅法”。

司马迁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

文化独特。秦国融合西戎，注入草原文化，百姓淳朴忠厚，尚武团结，“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楚文化远比秦文化更人道、宽容。

秦国地处西北，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

用“亩产”换算当时的生产力，每亩地产量还不到十公斤。粟米“亩产一斗”的产量并不高。“一斗”计量单位，认折合成现在的度量衡，也仅有6.25公斤。

“诸侯卑秦”。孔子周游列国，有个重点是楚国。“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欣然前往。周游列国，却西不入秦。在孔子眼中，秦国是“蛮夷之地”，不可能实行“王道”。

中原国家渐渐改变殉人的风俗时，秦国却变本加厉。

秦武公死时（公元前678年），殉死者66人；秦穆公死时，殉死者多达177人，创历史之最。

明显缺乏楚文化的创造性。很难产生屈原那样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巨匠，《楚辞》这样的鸿篇巨制，也无法产生像庄子这样洒脱飘逸，或老子那样深刻复杂的哲学家。

屈原自杀，对楚怀王的抗议。

中国历史上士权对君权的一次著名抗议。

“士权”，华夏政权的核心概念。

“天地君亲师”，五权之中，天地是立法权，代表道统、民意。

天地由“土”来解释、总结。

主权在民，但不是“劳动人民”自己表达，而是“天道”“天理”来表达。

师是教化权。治权在君、教权在儒。

“士”的成员包括：“记者”（史官，朝廷官员），言官（朝廷官员，政府两大体系之一），“无官御史”学校师生，“天下无道则处士横议”的处士（无官的文化人）。

君主无权干预新闻出版，无权干预学校。

周文王为了灭商而建立“辟雍”，以“六艺”教授青年士子。

华夏文明具有了鲜明特色：“士”。

法家学派，围绕着君主利益的圆心，建议从人的劣根性出发，推行严刑峻法，把人当成动物一样管理。如同西方的马基雅维利思想一样，法家不追求公平正义，只追求现实功利。

法家文化只有在秦国那片粗粝的土地上，才能开花结果。

楚国属于青春叛逆型，文化发展自成一体。

在审美上追求瑰丽新奇，有着充沛的创新意识。

楚人喜欢筑高台，着奇服，好细腰，戴切云冠。出土的楚文物共同的特点，色彩富丽，线条流畅，造型独特，飞扬恣肆，富于想象力，出奇制胜，出人意料之外。

野蛮却是最有力的武器。

如同历史上许多时期一样，文明不再是国家的护身符。

春秋时期靠近异族的国家都强盛，腹地的国家大多国力较弱。齐国边上有莱夷，秦国、晋国边上有戎狄，楚国边上有黎族，吴国边上有粤族，这五国周边都有异族威胁，因竞争磨砺而强大，也容易“外循环”，开疆扩土。

国与国之间以杀伐为主。

楚国很难真正与中原地区融合，文化发展自成一体，站在战国文化的最高峰，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秦国选择虚心学习，楚国选择高冷傲娇，最

楚国很难真正与中原地区融合，文化发展自成一体，站在战国文化的最高峰，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秦国选择虚心学习，楚国选择高冷傲娇，最终，也导致了两个国家不同的结局。

终,也导致了两个国家不同的结局。

商鞅变法,首重取信于民。

信者,诚也。《论语》开篇,记载孔子与弟子的语录,出现六个“信”字,特别强调“信近于义”,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相互信任是交友结盟、治民睦邻的第一要义。

成功诀窍。不是法治理论的首倡者,却是法治实践的表率。法,制度的总称,变法,就是变革传统政治体制,“法”一立,就不容动摇退缩,“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

商鞅变法,绝非取消身份、等级与相应特权,而是将血统贵族体制,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辈,已在局部实施的军功贵族体制。取消的贵族特权,只是打破凭借“龙生龙、凤生凤”的血亲关系,生而富贵的寄生性世袭特权,代以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的特权体制。

建立军功授爵制度,论功赏罚。

秦国士兵砍下敌军一个首级,就能获得一级爵位、几亩田地以及仆人。

变法初令,似属创新,实为复古。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辞辛苦地追溯秦始皇祖先的发迹史。秦始皇祖先原是替周天子养马的家臣,靠牲畜繁殖,对付西戎有军功,拜爵封侯。商鞅以“法”,帮助秦孝公重振秦穆公霸业的光荣。

商鞅变法,法治思想与政治文化融合的典范。

土地国有,始于商朝的井田制。

中国最早的“土地国有+集体固定耕作”。

国家租给农民耕种。《商君书》记载:“訾粟而税。”

訾,量;税,地租。国家根据田亩总收入,收取租金。

“国之所以兴农战也”。

富国强兵。商鞅变法的重点,是实行“农战”政策,经济改革的核心在废井田、开阡陌,从法律上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改革,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军事发展最核心的问题。稳定的后勤保障、源源不断的兵员供应,以适应战国 农即战,农战结合,基本国策。

堵死“农战”以外的任何出路,勤勉地安心农耕。

减少爵位对农耕的影响。《商君书》介绍:“无以外权爵任与官,

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秦人想通过非军功的渠道获得爵位，就必须纳足够数量的粮食。国家既能获益，又不会减少民众对耕种的积极性。《商君书·农战》又规定，商人不得以私人名义买卖粮食，禁止囤积牟利，保护农耕。

在秦兵的眼里，只要砍一个脑袋就有一份功劳，会被折现为土地和官位。长平之战后白起杀了赵国40多万投降的士兵，在秦国的体制下，再正常不过。一方面，没有粮食给他们吃；一方面，人头值万金。

《商君书·垦令》十分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商鞅制定的征税标准明确无误，一定程度上减少官吏从中克扣的可能性，官吏就无法恶意加征。国家的公信力更高，农民对国家的归属感更强。



秦人在“做梦”，蜀人在“发财”。

此消彼长。秦国崛起之时，古蜀国却躺在“舒适区”里，惯性地忽略掉军事力量的培养，成了“温水里的青蛙”。

秦国兵民合一。

人人各自为战，农时务农，战时出征。

男人上阵下地，女人做饭洗衣。

全民皆兵。战争成了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

措施是“农”，目的是“战”。

“农战”关系中，战争胜利的基础，是农业发展。商鞅变法优化了功勋制度，将“令民归心于农”，看作治理国家、富国强兵的第一要务，农民能够全力以赴地耕作，为战争提供最为核心的保障。

《商君书》记载：“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故令民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相辅相成。“农战”核心在于重农富国，重战强兵，缺一不可。对内全心于农业，尽力务农，辟草垦田，多致粟帛；对外勇于作战，开疆拓土，才能成就“富强之功”。

每临开战，各地以村里乡党为单位，自带老碗干粮，自备锣鼓家使集体出征，秦国建立领功授爵的机制，为国功大者位尊，使每个秦军将士既有爱国之心，又有封侯建功之举。

战争机器。

秦国的每个人都拧在机器上，成为一颗不容松动的螺丝。

“南郑之争”，一场攸关秦国和古蜀国双方生死的重要



陆

柒

捌

玖

拾

战争。

措手不及。古蜀国靠剑门山区的葭萌关隘，暂时阻挡了秦军南下。

古蜀王集结兵力反扑。

秦国在南郑修筑城墙，秦国重兵把守，史称“秦左庶长城南郑”。

十年后的公元前441年，付出巨大代价后，古蜀国才将汉中艰难收复。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南郑反。”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格局，棋盘型格局。

中原为中央腹地。

四角，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边，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

秦蜀咽喉。汉中，对南北政权分合影响重大。

得汉中，南北一体；失汉中，南北对峙。

关中、巴蜀共享的天然门户和缓冲地，南北政权的重要衔接带。汉中为南方政权所控制时，双方往往以秦岭攻防天险；汉中为北方政权所控制时，南方政权只能凭大巴山防御。

东西延伸。西出甘肃，东贯湖北，联通长江流域。

东西横贯，比较顺畅、开阔；向南北，要翻越秦巴高山。

“得陇望蜀”。陇西地势高于关中、巴蜀，下攻二地较易。

汉水自古是沟通陇西、陕南与华中地区的水路。

与张仪同出自鬼谷子门下，同学纵横之术的苏秦，在策划“合纵”时，谈到秦国自汉中、下汉水击楚国郢鄢之地的便利：“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汉水，素有“千里汉水黄金道”之称。

“益州咽喉，若无汉中，是无蜀也”。汉中之险，在于联结成都、雒城（广汉）、剑阁等地，形成首尾相接的阶梯级纵深防御体系。三国之所以能“鼎立”，蜀汉就是依靠汉中与成都的连通。

汉中，夹在两大豪强中间。

命运多舛，北边是秦国，南边是古蜀国。

今天被秦国占领，明天又被古蜀国攻破。

商国与古蜀国的战争，多发生在汉中。

随后，秦国与巴国、古蜀国，多次发生冲突和拉锯战。

公元前451年，楚国势力北扩，置汉中郡（郡治在今安康）。

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

秦国曾对汉水上游一带，有过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几度占领汉中，大都无功而返。古蜀国再次凶猛地反攻。守城一方与攻城一方。

“汉中”之名，始见于史籍。尽管位于汉水上游，但“地名漂移”之称，沿用至今……

秦国曾对汉水上游一带，有过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几度占领汉中，大都无功而返。

古蜀国再次凶猛地反攻。

守城一方与攻城一方。

高大坚固的城墙，野外的军营寨门、长短不同的刀枪、方圆不同的盾牌、战场的高大树木、双方统帅的指挥所在，军书卷轴摆在案上。双方武士，横着棱口，下颌轮廓、颞弓线条分明，显得气氛凝重森严。双方将领，脸形瘦削，眉弓突出、双目圆瞪，眼轮匝肌夸张突出，表情肃穆深沉。详实而精细，四川一收藏家一套保存完好的古蜀国玉兵阵器物，“记录”了战争场面。

无所不用其极。

除疆场上金戈铁马的壮丽豪迈，也有草庐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诡诈奇谋。

战场上，率军将领不需披坚执锐，骑马肉搏，但必须会运筹帷幄，排兵布阵。阵法运用，将领重要的基本技能。古蜀国参与的战争规模宏大，气势非凡，军事实践、军事理论都比较成熟。

“蜀有褒汉之地”。

古蜀国重新夺回汉中，划沔中（汉水上游）与葭萌地为苴国，建宗藩。

在《史记》中，司马迁又记载：“蜀取我南郑。”

又再次占据优势。秦国势力退出秦岭以南。

汉中南北有秦岭、巴山两个巨大屏障，成为扫视天下的障碍，视野和发展空间自然受限，难以达到大开大合、长驱直入的军事效应。这，也决定了汉中的回旋余地有限，容纳体量狭小。

获胜的古蜀国，沉浸在骄傲中。10年大战的消耗，不愿再去冒险。收复汉中，并没有作为战略平台，

只当作不毛之地。根本没有打算作为胜利的水陆“通道”，一鼓作气歼灭邻国秦人……

“远交近攻”。开明一世、二世和三世都曾经骑着战马，带着强大的军队，手持剑钺，通过强弓、硬弩和锋利的青铜兵器，在古蜀国四面八方的边境上冲锋陷阵，为发现的“新大陆”前赴后继，不断拓展自己的疆土，不仅保有“褒斜前门”，越秦岭，达到渭水平原，一直进逼到秦国都城……

“帝以会昌，神以建福”，颂词不是偶然唱起。

“攻秦至雍”。开明二世“生保子帝”。

“保”应作“褒”，即殷卜辞中的“缶”，地在汉中褒城。

开明三世“保子帝”，即以褒为名，陕南汉中盆地一带，已全入古蜀国的北部版图……

东界已过嘉陵江，进入长江流域，势力远达鄂西的清江流域。

古蜀国强盛时期，已经具有衣冠楚楚、队列整齐、军旗飘舞、骑着高头大马、手握制式兵器的军队。玉马健壮阳刚，昂首立耳，平身翘尾，四肢刚劲有力，张口露齿，好像正在嘶鸣。

富有张力，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马是六畜之首，古蜀国强大的军事装备。

战国以“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等马拉战车数量的多少，来形容国力强弱。君王将帅以拥有骏马为荣。周穆王拥有八骏；汉武帝为取得大宛汗血宝马，曾经两次远征大宛。

《山海经》记述的天马，“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

古蜀时代，战车的价值就等同于现代的重型武器。成语“万乘之国”中的“乘”，指以战车为核心的“百人队”：4匹马拉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

在广袤的成都平原上，战车可以高速行驶，冲散敌人阵型，步兵再跟上挥戈“收割”人头。

古蜀玉器中的骑兵图案，正是古蜀强盛时期的展现。

立体“玉兵阵”，再现了古蜀战争场面。

阵法，古蜀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作战形式。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并不是拿着刀枪冲上去一阵砍杀。孙子兵法中强调“六如”，“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

动如雷霆”，就是要说明阵法操练的最高境界。

强大的军队，除要能够把阵型排得整齐之外，还要做到行军时阵型不乱，面对强敌冲锋时阵型不散，进攻敌军时迅速而阵型不疏。面对不同敌情、地形时，阵型能够快速变换。

强行突击。锥形阵，古老的阵法，前锋如锥的战斗队形，必须前锋尖锐迅速，两翼坚强有力。通过精锐的前锋在狭窄的正面攻击敌人，突破、割裂敌人的阵型，两翼扩大战果。

雁行阵。模仿大雁飞行编队的一种阵法。骑兵的雁行阵，用于快速突击对面敌人的两翼薄弱部位，步兵往往用雁行阵克制敌军的正面冲击。先用横阵面对敌军冲锋面，迅速展开雁行阵。

马其顿方阵，在古代西方军队中最有名，由4 096名步兵组成战斗方阵，每一个方阵都可以独立作战。方阵中步兵携带长约4米的马其顿长矛、一个直径0.7米的圆盾。

精髓在于士兵同心协力、齐头并进。

临阵脱逃者，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民间收藏的另一幅特大圆形阴刻古蜀文化石板画。

有短兵相接，搏斗厮杀、人和马中箭倒地的画面。

有城墙口守卫站岗、士兵整队待发的画面，还有挑水、煮饭、休憩、习武，以及由长官带领众人双手高举牙璋，跪向纵目大耳人面具，祈求保佑的画面等。

画上共涉及各种人物92个，牛、马、鹿、象、鱼、鸭等近20个，还有多幅表现中国最早渡河工具独木舟的画面。圆形石板画背面，阴刻的一条龙。

在押送俘虏、抬运伤员的玉版画上，有古蜀国人拉弓用箭，射天上的鸟、太阳的图案。

古蜀国的各种形状的箭簇，一个共同特点，在于箭簇底部形状为正三角的倒刺。

让敌方人马被射中后把箭拔出时，会扩大创口面积。

水战，场景壮观。

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战国时期的嵌错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从铜壶画面第三层刻画中，古蜀国激烈的战争场景，攻城之战惊心动魄。

横线代表城墙，斜线代表云梯。守城的一方，有弓箭、礮石、长戈、短剑等；攻城的一方，有云梯、长矛、长戈、短剑。攻的一方处于下风，有的已身首异处，有的从云梯上摔了下来。

图像珍贵。春秋末期，水军是刚形成的新军种。

两条对攻的双层战船上，飘扬着战旗。

左船的战旗，用织物制成，旗上的圆点，表示着最高指挥官的级别。

右船的战旗，用鸟羽修剪、编缀而成，称为旌旗。

上层的士兵正在厮杀，手持长兵器的或刺或钩，持短兵器的近体肉搏。

右船有洒水的士兵，伺机破坏敌船或登敌船格斗，夺取敌船。

左船尾部有人擂鼓助战。

先秦时，称水战用的楼船为“楼舡”。

秦代，称水军为“楼船之士”。

手握制式兵器的骑兵。民间收藏多匹古蜀文化的玉马，或昂首嘶鸣，或低头沉思、或奔走、或静立，马尾或下垂，或打结，皆表现出生动华丽且充满活力的神态。

玉马大都体型丰硕，骨健肉丰，四肢轻捷，小耳小眼，机灵明敏，洋溢着神骏之气，放射出刚烈倔强之威。

玉马通高35.4厘米，长32.5厘米，造型肥硕，臀部大，颈部宽，眼部多刻成三角形，眼睛圆睁。这样的细部镌刻，显示出马的内在精神和韵律，体现了古蜀国繁荣昌盛的景象。

古蜀王出征时骑兵护卫队，当时的战争场景。

马既是战场上的勇士，又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

战场信息的获取与传递，主要都是依靠骑兵来完成。

由骑兵进行侦察活动，将侦察的情况回报主帅。主帅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得出下一步采取何种行动的判断，再派遣骑兵传达命令给分散在各地的军队，各支军队再根据命令进行相关的行动。

骑兵还能“遮其粮食，绝其军道”，“败其津关，发其桥梁”，破坏敌军物资运输的通道、毁坏重要的桥梁道路，获取战场交通的主导权，决定在何时何地敌军开始作战。

“败其携带，出其不意”。

“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

甚至，还组建“特种部队”：战象。

象的庞大体积、重量优势，被广泛使用于古代世界的战场上，包括波斯、埃及、塞琉古、安条克、帕特亚、斯里兰卡，甚至中古欧洲查理曼、腓特烈的战争中，都有战象的使用。

战象骑兵，广泛分布于古代欧亚、北非的常见兵种。《亚历山大远征记》记载，印度人用200头战象配合300辆战车、4 000名骑兵与3万步兵，阻挡号称“世界征服者”的亚历山大的军队。

大象广泛见于上古时代的中原。大舜“象为之耕”，舜将大象用于耕田。甲骨文中常见“获象”的记载，最多一次捕获了250只野生象。经过驯化，野生象就能广泛投入使用。

殷商在修建宗庙等大型工程时，使用驯化的大象，搬运木材等建筑材料。

顺理成章。既被用来耕田、运木材，也被用于战争。

周公东征，驱赶商人的战象部队，创作了《三象》乐舞作为纪念。

春秋晚期，楚国还用大象攻击吴军。到战国时代，野生象逐渐绝迹，《韩非子》《战国策》中只提到“死象之骨”“白骨疑象”。战国初期的中原大地，只剩下大象的骨头遗迹。

比中原地区纬度更靠南的成都平原，存在野生大象。

成都金沙遗址象牙本地所产。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当时的长江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有大象存在。晚于古蜀国2 000多年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征南中，就用大象作战。

古蜀国各大氏族、部落之间或联盟、或争斗、或迁徙，中途没有停息过。

古蜀发展史，就是古蜀人为了生存与发展的战争史。

战争只是一种政治行为，古蜀国王以其政治智慧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战争并非贸然发动，战争前，双方必然都经过精心策划，考量各种后果，才做出决策。战争里存在着理性的因素。

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决定着投入战争的力量，决定着宣战、媾和的时机。

偶然性与必然性，也此消彼长。

政治目的达到，就意味着获得实质性胜利。

古蜀国与变法前的秦国、甚至是变法后的楚国交战，并不吃亏，甚至还一度占优。

奴隶制发展，已是强弩之末。

因循守旧。“古成都人”没有变法，固守富饶的成都平原，也没有走上封建制的道路，与楚国交战，竟能旗开得胜，一度还咄咄逼人。南郑抗秦，东征楚国，多为被动的“反击战”。

中国以外。在“田氏代齐”的前475年，波斯就已成为一个疆域远超秦朝的世界帝国，控制面积曾达560万平方公里，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就在都城修建“万国之门”，用于接受万国朝拜。

波斯灭亡了刚刚兴起不久的新巴比伦王国。

最早的“超级大国”。征服战争早期，波斯帝国便以四大都城——波斯波利斯、苏撒、埃克巴坦那和巴比伦为辐射中心，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网。军队打到哪里，道路就几乎就修到哪里。

波斯北方是游牧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个“天下”。

「古成都人」没有变法，固守富饶的成都平原，也没有走上封建制的道路，与楚国交战，竟能旗开得胜，一度还咄咄逼人。南郑抗秦，东征楚国，多为被动的「反击战」。



陆

柒

捌

玖

拾

天佑大秦。

秦国变法期间，山东六国之间，拳打脚踢，打得难解难分；古蜀国安居乐业，自娱自乐，正好为秦国提供战略安全期，就像蜕壳的夏蝉一样，在最为脆弱时，顺利地进行一次大蜕变。

东出函谷，表明秦国对华夏正统身份充满渴望。

摆脱西部戍边人的角色，秦国君王为此日思夜想。

欧洲南部战火连天。

公元前338年，希腊各城邦为马其顿所败，失去独立地位。

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东征。

马其顿军横扫波斯、两河流域。亚历山大率军孤军深入，以进攻为主，连续战斗，进行了数以百计的抢渡江河、围城攻坚，以及山地、沙漠地和平原地作战，多次以速决战胜优势之敌。饱含血与泪的战争。

亚历山大最后战胜并统治波斯帝国，两河流域的政治文明中断。

文明失去存在的条件。楔形文字，渐为外来的希腊文所替代。

打波斯时，秦国已经攻取义渠国，后方基本稳定。

打印度时，开疆拓土，领土、人口都大幅度增加。

对中国，亚历山大不敢轻举妄动。

通过“西北走廊”打来，沿途补给线太长，天文数字的补给运输消耗；跨过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高难险阻，难以逾越；从阿富汗转入新疆，在草原上就会被再次崛起的

匈奴干掉。

记忆犹在。公元前1220年，“鬼方”成为商朝奴隶。

尝试文明共存。东西方在经济、文化上的接触，由偶然地接触发展，到经常性的广泛而深刻的交流、渗透、碰撞，加深了希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及古印度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很多希腊人来到东方，或随军、或经商、或做官，甚至以移民的身份居住。

不断在东方土地上扎根萌芽，希腊文化结出灿烂果实。

希腊的文化与科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对欧洲和东方深远影响，史称“希腊化时代”。

秦国君臣同德。一手烂牌，经过秦孝公和商鞅二人，戮力同心，在山东“打群架”无暇顾及、古蜀国“内循环”之际，逮空重洗，换得一手好牌，并将牌打得美轮美奂，如行云流水。

“明法度，定律令”。

以法为治，以吏为师。

整个社会形成“贪狼强力”的风俗。

虎狼之师。秦军以“耕战”为核心，战术不择手段，破坏周朝的“战争法”“战争公约”，狼性在战争中放大，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任何借口，断绝生路，只能激发狼性。

在经常吃不饱的古代，没人会有心思健身保持身材。秦国有“啤酒肚”的将军，基本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有肉吃有酒喝有屋住，长期的滋养才能出现的“啤酒肚”。

爵位越高，在部队的伙食也不一样，普通士兵一般只能满足温饱，英勇杀敌的士兵，不仅米饭管够，还不定期供应各种肉类，那些大腹便便的士兵，都是战斗力极强的战场猛将。

古代选拔士兵和将军的标准是：“弓马娴熟，膂力超伦”。

武艺高超，力大无穷。

就连徒步周游列国的孔子，也是个胖子，力大无穷。

《吕氏春秋》中记载：“孔子之劲，能招国门之关”。放到现代同样适用。世界大力士比赛中选手，各个虎背熊腰，完全没有腱子肉，比拼的项目也是丢圆木、拖卡车、举大石等。

在古代，战场上腱子肉并不实用，比拼的是力气。

实力体现。将军画像，无一例外是虎背熊腰的典型代表。

秦国君臣同德。一手烂牌，经过秦孝公和商鞅二人，戮力同心，在山东「打群架」无暇顾及、古蜀国「内循环」之际，逮空重洗，换得一手好牌，并将牌打得美轮美奂，如行云流水。

力气，古人战斗力的重要衡量标准。《宋史·岳飞传》记载：“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未冠，指还没到20岁，就能拉开将近175公斤的弓箭。最低标准，作为一个将军。

楚霸王能够担任扛鼎，以现代的重量换算，鼎将近200公斤。

古文献记载：夏桀“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殷纣“能倒曳九牛，扶梁换柱”；明将刘綎“所用镗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等，战力超群的最佳表现。

先入为主。以“八块腹肌”，看待古代官兵的身材而判断战力。

与现代高科技的战场相比，更看重士兵的实战能力，长时间的鏖战中，挺着“啤酒肚”的胖子，往往能坚持到最后，不少士兵不是被武器致死，而是被恶劣的环境、自身体能不足导致。

如今，崇拜健身肌肉，以健康为主，古代以杀敌制胜为主。拥有“啤酒肚”，军官的真实写照。“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的陈安，也挂着气派无比的“啤酒肚”。身份地位的象征，为实战为练就的身形。

张仪、司马错，狼性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

利用关中平原的发动机，源源不断地向战争机器的供输能量。

让秦国在战争的红利中，停歇不下来……

战国七雄，从公元前656年到公元前357年，在160场国际大战中，秦国只发动过11场。但是，从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到公元前221年，在96场国际大战中，秦国发动了52场，取胜48场。

楚国，秦国“变法”前的30多年，就任用吴起，进行“变法”。已为“只是近黄昏”的楚国，注入新的生命力，“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再次成为决定群侯

争霸格局的“超级大国”。

洪流之势。“变法”使两国强盛。

固步自封。版图庞大，给“古成都人”带来心理上的优越感。

唇亡齿寒？“变法”已经卓见成效的楚国，要拿巴国试刀。

大军挥师西进，占据邻居巴国的大片领土。

巴人在江关（今重庆奉节）、阳关（今重庆长寿）、弱关（今湖北秭归）一连布置三道防线与楚军对峙。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巴人的东方大门向楚敞开，无险可守。庞大的战车部队，在江汉平原上冲驰酣战时，在三峡的峡谷沟壑间，巴国军队仍然依靠强健的四肢，翻山越岭，跨江涉水，勇士更多的是用血腥的搏杀，延缓消亡的时间……

奉节以东尽入楚之版图。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古成都人”仍然在富裕、安逸的梦中，没有苏醒。

两面树敌。军事上，秦国、楚国对古蜀国，都占据“地利”。

秦国对成都平原，一直有强烈的占有欲。采取硬攻，只能事倍功半。想发起战事，首先要打通进山道路，秦惠王使用一条妙计后，又精心设计了金钱、美人之计，仍然无济于事……

交通便利。纵横交错的道路，从成都平原腹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唯有出川之道，异常艰难。东川路、巴岭路，通向偏远蛮荒的东南方，东北方向连接着先进发达的中原文明。

为了秦蜀两国的经济交流，古蜀国开辟古金牛道，连接褒斜道。

褒斜道，沿汉水支流褒水两条河谷而成。斜峪口，在陕西眉县之南，褒谷口，在汉中褒城以北，故名褒斜道。古代由长安去汉中，先入斜谷，后入褒谷，也称斜谷道。全程249公里。

褒斜道南端，汉中褒河镇。褒河，陕南的一条河，以美女——周幽王的爱妃褒姒而闻名，即“烽火戏诸侯”里“一笑倾国”的美丽而幽怨的“冷美人”。褒姒，汉中褒河人。

栈道南端是叫小石门；北端，叫大石门。

汉中盆地，北望关中，南通巴蜀。

蜀道的核心地带，秦人入蜀，蜀人入关的必经之所；连绵无尽的山地中，一小块被汉江浇灌的沃土，让汉中成为微型的“成都平

原”“天府之国”。

既是举兵入关的“咽喉要地”，还是屯兵休养的“后方粮仓”。

张良送刘邦入汉中时，指出此地平原广阔，利于农植，可休养生息，为楚汉争霸保存实力。萧何也以为，“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可“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韩信与汉高祖君臣在汉中相会，指出“楚必亡、汉必兴”的道理。

“南郑之争”，战略上与三国曹刘之争，区别不大。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褒斜之道，《禹贡》发之，而汉始成之。”

《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既排洪行潦，治理水患，又建立水陆交通线路。

导山导河。“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发源于岷山的岷江，流入成都平原后南，向川南的宜宾，汇入长江。

“江沱”的进水口，在今都江堰南马尔墩。“江沱”首受岷江后，东行经徐谿河故道，东注于毗河，向东直入金堂峡，汇入沱江。沱江尽管源于龙门山，水源的相当大一部分却来自岷江。沱江自西向东，流过成都平原、龙泉山地，向东南于泸州注入长江。

潜水，“一在巴郡宕渠县，一在广汉郡葭萌县”，即今嘉陵江支流渠江与在今广元境内流入嘉陵江的支流。大禹时期在四川盆地的治水活动，主要集中在岷江、沱江与嘉陵江流域。

古金牛道在成都平原所经过的路段，正是岷江、沱江流域。从成都向北，进入绵阳、广元地区后，主要穿越的就是嘉陵江流域；甚至，大段大段地直接利用嘉陵江河谷，为主要路线的通道。

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是时连通今汉江。

《山海经》记载：“又西三百二十里，曰蟠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蟠冢之山，《禹贡》中的“蟠冢”。沔（水），上古时对古汉水上游河段，甚至整个汉水的别称。

“陈仓道”的前身。《禹贡》记叙，大禹带领古羌部落联盟到中原地区，通过这条水陆交通线路，先乘船顺桓水而下，然后，转入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附近，至四川广元白龙江口的嘉陵江河段，经过古汉

水上游，再进入渭河水路、黄河干流。秦以降称“故道”。

故道，老路、旧道之意。

古金牛道一线，跨越岷江、沱江水系，沿着嘉陵江河谷北上，同步形成。

一条南北向的文化交流渠道，围绕民族迁徙的“藏羌彝走廊”网状交通线。天成的古嘉陵河谷走道，连接成都平原与汉水上游地区的通道，后世所称的金牛道是网状路线之一。

“攻秦至雍”，要有道路。

这条古道，就是原始的秦蜀栈道。

《水经注》引三国来敏《本蜀论》记载：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路，刻石牛五头，尾下置金，扭动机关，金便泄下，谎言牛能便金，赠送蜀王，要蜀王自派人去取。蜀王上当。

《华阳国志》等，亦有类似《本蜀论》的记载。

石牛道、金牛道之名，皆源于此。

石牛道自褒谷口向西南，经汉中留坝县、勉县烈金坝（金牛驿）、宁强县五丁峡（金牛峡），再经广元昭化古城，溯剑溪，经剑门关、普安镇、武连驿、梓潼县，西达成都金牛坝。

在广元市的昭化以北，说法异同。

两种说法。自昭化溯嘉陵江上游，经广元、朝天驿、七盘关入陕西宁强；自昭化溯白龙江，经古白水（治今青川沙州镇），再溯刘家河（金溪河），经青川营盘乡五里垭，进入陕西宁强。

第二种说法，真实可信。

白龙江栈道为圆孔，嘉陵江上游栈道为方孔，前者更原始古老。

嘉陵江，古称“漾水”，西汉前直入汉江。两汉时，漾水在陕西宁强阳平关以东发生袭夺，才进四川，成为蜀北比白龙江更大的河。漾水发生袭夺前，广元以北不具备建石牛道的地理优势。

行政区的设置总以交通、经济流向为基础。

白龙江下游乔庄河口、金溪河下游，在公元前201年已置白水县，广元在公元390年才置兴安县。

亮丽地段。广元段，由北至南依次有：沿白江龙而下的白龙湖、古白水遗址、马鸣阁道、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的木马山、鲁班峡、飞鹅

峡，跨嘉陵江上下游分界的昭化古城，溯清江河的千年古镇宝轮院、剑门关、剑门七十二峰、翠云廊、古剑州、武连驿等，神奇的历史与故事。

也是通向九寨沟、唐家河的最佳路线，出川北上甘肃的必由之地。

大禹与古羌部落联盟、古蜀族部落联盟，最早开辟这条道路。

河两岸的岩壁上，凿有一条难容双脚的鸟道。

在险峻处，排列着钻凿的小石窟。

“古成都人”重视修建道路。

异常醒目。越封闭，越有向外探索的精神向往。

交通便利。纵横交错的道路，从成都平原腹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唯有出川之道，异常艰难。东川路、巴岭路，通向偏远蛮荒的东南方，东北方向连接着先进发达的中原文明。

开辟“古金牛道”。

打通从蜀至秦的信道。

古蜀国动用上万的“古成都人”，采用“沿溪河成路，岭横越垭，陡峻盘旋，险绝而栈”的方法，以血肉之躯犯险，遇山则火焚水激打洞，逢涧就凿洞插木成栈，每条古道的开通，都是壮士喋血浇筑而成的天路，每一次的跋涉，都是惊心动魄的历险。

以开明十二世麾下的“五丁”为基本单位，组织一支精锐“特种工程兵”，攻坚克难，几乎承担了古蜀王国所有的艰巨劳役，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担土运石，伐木聚沙。

“五丁”带有半军事化性质。

“古成都人”有尚“五”的观念，故“五”为编制。

“特种工程兵”，一个个高大孔武、虎背熊腰，臂力过人。

经褒水、嘉陵江，凿通龙门山脉与秦岭山脉。

南段起点，成都金牛大道的营门口。

北段起点，陕西宁强的金牛峡谷。

匪夷所思。凿石筑路，在龙门山脉、秦岭天塹的绝壁沟壑间，工程艰险，耗费巨大。

从北至南，陕西境内有金牛峡、五丁关、西秦第一关等；经黄坝驿入蜀，有七盘关、清风峡、朝天关、明月峡、石柜阁、葭萌关、剑门关等。白龙江一线，还有白水关、飞鹅峡等险隘。

一路上，雄关当道，险隘叠起，云栈连绵，恶水滔滔，行旅之人无不望而生畏，行之胆寒。葬身于险崖恶途、失命于狼虫虎豹者，不在少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名副其实。

许多山体石英石岩质。硬度仅次于钻石的天然矿产，在莫氏硬度标准中，硬度数值达到惊人的7.5，远高于不锈钢5.5的硬度值。即便如今的钢制工具，也难在石英岩上留下痕迹。

没有炸药、机械钻头，何以开凿出如此整齐划一的栈孔？

“火焚水激”。用柴火，把山体烧透，河水来激。热胀冷缩的原理，山体自然地剥落。“古成都人”的智慧穿越2 500年的时光，在智能手机的现代人面前，展示了我们早已忘却的光辉。

史志没有记载修路工匠们的名字，殚思竭虑的开路方法已成为传说，倾尽心血所修筑的栈道也已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消逝。但近乎“愚公移山”的“五丁精神”，却永远不会，也不该被忘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长城精神在“围”“堵”，以大围墙姿态，拒绝外人进入自己的“家园”。

“修路拆墙”。“五丁精神”相反，象征延伸、沟通与发展，有了解外面、走出去的内涵。互联互通，修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也让别人有路可走，实际倡导了“一带一路”。

一路上，雄关当道，险隘叠起，云栈连绵，恶水滔滔，行旅之人无不望而生畏，行之胆寒。葬身于险崖恶途、失命于狼虫虎豹者，不在少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名副其实。

中国之中，不在天下之中，而是文明之中。

越南冯原和成都平原相隔不远。

金沙城到越南河内，1000多公里。

用「成都模式」来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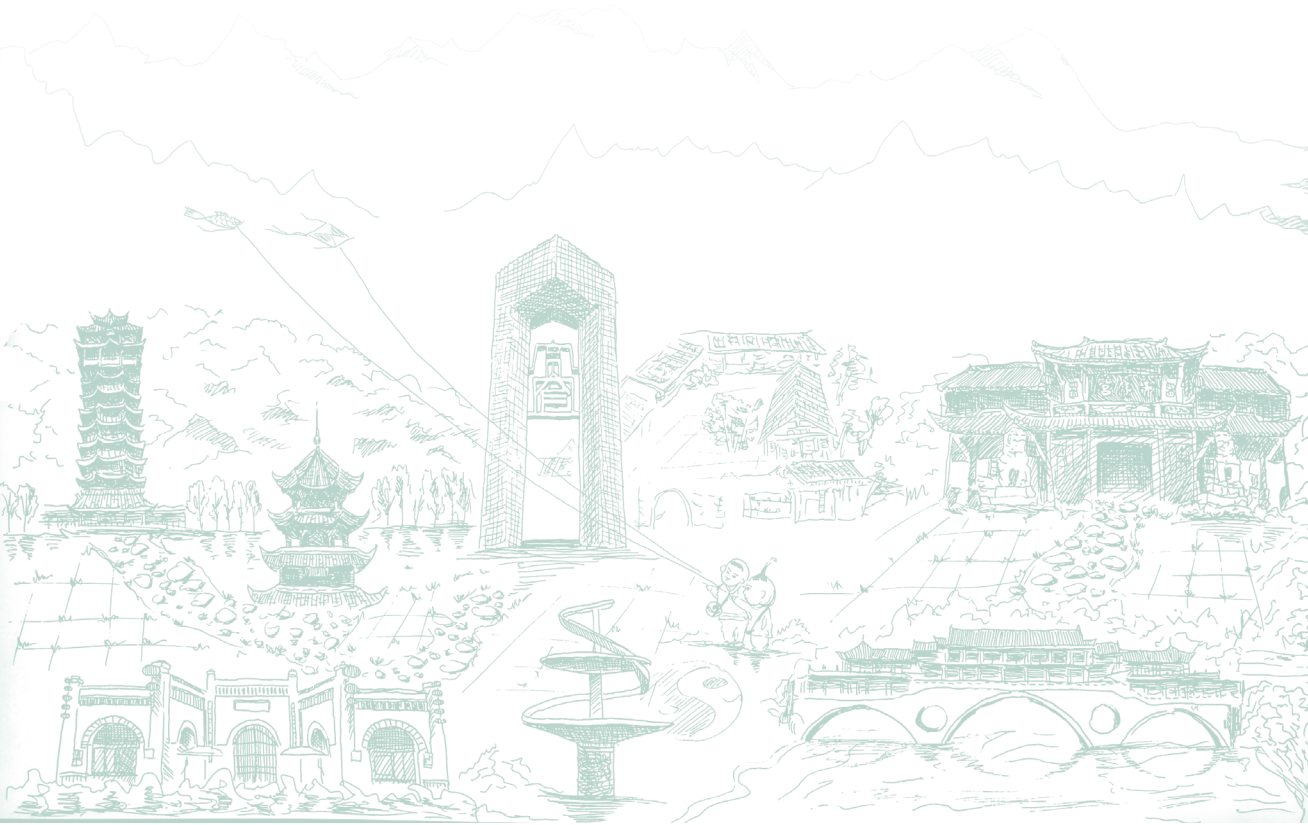
「古成都人」积极地将成都平原实践多年的农耕灌溉技术传入红河三角洲。靠摘果子、打猎为生的土著部落，为了能够过上相对轻松的生活，开始走出丛林，加入了「古成都人」行列。

「瓯雒国」重复上演「箕子朝鲜」的故事。

「把成都少城搬到广州」。「泮溪」上的行宫，古成都城「少城」中一个「社区」的规模，模式也与「蜀王宫」的規制相同，纵横二三十公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国该有的都有。

文明世界从东向西，第一次「联通」。

中华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与征服」行动启幕。





有去无回的文明出访



陆

柒

捌

玖

拾

不畏艰险。

“五丁开山”，迎难而上。

在送他们喝壮行酒、高唱战歌，挥泪北上出城的路边，“古成都人”在等他们的英雄回来……

等来的却是不断的死讯。

开明十二世亲自祭拜亡灵，给英雄塑像，厚待壮士家属。后人为纪念他们，将送别壮士的路命名为“五丁路”，将架在河上的桥，命名为“五丁桥”，铭记古蜀先烈不畏牺牲、开天辟地的创业精神。

地名，现在还保留着。

多样立体的格局。

纤夫道、水道、飞鸟道、驿道、栈道。

在悬崖上打洞，工学原理先进。

蜀道，多样立体的格局，纤夫道、水道、飞鸟道、驿道、栈道等。栈道多沿着河岸，在悬崖上打洞，工学原理先进。栈道，功效相当于如今的高速公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级道路。

可与万里长城、都江堰水利工程、大运河媲美。

修建与使用，都堪称一条绿色环保的高速公路。

智慧结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交通历史博物馆。

建城的“古成都人”，以血肉之躯犯险，遇山则火烧水激打洞，逢涧就凿洞插木成栈，每一条古道的开通，都是壮士喋血浇筑而成的天路，每一次的跋涉，都是惊心动魄的历险。

改变着成都平原，也创造着丰富的文化遗产。

沧桑、雄奇之美。从来文人多入蜀，芳树晴岚流诗韵。美学上的崇高之美，吸引数不尽的文人、诗人书写、创作，由蜀道激发的创作灵感，演绎了许多千古流传的动人故事、诗词歌赋。

漫长的历史浓缩，层叠的文化遗产，都微缩在空间断面上。

正是不愿被环境束缚的秦巴山区的秦人、巴人、蜀人与“古成都人”，才更加血脉贲张地想冲破现实的枷锁，启发了埋藏于意识深处的智慧潜能，修建了那一道道疏通发展之途的蜀道。

离现在“五丁桥”不到200米，就是蜀王城。

大名鼎鼎。公元前347年，开明九世召拢继续沿“藏羌彝走廊”高山谷地、一路延展而下的古羌人，赶着牛羊，与洪水灾害中幸存的建城的“古成都人”一起，在武担山以南，再建蜀王城。

城区最高地标。比周围高出30至50米，长100余米。

成都城的“龙脊”。城区最高之地，少城的中轴线，由北往南向的长顺上街，以武担山为“靠山”，以红照壁为“案山”，上连凤凰山、下接开明王府，将山川风水格局形表于大城内。

“龙脉”在武担山，延续至今。

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

《华阳国志》说：开明九世颇会享乐，修过以珍珠为帘的七宝楼、鸚鵡舟。传说雍州之域的武都有“山精”，化为年轻女子，美背、侧颜，貌美如花，蜀国的美女也难与之相媲美。让人神往。

让人远离成都。武都，在甘肃省成县以西的边远小城。

开明九世把她接到成都，纳为妃子。

宠爱有加。写了一首《东平之歌》取悦。

红颜薄命。王妃不习水土，哀怨地离世。

临终，紧依蜀王难舍难分，又非常思念家乡，要求蜀王以故土、故物陪葬。

伤心欲绝。多情的开明王九世，又作《與邪歌》《龙归之曲》悼念，焚香烧烛，祷告上苍，“还我妃来”。为用王妃家乡的泥土建墓，派“五丁”到陇南山区，千里迢迢地挑土回成都。

蜀王妃墓高大如山。以家乡用过的石镜一块置于墓前，又以本地泥土将墓堆，叠成了一座小山，高度不亚于后来的皇陵，超过附近房屋的屋脊。后代称为武（五）担山，或“五担山”。

“唐初四杰”的王勃，在《晚秋游武担山寺序》中说：“鸡林俊赏，萧萧鹫岭之居……”鸡林，指佛寺，盛赞秀丽，说这一带如佛所居的鹫岭，竹树萧萧。

武担山的“石镜”，古蜀王妃的墓表，圆形光洁，半埋土中。

杜甫喻为“月轮”，薛涛比为“妆镜”。

古人曾称“蜀镜”，后人称为“史镜”。

“大石文化”。建城“古成都人”灵魂与石砌建筑灵魂的共同载体。

开明九世还修一座西楼，登楼“北望”，隔空遥寄相思。

“开明谱歌醉酒悦美人，王妃抚琴望月思故乡”。在《成都古今记》中，赵抃记载：“望妃楼亦名西楼，闻明妃墓在武担山，为此楼以望之。”首次记录成都“西楼”的出典。

“天府蜀都”。在北宋名臣中，“琴鹤先生”赵抃，在成都平原总共生活9年，五往四入，与成都关系最为密切，以“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三度治理成都，名副其实的成都“老市长”。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形象的树立，萌蘖于宝墩文化时期，存续于三星堆年代，发展于北宋中期，时间历程正与中国国家精英集团的时代精英，从封建集权离心而出，返回自身，徜徉山水，释放自身诗性精神的历程相吻合。

爱情平等。率先垂范，古蜀王公开发布情书。

中国最早“西楼意象”起源。最初似为实指，慢慢沉淀为泛指伤心地，成为诗词创作中的一个“意象”，不再是实在的楼宇。使“西楼”的意象逐渐虚化，形成具有一定虚拟时空的“西楼情结”，被诗人、词人们反复应用。把逼仄的传统“西楼”空间，立体拓展到“意象”空间。

刘备“称帝于武担山南一百二十步”。

诸葛亮大兴土木，“营南北郊于成都”，在武担山附近营建蜀汉宫城，“列绮窗而瞰江”，借成都城北墙，为宫城南墙，借成都北门，为宫城南门，与成都城保持着可分可合的关系。

原古蜀国开明王的宫殿区。

中国仅有的三个政治中心之一。

武担山，现位于江汉路西部战区司令部大院内。

“小富即安”。古蜀国的鼎盛和不再进取，也意味着危机临近。

古金牛道基本打通之时，一场灭顶之灾，又不期而至。

公元前300年左右，龙门山区发生了一次与“5·12”汶川地震同等规模的地震。

记忆犹新。前700年左右，“金沙城”遭受特大洪水袭击。

巧合。西周和东周更替。

川茶第一个成为西周王室的贡品。

东周迁都，贡品川茶自然被送到河南洛阳。

山崩地裂。山崩“雍江”，海子溃决。

地震引起山洪泥石流，岷江两岸山体滑坡，河道堵塞，河床提高，引起断流。再一次形成堰塞湖，堰塞湖溃坝后，“巨浪滔天”，再次冲入成都平原。洪灾后瘟疫流行……

十二桥。人烟辐辏、房屋密集的温馨聚落，古蜀人在带回廊、铺设木地板的建筑中，尽情享受原始粗犷的生活。预料到洪水迟早要来，在房子下面打埋木桩，以抬高房屋的居住面。

“巨浪滔天”。

席卷整个壮丽建筑，又慢慢地退去。

逃走的“古成都人”，回到居所一望，只见满目泥沙，一片荒凉。

荒芜人烟。有的还沦为墓地。

他们，呆呆地伫立在远处，叹息一声，转过身，走了。

洪水带来的草籽树根，又在遗址上生根发芽。

当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时，任何远古文明都会颤栗。

大灾之后，成都平原往往发生大瘟疫。

公元前1099年，发生的地震引起山崩、滑坡堵江，进而引起古岷江改道，导致三星堆文明的消亡和金沙文明的传承，以及杜宇时代的严重水灾。

成都古城镇迁移，最大因素是山洪泥石流

成都城的「龙脊」。城区最高之地，少城的中轴线，由北往南向的长顺上街，以武担山为「靠山」，以红照壁为「案山」，上连凤凰山、下接开明王府，将山川风水格局形表于大城内。「龙脉」在武担山，延续至今。

灾害。

毁灭时代，与区域大地震的时代吻合。

金沙遗址被公元前300年左右，龙门山区地震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所毁灭，与2 600年—2 300年前的区域大地震重叠。洪水后的次生灾害，瘟疫流行，大多数人死亡，生产力大大下降，国力衰減。

遗址坑里，大小不同的泥石颗粒散落，象牙杂乱地分散着，还掺杂泥沙，有着山洪冲击造成的“洪痕”、古河道乌木。在“梅苑”内，已经出土6 000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石器等礼器，发现被泥沙掩埋的大量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等。

灾难惨烈。“金沙城”被洪水毁灭，“十二桥”被泥沙湮没。

命运相同。与4 500年前被洪水淹没的良渚文明，如出一辙。

次生灾害。洪水之后，成都发生大瘟疫。

许多异兽怪鸟，是灾害的代名词。《山海经》记载：“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如旱魃、絜钩、趾踵等。

“絜钩”，瘟疫的代名词，长得像鸭子，却有老鼠一样的尾巴，擅长攀登树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瘟疫，就有灾难。《山海经》记载：“又南五百里，曰山，南临水，东望湖泽，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嗥狗，其名曰崑崙。见则其国多狡客。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见则其国多疫。”

“絜钩”，鼠疫和禽流感，发生在成都平原。

霍乱病。《山海经》还记载：山上生长着一种怪兽，它的形体同牛很相似，但头是白色的，长着一只眼睛，有蛇一样的尾巴，它名叫“蜚”。这是一种不祥之兽，它从河水与水泊中渡过，河和泊就会干涸；它从草丛中越过，草木就会枯死。只要它一出现，天下就会瘟疫流行。

青耕御疫。葭理山中有一种鸟，状如鹊鸟，长着青黑色的羽毛，鸟喙为白色，眼睛和尾巴也是白色。这种鸟，叫作“青耕”，可以抵御瘟疫，经常“青耕、青耕”地鸣叫。

后世，这种传说演变为“灵鹊报喜”的神话与信仰。

复州山，“山中飞翔着一种鸟，状像猫头鹰，却长着一只脚，生着猪尾巴，名字叫趾踵，一种不祥之鸟，如果它出现，全国就会出现大瘟疫”，可能是天花病。

从《山海经》可知，古成都平原多水灾、瘟疫。

北宋《舆地广记》记载：“犀浦县，属益州。李冰作石犀以压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县取此为名耳，不在其地也。”

李冰从“古成都人”那里学到知识，受到启发。

“古成都人”屡次面对大规模传染病，从未失去过信心，不仅根据生产、生活经验，对疫病的传播媒介进行合理猜测，也根据社会管理经验，试图对疫病的发生与传播进行管理，进行各种预防、控制方面的尝试，具体措施包括：顺应节气、用巫术进行精神控制、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与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病人隔离等。

初步掌握了一些比较有效的防控、治疗的方法。

瘟疫，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恶性传染病，常见的有鼠疫（黑死病）、天花、霍乱、流感、痢疾等，还有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等。

《蜀志》记载，三种瘟疫盛行：大头瘟，沾染的人脑袋肿胀，大到像米斗，头发变成暗红色；马眼睛，患者发病后双眸肿痛，直到眼珠溃烂掉落；马蹄瘟，发病后患者从膝盖到脚趾奇痒难忍，直至肿胀成为马蹄状。三种病皆为绝症，中者无法救。

瘟疫流行，中国各个时期死亡人数惊人。

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疢疾”“疾年”等文字记载。

“疫”在中国古代文字学中，指“瘟疫”。

在《尚书》《山海经》《左传》都出现、使用。

三千多年前的商王，都怀疑自己被传染瘟疫。

疑似瘟疫的甲骨卜辞，出自197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小屯西地发现一个灰坑中的牛肩胛骨上，原文是：“乍（疫），父乙，妣壬豚，兄乙豚，化口。御众，于祖丁牛，妣癸卢豕。”它说的是，疫情突发，为众人祛除疠疫举行一系列祭祀先人的活动。

两辞同卜。大牛肩胛骨卜辞：“乍疫一御众。”

“疫”，“民皆病”之意，描述传染病（疫）不能有效控制。

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瘟疫的文字记载。

殷商时期，中国已出现过多次致命的传染病的流行，都得到上层的充分重视。

甲骨原文中“疾”字，写作一个“人”字，加一个“彡”字，彡就是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形象的树立，萌蘖于宝墩文化时期，存续于三星堆年代，发展于北宋中期，时间历程正与中国国家精英集团的时代精英，从封建集权离心而出，返回自身，徜徉山水，释放自身诗性精神的历程相吻合。

床。意思是，人躺在床上，人字四周还有代表汗滴的点，意思是，病人在床上发热、出汗，无法动弹。

记载商王武丁出现耳鸣现象，重大事件的预兆，或是祖先的提示，或者惩罚。

武丁自己进行占卜，多次给祖先献上几十，乃至上百头羊作为祭品。

殷商时期，病疫瘟疫猖獗，有非理性的“御疫”、殴驱疫鬼“宁疾”，以求“御众”消除疠疫的巫术祭祀活动，通过国家行政防控应对手段、社会群体群防形式、个人的锻炼活动等，理性实施疫情防控应对措施。此外还有隔离防疫、禁止谣传、熏燎消毒、药物医防、饮食保健、洒扫居室、环境清洁卫生、刑罚惩处等，让人们加强个人的身体锻炼，以强壮体魄，抵御疠疫。

“疠”字，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公元前243年，《周礼》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吕氏春秋》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疠疫。”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

流行疾病猖獗。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许多人逃过洪水，却没躲过洪水后的瘟疫。

同一片天空下。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瘟疫几乎摧毁希腊城邦。

伯里克利连选连任雅典首席将军，完全掌握国家政权。

雅典进入“黄金时代”。奴隶制经济、民主政治、海上霸权和古典文化臻于极盛。雅典的殖民地

遍布爱琴海岸，强大的舰队经常出没于辽阔的黑海领域，通过战争的胜利获得大宗的战略物资、赔款。

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杰出的代表者。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希腊人同室操戈：一方是雅典阵营，拥有辉煌的殖民帝国、民主制与政治权利的丰富传统，光辉璀璨的文化成就；一方是军国主义、寡头统治的斯巴达阵营。

“波希战争”后，雅典与斯巴达全面争霸。

公元前429年，一场可怕的瘟疫袭击雅典城。高烧、咽痛、腹泻，雅典一半以上居民、四分之一的城邦军队死亡。外敌进逼，城内尸体堆积如山，人心涣散，怨声四起。

“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伯里克利与妻子、两个儿子都死于瘟疫。

西方世界，群龙无首。

瘟疫影响了整个社会结构，道德也随之崩溃……



陆

柒

捌

玖

拾

国与国之间，果然只有永恒的利益。

发生在整个希腊世界的一场“世界大战”。

瘟疫结束，雅典终败于斯巴达和波斯的联合力量。

脆弱的地缘平衡，旋即引发新的争斗。

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作战，宗主国与暴动的属国作战。毫不掩饰的功利主义，恃强凌弱的恐吓，对正义与公理的漠视与嘲弄，经济、文化毫无建树的斯巴达人，高举“解放”的大旗，真实的雅典帝国，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构筑在与同盟国残暴统治之上，靠横征暴敛、民粹主义维持，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却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最初的基础。

公元前323年，驰骋天下的王亚历山大，有一天，酩酊大醉后，突然发烧、病倒，死在巴比伦的宫中，年仅33岁。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亚历山大帝国，随之瓦解。

从巴尔干延伸到印度的庞大帝国，被四位将领瓜分。

同时，也使蓄谋已久的入侵阿拉伯半岛的计划也流产了。给了世界上最大的游牧民族，将近1 000年的和平时间，产生出一门普及的宗教、一位强力的政治领袖——先知穆罕默德，绰绰有余。

古希腊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在遥远的东方，古蜀国命似古希腊，成都城一如雅典城。

锐气被洪水、瘟疫重挫。

霍乱吞噬的生命，远远大于洪水。

霍乱来势凶猛，只要一出现拉肚子，两三个小时就没

人了。

病死的人没人敢触碰，直到腐朽在床榻之上，也没人掩埋。

国运也被洪水、瘟疫左右。

灾后重建。开明王带领军民，一边在城里掩埋瘟疫中病死已经腐朽的尸体，一边在“十二桥”废墟西北边的武担山一带，修建“北少城”……

系统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成都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经历过瘟疫的反复打击，甚至在洪水、瘟疫中“毁城”，但“古成都人”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金沙古城消失何以没有文字记载？

人死得太多。先死者，有人集中埋葬；后死者，没人埋葬，更没有人记录。“四塞之国”，道路“难于上青天”，知道者少之又少。扬雄、常璩即便听说过，也不敢相信，没有记入史册。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和《山海经》上都没有。

“古成都人”不注重文字记录，即“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不晓文字”，不知用文字记录，“未有礼乐”，指辉煌的宗教文化被灭。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完整、没有烧毁、砸烂痕迹。

古蜀国富饶强大，几乎不可战胜，只有洪水、瘟疫才会使其灭亡。

成都平原在古代经历多次洪灾、多次瘟疫，墓葬有多种类型。

“古金牛道”已经全线打通。

时机成熟。巴蜀风云再起，当古蜀国进攻巴国时，公元前316年八月，秦惠王遂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秦军伐蜀，关中铁骑挥师，通过“古金牛道”一路南下……

之前，秦国咸阳，王宫之内。

争论不休。朝堂之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针锋相对的声音。

举棋不定。秦惠文王在先灭蜀，还是先攻韩之间。

丞相张仪主张先攻韩，大将司马错主张先灭蜀。重用张仪为相，施行“连横”策略，分化三晋诸国，经过与“合纵”阵营的几番争夺后，在公元前318年，一举粉碎五国合纵，重创魏、赵、韩三国联军，奠定了秦国在七雄中的优势地位。

公元前317年，再次兵出函谷关。

灭杀赵国、韩国的军队8万人。

张仪，著名的纵横家，擅长战略布局，凭借着卓越的口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了三寸不烂之舌，能敌百万雄狮的奇迹，几次凭借着自身的才华化险为夷，在瓦解六国合纵联盟后，认为天下诸侯散沙一盘，已经不足为虑，不必把精力耗费在与诸侯无谓的争斗上。

司马错，秦国著名将领，远距离长途奔袭作战的主要发展者。

黄金搭配。内可安定内政、发展，外可开疆拓土，威慑他国。

灭蜀战役，张仪、司马错共同指挥，灭巴之战全由张仪完成。

围绕征讨韩国，还是巴蜀的争议，仅为政见之别，而非党争。

张仪给出的建议：“巴蜀乃戎狄小族，不足挂齿。秦国历代祖宗都是东进，过了黄河，就是天下的中心。执行既定的战略，结好魏国、楚国，先扫除韩国。这才是帝王的大业。”

攻打韩国，出兵三川郡，也就是洛阳盆地。

相国张仪，近年战功并不卓著，自10多年前不战而屈魏国，从而获取河西与上郡后，合纵连横政策的收获也不大，战功也屈指可数，早已没有获得爵位时的意气风发，在秦惠文王面前逐渐失宠。

司马错反驳说：“不对。想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开拓疆土，想要使军队强大，必须先让百姓富庶；想要成就帝王大业，必须先树立德望。三个条件具备，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

地广民富、博德。

古蜀国地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粮食充足，人口稠密，富足充实。

战争历来是吞噬资源的“黑洞”。

本质上，拼的还是社会经济实力。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汉军攻打西南夷，每运送一石粮食，就需要在路上消耗掉十倍的粮食。

秦军长期征战，仅靠关中平原发展农业，艰难维持。讨论伐韩，还是伐巴蜀？根本原因在于“家底”不够厚，先解决秦军长期吃饭问题，再解决与山东诸侯国长期作战问题。

以战养战。“兵者，国之大事，生死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一个尚武的国度，即使不出函谷关，向东方六国开火，也会和北边、西边

在位的21年中，雄才伟略，雄心勃勃，北伐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秦国疆域扩大一倍有余，接连击败魏、齐、楚等当代大国，将一个只能「霸西戎」的区域性方国，带到了战国一流强国的位置，为一统天下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的游牧民族交战，实行军功奖励，士卒斗志很高。

张仪以雄辩著称，司马错也善用奇谋。

前者建议不顾巴蜀，而是攻韩，利用魏、楚一起出兵韩国，“临二周之郊”，借此“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雄心勃勃，不仅想要诸侯国的城池，还想直接绑架周天子，“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计过凶险。秦国挟持周天子，表面风光无限，但司马错强调，“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你可以带着秦军将山东各国各个击破，但其他诸侯国，也不会坐由秦国来灭亡；相比之下，伐蜀却有诸多便利，“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

“得蜀即得楚”，“取其财足以富其民”，秦国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韩国之地兵家必争之地，势必引起东方六国的联合。战略储备更多，兵员占比更大。

成都平原的面积，约是三个关中平原的大小。

若被楚人占领，一统的趋势，恐怕无人能挡。

地缘优势，得天独厚。凭借陕西、山西交界处的狭长地带，一面是水流湍急的黄河，一面是难以行军的大山，进可东出争天下，退可安然守雄关。即便吃大亏，退回函谷关内，平安无事。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最初用来形容关中平原的东大门函谷关。

位于今河南灵宝北约15公里处的函谷关镇王垛村。

沟通古都西安、洛阳的崤函古道，东起崤山，西至潼关，多在涧谷之中。从函谷关至潼关的崤函古道西段，深险如函，古称“函谷道”，函谷关扼守函谷道最险要之处，得名。

一个文化交融的地点。老子在函谷关一带创作

了著名的《道德经》，有人曾传言，老子西出函谷关紫气蔓延三千里，才有了“紫气东来”这个词。诸侯各国文化互通的一条道路。

从大禹到秦穆公，“一统天下”就要“东出”。

“塬”，一种台状高地，顶部平坦，四周因为河流冲刷而峭壁陡立，往往有数十米乃至数百米之高。黄土高原上的独特地貌，如著名的白鹿原。在今灵宝市北部，有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原，称“稠桑原”，横亘在黄河和秦岭之间，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桑树等各类林木，阻断东西之间的通道。北面就是黄河，没有河滩可走。想要通过稠桑原绝非易事。

天无绝人之路。稠桑原上，有一条雨水冲刷而成的裂缝（峡谷）可供通行，长约7.5公里，深50米至70米，谷底宽约10米，最狭窄的地方不到3米宽，史称“车不分轨，马不并鞍”。

“丸泥可塞”。函谷关城位于裂缝东边的入口处，用几颗泥巴蛋子，就能将函谷通道封了，更为奇绝，关口东边还有一条大河——宏农涧河（也称“涧河”），波浪滚滚，向北流入黄河。

去关中，得先过函谷关。

过函谷关，得先过这条河。

秦国四大雄才君王。

两人同年。秦惠王与亚历山大同期。

继位时年龄差不多，国家都已发展到相当高度。

欧洲力捧的超级帝王亚历山大，与罗马帝国的凯撒、法兰西帝国的拿破仑和沙俄彼得一世齐名。当年选择挥军东北，将会与华夏的秦朝交锋，秦惠文王定会用虎狼之师，教亚历山大明白何为战争，秦国会知道在遥远的西方，也有广袤的土地，在东进受阻下，会选择向西扩展疆土的极限在哪？不得而知。亚历山大的选择挥兵东南，进攻印度，拯救刚刚建立的庞大帝国。

在位的27年中，雄才伟略，雄心勃勃，北伐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秦国疆域扩大一倍有余，接连击败魏、齐、楚等当世大国，将一个只能“霸西戎”的区域性方国，带到了战国一流强国的位置，为一统天下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成都平原第二级地理阶梯上的最低洼处，北方到南方的要道。

对楚国而言，致命的弱点。

秦国不仅获得一个盛产粮草的安全后方基地，还多一条伐楚通道。以巴蜀为基地的秦军，向北，可以攻打楚国设置的汉中郡，向东，可以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出巫峡。

楚国的巫郡、黔中郡，就完全暴露在秦人的攻击下。

秦国已走下第二级地理阶梯，突入第三级地理阶梯。

类似“连续剧”，将在后来的西晋统一、蒙古灭南宋的历史中反复上演。

最终，39岁的秦惠文王拒绝张仪的提议，采纳司马错入川的建议：伐蜀。

图谋已久。战略大师、秦国名将司马错，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八世祖，曾经多次派人乔装入川，深入成都平原，对沿途地形研究细致。为入主成都平原，早就做好战争前的各种准备。

秋天，当蜀国“惩罚”巴国时，秦军从陇西出发。

风顺水，水路入蜀。

张仪、司马错率秦军，利用航运之便，兵分两路，通过褒斜道，运兵方便的古汉水，水陆并进，到达武都（今陕西略阳）后，不向东进入汉中，悄悄地向南，沿着古汉水的陈仓古道，直入故道水（嘉陵江），浩浩荡荡，直杀广元……

奔腾不息。原古汉水，从陕西宝鸡南面发源，流到略阳的“天池大泽”，一条向南流入四川，经广元、南充，在重庆注入长江；一条向东流入汉中，贯穿半个湖北，在武汉注入长江。

古老江流。汉水上游河道大多通航，水路交通便利。

楚国占据汉中，一直试图消灭巴蜀，进攻巴国颇有成效，巴蜀两国也在交战，完全可能先灭巴后灭蜀，但因古汉水的存在，必须逆江而上，秦军从陇西顺流而下，明目张胆地“截胡”。

天助秦国，水助秦军。

闪电攻蜀。

举国之力。30万军队入蜀，民夫却征了30万，修葺褒斜道、金牛道。

褒斜道在未修栈道前，仅为谷道。

绝险处须攀缘而行，艰难辛劳，不可言状。

栈道并不完整，坑坑洼洼，百步九折萦岩峦，以手抚膺坐长叹。

轻视中原强国的真正国力。一向不可一世的古蜀国，没想到秦军水陆并进，来如闪电，已抢占牛头山，以逸待劳，就等蜀军「入瓮」。原来「地利」的葭萌关，成了蜀军的鬼门关。

过了褒斜道，秦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古蜀国沿途设下的关卡和据点，形同虚设……

秦军兵临葭萌关（今广元昭化镇）。

天灾与瘟疫并行。这年，成都的冬天寒冷，时而狂风大作，时而冰雪交加。地震次生灾害延续，瘟疫流行，正在组织人力抗震救灾的开明十二世，不得不亲率20万大军赶到，仓促应战。

葭萌关又称天雄关、牛首雄关，设在牛头山腰的险要之处。

剑门天下险，夔门天下雄。

剑阁之险，于剑门关东西绵延100多公里，在大剑山中断处，形成垂直高度近300米，底部最窄处仅50米的天然隘口，古代出秦入蜀的必经之处，被称为自然天成的天下第一关隘。

在《蜀道难》中，李白赞叹：“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进入蜀地，走到剑阁时，要么选择走龙门山脉，要么走剑山方向，龙门山脉就如同不能攀登的悬崖，大军想从这里通过，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只能转而走剑山。

剑门关破，蜀地不存。

牛头山是剑门山向东延伸的余脉，海拔1214米。

横亘于嘉陵江、大剑山之间，四周群峰昂首，与剑门群峰遥相呼应，被白龙、嘉陵两江所环，因山势雄似一巨型昂首的牛头，得名，像一把利剑插在剑门与昭化之间。

剑门关东北约20公里处。城关三面环山，两面临水，“北枕秦岭，西凭剑关，全蜀咽喉，川北锁钥古称‘四战之地’。虽为弹丸之城，而有金汤之固也”。金牛古道，穿城而过。

“先有路，后有城”。

如今漫步剑门关口，还必须走过宽约1.5米的金牛道。

水陆两便。“白天千人拱手，夜晚十万明灯”。

从葭萌关城头望去，山形如一头卧牛，牛头、牛身、牛尾毕现。

轻视中原强国的真正国力。一向不可一世的古蜀国，没想到秦军水陆并进，来如闪电，已抢占牛头山，以逸待劳，就等蜀军“入瓮”。原来“地利”的葭萌关，成了蜀军的鬼门关。

旷野河谷。战车开不进山区，入山区的主要是步兵。

秦军前列，司马错着力打造的铁鹰锐士，只有600人。

战国时期，共有四支最为强大的军队。

魏武卒。魏国吴起训练，手执一支长戈、身上背着五十支长箭与一张硬弓、同时携带三天军粮，总重超过25公斤，连续急行军50公里，还能立即投入激战。

胡刀飞骑。赵国赵武灵王训练，全部是轻骑兵，机动力强，来去如风。

技击之士。齐国训练，配合战车作战的轻骑兵，武艺高强，弓马娴熟，剑法超群，熟练掌握军阵阵法，最具技巧性的兵种。

铁鹰锐士。司马错训练的铁鹰锐士，选材标准综合了前三种精锐的标准，都是勇冠天下之辈，人数很少，司马错只选出来区区600人，秦国全盛时期也不过1 600人左右。

冲锋在前。一般战斗中，也就10多个铁鹰锐士带领冲锋，像魔兽一样杀开一条血路，后面的大部队趁机掩杀。司马错带足600铁鹰锐士，在这次葭萌战斗中，悉数参战。



陆

柒

捌

玖

拾

一触即发。

葭萌关外，生死肉搏。

蜀王，比较自信。论兵力，蜀国并不比秦国少；论领土面积，蜀国也与秦国相当。而且蜀国一直是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霸主，对于关中的秦国，开明十二世并没有放在“高位”重视。

战时，杀声震天。

鲜血，染红整条江水。

半人半鬼般的秦军把蜀军撂倒一大片时，古蜀国军队才意识到秦军个个都是杀神。

“葭萌之战”，开明十二世兵败牛头山。

退至梓潼，与秦军再战。

蜀军大将“五丁”（弟兄五人）战死。

刀剑锋利。秦军挥师南下，开明王且战且退，退守成都。

秦军成功之因，也是韩信成功之因，更是诸葛亮失败之因……

“武都大地震”，“暗度陈仓”成为绝响。

陈仓道，从关中西侧穿越秦岭，历史久远称“故道”，周秦时称“周道”；以道路北端入山处陈仓名为“陈仓道”；因秦岭北侧大散关，又称“散关道”；翻越秦岭南行，入故道水嘉陵江，又称“嘉陵道”。

现名“川陕公路”。

川陕要津。北起雍城，南出褒溪口，绵延400多公里。

绕山越岭。秦军在陈仓道上的行军路线为：自咸阳，循陇

关道西行，至雍城(凤翔南)，折至陈仓(宝鸡东)西行，过渭河古渡，南进大散关，翻越秦岭，至黄花川，沿故道水行至凤县，折西南沿故道川，经两当、徽县至略阳，接沮水道抵汉中，或经略阳境内的陈平道，至大安驿，接金牛道入四川。

西周时，开明二世就再次开辟“周道”。

沿着“先辈足迹”，在大禹治水北上、武王伐纣时“川军”出川“古道”的基础上，古蜀人为了迁徙，踏出一条从有郃顺漆水，向豳地的道路。为了征战，古蜀国向北开辟了一条通向密须(今平凉灵台)、阮(今甘肃泾川南)、共(今甘肃泾川北)的通道；秦岭南部，在巴蜀与先周间，很早就有来往的古道。

开明二世率领蜀军，攻雍城，进军路线就是陈仓道。

在宝鸡渭水南岸，西周有散国的封地。

秦岭北边的清姜河西岸，有大散岭、大散关、散水。

在宝鸡益门古镇的西北边，有散国国君散宜生的庄园，庄园毁于大地震滑坡之中(现仍有滑坡的痕迹)，清乾隆年间，出土了周厉王时期的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有“周道”。

益门古镇，雄踞巍峨陡峭的西山之中，与汹涌奔流的清姜河，在这里夹峙形成窄小的瓶颈，扼守古道的咽喉，成为“周道”北端口上第一雄镇(关)，入蜀第一门户，故名为“益门镇”。

《水经注》记载：“扞水出周道谷，在故道县北。”先秦将凤县以南，称“故道县”，历史久远。在故道县北边，还有周道谷。道路初开、走向，无标准规定，周朝建立后，开辟了“周道”。

西周时，道路规划、管理，都有突破、创新。

把道路分为国中(城区)、鄙野(郊区)。

由名为“匠人”“遂人”的官吏管理。

国中道路，分为四种，南北为经道，东西为纬道，围城为环道，出城为野道；郊外道路，分五个等级，容车三轨的路，容车二轨的道，容车一轨的涂，走牛车的畛、走马的田间小径。

东周时期，重视交通，常修常管，连接秦岭南北的“周道”，甚至能决定国家的存亡。《国语》记载，东周单子经过陈国，看见道路失修，河川无桥梁，旅舍无人管理，预言国要亡。

秦惠文王打通陕西到四川的道路，再次修筑褒斜栈道。

楚汉战争时，韩信一面让部将带小部队出子午谷，做出进攻陇西

的态势,吸引秦军主力,一面率主力从古汉水源头散关杀出,沿陈仓(今宝鸡)“故道”突入关中,打得秦军措手不及。

“明修栈道”,连通陇西、鄂西的畅通水道,舟楫便利;“暗度陈仓”,沿“故道”一路靠近陈仓,在粮草、兵员的输送上,利用畅通的古汉水水系,顺利地完部队战略集结。

军事地理。逆地理阶梯线、反逆俯冲东方之势。

天助地利。史上唯一由汉中反攻关中的成功战例。

公元前186年初,武都道(今陕西略阳、宁强一带)爆发一次规模不低于7级的大地震,时断时续,余震持续,整整八个月,山崩地裂,陕甘交界地区被震得面目全非,古汉水在宁强阳平关处上承西汉水,地震使汉水河道在中游与原有的上游中断,西汉水与故道水脱离原始的汉水水系,转而南入今广元市辖区,构成新的嘉陵江水系与嘉陵江河道。

古汉水被震成嘉陵江、汉江两条江。

陈仓古道也被震“崩”,不复存在。

《汉书》称:“(高后二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

“武都大地震”造成,今汉江中源汉嘉分水岭一带巨大的山体滑坡,古汉水上游形成规模巨大的堰塞湖。堰塞湖天然坝体(汉嘉分水岭)的存在,导致古来贯通的水路交通被切断。

地震活动引起的大型山崩,今汉嘉分水岭的形成,“天池大泽”消失,山势阻断,嘉陵江袭夺古汉水,形成武都、天水通道走廊,秦岭也被分成地理意义的两部分,“西秦岭”出现。

阳平关(今陕西勉县)和嘉陵江之间的道路,被震得崎岖难行。

溢流改道。与之并行的白龙江,分割岷山与西秦岭,两江合并于广元昭化镇。

类似情形,后来也出现。1933年,叠溪(今茂县北部)发生7.5级地震,在迭溪城下等地,岷江两岸的山体崩塌,形成三座100多米高的天然坝,将岷江切割成数段,形成堰塞湖。

三国时期,诸葛亮出师,将汉中作为北伐的基地,因要连续跨越巴山、秦岭,艰险难行,常规车马不便同行,蜀军只能用畜力车、人力车、旱船、滑索、桥子、背架等,粗笨的交通运输工具,在“难于上青天”的金牛道上艰难行走、运输,于是发明了运输粮食的“木牛流马”。

军事行动本质，“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

用兵路途遥远、艰辛，军需物资成本高，经济消耗极大，从而影响持续作战能力。

无可奈何，不得不一次次地因为粮草供应不足退兵。

屡次北伐，蜀汉皆无功而返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不是“武都大地震”，中国的历史会改写。

“栈道之乡”。通过汉水，南方伐北方将成为常态，汉中和成都平原的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将变为夺汉中而得天下。通过汉水，再到天水，中国向西域的扩张更加便利，对西域的控制范围，将更加广阔……

“葭萌之战”的“西汉版”。

汉朝占据长江上游，轻易征服南方政权。

从“南郑之争”到“葭萌之战”，汉中的军事价值远远大于经济价值。秦国“闪电战”攻灭巴蜀，占据楚国上游，取得战略优势，顺着古汉水，攻取汉中、黔中等郡，使楚国一蹶不振……

“武都大地震”后，汉中的经济价值远远大于军事价值。当钟会、邓艾伐蜀时，虽能迅速夺取汉中，但却受阻于金牛道上的剑门关一带，以10多万大军攻打剑阁数月，依然无功而返。

曹操消灭汉中张鲁后，惊呼汉中之地为天狱。

诸葛亮也堪为汉中谷道所苦，每条天道运粮，都是重中之重。

“上邽之战”，本来大胜司马懿，却因为粮尽退兵；“五丈原之战”，干脆在关中屯田取粮，不全指望从汉中运粮，准备长久之计，只是生命却没战胜时间，“出师未捷身先死”。

能深远影响军事形势千年的大地震，只有“武都大地震”。

多少功名，都在地震之下，化作一抔黄土……

从「南郑之争」到「葭萌之战」，汉中的军事价值远远大于经济价值。秦国「闪电战」攻灭巴蜀，占据楚国上游，取得战略优势，顺着古汉水，攻取汉中、黔中等郡，使楚国一蹶不振……

穷追不舍，司马错不给古蜀王半点喘息之机。

无力回天。在固守成都城的最后两天，开明十二世传位于10岁的小儿子，后人称“蜀泮”“开明泮”，决定辗转南迁，战术上防御性地转移到云南，战略上决定性地南下攻击交趾。

“蜀泮”在武担山出生，开明十二世为避免“宫斗”，让儿子5岁就离开蜀王宫，以幼稚之躯，回到以穿青衣（青黑色）著名，又有青羌之称，河流得名“青衣江”的领国，跟着辅臣工匠皋通训练以马船、粮船、坐船、战船混合的水军编队……

青衣羌国建于公元前816年。

雅州《樊敏碑》，称为“青羌”。

汉代文献称为“青衣”“羌氏”。

比喻为都蛮獠类，源自氐羌的“神都”“神荼”。

国都在今雅安宝兴灵关镇。

领地，今雅安至乐山的青衣江流域。

汉代青衣羌国，领雅安、卢山、名山三地，扩展至宝兴、天全、峨眉、乐山等地。

北周，置平羌郡，郡治今乐山市。

峨眉为平羌县，乐山城为平羌镇。

代代相传。在成都平原，仍然保持古蜀淳厚的千古遗风，在蚕丛主要的活动的岷江、湔江河谷、青衣江流域，仍然是一派桃花源似的乡风民俗，同时，仿照青衣神的衣着，仍然着青衣、裹青帕，唱着祭祀青衣神的带哭腔的山歌，怀念青衣神。

以蚕丛为祖神的青神，栽桑养蚕一直贯穿于历史的进程中。

青衣县，青神最早设县时的县名。

县城所在地，在与中岩西寺隔江斜对的瑞丰镇，地处岷江航道主要码头，西魏恭帝（554年）时，成为县城所在地，直到北周，更名青神县仍为县城，到唐武德八年（625年）才迁走。

文明中心。“西眺雪岭，东望长松”。

风水宝地。龙泉山，中国山川的主龙脉。

龙泉山脉的长松山，离成都20公里，城市东面第一高峰，海拔为1 051米，“诸山皆发脉于此”，也是往西的芦溪河、往东的绛溪河的水脉源头。芦溪河，下游是黄龙溪，沿途栽桑养蚕。

三国魏晋时期，龙泉山是岷江与沱江水系的分水岭，叫分栋山。

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改灵地县为灵泉县，分栋山改称“灵泉山”，明代，称“龙泉山”。龙泉街道旧名王店镇、灵泉镇。

追根溯源。成都的官员、百姓，选择在长松山上修建纪念先祖的蚕丛王庙。

在祭祀时，人们依照蚕丛的装束，穿上青衣、裹着青帕，代代习俗相传。

祭祀的队伍中，包括成都府、成都县、华阳县、灵泉县的官员，蜀锦的商户、织户代表，缅怀蜀先祖蚕丛王，誓要利用蜀地的优势资源，将蚕丛王教授的栽桑养蚕、纺织技术发扬光大。

长松山的得名，来自长松寺。

“西蜀天漏”。成都平原洪灾雨水，木船、竹筏众多。

古蜀龙舟，水上指挥作战中心，平时用来运载士卒、军器和粮草给养，加配战具，成为参加军事行动的战船。木船、竹筏在两军对垒，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被征集、使用于军事行动。

逐水而居的青羌人，利用水对竹木的浮力，造船操舟，渡涉江河。

古蜀“训练”的水军，依靠青衣江边的崇山峻岭，并未形成“编队”，只能使出平日渔猎的功夫，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秦军较量，一败再败，向青衣江下游夹江、乐山一带转移……

三路突围。一路，古蜀国的丞相、太傅与太子向北，逃往彭州；一路，“蜀泮”与王室贵族向南，在荣经集结；一路，突围至今眉山彭山区牧马镇、武阳镇、成都双流区黄龙溪镇一带。

《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自於葭萌拒之。败绩，王遯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死於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古蜀国的丞相、太傅与太子“逢”，率部退到湔江故地“海窝子”的“瞿上”继续抵抗，不久也被秦军全部消灭。最后，蜀太子也死于形如覆钟的彭州白鹿顶上。

白鹿顶即白鹿山，白鹿河上游，彭州白鹿镇旁边，海拔1700米，站在顶上，近可看川西平原，远眺也可以观看九峰山、盘龙山，天气格外好时，甚至可以仰视狮子王峰。极佳的观景平台。

在“武阳”，开明十二世被秦军全军包围，死于乱军之中。

享年95岁。生命力旺盛，85岁时还能有个小儿子。

“蜀泮”，在王室贵族保护下，按照老蜀王的“部署”，带领3万强

巴蜀图语，「图画」和「文字」，又称「巴蜀符号」「巴蜀图形文字」，集中了古蜀文明的神奇。每一个单薄的图符背后，都可能掩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活跃着一群生动的面孔。

将精兵与皋通的儿子，以“灵关古道”为中轴线，且战且退，向南至荃经，集结各部族武装准备与秦人，殊死一搏。

西南密林。4 500年以前，从成都南下便存在着一条“神秘走廊”，由陆路、水路组成，经过川、渝、滇、黔、湘、桂、粤等省区，往东直达广东的珠江口，往西进入南亚，往南进入越南。

蜀商最倚重的蜀马，很早就传入越南境内。

成都平原的河道上，过去有一种用粗竹做成并挂有帆的竹筏，在越南北部的河道上很常见。日本史学家西村真次认为，竹筏的雏形始于成都平原，随古蜀土著的南迁，传播到越南……

长驱直入，秦军攻破古蜀国都城。

攻下成都，仅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十月，取之，遂定蜀。”

在成都城被攻破前，开明十二世就安排在牦牛道的起点、开明王朝的铜冶基地荃经，组织最后一道防线，让快马手持“巴蜀印章”，联络沿途各部族在荃经集结，听由“蜀泮”指挥。

印章雕刻着图案：手持利刃的武士，张开的手、鲜红的心脏。

目报于蜀王各部族首领的徽记，开明王分发给各部族的信物。

巴蜀图语，“图画”和“文字”，又称“巴蜀符号”“巴蜀图形文字”，集中了古蜀文明的神奇。每一个单薄的图符背后，都可能掩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活跃着一群生动的面孔。

可能是巴蜀部落的图腾，也可能是边关重镇商贸通行的信物。

做部族首领，必定有自己的土地、世系，甚至族徽。

古蜀文字出现时间较早，中国除汉字外唯一发现

的先秦文字。

商周至战国时代，古蜀在使用自己的文字的同时，也使用中原文字。

“燹道有故蜀王兵阑”。《华阳国志》记载：在古蜀国的最南端邻近獠燹（今云南曲靖马龙、沾益一带）的地方，还有一处被称作“兵阑”的军事设施，放置兵器的栏架。

茱经，离成都175公里，最早是楚人建立的岷山王国，北接成都平原，东、南、西三面，被海拔达3 000至4 000米的牦牛山、瓦屋山与邛崃山环绕，南下便是邛人、笮人等部落的地盘。

“巴蜀印章”出土共有百方，仅茱经一地就有80余方。

深藏于山中的军事要塞。建筑在一个地势险要的茱河阶地上，以山岩陡坎作屏障，易守难攻。背靠大山，下临茱河的严道城，地势平坦，土质肥沃。

古代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分界岭。

大相岭，四川的南北分界线，经常路过的人都知道，阴阳两界，“穿过泥巴山，晴雨两重天”，茱经一边，清风雅雨；汉源一边，阳光灿烂。

《西游记》中的“黄风岭”，原型可能是大相岭。



陆

柒

捌

玖

拾

蒙经决战，一如“葭萌之战”。

秦人的强大，已超出“古成都人”的想象。

惨败。“蜀泮”带领残部，分两路辗转南迁。

一路，沿“灵关古道”，逃至今西昌和云南姚安，辗转南下入广西；一路，从宜宾经高县、筠连的“朱堤道”，进入云南，折向东入贵州，借道夜郎国，沿北盘江直去广东，进入交趾。

了如指掌。“蜀泮”与随从对“南方丝绸之路”与路线。

“南越之南”。

古越南人两个脚趾相交，被称为“交趾”。

纠缠千年的历史渊源。交趾属百越的骆越之地，北起广西红水河流域，西起云贵高原东南部，东南至越南的红河流域。越南人祖先貉龙君为“神农氏”后代，涇阳王与洞庭君龙王之女所生之子。

越南官方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越南第一个王朝是由雄（或雒）王建立的“文郎国”。雄王有一个美艳公主，先世蜀王想要为王子娶其为太子妃，雄王没有同意，导致富裕的古蜀国怨恨……

声东击西。秦军知之已晚。

神秘消失。“灵关古道”上，行色匆匆的迁徙队伍，3万军队、2万匠民，有志忑不安的官吏，有专司祭祀的巫师，有负责筑城的工人，有制造青铜器的匠人，还有成都城逃出的百姓……

“古成都人”，穿着左衽的细苧麻布衣、丝衣，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背面比正面

长，像长着尾巴一样；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

在三足陶盃里，烹煮肉食。

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

把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收藏、陪葬。

对襟衣，军士中穿着较多的服式。

无领服装，对襟长袖服，窄袖长至腕部，无衣领，两襟相交露出颈部在前面成V字形，腰间系带两周。衣服上有明显凸出的纹饰，上身前后为云雷纹，两肘部为变形的夔龙纹。

军士不论拈弓射箭，还是持稍挥刀，都身心合一，得心应手，进退自如。

一组7个排列整齐、面目冷峻、骑马挥刀的军士，阴森恐怖。数以千计的重甲骑兵驰骋疆场，冲锋陷阵，有如决堤洪水，一泻千里，所向披靡，奋力劈杀。恐怖的血腥格杀战争场面。

沿着“藏羌彝走廊”，“古成都人”继续南迁。

“从蜀宜径，又无寇”。

古蜀王作为西南夷诸族之长，长期控制着西南夷地区，关徽常常开放，从西南夷道出境外，由此至缅、印而达中亚大夏（今阿富汗境）、西亚，实比从西北和北方草原西行，更容易。

沿途，“蜀泮”的背影几乎如影随行。荦经严道古城附近发现一批军事墓葬，出土棺盖蜀纹，大量典型的巴蜀式兵器，铜戈、铜矛、铜剑，上面雕刻着虎的头颅、蛇的尾巴。

一种象形符号，一个符号就是一幅图画。

有完整的故事寓意，但不能作为文字连接起来解读。

图语刻在青铜器、印章上。

以近乎玄秘的方式，代代流传。

结束结绳记事时代，创造出称为“巴蜀图语”的原始文字。分为两类：以图像为主，集中在商周时期的多种兵器、印章上，字数极少；以方块为主，表现在周后期的兵器之一“有胡戈”。

巴蜀图符简化、创新，慢慢成为“巴蜀文符”，形态比较接近古彝（夷）文，文符大多作为印章、器物的标识，抑或类事表达。直到开明时代，才慢慢向“巴蜀文字”转变进化。

丰富的形制、玄妙的纹饰。

巴蜀文字与甲骨文、金文不同，从方块字而非拼音字，直行而非

沿途，「蜀泮」的背影几乎如影随行。荣经严道古城附近发现一批军事墓葬，出土棺盖蜀纹，大量典型的巴蜀式兵器，铜戈、铜矛、铜剑，上面雕刻着虎的头颅、蛇的尾巴。

横行。目前发现的“巴蜀图语”达200多种，造型有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等。

虽然在文字上没多大突破，但此时古蜀的通行语（羌汉）结合羌汉彝三地的发音特点，去异取同，慢慢形成了原始的古蜀通行语——尔玛语（尔苏语前身）。

“古成都人”似乎想通过“巴蜀图语”，表达对古蜀先王的尊敬、怀念。

成都三洞桥战国遗址出土的铜勺勺面上，刻了五个巴蜀符图，上排是鸟文、鱼文，下排为龟文、心文。一处图语，似乎代表一位古蜀先王。鱼文，代指鱼凫；鸟文，代指杜宇；龟文，代指鳖灵；心文，如同虫状，疑为蚕丛。似乎在释说古蜀诸先王永远长寿，带有祈祷之意。

象形功能，看图解意，用符号记录信息的手法。

异曲同工。与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的QQ、微信中，一种用符号来表示心情的“颜文字”。

在中华文明的上游，汉字不是独霸天下的存在。在夏王朝之前，文明并非一统，“夷夏东西”，“夷”与“夏”的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交相辉映。

历史凭借地理而生，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不是南北。

太行山，“东西”的地理标志，以东，属于夷的文化区，以西，属于夏的文化区。以东，北到辽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乃至上游，这一半月形地带，应该都属于广义的夷文化区。

因对峙生争斗，因争斗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发展。

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伏羲始画八卦，起初用于记事，被认为是中国文字的始源。

山西陶寺文化的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证明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

独立的系统，即东方夷（彝）文字系统、西方夏启建立“家天下”的夏文字系统。

商代甲骨文里，目前发现五条有关“文邑”的卜辞，“癸酉卜贞，文邑受禾”“壬申卜贞，文邑受禾”等。古籍记载，夏禹名叫“文命”，夏代也叫“文夏”；现在推考的夏代王庭叫“文邑”，都强调“文”字。

“文”就是修养自己的内心，修养道德。这样的一种文化面貌与太行山以东的夷文化完全不同。《礼记·表記》中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

陶寺最晚期的遗址，实际上是夏启所建的王庭。

权力斗争。“益干启位，启杀之”。

陶寺遗址分成早、中、晚三期，没有城墙的文邑出土在最晚一期，早期、中晚期都发现有城墙。巨大的变化。早期的城墙被推倒，宫庙被毁弃，男人被杀戮，甚至女人被绝嗣。

夏启建立夏王朝，一场“革命”。

在最晚成于西周早期的周易《泰卦》“上六”爻辞中，发现了线索：“城复（覆）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殷商的大邑，没有城墙，不可能有“城复（覆）于隍”之事；商汤灭夏桀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夏朝已经叫“邑”，商汤所建的叫“亳中邑”，不可能有“城复于隍”这样的事。造成这一“革命”性巨变，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夏启建立他的“家天下”时，开创了文邑制度。

“家天下”王朝，将文邑作为宫廷。

“文邑”为夏代文字，也就是甲骨文的祖先。

“邑”，没有城墙，居住一个族，或一个分族，族与族之间通过环壕限定，环壕只起到防御野兽的作用。在夏商周三代的文献里，王庭统统都叫“邑”，没有城。四面有城楼的叫作“墉”。

《尚书》里记载，盘庚迁殷“于兹新邑”。

西周初期周成王所建洛阳，叫“雒邑”。

《周易》“夬卦”有爻辞云：“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王宣命教化于王庭，王庭是没有城墙的邑，“不利即戎”，一打仗就溃，但“利有攸往”，利于王命的传播。诸侯封建于王庭的周围，重要的义务就是拱卫王室。

2004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的安诺遗址，出

土一枚史前石制印章,印面刻有3或4个文字符号,内有红色笔迹。科学测定确认,制作年代距今4 300余年。

甲骨文前还有文字,经过很长时间、甚至千年,才最终演化成甲骨文。

逻辑推测。甲骨文前“处于演化之中”的文字,安诺印章难道是夏朝的文字?

“夷夏交胜”“夷夏东西”的格局,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夏文字在殷承夏制、周承殷制的接续中,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得到强劲的发展。

统治者为实现政治扩张、王权统一的理想,将文字变成最主要的文治教化工具。

“夷夏东西”。从多元到归一,经夏商周三代,成为一统。

“月朗星稀”。夏商时期开始,中原文明在中国地域之内,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青铜文明非常发达;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日月同辉,遥相呼应。

独立发展。古蜀文明连续不断向前发展。

令人惊奇。目前仍然没有从发达的古蜀文明中发现文字。距今5 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达到早期国家水准,但只发现刻在玉器上的图像符号,没有发现像丁公陶文那样能多字连缀成篇的文字体系。

青铜文化、马与马车文化、牛与牛奶文化、羊与羊毛加工四大技术,从4 000年前左右,夏代初期便进入东亚夷文化区域。此外,传入夷文化区域的还有小麦、火葬墓和支石墓、黄金崇拜、天崇拜、砖(瓦)等。

三皇五帝传说的合流、五谷六畜技术的汇总等。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东亚文化与外来文化,逐渐融合,形成夏文化。

陶寺可能是夏邑。

重中之重。尧、舜、禹时代,以祭祀为大,用玉器祭祀。

打仗次要,战争不是主旋律。

从夏启开始,战争变成主旋律。

青铜兵器的出现,戎与祀成为国之大事;夏启的王位权力通过战争夺取,不是禅让而来,战争正好是陶寺的灭亡和石峁的兴起,中

国从“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王国”的主要转折点。

宗教性质的文字，都是象形文。

人神之间的交流，除了嘴，眼睛特别重要。

通过文字、图符完成眼神的交流。

“纵目”，一种眼崇拜，表现眼神深远而精准。

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只有两种经典形象：一种是只有空洞的眼眶，嘴角都往下撇，一副哀苦的样子；另一种则是眼珠夸张地突出，嘴角都笑着上扬，欢快、愉悦模样……

祭祀区5号坑出土的金面具，在古埃及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中，也有使用黄金面具的呼应。在希腊，有一尊古老的青铜雕像，与“青铜大立人”一样，留下无尽的悬念。

雕像铸造时间，距今3600多年，左手水平伸展，右手向后举起，无法考证右手握着的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的雷电，还是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具体身份无法确认。

硕耳纵目、高大神树、形似汽车方向盘的神秘圆盘……在古埃及、玛雅等文明中，也有引起这类猜想的文物。古埃及的壁画，与“方向盘”造型颇为相似的图案，“方向盘”不是太阳。

与世界的神奇“互动”。三星堆、金沙村与大约同时期其他世界文明的种种“巧合”“互动”，也表明人类文明的绚烂多彩与互鉴共鸣。

三星堆、金沙村两个遗址有不少文物“撞款”。

有个泥塑陶猪呆萌可爱，与“愤怒的小鸟”中的反派绿猪极其相似。

商周年间，古蜀文明就已走“国际化”路线。

向西，“蜀身毒道”。

成都平原就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发生文化交流。印度地区所发现石斧、有段石锛，沿陆路“蜀身毒道”，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沿海路进入盘福加。印度河文明哈拉巴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马亚来与马来族的素梦、招魂巫术，与中国南方的楚风亦多相似，竹王的神话，与“西南夷”的信仰同出一源。

向南，与“南岭走廊”贯通。

“灵关古道”从成都出发，经邛崃的“临邛道”，至雅安，上名山、荥经的“青衣道”，汉源，再逾小相岭，登越西的“牦牛道”，连西昌

“建昌道”，至泸沽、会理，渡金沙江，经云南昆明、楚雄，至通海，循盘龙江（清水河），经元江，下红河至越南北部的红河道、安南道相往还。或从成都经夜郎（夜郎道），至番禺（今广州）的牂柯道。南方丝绸之路。

海贝、牙璋等文化交流，也通过红河道实现。

大、小相岭以南，历来是“西南夷”部落的地盘。

越西、西昌、盐源、昭觉、会理等地，沿途留下了不少墓葬与青铜器。

有些部落，定居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

失去记忆的尔苏人。在四川凉山的甘洛、越西、冕宁、木里，雅安的石棉、甘孜州的九龙等地，分布着一支迁徙而来，总数仅两万余人的族群——尔苏人。躲避战乱、屠杀，逃亡到深山，居住在凉山的甘洛、越西，雅安的石棉、汉源四个县，散落在“灵关古道”地区，史称“河道七场四十八堡”中的二十九个堡。还有4 000人的族群生活在深山，与周围仿佛格格不入。

尔苏人男子，普遍高大英挺，头发微卷，高鼻深目，脸部特征极似三星堆出土的铜人面具。尔苏妇女，多缠黑白布帕，用银泡点缀额前，服饰精美，刺绣水平极高。三星堆玉璋中，一些代表日月星崇拜和时辰的图形，在尔苏人的经卷图画文中也有出现。

不是藏族。甘洛县的尔苏人，古羌直系后裔，被秦军追驱至此。

“滇以北”的安宁河流域，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以邛人最为强大，与夜郎人、滇人、昆明人，鼎足而立。邛人保持着一种恐怖的军事制度，“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

七支部落，七支部队。

战争来了，举族皆兵。

靠亲情、血缘维系的军队，战斗力强悍。

安宁河流域，两侧为山地，中间形成一个宽约40公里的槽型谷地。土地肥沃、日照充沛，邛海和安宁河，提供充足的鱼类资源。邛人自由游荡，大声歌唱，《后汉书》记载，邛人“俗多游荡，而喜讴歌”。占据整个安宁河流域，大概分为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米易、普格七大区域，每个区域相对集中，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应着邛人的七支部落。

平时沿河而居。

一有战争，就变成七支军队。
充满传奇色彩的七部营军。

邛人亦醉心于拓展疆土，一直试图往大渡河流域渗透。

《华阳国志》载：邛崃山，原名邛笮山，邛人、笮人的分界线，邛人屡屡北上试图翻越，遇到剽悍的笮人，大多无功而返，始终未能有突破性进展，故更名为“邛崃山”。

安宁河谷虽名“安宁”，却危险、杀机潜伏。

团团包围。北临蜀国，南有古滇，东接夜郎，西望笮都，西南则是昆明人。

春秋战国，青铜大量投入战争的时代，环绕安宁河流域的古滇人、笮人、夜郎人、昆明人生活的地域，中国西南出土青铜兵器最为集中的地带。七部营军再剽悍，也难以抵挡锋利的青铜兵器。

扩张草草收场，百般无奈，只有退守安宁河谷。昆明人、笮人、古滇人、夜郎人，一直觊觎着邛人广袤丰茂的领土，如同一个落魄的地主一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领土落入他族之手。

“灵关古道”藏了多少秘密，至今无人能说清楚……

在“灵关古道”上，仿佛隐约还能听到刀剑碰撞的声响、悠长的号角声。

伴着凄婉、悲凉的羌笛。

王室贵族保护着“蜀泮”，按照老蜀王“秘制”的路线，向尚处于莽荒状态的中南半岛挺进。前往百越，与成都平原一样土地肥沃的平原。同祖同源，那里住有同为炎帝后裔的族群……

青铜兵器的出现，戎与祀成为国之大事；夏启的王位权力通过战争夺取，不是禅让而来，战争正好是陶寺的灭亡和石峁的兴起，中国从「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王国」的主要转折点。



陆

柒

捌

玖

拾

忍痛告别家国。

“古成都人”主要分三路向南迁移。

一路，沿岷江而下，先在成都平原边缘的乐山盘桓，不愿走的伤兵、妇女就地留下。

这一路，吸引秦军主力部队，掩护其他两路。

一路，沿“灵关古道”经邛崃、汉源至今西昌，短暂休整，招揽散兵游勇，补足粮草，南渡金沙江而入姚州（今云南姚安），经今云南礼社江、元江，顺利进入交趾，盘占红河平原。

一路，沿青衣江、雅砻江南下，至宜宾、泸州等地入贵州，借道夜郎国入云南。云贵地区为楚国势力范围。稍得喘息，从滇池至文山，再沿泸江（盘龙江）上游，进入越南北部宣光地区。

路途的艰险，丝毫不亚于劫匪的凶悍。

雷雨的天气，山谷中没有悠远的铜铃，只有清脆的马蹄声响。

北纬28度，攀西高原的阳光，温暖的大凉山翻涌的云，留住小相岭湿润的风，滴滴汇聚的清泉，崇山峻岭间的灵关古道，仿佛从古老而幽暗的历史深处，穿越而来……

相同的空间维度，体验不同的时间维度。

真正意义的古道，一条贯通古今的小路。

马帮的蹄印，人的脚步，“得得”叩击着古道边故乡的耳膜，穿过野花满径的石板路，温润着故乡的梦幻。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情思。

古道永远维系着故乡。

沉默的古道，满布青苔。

忘记曾经的繁华、喧闹，只有一片静谧、无声。

一天天，一年年，不知多少年月，多少马帮行走，才会形成旷世之作。

以攻代守。从贵州、云南，再到桂西、桂中，艰苦跋涉，千里跃进。

“蜀泮”一面设法与秦军作战斗勇，一面沿途与土著部落周旋斗智，练就聪明才智，与沿途许多部落联盟，被众多雒越部落推选为首领。加上沿途陆续加入的部落族人，带有10万之众。

并非真正的军队。

由军人带领着的移民队伍。

时间不到两月，到了广州。

随军的匠民，在小皋通随从指挥下，建临时行宫。

地面城池。同是不到两月，在“泮溪”建起一座规划四正、街巷宽敞的微型城市，如江苏常州武进的淹城。几层环水，水护城，城依水，有石兽两只，一只鹿，一只羊。广州建城之始。

淹城建于春秋晚期，距今有近3 000年的历史。

“三城三河”的建筑形制，中国独创、世界唯一。

面积约0.6平方公里，宛如一座深奥莫测的水城迷宫。

与《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廓”的记载相吻合。

吴中平原的中央地区，依山、傍湖、近海，不像帝王都城，而像屯兵的军事堡垒。一说是先祖夏末君主夏桀的离宫，一说是商末周初奄国的国都。应是吴国的军事城堡，战略地位重要。

有“神龟救淹”“双龟造河”等十大传说。

异曲同工。成都筑城传说的“常州版”。

“泮溪湖”南部，用太子“逢”之名，命为“逢源”。

休整几月。为进入“交趾”修养生息，恢复元气。

秦军闻讯，追杀“蜀泮”抵达广州。仍是知之已晚。

抵达交趾的时间在公元前315年末。

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土著部落政权“文郎国”。地处红河萦回贯注地带，每年雨季必汇为泽国，而潮水涨消，带来肥沃泥沙，宜于垦殖水稻，这里的西瓯、雒越两族也多以农业为生。

结绳记事。土地称“雒田”，百姓称“雒民”。

马帮的蹄印，人的脚步，「得得」叩击着古道边故乡的耳膜，穿过野花满径的石板路，温润着故乡的梦幻。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情思。

“雒”即“鸟”，有“雒田”即“鸟田”之说。

雒田在海边，田地的大小，依潮水的上下涨落而定。

文朗国以“东山文化”（越南清化省东山村遗址得名）为代表，以青铜鼓出名。

“蜀泮”与“古成都人”，再不是“得且住，为佳耳”的“小富即安”。在收服西瓯后，常望着雒越的野玫瑰们发呆，血液里的创业基因、心中的扩疆大计，如火焰般燃烧。

地域的逐渐扩展，带给他们难言的幸福和快感。

这种快感，在与瓯雒的争斗中依旧得到延续。

“蜀泮”从11岁进入百越地区，逐渐收降当地的西瓯族，慢慢形成一个强大部落联盟，指挥数百次军事行动，身先士卒。经过40多年的历练，逐渐“独霸”红河三角洲，呼风唤雨……

南越、雒越、西瓯总兵力才5万人。

抵抗秦军后，仅有3万兵力。

古蜀国已历4 800年，开明王已到“十三世”。

文明程度高，与秦国军队、百越部落长期战斗，沙场久经，作战经验丰富。

雒人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射猎采集阶段，“射生为活，吞噬昆虫”，在曾经富裕、强大的古蜀国“蜀泮”军民面前，慢慢地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平原土地，不得不迁徙到更加荒凉的山区。

《水经注》中写道：交趾北部，“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水上下。民垦食其田，谓之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铜印青绶”。

既无文字，也无政权，更无姓氏。

“文郎国”只是部落联盟，还没有达到国家的层面。“瓯雒”的“瓯”，指“西瓯”（今广西西南、越北的越族），“雒”指“雒越”（今越南西北，古百越族一支）。西瓯、雒越各部落的领袖。

文明与原始的碰撞，战争无可避免。

“废武备而不修，惟日事酒食为乐”。

自恃强勇。雄王不可一世，一如当年古蜀轻视秦军的真正战力。

公元前257年，雄王仍在美人醇酒中潇洒、倜傥，在正当壮年“蜀泮”的一声高呼“冲锋”中，“文郎国”灰飞烟灭。直到蜀军攻入，如梦初醒的雄王，吐血投井。

复兴“蜀国”。

“蜀泮”将西瓯、雒越两国合并，新建“瓯雒国”。

史称“安阳王”。《太平寰宇记》引《南越志》：“瓯雒国安阳王，巴蜀人也，姓蜀名泮。因先祖求雄王之女媚娘为婚，不许，怨之。泮欲成前志，兴兵攻雄王，灭文郎国，改曰瓯雒国。”

雄王子孙。越南官方史书采用的神话说法，最早的王朝是鸿庞氏，首位君主禄续，神农氏炎帝四世孙泾阳王，被封到南方的百越，娶“洞庭君龙王”之女，生“百粤之祖”的貉龙君。

长子称为“雄王”，继承王位，建立“文郎国”。追为国祖。

“文郎国”，传了十八世王，首都在今山岭地区的越溪，地形险要；瓯雒国，首都在今河内以北17公里的东英县境内，一马平川，二者相距颇远；雄王建立的“文郎国”都城，未见有城墙。

在《史记》中，安阳王的瓯骆国，司马迁称作“瓯骆”。

东汉班固的《汉书》中，也叫“瓯骆”。

越南京族（越族）、黎族、水族与老挝龙族的祖先。

建造首都“螺城”。

规模庞大、结构独特的军事防御工程。

重要“粮仓”。今河内和古螺城一带是平原地区，要站住脚，有效地抵御秦军，一定要有城墙的保护。“把成都搬到交趾”，“蜀泮”军民在像故乡成都平原一样肥沃的大平原上建立了国家。

冉冉升起。一个新的古蜀王国在交趾。

略显沧桑。“蜀泮”离开成都平原只有10岁，少年老成，如今已经69岁的安阳王，看不出君王的威严容颜，生存环境所迫，需要处心积虑地运用超常的智慧，才能挣扎出一片天地出来。

定都封溪。“安阳王”，“开明王”的同音异写。

“安阳”读音，在上古时期与“开明”相近。

封溪建城，费时九年。城曲缩如龟。在越南古籍《岭南摭怪·金

龟传》中,记载古螺城:“筑城于越裳之地……其城延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曰螺城,又曰思龙城。”

城“随筑随崩”,便立坛斋戒,祈祷百神。一金龟出现,“助王筑城一月而就”,事与在公元前311年张仪筑成都城略同,俗称“龟城”。地形与方位格局与成都吻合,都适应地舆环境而建。

一脉相承。成都筑城传说的“越南版”。

如今,成都市中区青石桥地段,当年神龟殉难之地,青石桥古名叫“龟化桥”。

又一个三星堆、金沙城仿佛降临。

古蜀文明的延续。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共筑三重夯土城垣,城外有护城河,外城周长8公里,内城周长6.5公里,宫城周长1.65公里。

三星堆商周遗址面积26平方公里,成都春秋战国遗址面积达15平方公里。

都大于中原同期城市。

古蜀的都城建设技术比中原地区发达,都城建设时间也比中原早。

到了汉代,从成都至交趾的水路交通,也比以前更为便利。

四川、云南和今越南北部,已有了经红河航道南北往来的水陆通道。《汉书·地理志》记载:“(西随)麋水西受徼外,东至麓冷入尚龙溪,过郡二,行千一百六里。”

云南的西随水(金平北部一段红河)与交趾麓冷县相接,许多支流入交趾郡尚龙溪,由红河口入北部湾。这打通了中国内地与北部湾沿海的交通,为西汉更好地经营南方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瓯雒国建立后,“安阳王”不断召唤成都平原的子民,前去安居乐业……

越南的京族、芒族,百越之中的“骆越”(雒越)。

漫长的历史时期,雒越中融入了占人、高棉人,形成今天的越南人。

中国中原地区,也有大量的汉人迁徙越南。

越南语中有70%以上的词汇,来自汉字。

语法与汉语的语法却差别很大。

越南语中的汉字词的发音,保留中古汉语的发音,汉字不是表音

用「成都模式」来治理。越南冯原和成都平原相隔不远。三星堆到安阳的直线距离，大约1000公里。金沙城到越南河内，大概也就1000多公里。

文字，可“书同文”，不必“语同音”。在古代，要做到“语同音”也很难，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汉语的语音发生的变化很大，越南语中的汉字词，保留的是中古汉语的发音，加上汉字传播到越南，发音也会融入越南当地人的语调、声调，就很难听得懂越南语中的汉字词。

冯原遗址。位于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属于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文化的过渡时期，距今约4 000年，根据同时期中国和越南的史料对比，基本确定冯原遗址的玉璋由中国传入。

史学界通常把公元前316年看成古蜀国的终点。

安阳王南迁到交趾建国，这段历史是否也该改写？

古蜀国、秦朝兴盛之时，正是马其顿王国的“希腊化时代”，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迦太基被罗马削弱；埃及托勒密的第三位法老逝世，继位的托勒密四世治国上没有才能，受到臣子的控制，爆发了南叙利亚战争；古印度属于孔雀王朝时期，依然是奴隶制王朝；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去朝鲜半岛北部，早已另立国家，历经多代，史称“箕子朝鲜”……

融入富裕的农业帝国“宅兹中国，自之牧民”。

已走下第二级地理阶梯，突入第三级地理阶梯。

相当于新蜀国的“瓯雒国”承前序后的崛起，更近似于丛林法则，从老虎到狐狸，生态链不断萎缩，红河三角洲的民族整合与被动融入，古蜀国以农耕文明的绝对优势，在遭遇“困境”后，通过刀耕火种，反而拓展生存空间。二三级地理分界线的岭南丘陵、三级地理分界线的海洋，永远是涪民的避退之路。

“瓯雒国”重复上演“箕子朝鲜”的故事。

“文化梯递”。东南沿海、东南亚一带，居住着百越等松散的部落，组织程度非常低，国力残弱，社

放弃非主流文明的过程。不断扩大文明边疆，周边族群不断加盟、内卷，或内化，就是认同中国主流文明，

会环境、经济思维与第二级地理阶梯的族群更加接近，更易建立统治秩序。内陆腹地民族的选择，永远是向东、向南。使得东亚长期游离于主流文明之外，也在无形中，救东亚数次。

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选择，在1949年国民党军队，溃退宝岛台湾。

“双循环”。中国的“天下”，没有边界。

不断扩大文明边疆，周边族群不断加盟、内卷，或内化，就是认同中国主流文明，放弃非主流文明的过程。农耕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荒土之上，屯邸田园、贵戚士人的存在本身，依赖于文化不间断的输入。在商品交易相对匮乏的时代，自足农业本身的弹性空间大，庶民可以吃得简单点，贵戚的屯邸和士人的田园，也已满足肉食和水果之需。

不管族群、肤色、出生地，只要信奉“仁义孝悌爱国爱家”的价值观，就能做中国人。中华民族即便国破、家亡、人口锐减，只要价值观在心里，迟早会吸引更多认同它的人，然后，重新崛起。

血脉相连。

历史上，越南人和“古成都人”是“近亲”。

越南北部等地的出土文物，与三星堆玉戈、玉璋、玉环、玉璧等礼仪用具极为相似。

玉璋与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几乎如出一辙。

上万件铜镞、100多件铜锄的发现，令人震惊。

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不少在成都都能找到“娘家”。

开明王朝盛行船棺葬、成都十二桥船棺葬，一度被认为是古蜀王的家族墓葬，而在越南海防、朱芹、朱山、越溪等地却屡有船棺出土，尽管年代稍晚，大约相当于中国的秦汉之际。

墓中出土的铜斤、环首铜削、铜拍，在成都也都能找到“原型”。

越南历史上最早的政权，以“文郎国”为第一代，

“瓯雒国”为第二代。从古至今，越南人都把安阳王作为祖先来敬奉，把安阳王建立的蜀朝，作为越南历史上的朝代来记载。

在河内，还有一条大道名为“安阳王大街”，一条路名为“媚珠路”。

河内叫HA NOI，HA就是河，NOI就是内。

红河上的一块冲积平原的城市，叫“河内”。

“同宗兄弟”，成都人和越南人在文化上。

在瓯雒国，祭祀仍是重要内容。

模式相同，尽管赶不上金沙时期的奢华与繁荣。

人口约20万，疆域约横跨整个越南中部、北部地区。

“古成都人”积极地将成都平原实践多年的农耕灌溉技术传入，完全靠摘果子、打猎为生的土著部落，为了能够过上相对轻松的生活，开始走出丛林，加入了“古成都人”行列。

带入先进的文明。

“教民耕稼农桑，始有君臣尊卑之等，父子夫妇之伦”。

河内一带位于红河三角洲的腹地。

经常洪水泛滥，控制洪水成为社会建设工作的主要部分。

“蜀得陆处”，来自成都平原的“古成都人”善于治水，“导江治河”，改“堵”为“疏”，“随山刊木”，从大禹治岷江、沱江、涪江，到鳖灵开金堂峡、玉垒山、乐山离堆，发展农业、福泽百姓，都把治水事业放在首位。瓯雒国模仿治理岷江，建造了堤防、运河系统以牵制红河，灌溉稻作的三角洲。既便于洪水分流，又有利于舟楫、灌溉。

用“成都模式”来治理。

越南冯原和成都平原相隔不远。

三星堆到安阳的直线距离，大约1 000公里。

金沙城到越南河内，大概也就1 000多公里。

在1 000多公里路线上的广西、云南，都找到了跟三星堆相同的一些器物，在越南发现与成都金沙文物相似的器物，不算“新闻”。

“外循环”，文化强大以后，一定会传播出去。

“古成都人”。越南文明不可缺失的“催化剂”。

壮观的迁徙。给越南文明带去古蜀文明的精华。



陆

柒

捌

玖

拾



心念故园，情系北方。

聊解“乡愁”。

珠江三角洲与红河三角洲大小相仿。

公元前251年，在瓯雒国境内离成都最近的城市番禺城，安阳王重建行宫。

“把成都少城搬到广州”。“泮溪”上的行宫，古成都城“少城”中一个“社区”的规模，模式也与“蜀王宫”的规制相同，纵横二三公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国国都该有的都有。

为两千年的古城格局正式定调。

行宫大殿之上，安阳王已达75岁，当了6年的国王，已经有几多白发，面容带着几分越人的桀骜，也保留着一些“古成都人”的样貌，端坐在木头制成的王座之上，不怒而威。

两条水道之间的一处高岗。

位置在今中山四路北面旧仓巷以西一带，约是今文德路、北京路向北延伸线、省财政厅一带。珠江江岸在今西路一带，依山傍水筑城。亦有防御外敌的作用。

天地造化，气势雄浑。

广州城北靠五岭，南临珠海，市内有白云山坐镇。

珠江是独特的广府城市景观。

马路建设也基本同与珠江流向保持一致。

与成都相似。“上风上水”的“水上人家”。延续至今的“龙脉”，成都城区的“武担山”与广州城区的“番禺山”。“神秘链条”，继“越南版”后，成都筑城传说才有了“广州版”。

古广州的核心区域，历代官衙、署衙都建于此。

“云山珠水”。走出大殿，安阳王北看白云山，南望2 000多米宽的“珠海”，左右两条宽阔的古水道，既是天然的护城河，又能提供充足的淡水资源，基本符合成都城的“建城战略”。

秦军进入广州前，已有安阳王在公元前315年建立的行宫。

泮溪公园，“蜀泮”行宫的旧址。与“泮溪”相随的地名还有“龙津”，末端还有一个“东龙里、胜龙新街、金龙里、祥龙里”的小区，外围还有一些叫“泮田”等的地名。

安阳王收服土著西瓯，统治十区，号为“南岗部”，应是广州东部的“南岗”，广州的“南岗”并无“岗”。黄埔区偏北地域，还有叫“泮田”“泮涌围”的原始地名。

“围括岭”，一条南北通道穿过的一处盆地。适合做大型的埋伏战场。可能赵佗所带的秦军并不“纯粹”，而是从赵国老主人那里所带来，曾经在这里遇到“蜀泮”军队的埋伏。

沿着“仁威庙”西院墙外，由南往北一条中轴线街道，名为“新都里”。

古蜀三都：新都、成都、广都。

“新都”，“蜀泮”亲自带来的古蜀国地名。

珠三角地区，一片溺谷湾，广州古城位置恰在海湾顶部，地处珠江岸边，离河口有段距离，白云山脉与海湾的接合处，犹如飞龙吸水之地。联系白云山系、珠江水系的一条“生态轴”。

“蜀泮”没有沿珠江北岸筑城，一如没有把城西界建于文溪西支流东岸，把城北界建于越华路以南高坡一样，因是情系成都的行宫、抵御秦军的“前线指挥部”，还用不着大修城池。

与一条古水道息息相关。源头在白云山东麓，沿着山麓蜿蜒流淌，流过今天的上塘、下塘，经过越秀山麓，又分为两支，一支往西南流，经过今天的大石街，注入西湖；另一支往东南流，大致沿着今天的小北路、旧仓巷的方向，向南注入珠江。

“天下之中”。番山禺山，广州古城的胚胎。

“广州之上”。伴山两侧水道，哺育着城池生长。

适应水网生活。“泮溪”师法成都，既满足农耕文明的需要，又达到海洋文化的择址的要求。强调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在最大江河的入海口，既联系广阔的经济、资源腹地，又是便捷出海、泊船的

基地。与成都城选址有所不同，效仿在红河三角洲建古螺城，满足了“在海性”“向海性”的人文聚落空间形态选地的条件。

当开明王子“蜀泮”，率领“古成都人”由“藏羌彝走廊”迁徙，“将兵三万”，按照老蜀王“秘制”的路线，主要分三路上“南岭走廊”，向尚处于莽荒状态的中南半岛挺进，“讨雒王雒候，服诸雒将”，没有想到，会在交趾建立“安阳国”，会在广州的泮溪公园，建成心念故园的行宫——“岭南版成都”。

都城雄伟，文明先进，军队锐不可当。

文明碰撞。不知不觉中，异乡成故乡。

从成都→广州→交趾，秦汉之际的100多年。从中国第二级地理阶梯，击入第三级地理阶梯，从“长城·藏羌彝”传播带，到“长江·沿海”半月形传播带，从人口地理学的“胡焕庸线”，到空间经济学的“汤继强线”，从川南神秘的“灵关古道”，到红河三角洲的百越部落，“古成都人”与古蜀文明一次有去无回的出访。

安阳王统帅的5万“古成都人”，把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百越之中，人生却不曾厚待，历史也永远的遗忘，甚至连居住的地方，也在离开5年后、安阳王15岁时，“与咸阳同制”兴筑。

成都由蜀都变为蜀郡治所。

公元前311年，秦国宰相张仪，按咸阳建制，在蜀城的基础上，向东、向南拓展城址，兴筑成都城垣，称“秦大城”，由大城、少城构成。大城是新城，军事政治中心；少城为旧城，经济中心。

城中有城，“经营版筑，役满九年”。二城并立。

后世称为“秦城”，又称“张仪城”。

成都城市历史上，最完整、最巨大的城垣。

顺应水势，坚持因势利导，构筑中轴线、打通“微循环”，城垣走向与大致河流平行。城垣呈西北、东南走向，形状非方非圆，东西狭而南北长，实现采光、集热、通风与山川河流地势的整体协调，成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曲缩如龟壳，后世又称为“龟城”。

城周回十二里（5.2公里），高七丈（17.1米）。

城墙下部皆筑有粮仓，城上建有多座“观楼”和“射栏”，既可驻扎士兵，又可贮存武器，充分体现城垣的军事意义，也展现了城垣的雄伟、壮观。

城外东、西、北面，掘有千秋、龙堤、柳池、天井等池。

大城在东，少城在西。

两城并列、相连，大城西面和少城东面共用一段城墙。

称为“层城”“重城”。

秦大城比清皇城略大，少城比清满城稍小。

城垣格局或显或隐，承续2 000多年。

中国古代城市格局的一种重要类型。

两城在功能上，也不大相同。大城，作为蜀侯、蜀相和蜀郡守的治所，又是秦移民聚居的区域，成都的政治中心。少城，成都县治所在和商业区，成都的经济中心。

“北寺南市”。

少城的结构布局，仿照秦都咸阳。

“北寺”，少城北部，官署所在地。成都县令、管理手工业的“铁官”“盐官”，管理商肆的“市官”等机构的长、丞等行政官员，驻这一地区。“南市”，规划整齐的商业区、民居。

建构人居“建筑基准线”。

从金沙遗址到浣花溪，到百花潭、商业街片区。

咸阳、洛阳、开封等古城，都是正南北方向。

偏偏“古成都人”的方位概念，与中原地区不同。

“北偏西”与成都平原的风向、水流，关系密切。整个成都平原为北偏东，走向与北偏西恰好垂直，“古成都人”恰如其分地利用、调节，才有了“北偏西”这个独到的视角。

古蜀的富庶，得益于水沿河而建的城市布局，也埋藏下洪水隐患。

宝墩文化时期传下来的筑城传统，就是修筑高大的城墙，既为防洪，也为防御。

十二桥遗址泥土掩埋的房屋构建，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倒塌，一次大洪水遗迹。

从成都↓广州↓交趾，秦汉之际的200多年。从中国第二级地理阶梯，击入第三级地理阶梯，从「长城·藏羌彝」传播带，到「长江·沿海」半月形传播带，从人口地理学的「胡焕庸线」，到空间经济学的「汤继强线」，从川南神秘的「灵关古道」，到红河三角洲的百越部落，「古成都人」与古蜀文明一次有去无回的出访。

三星堆遗址的堆积层中,也发现厚20厘米至50厘米的淤泥,也是洪水遗迹。

大洪水摧毁三星堆城、金沙城,却没有摧毁文明。

恰恰相反。洪水过后的腐殖质上,文明枝繁叶茂地生长。

形成东、西二城倚背相连的形势。站在大城西垣,向西展望,少城又像是大城的外城,可算大城的前卫。后世,每当成都发生战事,攻城者往往先进攻少城西南,屏障作用尽可“一窥”。

又在成都的西北、西南兴建郫(今郫都)与临邛(今邛崃)二城。

三城呈品字形而立,互为犄角,构成防卫线。

秦在蜀地统治的重要据点。

成都城高23.3米,郫都城高20米,邛崃城高16.6米。随着时间变化,郫都城址已经迁移,只有成都、邛崃在原址上,不断更迭,堪称成都平原的“双城记”。

天府文化风水古城的范本。

金沙江流域的原住民丹、犁等部族,世居险要山地,与古蜀国和平相处,对秦国管辖下的成都平原蠢蠢欲动,发动叛乱。司马错带兵征讨,“在蜀西南姚安境内,本西南夷”。

“西南夷”,汉代统称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如今的四川凉山、甘孜、阿坝地区的土著民族为“西夷”,今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的土著民族属“南夷”。

秦军第一次深入金沙江以南地势险要的地区。

公元前285年,秦蜀守张若,率兵取“笮”及“江南地”。

“笮”在今四川盐源、盐边一带地区,汉时曾置定笮、大笮等县。

“江南地”,指“笮”的金沙江对岸的今丽江、楚雄境域。沿“灵关古道”南下,目的是消灭“蜀泮”南下的残余反抗力量,开拓疆土。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麾下大将王贲,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王翦的儿子,领兵灭掉六国中最后一个残存的政权——齐国,秦国彻底统一了天下,在成都通往云南、贵州的崇山峻岭中,起于夔道(今宜宾),终于今云南曲靖,修筑“五尺道”(约为1.4米),全长1 000多公里,与安南道(昆明至越南)衔接,到祥云与博南道相互连。东可通越南、西可达缅甸,不日到印度、阿富汗。

“西南丝绸之路”东路。

与秦长城、阿房宫、始皇陵、灵渠、直道、驰道,并称秦朝七大工程。

“开明肇其端，李冰集大成”。

为充分利用岷江水资源，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公元前256年左右，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都江堰，“把岷江搬到成都”，促使成都平原发展，润泽千万人。

“放水仪式”，一种水图腾。

纵贯150公里。岷江在成都城优美、潇洒地绕一圈，又在下游归入岷江。

“上善若水”，天人造府。“天”与“人”共同创造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风水上乘”的境界，筑造“超稳态”富庶、闲适的“天府成都”。

岷江美丽，美在“人水和谐”。

郫都也被誉为古蜀文明发祥地、长江上游农耕文明源头。

“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在安阳王在广州建行宫“泮溪”的同年，秦国在穿越秦岭通往汉中沿褒水、斜水而行的悬崖绝壁间，“穴山为孔，插木为梁，铺木板联”为栈阁，全线接通褒斜道，被称“蜀道之始”。

号称“中国第一栈道”。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差不多同期。北逐匈奴，南戍五岭。

安阳王在位时，适值秦汉“平定百越”时期。

公元前214年，灵渠凿成通航。

僵持不下。“旷日持久，粮食绝乏”。

秦始皇令监御史禄，在今桂林兴安县境内“以卒凿渠，以通粮道”，开凿连接湘水与漓水，全长34公里的灵渠，联接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构成遍布华东、华南的水运网。

桂林有两条名震天下的河水，南部阳朔境内的漓江，北部兴安境内的灵渠。灵渠工程分铎嘴、大小天平、南北渠、泄水天平和陡门5个部分。穿越南岭，北渠的宽度大于南渠，调节水量。

后人称赞史禄，“咫尺江山分楚越，使君才气卷波澜”。

短小、精巧……

有一种柔媚的女性美，恰好和北方长城的粗犷、雄性交相辉映。

一条为征服而生的运河，“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

在安阳王在广州建行宫「泮溪」的同年，秦国在穿越秦岭通往汉中沿褒水、斜水而行的悬崖绝壁间，「穴山为孔，插木为梁，铺木板联」为栈阁，全线接通褒斜道，被称「蜀道之始」。

“北有长城，南有灵渠”。

解决后勤之需。大批粮草经灵渠运往岭南。

秦军在百越战场上兵锋凌厉、势如破竹。

灵渠的丰功伟绩，长城望其项背。竖立长城，阻隔北方民族的南下，目标却始终难以实现；开凿灵渠，却像一柄打开广袤的神秘世界的拓疆利剑，依靠它，把版图扩大将近一倍……

公元前212年，特派大将蒙恬率30万军队、民夫修建“秦直道”，全长700多公里，从陕西甘泉宫直达内蒙古包头九原郡。世界公认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与长城呼应的世界奇迹。

沿途每隔40至50公里，建一个行宫。有的行宫面积很大、十分豪华。志丹境内任窑子行宫占地28万平方米，安塞红花园行宫占地10万平方米，用于巡行、避暑的高规格建筑。

比罗马大道宽3至8倍、长15倍、早200多年。

“化外之地”。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长江·沿海”半月形传播带内。

《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与越南北部，长达4 000公里的半月圈内，古越族人集中的分布地区；古越族人局部零散分布之地，还包括湖南、江西与安徽等地。

百越民族，亚洲南部一个古老的民族群体，分为以浙江为中心的东越、以版纳（今西双版纳）为中心的西越。支系很多。较大的有吴越（今苏南浙北一带）、闽越（今福建一带）、扬越（今江西、湖南一带）、南越（今广东大部）、西瓯（今广西一带）、骆越（今越南北部、广西南部一带）。

“大分散，小聚合”的居住形态。

南越是部落名，不等同于南越国。

“越”或写作“粤”。古代“越”“粤”相通。

“百越”是统称，大小无数越人部落的归纳。

“百”并非实数，“各有种姓”的泛称。

部落到底有多少，即使安阳王与南越王心细如发，也未必知晓。

越人，有生越与熟越之分。

生越，散布各地大小的部落。

熟越，代表者是昔年的越国。

“北拘于胡，南卦于越”。

围攻岭南。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以长公子扶苏为帅，任嚣、赵佗等人为将，令尉屠睢发兵50万，分五军南征百越，“一军塞罽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每军要占领五岭一个主要的隘道，实现统一中国的宏图大志。

中华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与征服”行动启幕……



陆

柒

捌

玖

拾

虎狼之师。屠睢率领20万大军南下。

作为副帅，赵佗与主帅任嚣同征南越。

公元前214年，秦朝平定岭南，设置岭南三郡。

南海郡郡治，在今广州；桂林郡郡治，在今广西贵港；象郡郡治，在今广西崇左。

任嚣首任南海郡尉，节制三郡，故称“东南一尉”。

南海郡下，设博罗、龙川、番禺、揭阳四县。

龙川地理位置、军事价值都重要，辖地颇广，包括今广东龙川、连平、五华、兴宁、河源、和平、新丰、海丰、陆丰等县和紫金、平远两县的部分地方。赵佗为龙川县令。

南海郡治、番禺县治，即今广州市越秀区。任嚣与赵佗修筑“袤四里”的番禺城（今广州仓边路以西的古番山、禺山上），筑以城墙，以文溪、珠江作为城池的屏障，史称“任嚣城”。

赵佗，生于公元前240年，时26岁。

与赵国王室联系，千丝万缕。

石家庄人。出生在今河北正定，19岁时就获得秦始皇的赏赐，得到一把御赐的护驾宝剑，随后就跟随出巡，负责保卫安全。东征西讨，仗剑跃马，凭赫赫战功，从士兵跃升为将军。

《岭海剩》称：“佗略定杨粤，拜龙川令，筑台于惠州长乐县。”

选择龙川筑治所。地理条件优越，三面环山，东临大江，江水如龙流动，群山似虎眈眈，又处于古龙川中心地带，可

利用水道到达龙川所辖的绝大部分地区。广东最早的县城之一。

龙川县城又称“佗城”，因赵佗得名。

赵佗曾要求秦朝从中原地区迁居居民至岭南。

一举两得。秦朝从中原迁来50万人，除了一些犯罪被贬的人、遭到贬职的官员之外，大多是“贾人”，朝廷重农抑商政策的打击对象，既惩治“商人”，又“渗透”了岭南。

“得风气之先”的“兴王之地”。

开发岭南的“试验田”，播种中原文化的“起跑线”。

唯一留在历史名册上的县令。

用兵岭南，当秦朝军队深入到岭南地区，就遭到顽强抵抗。

未知世界。到处树木丛生，野兽遍地，每个角落令人窒息的瘴气满布，笼罩着每个人，神出鬼没的森林与猎人，更是恐惧之源，一个原始蛮荒世界，将是当中幸存者的未来家园。

西瓯人撤到深山密林，发挥善于爬山越岭、驾船荡舟的长处，利用当地山高、河多、谷深的地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白天隐伏于山林之中，晚上四出偷袭秦，使秦军处处挨打。

还袭击运粮的队伍，使秦军夜不能寝。

秦军亦因不服水土而爆发疫病。

《大越史记全书·蜀纪》记载：一天夜里，越人在西江畔三罗（今广西陆川珊罗镇）设下埋伏，突袭屠睢所领秦军主力。猝不及防。屠睢中了两支毒箭，由马背跌落，全身发紫而亡。

群龙无首。秦军四处逃散，慌不择路。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主将被杀，粮食不继，减员大半。

尸横遍野，濒临覆亡的绝境，秦军仍然没有退缩，百越军同样不作任何妥协，战斗依旧激烈地进行着。一方，为保家园，血战到底；一方，失败等于耻辱，后退等于死亡。

秦军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百越族人也奈何不得强大的秦军。

形成“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弯”之势。

秦始皇何以劳民伤财修筑长城、灵渠？

从成都武担山的「西楼」「石镜」，古蜀王率先垂范公开发布爱情平等的请书，到广州番禺山的「泮溪」的「琼玖永好」，将逼仄的传统空间，立体拓展到岭南的「意象」空间。

历史给出答案。千古一帝，奠定中国政治制度基本格局。

焚书坑儒，坑死的460人，并未有株连之罪。

历史上，常说是儒生，实为方士之流，一些卢生、徐福的拥趸。

康有为说：“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鲁迅更是提过：“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地区稳定，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秦始皇仍然一如既往的勤奋、努力和警惕，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秦始皇“日批奏折百二十斤”。换算为今天的计量单位，也有30公斤。相当于每天处理公文近10万字。“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转心揖志”。每日只睡4到5小时，少有娱乐，连皇后都不立。

为国事操劳，只活了49岁。

在位期间，更从无错杀，冤杀一位功臣。

励精图治。从公元前219年开始，短短11年间，出巡5次。

战国后期，秦国国君与齐国国君曾一度称“帝”。

3岁逃亡，13岁登基，39岁统一天下的男人。

扫六合，建秦朝后，认为功劳盖过三皇五帝。

“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认为，秦王政“兴义

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人皇，人皇最贵”，建议采用“秦皇”头衔，秦始皇在“三皇五帝”这四个字中取两字，显然不能取“三五”，取了“皇帝”二字。

将自己称为“始皇帝”，即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百越之战”。秦统一六国后，最惨烈的一战。

灭“蜀泮”的安阳国（瓠雒国），并非一蹴而就。

“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

公元前210年，赵佗伐安阳王。

《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记载：“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

安阳国顽强反击，“瓠骆相攻，南越动摇”。

地处南海郡上峰的桂林、象郡，也趁乱建国立王，给南海郡稳定带来威胁。

与瓠雒国的战争，一直与神弩相联。《金龟传》中记载，双方在北江的仙游山交战，因安阳王拥有一具威力强大的神弩，每发可杀三百人，赵佗的军队大败。退守武宁山，遣使讲和。双方约定以平江（天德江）为界，北为赵佗界，南为安阳王界。

传说，有只神龟在瓠雒国居住三年，临行时，神龟脱其爪化为神弩。

《越史略》记载：皋通造柳弩一张，“十放，教军万人。”安阳王来自成都平原，跟雒人作战，处于优势。也让南越王赵佗，吃尽苦头，“一发杀三百人”，越军闻之丧胆。

到了北宋初期，《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还把神弩的威力夸大，“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杀三万人”。千弩齐发，一放杀三百人或有可能，小皋通也只不过是一个善于治弩的大臣。

武力胜不了，请和、求亲。

赵佗使“美男计”，派遣儿子赵仲始向安阳王之女求婚。年迈100的安阳王，有个叫媚珠的女儿，粉妆玉琢，见当人质的太子赵仲始十分英俊，一表人才，一见钟情，真心相爱……

公元前209年，赵仲始娶媚珠公主，入赘安阳王。

二人完婚后，住在古螺城的王宫内。

上门女婿。安阳王视赵仲始为己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秦末，农民起义如火如荼。起义一月，便拥有1000骑兵、数万步兵；攻到函谷关时，仅部下周文就有千辆战车、数十万士兵。建立“张楚政权”，陈胜自认“陈王”，吴广为“假王”。

整个中国历史，汉人对于北方骑兵一直被动防御。

没有内忧，只剩北方外患。统一六国后，秦国和匈奴一打就是10年。北方的诸侯，已经没有精力再去迎击，扶苏带领30万大军，直接在北方驻守10多年，还修建绵延万里的长城，来抵御匈奴，把游牧民族阻拦在农耕文明的院墙外边。不是没有雄心攻占漠北，越过长城的土地，不能够用以耕种，付出的战争成本得不偿失。

要到达北方草原作战，需要大量的粮草。从中原调运，一旦战线拉长，光路途中的消耗，就是真正前线所需的上百倍。国家收入建立在农耕基础上，就算有了颇大的草原干什么用？

坚固围墙的修筑成本，远远低于从中原调集粮草的高昂费用。

内外交困。秦始皇突然病亡，朝纲大乱。赵高谋害皇帝长子扶苏，立幼子胡亥为帝，后又杀胡亥立子婴，反过来又被子婴所杀。朝廷里，杀大将、杀丞相、杀老臣……

帝国瞬间陷入迷茫。

北方大乱，打得昏天地暗。

赵佗与任嚣一起征杀了4年。

任嚣已经病重，密切关注天下局势，临死前，将最信任的下属赵佗召来：“中原扰乱，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当即颁布文书，让赵佗接任南海尉的职务。

公元前206年，任嚣病逝。

龙川令赵佗接替南海郡尉。

手握三郡军政管理大权。

赵佗以合理借口杀秦朝所置长吏，以亲信代理郡县守令。

断绝军事要道，“绝道聚兵自守”。

洞悉广州防御要领，避免战火蔓延到百越与岭南地区，严封五岭的四关：横浦关、连浦关、阳山关、湟溪关。断绝四条新道：江西入

广东南雄一路，湖南入广东连州一路，湖南入广西贺县一路（潇贺古道）和湖南入广西静江一路。构筑捍卫番禺的三道防线：乐昌—仁化—南雄防线，英德—清远防线，石门要塞防线。要逾五岭攻南越，不破三道防线，到不了广州。

兼并了桂林郡、象郡，打击越人势力，掌握了岭南的控制权。

经历众多患难的安阳王，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多少君王年少、壮年时大多雄才伟略，到了老年时变得昏庸。

收服九大头人，灭杀雄王，现在又打败强敌南越的赵佗，俯仰自得，有站在世代巅峰之感。对造神弩的大臣小皋通，也不再如昔日礼遇。小皋通归隐，走前对安阳王说：“珍惜神弩。”

南越王宫内，树木繁茂，鸟语花香。

流水潺潺。“曲流石渠”的一个转弯处，水流驱动着两个罗伞在转动。赵仲始与媚珠公主在王宫里漫步。旁边有个小孩，欢乐地追逐着蝴蝶。小孩，他们的儿子：赵昧。

凄美爱情敌不过战争情势。

“始令珠取父弩视之”。赵仲始引诱媚珠偷看神弩，再窃取神弓，用假弩换走灵弩。学会了制造弩和破坏弩的秘法，公元前207年，“便逃归报赵王”。借口说要回去省亲，把灵弩带走。

担心两国开战后，将与媚珠失散，临走前对媚珠说：“夫妇恩情可不能忘，如果两边打起来，我来找你，怎么才能见到你啊？”

媚珠说：“不要担心，我随身带着鹅毛被，拔毛做路标，你就能找到我。”

瓯雒国失去神弩，再无招架之力。

安阳王带着女儿媚珠逃亡。

“认鹅毛追之”。跟着鹅毛标识，赵仲始穷追不

一部向西发展，远足缅甸，今缅甸有「仁安羌」地名；一部向南发展，到了柬埔寨，故今柬埔寨有「万羌」古羌遗裔；越南史籍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来自成都平原的古羌与「古成都人」。

舍。

到了海滨。安阳王下马，海中浮出一只金龟，指着媚珠说：“是贼也，盖杀之。”

媚珠临死前发誓：“想不到我一片痴情，却被人利用。愿我死后，能化为珠玉，以此化解亡国丧家之痛和夫君背弃之耻。”

赵仲始追到海边，抱起媚珠的尸体失声痛哭，归葬于古螺城。

最初，一见钟情，最后，生离死别。

不久，媚珠的坟墓化作玉石。

公元前205年，赵仲始思念媚珠，将“曲流石渠”改建为“琼玖永好”。

又一段“成都版”凄美的爱情故事。

一脉相承。与140多年前的开明王九世类似。

从成都武担山的“西楼”“石镜”，古蜀王率先垂范公开发布爱情平等的情书，到广州番禺山的“泮溪”的“琼玖永好”，将逼仄的传统空间，立体拓展到岭南的“意象”空间。

血脉相连。“西楼情结”的具象化。

你不负我，我必不负你。赵仲始怀念媚珠，设计制作“媚珠玉佩”。“玉佩”落地，“画眉鸟”断开。“画眉鸟”断，媚珠亡。来到当年沐浴梳妆的井栏旁边，洗澡时幻看到妻子的影子，内心悲痛欲绝，在家国大义、儿女情长面前，舍情取义，投井而死。

殉情媚珠，终年38岁。

儿子赵昧，二人爱情的结晶。

“昧”，取自妻子名字“媚珠”的“目”“朱”。

湄公河的“湄”，与“媚”的字形有关联。

“泮”，也可能是湄公河“没”了的那个“公”。

决定瓯雒国命运的神弩，终究只是传说。安阳王得神龟之助走进大海，回应先祖鳖灵带领民众凿开玉垒山，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功绩。最终，仍然不能逃离“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命运……

秦国发动三次战争，才勉强打败了“蜀泮”。

秦国军队锋利的刀剑割断动脉，相对周边的部落级对手，安阳国即为当时百越之中最强盛的势力，面对完成大一统的巅峰之军，结果跟与父辈的“蜀国”一样，只能灰飞烟灭。

公元前206年左右，瓯雒国被南越王赵佗征服灭亡。

110年前，秦国战略大师司马错通过“闪电战”刀锋，击破古蜀国。

110年后，古蜀国王后代安阳王的瓯雒国，再被秦国将军赵佗击败。

年过百岁的安阳王带着残余部众，乘船散落到世界各地。

来源于“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信仰。

死后讲求回归。“古成都人”的亡灵，必须经过故地湔江河谷的“天彭门”，把死者灵魂送到过去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去与祖先团聚。沿水路送魂，船棺也就成去世先民的“载魂之舟”。

不是终点。瓯雒国残部：一部向西发展，远足缅甸，今缅甸有“仁安羌”地名；一部向南发展，到了柬埔寨，故今柬埔寨有20万古羌遗裔；越南史籍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来自成都平原的古羌与“古成都人”。

有的人南逃到中南半岛其他地方，有的人漂流到吕宋（菲律宾）、印尼、琉球、日本、北极（爱摩斯基人）……下海乘船逃亡的地方叫下龙湾，龙下海的地方。

不知所终。

究竟什么地方，才是“古成都人”南迁的终点？



陆

柒

捌

玖

拾

楚汉相争，汉胜楚败。

公元前205年，成皋之战。

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刘邦，围绕战略要地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展开的一场决定楚汉兴亡的持久的争夺战。战争史上，后发制人、疲敌制胜的一次成功典范。

同年，赵佗迅速“击并桂林、象郡”。

南征百越。岭南三郡并为一体，政治上归于一统。据有岭南（今广东、广西大部、越南北部），建立了疆土“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自立为“南越武王”。

公元前204年，将任嚣城向西扩张，以西文溪为护城河，扩大为周长5公里的大城。于今广州中山四路一带，东起今旧仓巷一线；西临今广大二巷、小马站一线；南界，在今西湖路北侧，南城门，在今北京路与西湖路交界处以北。俗称“越城”“赵佗城”。

今北京路，基本处于“赵佗城”的中心轴线上。

南越王宫博物馆，以“赵佗城”的遗址为基础建成。

广州的城市史，远超过北京、南京等著名都城。

比周定都西安更早。西安作为“镐京”的历史，只在西安长安区的西北角，不像广州一直在城市中心。安阳国是古蜀开明王子“蜀泮”建立的国家，广州因文明而起步的真正起点。

《粤记》说，“广东之文始尉佗”。

灭安阳国后，赵佗为了便于统治，将其地划分为交趾、九真两郡，设立户籍官，清查二郡的户口，制定政治制度、赋税

制度，传播汉族文化，使二郡开始有了文字、文字记载的历史。

由奴隶社会初期，跃进到封建社会。

古蜀文化对越南的历史影响巨大。前后近百年，政权统治52年，在秦灭安阳国时，“古成都人”已经与当地雒民普遍通婚两代人以上，通婚的“混血儿”，越北壮语系少数民族的祖先。

越南人长期以来都是十分热衷成都平原、“古成都人”。

“古成都人”，多族群地域性联盟共同体。

雒姓源于安阳王，出自古瓯雒国，以国名为氏。

与瓯雒国的雒民，联系密切。流经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湔江，在《汉书·地理志》里，也称“雒水”。如今三星堆所在地广汉，仍然叫雒城镇，既是真实还原历史，更是尊重古蜀文化。

古螺城现仍存着历史久远的安阳王庙。

庙前有口古井，传说赵仲始于此自尽。百姓传说，媚珠是因爱而冤死，鲜血流入大海，为蛤蚌所饮后，化为明珠。如以井水洗涤，明珠会更加晶莹明亮、灿烂夺目。

古螺城的媚珠庵供奉的无头石像，正是安阳公主媚珠。

有成都人、广州人，到越南河内旅游，建议抽暇去观赏螺城遗址、安阳王庙。

桃寺位于滨州县滨安乡慕夜山上，距离荣市约30公里。

供奉着瓯雒国的皇帝安阳王。

去旅游的成都人可以顺便向2 200多年前的“老乡”问个好。只是，在问路时，要记住越南文中的“安阳王”读作 An Duong Vuong，“螺城”读作 Co Loa Thành。

安阳王与“古成都人”不知所踪。他们把有关秦朝的消息带向世界各地。有人认为，东方强大的“秦”势不可当，用印度语翻译到西方，“秦”就变成“China”，中国这个名字，就在世界上流传开了。

治国有方，“和辑百越”。

赵佗带领10万兵士长驻岭南，起初以“中国人相辅”“以其党为假守”，尊从习俗，让越人参加政权管理、鼓励秦朝士兵与越人通婚，因地制宜，以越人“自治”，实行民族融合政策。

“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理由含蓄，朝廷再数额上打了五折，1.5万中原寡妇、未婚女子，浩浩荡荡加入支援边疆的行列，成为部队家属，“与越杂处”，

对于稳定士兵扎根戍边，推动广东的开发，起到积极作用。

以身作则。赵佗脱掉中原的官服，穿上越人的服饰，头发的造型也效仿越人的模样，称自己是“蛮夷大长老”。带头让自己的儿女和越人联姻，结为亲家。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南迁客家先民的精神首领。

文治武功。先进的中原文化、生产技术，给包括越南在内的“南越”带来繁荣，极大地促进农耕地的发展，打开民族融合的大门，对传播中国文化意义深远，连现代越南人都感同身受。

注意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伦理道德教化、诱导越人，教育他们赡养老弱、废除群婚。推广汉字、汉语，教育越人“习汉字，学礼仪”，从而使“蛮夷渐见礼化”。

“秦汉一徙”，迅速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贡献巨大。谱写了中国大一统“和而不同”的文明史。

文化认同，形成万人共戴一君的观念。

然而，也形成一些积重难返的弊端。

让中国人集中力量，创造出世界最持久的古代文明，一旦统治者年幼或者一意孤行，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巨大的风险。这一问题，随后出现的罗马帝国、大汉帝国，最终也没能解决。

《大越史记·赵纪》称，赵佗“英武之成，岂让汉高”。

越南史学家黎嵩的赞评，代表许多越南人的看法：“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禺，与汉高祖各帝一方，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安阳王），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真英雄才略之主也。”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去世，享年103岁。

结束了81年的统治，葬于今广州。

“多为疑昉”。深恐将来陵墓会被人盗掘，甚至抛尸荒野，后事安排非常缜密，坟墓藏得十分隐秘。出殡时，灵车分别从广州城四门同出。没有人能知道真正装有遗体的棺材葬在何处。

太子先死，赵佗死后直接传给孙子赵昧。

赵昧，史称“南越文王”。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今天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上，就是赵昧的陵墓。

“超长待机”。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地方统治者，熬死了秦朝的3位皇帝、汉朝的4位皇帝。陵墓可能在今天的越秀山主峰越井岗一带，即今天中山纪念碑附近的岗腹深处。

两广与越南一带的“拓荒者”。

越秀山上有越王台，赵佗经常在这里接待北方使节，大宴群臣，举行祭祀典礼。归汉之后，又在越王台西北面的固冈之上，筑了一座“朝汉台”，每年登台望汉而拜，以表臣服。

“神秘石渠”。越秀区中山四路发现南越国王宫的“曲流石渠”——“琼玖永好”，蜿蜒曲折，贯穿整个御花园，整体流向竟然是个“几”字形走向，与黄河的总体形状几乎一模一样。

南越王不仅向往着北方，甚至还有统一中原的雄心。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

番禺（今广州）城里的南越王赵昧，用产自夜郎国的枸酱款待，说夜郎国至少有10万精兵。唐蒙向汉武帝报告，成都到广州有路可通，建议利用夜郎国的10万精兵，收服南越，统一岭南。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岭南正式“归汉”。

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纳入中国统一的版图。

汉武帝设交州刺史，实行三大基本政策：“与民生息”“因其故俗治，毋赋税”“诸蛮将主民如故”，维持原有“制度”和“官吏系统”，与民生息，不用纳税，类似“一国两制”。

岭南“九郡”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大致在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

这几处地方被中国统治的时期，被越南称为“北属时期”“郡县时代”。

随着汉人的大量迁入，越汉杂处的居住格局形成，华夏族与越南土著族群通婚不断，导致越南自立后的多位王朝建立者，父系是华夏族的后裔，而

安阳王与「古成都人」不知所踪。他们把有关秦朝的消息带向世界各地。有人认为，东方强大的「秦」势不可当，用印度语翻译到西方，「秦」就变成「China」，中国这个名字，就在世界上流传开了。

母系则为越人。

国防巩固，疆域最盛。“东西万余里”，南越国东包汀江以东的福建永定、平和、漳浦，与闽越相接；北以五岭山脉与长沙王吴芮领地相连；西至广西环江、河池、东兰、巴马、德保、百色一带，与句町国、夜郎国为邻；南达今越南北部、中部的大岭，与马来人原始部落相邻。囊括今日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与越南地区。

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一统政权，均直接控制着东亚“两江河”（长江、黄河、珠江）流域最为肥沃的雨养农业区，都以以上三个农业区为核心确立统治（“中原”“平原”与“江南”）。

“甚有文理”。成为南迁北人向往的乐土。

赵佗被毛泽东誉为“南下干部第一人”。

汉文帝刘恒修建的赵佗先人墓地，在今石家庄市新华区赵陵铺镇。2006年，在墓地遗址基础上修建赵佗公园。公园里，还有一座四米高的赵佗铜像，左手拿书卷、右手执剑，十分传神。

石家庄市新华区，还有一条赵佗路。

直到今天，广州市发掘出的越王井，仍然作为重要的文化遗址被保存。

南越王国宫署遗址，被誉为“东方的庞贝古城”。

秦代的造船厂，在南越王国宫署的附近。

两千年前广州，已达上乘的造船技术。

岭南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广府文化。

在《史记》中，司马迁描述：“番禺，亦天下一大都会。”文化中心、千年商都，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成都，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广州，都拥有独特的历史商业文化魅力。

赵佗，开拓南越的先驱，几乎奠定汉代中国的南疆规模。

一位英勇善战的军事家、颇具魄力和治国才华的政治家。

大涛奔涌。前无古人的辉煌篇章、惊天动地的浓墨重彩。

越南北方随南越国一道并入西汉，先后成为东汉、三国的吴国、晋等中国王朝的一部分。千年以降，大量的中国北方人，或因履职，或因避祸，或因发配，或因戍守，或因投机，纷纷迁徙到古越南土地，带着相对高端的文明和工具，渐渐地同化、稀释了土著居民。等到唐朝末年时，当地的居民使用着中国字，说着中国话，受中国制度管束，已经与中国人差别不大。

儒家文化区，“越人”后代，汉族的一支。

越南的独立，在交趾的“古成都人”，建立的地方政权，形成越南前身。像一个叛逆的孩子，一边拼命反抗着父权，一边慑于中华力量，不得不与父亲保持良好关系，几番挣扎，抗争，回归，分离，终于摆脱父权，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越南历史，一段向北努力摆脱羁绊，向南拼命扩张的历史。

南岭山脉宛如有力的臂膀，拥抱着面向海洋的广东、广西两地，神奇、富饶的岭南地区，紧紧地依偎在南中国的怀抱中。珠江充满激情，纵横千里，上下万年，孕育出灿烂的广府文化。

只有“面朝大海”，才能“春暖花开”。

广州也是历史悠久的三朝古都。

与成都一样，属于典型的古今重叠城市。

“多元一体”，洋溢着强烈地域文化精神的个性人格。

生死存亡一次次，革故鼎新一场场，慷慨悲歌一幕幕，岭南豪杰一代代。岭南在中国历史舞台叱咤风云，以摧枯拉朽的气魄，张扬着岭南人的独特精神，从繁复多彩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中采撷优秀的文化因子，在复杂纷纭的政治、经济变化中，梳理鲜明的文化特质，构成了高古雄迈、瑰伟奇绝的岭南文化史诗。

成都，中国唯一处于内地，却享有“海洋性气候”的“飞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外循环”外与“海外”探索的精神向往，生生不息。广州，坐落在东南亚季风带上的港口，天然的避风港、停泊地。而与大海的搏击，人们很早就开始与“海外”的交流。

地理形态上，有诸多异曲同工。

广州北部。岭南山脉，城建成本高，有流溪河水源保护区，需要限制大工业的发展，采取“北抑”策略，只是“抑”字不好听，改成“北优”。

成都西部。青藏高原，经济腹地颇小，有都江堰灌区、龙门山生态保护区，环境生态重要，需要对产业门类、发展规模进行控制，“西控”即为此意。

广州东部。丘陵地带，基本农田较少，建设用地多，靠近香港、深圳，广深高速、广深铁路的起点，城市开发可以高歌猛进，于是采取“东进”策略。

成都东部。也以丘陵地带为主，靠近重庆，成渝双城经济圈“过

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民族从来都不是静态的、固定的，文化、地理意义远大于血统。民族在动态的演化过程中被「发明」，定义自我的共同体决断的产物。来自历史文化的原料，也许古蜀文明正是天府文化、广府文化创造自我的决断时，能重点援引的历史资源。

渡地带”，发展掣肘少、需求大、呼声高，可以大踏步前进，“东进”二字非常贴切。跨过龙泉山，拥抱发展空间更阔大、空间格局更优渥，一如广州跨过珠江水网，收获南沙新区。

广深市区相距约100公里，成渝市区相距超200公里。

都是大区中心，综合枢纽，综合实力突出。

空间格局直接决定城市的运营效率、居住体验与美学价值。

“大古都”名副其实，完美体现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情况。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推翻“箕子朝鲜”自立的“卫氏朝鲜”，被汉武帝给灭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并入汉朝的版图，建立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史称“汉四郡”。

同一时期，朝鲜半岛南部兴起马韩、辰韩、弁韩三个带有部落性质的国家。

韩国的国号，来源于这三个国家。

2世纪的亚欧大陆，有汉帝国、贵霜帝国、帕提亚帝国、罗马帝国。

“四大帝国”相连。人类的农耕地区，汉帝国位于亚欧大陆的最东端，并深入中亚、东亚；贵霜帝国位于中亚和北印度，帕提亚帝国（安息帝国）位于波斯，罗马帝国位于环地中海地区。

文明世界从东向西，第一次“联通”。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圈正式成立，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

一种同心圆、洋葱式的国家结构。

核心部位，“天子”直辖的“编户”，外圈与“天子”保持密切联系、接受“天子”册封的“内臣”，再往外与“天子”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时不时接受“天子”册封与赏赐、关系时好时坏的“外藩”，最后，与“天子”关系不密切的“朝贡”国。不管是“编

户”“内臣”“外藩”，还是“朝贡”政权，理论上都属于古典中华文明体系的范畴，构成从古代到近代、一以贯之的华夏文明，甚至整个东亚、东南亚文明体系，均可被视为“古典中国”的广义范围。

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民族从来都不是静态的、固定的，文化、地理意义远大于血统。

湖广民众在天府之国，经过数百年生息演化后，与千百年来不断从中原迁徙到岭南来的数百万北方人的情况一样。各族各部因蜀地、岭南独特禀赋而形成相似的习俗、文化、精神，已经具备共同体的潜质。

源于地域禀赋的精神，历史渊源可上溯至古蜀。

民族在动态的演化过程中被“发明”，定义自我的共同体决断的产物。来自历史文化的原料，也许古蜀文明正是天府文化、广府文化创造自我的决断时，能重点援引的历史资源。

中国之中，不在天下之中，而是文明之中。

中国之中，不仅在历史之中，而终将会是世界之重。

「天下之中」的向心力。

开放性、发展性、创新性。历史上，成都经历过很多磨难，成都城甚至在洪水后的瘟疫中「毁城」，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奋起，砥砺前行……

自然条件优越、历史积淀深厚、文化底蕴独特，一种以文化、美学为优先的生活方式，孕育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贯通历史、当下和将来。

从5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开始，优先、富庶、巴适、安逸的成都生活就已成习惯。1000年时间做探索，2000年时间打基础，2000年时间做传承，历史的沧桑，仍旧焕发着迷人的魅力。

「汤继强线」柔性突破「胡焕庸线」。
引领世界城市3.0时代的一次重要机遇。





「双循环」的「摆渡人」



陆

柒

捌

玖

拾

一部人类文明史，一部人类不断迁徙的历史。

安阳王“蜀泮”与他的部族，成都平原最早、走得最远的移民。

与此同时。一波一波袭向成都平原的“移民浪潮”，风起云涌。

正力敌六国之师。秦国急切需要为大一统提供后援。

“戎伯尚强”。秦灭巴蜀，置巴郡、蜀郡。

古蜀国灭亡，蜀人、巴人、氐人、羌人等部落的部分贵族与部落成员，纷纷外逃。

氐人，向西北迁徙到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成今天的白马藏族一支；巴人，向东回缩至川东与重庆一带，部分形成今天的土家族一支。

羌人，一部分，迁徙至塔里木盆地南沿，融入维吾尔族，建立媯羌部落，居住地后来成为如今的新疆若羌县，中国面积最大的县，约相当于2个浙江省的面积。一部分，翻过巴颜喀拉山脉，通过岷江上游支流的河谷，至雅鲁藏布江流域，成为发羌、唐牦等羌人部落。一部分，继续南逃，并与沿海的小黑人种群混血，成为当今东南亚各民族的祖先。

驻留在岷江流域的部分古羌，今日羌族来源之一。

血脉跳动至今。保留了中华民族最远古的血脉。

固守西南的蜀人，变成秦国百姓，生命、生活、迁徙，汇入在历史长河之中。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民族融合、迁徙中，和来自各地的移民，共同塑造如今的川人、成都人。

精神中的放旷、洒脱，正是在充满磨难的迁移中浸泡

而出。

“改造”成都平原，统一之路重要里程碑。

一部移民史。成都平原，多民族聚居区；成都，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平原、中心城市。不管是秦朝时期的“万家实蜀”，还是清朝时期的“湖广填四川”，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大量的人口移民来到成都。

古蜀国灭亡后，成都平原人口迅速下降。

贵族的外逃，使得原有的政权体系解构。

古蜀地区留下了巨大的人口空缺。

稳定统治，秦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政治引领。立蜀侯为傀儡，三立三杀。

《后汉书》曾记载，秦国保留古蜀统治阶层的地位，虽然指派了官员进行治理，实际上还是让当地的首领代为管辖，在赋税政策上向土著倾斜，世代赠送美女，将赋税减到最低。

稳固统治。统治者向被统治者示好，避免激起民族矛盾。

两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稍微发生摩擦都可能引发动荡。

“后院”起火，将不利于统一大业。

“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

颁布诸多优惠政策，巴蜀贵族犯罪，可以用爵位抵罪。

分封制、郡县制并用，巴、蜀、汉中三郡31县，在不到30年间，扩大至41个县。

军事改造。仿照咸阳，修建了成都城、郫城和临邛城。

还修筑了江州（今重庆）城、阆中城。

城市中都修有高大的城墙，上有观楼和、射阑，下设粮仓，街道、府舍、市肆与民宅样样俱全，为秦国提供驻守、掌控政权的便利，同时，还促进当地盐铁行业、农业经济的发展。

经济改革。延续时间最长，波澜壮阔。

统一，军事实力的角逐，也是国力的比拼，强大的军队加雄厚的国力，才是真正的王者；移民，是为经济改革服务。迁“秦民万家入蜀”，将古蜀纳入中华文明的核心圈。

“缘法而治”。大量移民、屯兵，发展农业生产。公元前314年，一纸令下，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者，秦国国内作奸犯科者，流放至蜀。秦惠文王死后，法令被子孙延续。

负责戍卫任务的秦国军队，也一支支踏上征途。

规模浩大。迁徙队伍按照一家五口计算，有5万人之多。

移民中心：成都。

迁徙长达100年，使成都平原持续成为“热点”。“实蜀”政策，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长达300余年，持续秦国六代人，史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场大移民运动。

秦国派了军队，任命了官员。

从中原六国走来的陌生脚步，一次次地叩响富饶、神秘的成都平原。

对“移民”，迁徙等于“永别故里”。

“征服”天下的一个“举措”。

惟有民众都融入，才是真正的“融为一体”，“移民”能加快这一进程。

秦王朝自然考虑到，“移民”，快速补充人口的最佳选择。

形成独特的刑罚。《汉书》记载：“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

“流放”，成为一个独特的惩罚罪人的刑罚。

千里之遥。蜀道奇险，通行不易。

“跨界团队”。身份不同，往日僻静的古蜀道，出现一批批的长途跋涉者，由秦国相国及赵国、魏国等的达官贵人、百姓、戴着镣铐的犯人组成。离目的地成都，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风尘仆仆。并非一次旅行，而是一次无奈的迁徙。

一批又一批，都是命运不能由自己左右的人。

不愿远离家乡，种种原因又不得不移民，到陌生的地方开启新的生活。

伴随着秦朝军队的南征北伐，大量流离失所的人出现。

强大的秦国，令他们走在一起。

大多来到成都，也有一些就在入蜀沿途，扎根安居。

艰难的迁徙，一次永别。

离开故乡与家中的亲人，一生都不知能不能再回故土。

无奈背井离乡。对成都，大多数人感到陌生：会有肥沃的耕地么？听说蜀人“左言”，讲起话来难懂无比，外乡人很难听清楚，会跟家乡人一样淳朴么？旅途的劳累、前途未卜的失落……

在《史记》里，司马迁记载：“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

迁徙长达二〇〇年，使成都平原持续成为「热点」。「实蜀」政策，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长达二〇〇余年，持续秦国六代人，史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场大移民运动。

川、甘、陕三省结合部。始于青川县沙洲镇和营盘乡，即汉代白水县城的白水关，至广元昭化（葭萌关），一共长约60公里。秦灭蜀，走的是从陕南到青川再到昭化的线路。

距秦地不远。部分入蜀移民留驻，将郝家坪作为族群墓地。

青川战国木牍，记载了秦朝“移民实蜀”的历史烟云。

正面，记载公元前309年秦武王，命令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四川最早的农田水利政府文告，大规模开发四川地区、成都平原的珍贵历史见证物。

从繁华都市商埠里，迁到荒凉边远地区。

除了迁入蜀地罪人，一些富商大贾也成迁徙的对象。

公元前238年，迁徙队伍中流放的吕不韦，自是牢骚满腹。

秦始皇诛杀了嫪毐后，“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

与嫪毐关系密切的吕不韦，秦始皇令“其与家属徙处蜀”。

本是一介商人，年轻时的一单生意，造就一生的富贵。

贵为相国、文信侯，曾经权倾一时，门客扬言造反，被嬴政诛杀，难逃其咎，被贬居蜀中。眼看经营几十年的政治生意，血本无归，在蜀地又不知道将受到何种待遇，悲难自禁，绝望之中饮鸩自尽，死在入成都平原的途中。

移民中最赫赫有名的一位，将政治当作生意来做。

破产后，也只能选择个商人，最极端的抵抗方式。

随着吕不韦的下台，家人和众多门客，也成了流

放的对象。

富商大贾来自赵、魏、楚等国。

家有千金之财，皆是当地望族。

秦灭六国后，秦人的掌中之物。

有钱有势，秦人生怕他们留在故土滋事，便发配至蜀。正中下怀，强留在故土，与虎谋皮，命运难测，到了成都平原，秦王朝可能鞭长莫及，反能一心经商，安享太平。

蜀地历来产铁。《禹贡》明确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磬、磬、熊、罴、狐、狸。”梁州的主要地域是四川盆地，上贡的物品清单内赫赫醒目：“铁”。

镂，或称“刚铁”。

磬，又叫“磬石”，也能火烧成铁，质地相当刚利。

《华阳国志》也列举了“铁”，用“饶”字形容。

铁的产量高。

也有人主动要求入蜀。赵国卓氏的话，颇能代表商贾们的心理，“吾闻岷山下之沃野，下有蹲鸱(芋头)，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迁入成都应该比现在好，肯定不是坏事。

流放途中，只有卓氏夫妇推车步行。

卓氏祖先原是山东有名的冶铁商。辗转迁到成都平原，来到临邛(今邛崃)，见有储量丰富的铁矿、天然气，盛产的富铁矿“大如蒜子”，却无人开采，大喜过望，定居下来。“开关梁，驰山泽之禁”。随即，大量招揽滇、蜀两地百姓上山采矿，交由随行的铁匠铸铁……

“即山鼓铸，贾于椎髻之民”，继续操起老本行。

卓氏采矿，只需上缴政府少许银两，一本万利。

战国年间，铁器在蜀地尚不流行，卓氏的铁器极受百姓欢迎。

几年下来，赵国卓氏富甲天下，单家中仆僮就有千人之多。

传到卓王孙，铁冶生意做了近百年，生产的铁器，行销四川、云南，甚至远到交趾。

汉朝专门在此设立铁官，专管铸铁。

汉唐中国“五大铁城”之一。

邛崃人很早就以天然气煮盐。

《华阳国志》介绍，“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盐”。世界上最

早开发、使用天然气的记载。诸葛亮曾亲临邛峡，考察火井。晋代左思《蜀都赋》中，“火井沉荧于幽泉，飞焰高煽于天垂”的描述，记叙、描写出了一个繁忙的场面。

“骑龙山”下曾发现过一处汉代冶铁遗址，遍地炉渣铁块、弃掷的生铁，当地人称“铁屎坝”。这处冶铁遗址，尽得“临邛道”之利，铁器一旦铸成，即可上“灵关古道”，远销西南。

如今在火井镇、南宝山镇，还能看到埋藏在地下一米多深的古代陶制的天然气管道。

卓王孙，主营工矿业，兼营商业、金融业。

铜铁矿中，有工奴800至1 000人，炼铁作坊工人多达2 000人。

冶炼出铜、铁后，制作成铜器、铁器，通过组建的通商马队，东去成都、长安，西达康藏，南下滇缅，远销南北和境外“椎髻、纹身”之地，与丝绸、蜀布等一起，直达印度，再运回犀、象、珍玩、管马、牦牛等，供应巴蜀和中原所需。

冶铁铸钱。汉文帝赐蜀人邓通铜山，批准铸铜钱、铁钱。在原先宽泛的岷山之中，有了一处叫“铜官山”的地名，临邛之南2.5公里，便纳入“岷山脚下”之地，改称为“铜官山”。

“红顶商人”邓通，将政府冶矿铸钱的“特许银行”，以“岁取千匹绢”的“租金”，将特许铸造五铢钱的专利权“转让”给卓王孙，并以邓通的名义发行于天下，卓王孙便将“铜官山”脚的一片土地买下，既用于制作生产陶器，又进行金属冶炼铸造钱币、铁器的场所。

在《史记》中，司马迁命名为“铜官山麓”“陶铸之所”。

范围扩展到“基方十里”，涵盖原先的整个城关镇范围。

“垄断经营”。卓王孙所铸铜钱、铁钱，流通于市。

邓通，风度翩翩的美男。今四川乐山人。

有断袖之癖的汉文帝的深爱之人。原是“船拐子”，机缘巧合，成了宠臣。不仅封为上大夫，还得到严道铜山赏赐，让他自己铸造钱币使用，出现“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的场景。

成都平原出现民营企业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富甲天下”。中国最大铁业资本家。《史记》记述：卓王孙“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生活奢华，仆人过千，与皇帝相比也不差。

立竿见影。大批的移民，带来了秦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依托巴蜀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当地经济开始飞速发展。成都城再显生机，江州（重庆）等城池拔地而起，成为著名大城市。

中国首富，一子两女。

长女卓文君，邛崃第一大美女。

美貌和智慧。“白富美”的卓文君，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通音律。不仅出身富贵，而且姿色出众，身材婀娜窈窕，“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

鲁国程郑，秦汉时期“四大铁王”，也靠在临邛铸铁发家，富比卓氏。

《史记》记载：“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在《华阳国志》中，常璩说程郑：“富绾公室，豪过田文。”

田文，战国时期有门客三千的齐国孟尝君。

卓氏、程郑的派头不输孟尝君。

强制性地迁徙移民以来，还有另一类移民。

众多逃亡者和流民，携妻带子因避难，来到成都平原。据《汉书》记载，扬雄家族，也是典型的逃亡奔蜀者的后人。汉之前，商鞅的老师尸佼、扬雄的祖上，因避难而入成都。

尸佼，神秘的先秦时空学者，诸子百家中杂家的代表。

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最完美的描述时空宇宙概念的文字，出自尸佼。《汉书》中记载：“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商鞅造反失败，尸子逃脱秦国的追击，潜逃到成都平原，并没有招兵买马替商鞅报仇，发奋著书，把自己的思想写成了二十卷，大约六万余字的《尸子》。著书立说成功后，才死。

一举两得。既扩充蜀地人口，又削弱六国势力。

移民中，有善于铸造、经商者，将大量的财富、中

原地区的金属冶炼技术、农耕方法带到成都平原。不仅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客观上也加速区域文化之间的融合。

《华阳国志》中，描述了这些“移民”发家致富后的“奢华生活”，“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

影响巨大。伴随“移民”，民俗文化与带来的文字。

“奢侈不期而至”。也包括奢华之风，常璩就流露出“批判”意识。

秦汉帝国的交通路线，编织一个庞大的道路网，由纵横主干道，经过分支，一步一步地从核心地带，渗透到各处。移民开拓新的分支道路，就将中国的行政权力，“移”进了新的地区。

海路交通没有可寻的主干道、分支道，只是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跳跃式的连结，不同于陆路交通，而后者能够编织为持续存在的道路网，网罗新的地区于中国的版图内。

迁移每一个人，都意味着要安置住宿点，划拨土地、住处。

无论人力，还是物力，成本都是巨大。

稍有不慎，迁民行动就会造成动乱。

在2 000多年前，凭着政策得当、管理高效、手段坚决，完成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作。

立竿见影。大批的移民，带来了秦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依托巴蜀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当地经济开始飞速发展。成都城再显生机，江州（重庆）等城池拔地而起，成为著名大城市。

春秋战国前后，秦国存在550年，“秦王”也已传到第31代。秦王室的历史，可一路追溯到商纣王时期，作为正式承认的诸侯王，却是从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开始。

“奋六世之余烈”来形容。

完成统一并不是嬴政一个人的功绩，历代先祖不断奋斗的结果。

开疆拓土，一统六国。秦始皇的辉煌，是站在先辈们的肩膀上得到。550年诸侯国历史、30位秦王的积淀，才换来秦王嬴政10年的爆发，换来“千古一帝”开创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成就。



成都平原，强秦的“发动机”。

著名感慨。在《史记》中，司马迁写下一句：“蜀即属秦，秦以益强。”

盐铁等城市手工业，也成支柱产业。随着秦国大军的东征西讨，大批的六国俘虏，也源源不断进入成都平原。每一批移民，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领先列国的眼光、资源整合能力，打造出了最大的“新增长极”。

国家统一，在于文化统一。

进一步废除巴蜀文字，大力推行小篆。

巴蜀，秦国大力推行文字统一措施的第一站。

标准统一。“书同文，车同轨”。

独特的文字，极富“一体化”色彩的文化普及。

皇权，神经中枢。

移民，神经末梢。

铁蹄所到之处，移民就“撒”到哪里。

移民像帝国的种子一样，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对普通百姓，除了远离故乡，在新地方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区别不大。到了成都平原，有人分得几亩薄田，日作暮休；有人在成都城，以经商谋生，祖传的手艺在故土司空见惯，并不新鲜，到了成都平原却成了绝技，“一招鲜，吃遍天”。

过上了定居生活，许多人与当地女子结婚生子，俨然成了半个成都人，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走出过蜀地。耳濡目染，渐渐成为已经能听懂“蜀语”的“新成都人”。

消除敌对情绪，人口结构渐渐“重组”。

秦民，慢慢成为成都平原的主要居民。

移民和原住民混合居住，已经形成文化认同体。

与移民同时来到成都，还有大规模的秦国军队。

古蜀国新亡，迁徙入蜀的豪强、犯人随时可能造反滋事。

精锐部队。秦将陈壮、张若、张仪，先后率大军至蜀。

令人不解。迄今官方史料中，都未曾提及驻蜀秦军的详细信息。

在秦国，将士为国戍守四方，能得到国家的最高荣誉，史官何以没有记载？战国时期，秦国军队曾经带着盐和长戈，走到中国许多地方。世人已无法通过史料，获悉入蜀的秦军的信息。

2 000多年后，才揭开神秘面纱。

1992年3月，在成都龙泉驿区，上百座墓葬井然有序地排列。

墓主，2 000多年前戍守成都的秦国士兵。

墓葬分区四个，代表不同兵种，朝向正东方。

历史上，墓葬的朝向，往往能代表死者临终前的信仰、愿望，“古成都人”的墓葬北偏西，朝向故土岷山。秦在蜀的东北方，戍守蜀地的秦军许多人到死，都没能回到故土。

东方秦国，秦兵死后的墓葬一律朝着故乡。

墓坑土穴结构，上宽下窄，墓室凹凸不平，布置潦草。

几块椁板，象征性地置于墓坑中。秦国士兵的地位并不高。数以十万计的秦国士兵来到蜀地，历史并不曾厚待他们，就连死亡后，都只能以最卑微方式的安葬。

墓葬出土遗物透露了秦国士兵的生前生活。

兵器，锋利的铜矛；餐具，众多圆底陶罐、尖底盏。

货币，“秦半两”，少则几枚，多则二三百枚。士兵们一生的积蓄。

墓葬中除了兵器、陶器、钱币，还有镰刀、斧头和凿子。

士兵们不但要卫戍蜀地，还需自给自足，从事劳动生产。

与秦向岭南派遣50万的戍边部队一样，来到成都的特殊移民，都扎根平原，与成都融合，入乡随俗，用“古成都人”特有的圆底罐、尖底盏大吃海喝，一些人还用上了色彩鲜艳的漆器。

相互影响。曾经水火不容，早已成了过去。

文化的统一、融合，战争的根本目的。

移民对古代巴蜀方言的形成，影响重要。带入的语言，主要是战国时期的秦方言，在同古巴蜀语言的接触过程中成为胜利者，奠定蜀地方言的基础。

在墓葬中，一枚铜印上赫然刻着两个汉字——杨悲。

士兵的名字，军营一名下层文员，每当军中要发布命令时，便在公文上盖上印章，一来二去，名字已经像军令一样，为每个士兵所熟识。跟许多士兵一样，死后也没能叶落归根。

战友将他埋葬在公共墓地，把伴随大半生的铜印，一同放进。

在秦王朝长达一个世纪移民政策的驱使下，一批又一批的六国富商巨贾、罪人、百姓来到蜀地，与此同时，负责戍卫任务的秦国军队，也一支支踏上了征途。

移民们耕作、经商，娶妻、生子，生活很快像从前一样。

秦国士兵仍然只能固守在岗位上。

征战，和平。

和平，征战。

一支支的秦国军队，在战争与和平的特殊轮回中，失去青春的韶华，成为孤独的思乡者。

移民对古代巴蜀方言的形成，影响重要。带入的语言，主要是战国时期的秦方言，在同古巴蜀语言的接触过程中成为胜利者，奠定蜀地方言的基础。

唐卢求《成都记》说：秦惠文王移民，要“皆使能秦言”，让他们全部能够说秦国话，具有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的同化政策目的，结果就是导致巴蜀地区逐渐改说华夏语。

刘逵注左思《蜀都赋》引《地理志》：“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

“古成都人”开始和中原频繁往来、交流，语言与华夏族大致相同。远古时期巴蜀地域的“左言”，到秦朝时发生很大变化，开始融入华夏语言，成为成都平原方言的源头。

后称古巴蜀方言为“蜀语”。

以华夏语言为主体，兼有巴蜀土著语言底层的一支地域方言。

“吏治帝国”的政治考量与“回到春秋”的文化视野。

古蜀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古蜀语，华夏语的地域分支之一，成为华夏语、汉语的重要源头。

从“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古蜀文化构成完整的序列，与中原文化一道，成为长江、黄河文明的重要起源。秦人入蜀后，蜀语吸收秦语等的成分，成为独具特色的华夏语地域方言。

《山海经》中，有不少四川方言。

根据地域名称、行政归属的演变，把上古、中古时期的蜀地人语，称为“蜀语”；把宋元明时代的蜀地人语，称为“蜀方言”；把清代以后的蜀地人语，称为“四川方言”。

“蜀语”一词，始见于晋代葛洪的《抱朴子》。

“蜀方言”一词，始见于南宋黄希的《补注杜诗》。

“四川方言”，由于张献忠明末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清军又多次清剿，原有四川人已经十去七八，“湖广填四川”后，更是成为一种混合语。

蜀语就是蜀方言，但不能称为“四川方言”。用“蜀语”一词，是因历史上的蜀方言与今天的四川方言，相去甚远。四川方言，以上古、中古蜀语为“底层”，发展变化而来。

早在商周时期，蜀语与秦语、晋语、齐语、楚语等华夏语就有交集、交流，蜀语也是一种华夏语语言，甚至是一种优势方言。从蜀语，到蜀方言，再到四川方言，既有传承，也有消亡。

推广方言上，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历史名人，功不可没。

扬雄，西汉蜀郡（今成都郫都区）人，24岁到长安为官，中途两次回到家乡。

出蜀后，著有《方言》，收录20条古蜀语词。

蜀地将短衣、短袄，叫“曲领”，长安称“襦”。

苏轼，21岁出蜀，讲的方言在海南，至今都有影响。

文字中的“鲜翠”“元修菜”等蜀语，比比皆是。

长期生活在成都的杜甫，在《闻斛斯六官未归》中，有一句“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土锉”，一种蜀语，表示一种炊具，今天的砂锅。

陆游在《邻曲》里，写下“拭盘堆连展，洗醑煮黎祁。”“黎祁”，指成都人做的豆腐。作品中，还屡次出现“三老”“招头”等蜀语词，指的是船工。

性格在语言上，诙谐、幽默。

四川方言谚语“跌倒不恼，爬起来恼”“不大不小，刚刚倒下”“人对头了飞机都要刹一脚”之类；歇后语“罐罐头发豆芽——没得一根伸展”“红萝卜头撒海椒面（儿）——显不出来”“抱鸡婆打摆子——又扑又颤”“盘古王耍巴浪鼓儿——老天真”“沙盘上写字——要不得嘛，抹了就是”“土地老汉儿掉在井里头——要淘神”“缺牙巴啃猪蹄子——横扯筋”之类，即为明证。

“外戎内华”。南北族群融合中，形成了成都人的性格特征。

二律统一。一面，体现在能“兼取各种文化思想，自由不羁，具有更多的个性色彩”；一面，体现在成都人较少受理性的束缚，保留秦民较多的原始性，具有一定的“蛮性”“野性”的色彩。

方言中，有成都城的历史、形成了成都人的文化。

如影相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塑造着成都人的精神与性灵。作为地域文化、地域人群特征的重要体现、表现形式，具有丰富的特性、宝贵的价值。

历史长河中，蜀语混合了多种语言，而非单一语种。

天府文化中的包容特质，也可追溯至此。

成都平原开放包容，不管是朝廷命官，还是乞食的难民，都敞开怀抱迎接。

原本就是一座正宗的移民城市。

2 000年后，清末的《成都通览》中，记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

“成都人”都是外省人：湖广25%，云贵15%，江西15%，广东、广西、江浙、陕西10%，河南、福建、山东、山西、安徽、甘肃5%。

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较早提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典故。

在成都，一首竹枝词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家庭成员的原籍五湖四海，已没有超过十世的“老成都”。

移民潮不仅波及城市，也影响到广大乡村。

在外地人眼中，全都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

移民的进入，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各个文明的彼此交流、成就的移动空间，在共同体聚居中形成自发秩序资源的能力，迁徙来往留下足迹之地，秩序水位的自然流向，对不同文化的秩序输出，虽然一如黑洞一样广大、黑暗，但它不仅是“外循环”时周边民族与文明连结与互动的重要地区，更是“内循环”时人群杂糅“失落环节”的语言辐辏。

巴渝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南粤文化……

同形成于先秦的古蜀文化之间的碰撞，持久、激烈。

成都平原就像一口巨大的川味“火锅”，无论土著，还是移民，无论先来，还是后到，进入这口“大锅”，五涮六，七上八下，就会变得川味十足，逐渐变成“新成都人”。

分分合合，合合分分。

移民者带来自己的文化、技术、生活习惯……

改变了成都，给成都平原带来了“不一样”。

碰撞、融合的过程，一种区别于原古蜀文化的新文化诞生了。

各地移民文化习俗，相互渗透、融合过程中同化、消弭，开始以崭新的勤劳果敢、奋发向上且富有生命力的“川汉子”“川妹子”形象，活跃于全国各地，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社群特点。

早期的罗马帝国，却没有成都这些必要的“经历”。

罗马，与秦汉同时代，西方文明的最大规模政治体。

欧洲史上大规模的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

成都平原就像一口巨大的川味「火锅」，
无论土著，还是移民，无论先来，还是后到，进入这口「大锅」，五涮六，七上八下，
就会变得川味十足，逐渐变成「新成都人」。

结果千差万别。欧洲现在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挖掘出来的。大部分古希腊古罗马思想著作、艺术作品，被后世欧洲人重新发现。欧洲的文明有着长时间的断裂。走向统一，文化共识，中国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绝大部分都源于诸子百家。

“一体”与“多元”。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都要处理土地兼并与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蛮族封建王国。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

秦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多元”并存。

“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一体”，就开始分裂。欧洲自古就各自为政，除了地理、民族、文化外，关键是经济、语言文字的“多元”。

秦国文化机构素来重视，对于幼儿的启蒙教育。

广泛沿用。秦始皇命李斯创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学篇》，三人作品共三篇二十章，后人称“秦三仓”。《仓颉篇》，幼儿启蒙识字书籍。

耳濡目染。移民渐渐已经能听懂蜀人的“左言”，“古成都人”对小篆也不再陌生。

第一次将中原文化注入巴蜀文化的血管中。

真正确立了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

与长江、黄河共同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共构阴阳“太极结构”密不可分。

中华文化“多元”基因传承。

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离不开四川话乃至全国各地方言的传承与保护。

文化互嵌，互鉴融通。

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还有中原之民迁徙南方，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迁徙者成了跨文化的“双语人”，起着“双循环”的桥梁作用。

中华民族具有“多元”的起源，各族人民互相融，最终凝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文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否定野蛮的过程。

一以贯之。改革、开放，中国历史始终。

重要动力。守正、创新，中国历史发展。

《周易》中，已有“变易”的思想。

《汉书》记载：“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汉字，“通古今、达四方”的超时空力量。

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铭刻着中华民族久远的文化记忆，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见证并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圣哲的经典通过汉字，滋养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大一统”刻在民族基因里。

国家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

守护中国的人口、土地和文化。

维护中华文明的统一，神圣的责任。

说相同的话、读相同的书、做相同的事、有相同的敌人、信奉相同的价值观。

中国每次动荡之后，都有强大的复合力量推动统一。

自古以来，中国金融资本的地位在国家政权之下。只要政权还在正常运转，就会尽力驯服金融力量，服务社会发展。

西方的思想体系，用民族国家概念看待中国，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对中国上千年的存在、延续异常困惑。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不断强调：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国家可被击败、更替。

文明只要有人推崇、传承，就一直存在。

中华民族一直以超强的繁衍能力、超常的适应能力、超级的实用主义精神，实现着外部领土的扩张、内在血统的融合。不信奉中国的价值观，即使有中国的户口本，精神上也被开除国籍。



陆

柒

捌

玖

拾

天设地造。

成都，岷江水系从分散到聚合的关键点。

既是中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为中国南北文明的交会地。

5 500年历史选择的结果，不是靠一时一势的人为意志能造出的。

经济内循环，文化外循环。

农耕文明重要的经济特点。

矛盾运动。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构成了古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开放，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安定的多彩画面。

对成都商人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汉书》。

战国时代，成都平原的繁荣、富庶，离不开成都商人。

“蜀身毒道”，早在商代初期，3 500年以前就已形成。

大量的成都商人，那时就已在商路上……

成都的丝绸远销南亚，被印度阿萨姆人称为“蜀布”。

“古成都人”手中丝滑的蜀锦，顺着“一带一路”行销域外。

异域商贾也带着成串的海贝，来到成都平原。罗马商队曾载着阿拉伯的香水、印度的香料和稀有木材、成都的蜀锦，从叙利亚的大漠中，走过巴尔米拉城的华丽柱廊道。

“货贿山积”。在商朝，成都就是发达的一线城市，充满向外扩张的活力，以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外循环”的辅助，通过两个“Y”结合部，形成一个巨大的“X”形

的交通，汤继强线“T型经济带”，把整个成都平原联通，保证外部经济、技术的流入，更促进商业的繁荣、文化的融合，手工与商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对内对外商路的开拓需要。

异域文明与古蜀文明，在商贾不停歇的脚步中碰撞、迸发。

强吸收，不是弱接受。

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特点。

外来文化，从来没有割裂华夏文明，反倒融入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秦无“文”有“器”，成都贡献给秦朝的“丹青”，即色彩艳丽的印染、化妆品原料，为汉代色泽艳丽、制作精美的“漆器”、黄润细密的“蜀布”，奠定了精神物质和生活美学的基础。

“天下粮仓”。

“六国卑秦，不与之盟”。战国七雄中，秦国经济最落后，被称“孤秦”，兼并经济发达而军事落后的古蜀国，一举成为“富饶轻诸侯”的“超级大国”。成都平原至少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0%。

到了西汉，成都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人口增多，成为仅次于首都长安的中国第二大城市。

“巴蜀熟，全国足”，“女工之业，覆衣全国”。据《汉书》的记载，成都的户数高达76 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的80 800户。成都与长安、临淄，时称为全国三大城市。

当之无愧。类似于当今“北上广”的一线城市。

在《史记》中，记载了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首推的就是蜀商，卓氏、程郑，被司马迁列为西汉12位之首，中国首富。被司马迁看重，是因“古成都人”的财富、能量、活力惊人。

汉武帝一生，一直没有停止开疆拓土。

成都平原丰富的人力资源、“不知饥馑，水旱从人”的丰裕物产，为汉帝国建立打下了基础。一直到东汉时，帝国的许多重要城市，都是“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一幅繁盛景象。

客商流连、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商道上没有高大雄伟的关城，没有史诗般的战火硝烟，过路人没有见过“四边伐鼓雪海涌”的浩瀚，也没有闻听“三军大呼阴山动”的誓言，而雄奇险绝，却不逊色于六月飞雪的大漠边关……

行走最多的还是马帮。

驮着邓通制造的钱币，驮着卓文君家冶炼的铁器，驮着锦官城的丝绸绵缎……

中国最古老的国际贸易通道。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钦命张骞由“北方丝绸之路”，再次出使西域，寻找贸易通道，惊奇地发现连长安也殊难见到的蜀地特产，蜀锦、邛竹杖、苕麻麻布、铁器等，在地中海沿岸比比皆是，仰身长叹，原来在我之前已有人捷足先登。“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印度）”，断定西南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隐秘商道——“蜀身毒道”。

他，身在国外，还不知“蜀身毒道”早已存在，“蜀泮”南下交趾的“灵关古道”。司马相如又予以打通后，忙于与卓文君谈情说爱、饮酒作赋，没有及时将功劳上报朝廷。

张骞所言，迄今邛竹杖的最早记载。

到了唐代，“史记三家注”之一的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补充说，“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节高实中，或寄生，可为杖”。邛竹杖本是商贾、行旅登山、赶路时的手杖，带到异域，深受欢迎，从而大量贩运，成为与蜀布、枸酱齐名的特产了。

今邛崃、荃经间的大相岭，也称“邛崃山”，便是邛山。

联系成都平原与中亚、南亚的重要孔道，历来被行旅、马帮惊为天途。

在张骞凿空西域、开通北方丝绸之路以前，南方丝绸之路一直是通往东南亚、西亚的唯一通道，至少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即“蜀泮”建瓯雒国之前的越南冯原文化时期。

正是蚕丛氏为沿线土著，带去那吐丝如云的“天虫密道”，拒不降秦的开明十二世的小儿子“蜀泮”，在王室贵族保护下，按照老蜀王的“部署”，带领3万精将猛兵，以“灵关古道”为中轴线，且战且退，战术上防御性地撤至云南，战略上决定性地南下攻击交趾的“秘道”，经广东，达交趾，建瓯雒国、称“安阳王”。一条雄踞百年的路线……

西汉王朝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通博南、渡澜沧水，开通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永昌道”，将司马相如修筑的“灵关古道”（西夷道）、“五尺道”（南夷道），连成一线。

比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还早两个世纪。

不仅是南亚，蜀商也开辟了中亚市场。

商业足迹覆盖面广。开创性的对外商贸。

1936年，在中亚的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出一座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城——亚历山大城，城址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的丝绸，也被认为部分是蜀商运抵。

公元前4世纪是战国时期，可见成都商人的商业影响力。

成都商人还将商品、古蜀文化传播至百越之地。今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

东北亚，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以北的巴雷泽克谷地，曾经出土不少中国丝织品，朝鲜平壤附近的墓中，出土了一批蜀布和广汉郡的漆器，都被认为与蜀商有密切的联系。

西汉时期，成都平原外贸主要输出蜀锦、茶叶、漆器、铁器等产品，当时卖到身毒、大夏的物品不只邛竹杖、蜀布，只是张骞仅仅看到这两种。

成都商人对外贸易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汉武帝和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决心。

影响了中国和世界2 000多年。

先秦时期，成都平原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南面的云南地区，东面的湖湘、江浙地区，联系都十分密切，开辟出无数条通往外界的曲折道路。

许多陆路，由人行马驮的小道，拓展为走马行车的道路。

嘉陵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剑阁道、阴平道、米仓道、越嶲道、僰道、南方丝绸之路(今称)和长江上游的水路等10多条，为蜀商与外界商贸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陆路相对难行，水路交通却非常发达。

发达的水路，离不开优秀的中华先祖。

异域文明与古蜀文明，在商贾不停歇的脚步中碰撞、迸发。强吸收，不是弱接受。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特点。外来文化，从来没有割裂华夏文明，反而融入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大禹在川西高原岷山地区、川东与重庆地区治水；春秋时期，开明帝鳖灵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减轻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治理岷江，修筑都江堰工程，将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内江流经成都城外，东流而下，在嘉州与青衣江汇合，至今宜宾与金沙江相汇。古代成都的水上交通十分便利。

经三峡，出夔门，可直达吴楚。

纳入秦国版图后，成都平原处于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为商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其他各地，在秦统一天下后得到短暂的喘息，后来又发生秦末农民起义、楚汉战争，战火四起、满目疮痍。

社会经济保持稳定，商业发展一枝独秀。

《汉书》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从夏商起，成都平原农业持续发展，西周时已是富庶的农业经济区域。

巴蜀作为地域概念，在战国、秦汉时才形成。

战国时期，蜀文化与巴文化达到融合状态，形成基本整合的巴蜀文化。

狭义，特指先秦时期的巴文化、蜀文化。广义，指从古至今以四川盆地为中心，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蜀文化为主体，包括周邻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复合文化的总汇。

古蜀文化，指从远古时期到春秋早期，以族属命名的中国古代文明源流之一，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一带，一种追求和谐的内陆农业文化，地域特色浓厚，浪漫独特，光辉灿烂。

青羊宫文化称晚期古蜀文化。

大体相当于战国时代至汉代早期。

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同源。

发展轨迹，呈现为一个向心结构。

长效、持续“双循环经贸结构”。除农业外，成都平原自然资源丰富，还为冶铁、盐业、纺织等工商业的商品交换需求，为成都商人经商，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

先秦时期，成都就有多条联通外界的通道，既有由岷江、沱江，通向巴、楚，汇入长江，抵吴越的水路；又有北联关中、南接滇楚的陆路；还有水陆相继，通达南越的商道。

西汉时期，道路交通建设如火如荼。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萧何发成都平原“万船”,载军粮沿江而下支援前线;江南、山东发生水灾,汉武帝两次诏令调拨“巴蜀之粟”,以解江南之困,输送了数以万石的巴蜀之粟。

《成都记》记载:“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国。”

先乱后治。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思想。

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烈。

经济一体化,前导是政治一体化。

打破各种贸易壁垒,促进统一市场形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终极利器。

政策引导。秦始皇曾对以畜牧与贩卖织物致富的乌氏倮、开采丹砂的巴寡妇清倍加赞赏。乌氏倮和巴寡妇清,因为有经商头脑、懂得致富,受到秦始皇的赞赏。

西汉时期,多次出台吸引移民、发展商业的优惠政策。

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对巴蜀商业的发展最为利好。

“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在法律上,商人地位虽然不高,但实际获利却最好。

成都商人掌握先进冶铸技术,与汉初朝廷对私营盐铁的宽松政策相互作用,让成都平原冶铁业迅速发展成为龙头产业,并推动了农业、手工业、交通建设、商业等行业的发展。

为成都商人做大做强,提供坚实基础。

据《汉书》统计,仅仅只在成都地区的商贾人户,就已经达到7万多,首都商贾也仅仅只在8万多而已。经济、文化合二为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朝代重要的经济枢纽、中心城市。

世界商业史上,成都商业位居前列。

杰出代表。成都商人会发现地理区位优势,利用巴蜀丰富的矿产获取利润,跨出平原、冲破盆地的束缚,尝试突破传统、改变自己、超越自我。一如卓氏看中临邛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就迁移到那里,除了铁矿资源,还了解到有廉价的劳动力、良好的商业氛围,不久就富甲天下,成了西汉前期首富。

冒险精神。成都商人的优秀品质,为追求丰厚利润,跋山涉水,飘洋过海,将商品带到西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敢于开辟新的贸易商道,与尽可能多的人进行商业往来。甚至,为取得高额利润,也

「成都制造」成为古代「一带一路」上优质产品的代名词。行于「灵关古道」，惊心动魄。与历史胜迹情景交融，更能勾起无限联想。一路行去，满眼成画，所遇皆诗。

敢以身犯险，从事走私贸易。

古老东方的财富之都。

不仅是当时中国顶级的商业城市，也是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城市衰落时期时，世界第一流的商业城市，滚滚而来的商业财富，集中于成都平原的城市群。

载入史册。成都商人的财富，名列同期富商排行榜前茅。

商业成就，十分卓著，亦被史家视为经商致富典范。

“蜀地肥饶，兵力精强，远方士庶多往归之”。

统一后，“古成都人”感受到安定、繁荣。

消化融合能力，无与伦比。

“成都制造”成为古代“一带一路”上优质产品的代名词。

行于“灵关古道”，惊心动魄。

与历史胜迹情景交融，更能勾起无限联想。

一路行去，满眼成画，所遇皆诗。

行止崇州、大邑月冷、邛崃听雨、名山闻鸡、萦经履霜、汉源夜雨、越西骑牛，诗人、画家根本不用无病呻吟、弃笔不作，反倒是思绪万千，应接不暇……

时至今日，当年的“成都热”已是历史，曾惊艳多少客人的古道，或许也多隐没在历史尘烟中，不变的依是成都人代代传承的勤劳、智慧。

传承着来自营盘山、宝墩城、三星堆、金沙城的古蜀文化的髓脉，也融合着中原文明、江浙之韵、湖广之风、荆楚之神……个性反差极大的文化，交织融注，形成独特的“成都味道”。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构型取意“太阳神鸟”，空管1号塔台的外形酷似太阳神鸟盘旋上升，“成都人”将翱翔太空的美梦寄托在太阳神鸟上，飞

天梦想通过天府国际机场圆梦。

天府新区的迷蒙细雨中的氤氲。

浣花溪畔的万朵金桂香的飘荡。

“快耍，慢活”，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两个平行世界构成，三环路内的中心老城，三环路外的国际新城。

同一城市，两种生活方式。

太古里的美女，似乎不用上班，软件园的帅哥，好像不用下班；人民公园里的人，爱喝盖碗茶，环球中心的人，更爱喝星巴克；水碾河路南的人吃饭，在老小区楼下苍蝇馆子，铁像寺水街的人吃饭，要开车去街边吃麻辣烫；东城根街，几乎正宗的成都话，天府三街，疑似标准普通话；住九里堤的人，穿着拖鞋遛狗散步，住金融城的人，穿着“阿玛尼”发微信。

西住百花潭的人说，每走一步，都是成都的历史；东居龙泉驿的人说，每加一升油，都是成都的明天，城北的人，认为安逸巴适才是生活的意义；城南的人，觉得努力奋斗才是生命的真谛。

龙之梦酒店就能坐高铁，离世界更近。

到杜甫草堂需要一刻钟，离成都更近。

二元状态。城市个性与消费状态。

而且，生长在成都这片土地的人，最忠烈的人群。

曾经历过几次具有毁灭性的浩劫。

每次浩劫后，又迁来新的人口，组成“新成都人”。

“蓉漂”，一次次地变成了“成都人”。

5 500年里，成都“抱团取暖”走了过来……



陆

柒

捌

玖

拾

秦汉为界，华夏文明的历史分期。

中文，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道防线。

“内循环”保证凝聚，“外循环”保证活力。

难在同时保持“双循环”。当“内循环”完全压倒“外循环”，就开始保守僵化。当“外循环”完全压倒“内循环”，就开始外强中干。古蜀国除不可抗拒的天灾外，亡于只顾“内循环”。

富裕自足的“小农社会”。

“强大的国家能力”。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丞相李斯负责，在原有大篆籀文基础之上，进行文字简化，小篆横空出世。

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

在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证明统一的文字是古隶书，而不是篆书、小篆，在3.7万枚里耶秦简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古隶书文字，完全否定以小篆统一文字的说法。

小篆只出现在碑文、印章上，凸显皇室的高贵不凡。

隶书取代小篆，秦朝开始第二次汉字简化之路。

明争暗斗，“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

国家历史成本的付出，蜀人对于古蜀亡国灭鼎，有切齿之恨。

蜀王后裔除武力抗秦而外，文化上的抗争更剧烈、长久。

选址之争，最为典型。从蚕丛立国起，到开明十二世，3 000多年的发展，以“君长莫同书轨”为本，创造了世所瞩目

的古蜀文化，有国有治，有典有策，文明程度相当高。秦灭巴蜀后，采取强制性措施，加速巴蜀文化融入秦文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但从“古成都人”的立场看，毁策灭典，难以接受。反抗文化专制的斗争，波澜迭起。

重建成都城，彻底摧毁古蜀王朝在蜀人心目中的偶像。

为维护成都旧城的形象，巫师们巧妙地抵抗。

蜚声四起。筑成之初，数次垮塌，舆论哗然，城墙屡筑屡垮，皆言没有任用蜀人选址造成。蜀郡守无可奈何，只好请来“古成都人”。土著巫师以“神龟卜址法”，城址仍选在“武担山”。

顺行地势，再行筑城，城再也没有垮塌过。首战告捷，土著巫师既保住蜀王旧城，又赢得公开进行占卜活动的合法权利。“筑城之争”，对于巴蜀原始宗教巫鬼信仰的延续、发展，意义重大。

成都平原历来盛行巫鬼之风，内容五花八门。

内外呼应。成都城的巫师们围绕筑城选址进行斗争时，在青衣江流域坚持抗秦的开明王后裔，也得到皋通部族的相助，抗争活动风生水起。在瓦屋山一带的皋通部族大造“神弩”，用以坚持抗秦斗争。

青衣习俗来源于蚕丛，遗风流传至今。

开明第三世，攻取青衣。成为附庸国。开明十世后，主要力量部署在秦蜀边境，又给青衣羌以发展机遇。瓦屋山区、青衣江流域，成为古蜀贵族立足抗秦的最后根据地。

秦军大举攻伐，正面迎战。既不向东退却，也不向西躲避，表明都城虽在成都，根基却在眉（山）嘉（乐山）一带。秦军不是“闪电战”“定点清除”，开明王完全可能据险抗衡退守。

顽强抗争。古蜀王被秦军射杀于武阳，开明王后裔盘踞在青衣江流域，不仅有青衣羌的势力以资依托，更有“前则跨蹠健牂，枕寄交址，经途所亘，五千余里”广大地域的“战略后方”。

秦军发兵攻楚，使反秦武装力量在青衣江流域，重新聚集。

秦王国在蜀地的统治，采取封侯、郡县合一的“双轨制”。

三封蜀侯：通国与子恇、子綰，皆蜀王子孙，个个都谋反。

有恃无恐，就因在青衣江流域的武装力量的支撑。

谋反相继失利，被秦王蜀侯诛杀。

为了防范“古成都人”的反抗，秦王朝采取强制手段，将开明王后

与世界平行的古蜀文明，终因固步自封、小富即安，无法顺应时代，不能与时俱进，被历史洪流淘汰、湮没，空留「五丁力士」「杜鹃啼血」的故事，在成都平原的丛林里泣血哀啼。秦国的成功放大了古蜀国的失败。

裔驱赶到青衣江以西的瓦屋山丛林中，派重兵“封山”戍守；又将楚庄王及楚国贵族后裔也流放至此，一同看管……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曲终人散。

夕阳那一抹鲜艳固然动人，但与朝阳相比，只有凄美。

曾经盛极一时的富饶王国，经济、文化在华夏“第一方阵”至少2 000年，与世界平行的古蜀文明，终因固步自封、小富即安，无法顺应时代，不能与时俱进，被历史洪流淘汰、湮没，空留“五丁力士”“杜鹃啼血”的故事，在成都平原的丛林里泣血哀啼。

秦国的成功放大了古蜀国的失败。

历史或许就在于一个“事实”的差异。

架空历史。征服者的秦国，作为心理满足，凸显“足智多谋”，掩盖了历史真相，把天助秦国，水助秦军，“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悲壮又浪漫的千古绝唱，“改编”成“石牛计”“美女计”，将古蜀王“修撰”成好色贪财的“白痴”，荒诞又有几分喜剧色彩的情景剧。还添造在“葭萌”，开明王“兄弟不和”的故事。

“古成都人”没有这么愚昧愚蠢。

“变法”取得成功的强大秦国，更非那么荒谬可笑。

弥天大谎。“其编造当在秦楚之际”。从秦灭蜀至秦汉的100多年间，“金牛道”并无具称，《战国策》《史记》等历史典籍，都记有司马错、张仪等灭蜀大事，却未记叙行程与所经道路。

司马错、张仪等，不可能对名利双收战绩，谦虚地隐而不报。

对功盖万世的“史诗级之战”，司马迁却何以没

有具体记叙？

司马祖氏两大传统，文史世典周史，武将建功立名。

武职的光辉，比史职更闪光、夺目。

出身史官世家的司马迁，受过高度的职业训练，才学、见识非凡。

西汉，史官具有五分介于人神之间、人天之间的地位，必须忠实地记录所见、所识的历史，对神、对天，都有一种责任。如果违背自然现象谱写，会遭到神罚天谴，大于任何尘世间君主帝皇对个人利益的损害，甚至对个体生命的剥夺。

“史学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著《史记》时，司马迁本着真实、严谨，注重有始有终，以备考据。

对后世研究汉朝之前历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司马错，战略大师。秦国第一名将。

商鞅变法，秦国统一的第一块基石。

司马错攻占巴蜀，第二块重要基石。

商鞅提拔了司马错，临死前又向秦惠文王推荐。

白起，司马错手下的士兵。组建铁鹰锐士，挑选士兵，不在乎门第高低，只在乎能否打仗。不管贵族、平民，还是奴隶，都可能进入锐士。司马错将他提拔，才有后来的大秦战神。

电视剧《芈月传》的历史背景。

战略大师。相比白起用兵见长战神本色，王翦用兵贵在老谋深算，引起后世兵家重视，司马错用兵以谋略见长，注重把握时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在战争谋略策划阶段，就已稳操胜券。一如孙子所言：胜者无智名，无勇功。看似平平常常，缜密精深却无处不在。最大功绩，破六国合纵攻秦大军。

“得蜀即得楚”的战略主张，“葭萌之战”“浮江攻楚”的大手笔，走出了秦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步棋。伐蜀定蜀，把秦国的疆域扩大近一倍，人口增加近三分之一，秦国的综合国力翻番。

司马错和张仪，相辅相成。

司马迁的精神楷模，为突出八世祖司马错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在《张仪列传》中，使用“舌战张仪，力主伐蜀”殿前讨论，对“攻

蜀利弊论”辩论的场面与辩词，透露出纵横家的头脑，本领过人、洞察力超常，让中国古代第一谈判专家，连横之策的倡导者张仪都哑口无言，将司马错的功业生动、具体的记叙，抒发、赞颂对八世祖司马错的热爱。

毫不保留的记叙，司马迁及时地写进《史记》。

陕西韩城人司马错，与李冰是大同乡，也是司马迁大同乡。

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记载，也较为详细。

堪比商鞅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司马错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智慧。

有勇有谋、极富远见的将帅之才，见识明显高张仪一筹。

生平两场大战：灭蜀、攻楚。

司马错经营巴蜀，完成了对楚国迂回的战略包围，居高临下攻楚，意义重大。

打连环牌。公元前280年，便率大军，由陇西入川，增补巴蜀军队10万，乘坐大船万艘，载米600万斛，沿涪水（今乌江）南下，绕过楚国在秦楚边境的大军，再次“闪电战”攻到楚国后方。

楚军主力集结边境前线，后方空虚，遭突然进攻，猝不及防……

最后楚国被成功收入秦国的版图。

攻楚之战，“葭萌之战”的“如法炮制”，司马错智胜。典型的“避实击虚”战术，开创中国战争史上早期的战略大迂回战例。无论战术决策，还是战役指挥，都到达超乎寻常的地步。

司马错激励着司马迁，实现要在历史之卷上，书写一笔的伟大志向。

对于成都的战略地位，司马迁确认，“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公元前316年秋天的“灭蜀之战”，无论对成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司马错建议并发动的战争，司马迁自是了然于心。

西汉中期距离秦灭亡的时间并不久，司马迁是司马错的八世孙，相差只有180多年。对功盖万世的“史诗之战”的过程，却没有着笔记叙，连秦史中的重大问题记叙都记不周全，原因何在？

一战可定。军事地理上，战略地位有利，顺风顺水。

以秦攻蜀，如同豺狼逐群羊。

不费吹灰之力。稀松平常，毫无亮点。

天助秦国，水利秦军。古蜀国经历一次与“5·12”同等规模的

地震，次生灾害频发，瘟疫流行，古蜀王与“古成都人”忙于灾后重建，秦国“趁人之危”，审时度势，抓住战略机遇，“趁水打劫”，有悖伦理，更非仁义之师。

而且，公元前186年的“武都大地震”，军事地理发生“逆向变化”，古来贯通的水路交通被切断，使得“暗度陈仓”成为绝响。到了西汉中期，汉中的经济价值远远大于军事价值，才真正成为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汉江、嘉陵江上游之间，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过崎岖难行金牛道，运输只能用木牛流马类粗笨的交通工具，在“难于上青天”的的道上艰难行走、运输。

西汉水、嘉陵江虽与汉水之间，已非同一水系。

“资料”不足，“事实”不够，难以“考据”。

如果大写“灭蜀之战”，还会暴露其有悖伦理的一面，让后人耻笑。

在军事史上，司马错超过汉朝开国帝王刘邦、项羽。

“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即便歌颂汉高帝刘邦，“说不尽的太史公”也称其为“大圣”，当上皇帝完全不是凭借道德才能，而是靠运气(天命)的结果。

修史态度严谨，不会因为个人原因，改变内心的标准。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秦灭蜀只能简单记载：“十月取之，遂定蜀。”而“灭蜀之战”的精彩过程，却是“无始无终”。“葭萌之战”的历史真相，就被司马迁的“认真”而“疏忽”。

秦军能够多年战无不胜，除了上升的国势、强君能得的种种原因外，还在于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牵涉到整个国家体制的“秦军法”。依靠最先进、最高效率的军事制度，秦军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军队。

秦汉之际的史事，一片空白。

秦从中原向成都平原移民，古蜀文化从政治上消失，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受阻。到西汉中期，古蜀文化急剧衰亡，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都急速减少，甚至消逝。

司马迁不是神，也会出现疏忽性的“试错”。如今，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史记》中的记载已经有多处被推翻。不过，司马迁的“试错”，更多是客观性错误，而非主观性错误。

“家祖情结”与“个人认真”，造成重大“遗漏”。

刘禹锡曾写诗《登司马错古城》，“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足见司马错的历史功绩。

只可惜是司马迁的祖先，不然早就名扬四海。

“说不尽的太史公”。笔下的项羽、刘邦，英雄气洋溢又血泪悲情，豪情慷慨又众声喧哗，个个人物缺陷成堆，但仍然光芒四溢……能够让现在的千万中国人，仍为自己拥有的历史为荣。

优秀的史学家，能够精确地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

伟大的文学家，表达的东西远远比想要表达的东西多。

作为文学家，也许比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要更加伟大。

需要补充。司马错整整36年的征战经历，不是老死，就是病死，而不是被害死。

一直以来，我们都沿袭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

“金牛计”，又称“石牛粪金、五丁开道”。

秦国用“金牛计”灭蜀的故事，在正史中没有记载。

《水经注》中引用《本蜀论》记载的“金牛计”，论述“金牛道”“石牛道”得名缘由。《华阳国志》里面，也记载“金牛计”的故事，与《本蜀论》中略有不同，但大体的情节相似。

因为司马迁的“遗漏”，凸显秦国“足智多谋”的“改编”，以讹传讹。不仅西汉才子扬雄都“信以为真”，在《蜀王本纪》里，把古蜀形容成“蜀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蒙昧之地，连东晋常璩也信以为真，写作时不敢采用开明王九世凄美的爱情故事，在《华阳国志》里，还明确将“五丁力士”，列为“虚妄”“缪言”，大加抑绌。在一些文献中，才会有西汉初期蜀郡太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使得蜀地转化为“好文雅”之邦的举措。

近乎于寓言的谎言，至今还在被添油加醋地传播……

以至于现在还有人指出，越南有的人攀附古蜀国的历史，制造古蜀王子南迁的故事。

连广州拥有4 400年文明史、至少2 300年城建史，也随之被遮蔽。

“百代都行秦政法”。

“轴心文明”观和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秦文化是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借着统一的政令制度，与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形成了中国2 000年来在庞大组织面前的管理“奇迹”。

秦从中原向成都平原移民，古蜀文化从政治上消失，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受阻。到西汉中期，古蜀文化急剧衰亡，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都急速减少，甚至消逝。

两全其美。一方面实行安抚政策，准其立国，一方面又大举移民，在青衣国、丹犁国之间，逐渐形成一个汉民插居地带，成为中原经临邛，通往邛国、滇国的主要通道。一直延续到汉代。

汉室曾将淮南王刘长谪贬至蜀地戍守，因病死途中未果。

开明王后裔被集中在瓦屋山一带，与青羌融合，形成“獠”人势力，使得古蜀文化，特别是原始宗教“五斗米道”完整地保存下来。秦灭楚，楚王后裔被流放后，又带来荆楚文化与古蜀文化合流。

楚庄王后裔严君平的道学思想，楚蜀文化的结合。

汉武帝时期，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蜀地“言语颇与华同”。

秦朝太短，汉朝时间比较长。

秦汉帝国，压住地球的分量。

先秦每一个重大史实背后，都缠绕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争议与疑惑。

古蜀的历史归于平静，只有传说被纳入历史。

“古成都人”的史志，只留下几粒微尘，飘荡在故纸之间……



陆

柒

捌

玖

拾

“天下之中”向心力的“成都版”。

“古成都人”，中国最大的移民群体。

不是古羌部落，生活在成都平原人的代称。

不是单一传承，不同民族、族群共融在成都平原。

“蜀人”，并非少数民族，蜀地各族群的泛称。

除柏灌是古蜀原住民外，第一代蜀王蚕丛，从“西北走廊”来到“岷山石室”，与出生在汶川的大禹一样，来自古羌部落；鱼鳧“田于湔山”，来自江汉地区；望帝杜宇“从天”而坠，来自云南东北的“千年游子”；最后一代蜀王开明王鳖灵，也是来自楚巴的巴人之后。

本地“古成都人”、外来移民，族群不断融合的结果。

智慧选择。无论是5 500年以前的“营盘山人”，还是4 000年以前的“宝墩人”，无论是3 000年前的“三星堆人”，还是十二桥文化的“古成都人”，建筑诸如城墙、房屋、街道、祭祀坑，还有用于国家祭祀的羊子山土台，都朝着北偏西的方向。即使如今的成都，依然明显受到古蜀方位系统影响，中轴线走向斜行，由东北向西南，建筑，朝北偏西方向。

难道是怀念祖先的故土？

“方位系统”特殊。若今天我们从成都主城区出发，沿着北偏西的方向一直走，经过郫都区，过都江堰，到达岷江，顺流而上，就到达岷江上游面积最大的河谷冲击扇平原“茂县盆地”。

北偏西的方向，与遥远的传承有关。

古老、悲壮、荒凉之美。

古蜀国灭亡，带来一次古蜀文化的大转移、大传播。

古蜀文化影响到东南亚地区。

李冰修建都江堰，继承了大禹衣钵。

一脉相承。从大禹治涪江、岷江，到鳖灵开金堂峡，再到李冰治都江堰、文翁治沱“穿湔江口”，高骈改府河道，是成都五次治水事业的高峰。发展农业、福泽百姓，执政者都把治水事业放在首位。

艰难远行。“古成都人”有规律地周期性迁居。

3 000多年的迁移治水，3 000多年的沧海桑田。

一部长江上游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

一部古蜀先民不断寻找最佳定居地的迁徙史。

中华文明的根魂，在长江、黄河。中国的江河文明，在世界上具有唯一性，中国的文化基因强大稳定，具有自我修复、永续传承的能力和特征，产生了“1+1>2”的非线性放大效应。

6 000年前，当第一代蜀王蚕丛，率领古羌部族由四川、甘肃、青海交界地带，伴着凄婉悲凉的羌笛，跨黄河，翻越岷山深处的崇山峻岭，沿着民族迁移的“藏羌彝走廊”，由西北向东南，裹挟着浑碧的岷峨雪浪，沿岷江河谷迁徙，居高临下，向着美丽而神秘的成都平原迁徙时，没有想到，那里会成为自然生态环境一流、人文鼎盛、经济繁荣的“天府之国”，会出现“成都”。

时光在流逝，历史在延续。

辉煌的历史和文化。营盘山、宝墩城、三星堆、金沙城、十二桥，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古蜀文化仍然还保持着强大的惯性，绵延发展，始终充满活力，一方面与外来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继续发展演变，秦汉以后成为蜀文化，一种地域文化，专指以成都平原、岷江流域为中心，在古蜀文化根基上发展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

在古蜀先贤的基础上，李冰，以江为“合点”，建造都江堰，将成都平原打造成人类“天人合一”的实体样板，人称“天府之国”；诸葛亮是确定天府文化核心地点的人物，《隆中对》广为流传，确定成都才是天府之国；李白，以诗为“合点”，把“天人合一”的“一”凝聚到诗上，创造出“天人合一”的诗歌样板，给中华奉献出神仙般的飞扬诗章。

“天人造水”的奇特和伟大。都江堰令江水做两次弯道运动，让

「诗意地栖居」。「天府文化」以成都为坐标，成都平原人民精神追求的结晶，代表从「古蜀人」到「成都人」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创造性展现。

河水形成充分的扰流，把沙石翻起，随水流排泄到外江。同时，河水到宝瓶口，出现狭窄运动，流水立刻提速，快速流向成都平原。

岷江流进成都平原，成为一条“天人共造”的江。

雪山、山地、平原“与水和谐”，一部“古成都人”与自然融合的进化史。

“天府之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治水成功的商周、汉唐、两宋，成都都是中国的顶级城市。

成都城，天府文化诞生、延续和拓展的中心。

“诗意地栖居”。“天府文化”以成都为坐标，成都平原人民精神追求的结晶，代表从“古蜀人”到“成都人”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创造性展现。

古蜀国最后的国都，千年的国都史。

在秦汉以后，成都作为国都还有167年历史，加上陪都4年，共171年。历史悠久、影响很大，创造了许多的“中国第一”。“大古都”名副其实，完美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情况。

成都平原尽入大秦版图，秦岭南北的文化融合也进入快车道，逐渐被北方来的秦文化与东南来的楚文化涵化，历经千载沧桑的古蜀文明，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但仍然保留了独具一格的特色。

因水而兴，因水而荣。

因水而困，因水而发。

拥有5 500年以上的文明史、3 000年以上的城建史。

在中国开发最早、持续繁荣时间最长。

“天人共力”，古蜀文明最独特之处。

成都平原，世界上“天人合一”的第一样板。

中华奉献给人类的一种至上思想境界。

造江、风水、持续、生活，最亮丽的四大特色和

个性。

城市精神、气度勃发的最好体现。

城市想象力、生命力旺盛的绝佳象征。

天府成都，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

古蜀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双联体”的“结晶”。

地理位置的差别、混合民族的基因，发展上又有差异性和独特性。

繁衍生息，跨越时空几千年的时代。

演绎着天府文化源头的灿烂历史。

“富”“安”“适”，天府生活的本质内涵。

巴适、安逸、和美，成都生活的社区场景。

“劳而有果”。有冲突，多动口不动手，骨子里不需要靠械斗获得食物的习惯。守着自己的田地就完全够吃，根本不用靠侵略、战争来获得食物和财富，甚至很少用阴谋的手段获得财富。

“由安而乐”。生活有乐、乐于勤劳的良好生活心态、生活习惯。

天府文化因富庶闲适而优越雅致，因开放创新而引领时尚。

苏轼父子等开创的“蜀学”，蜀文化根基上成长，精神上的创造。

文化源流。古蜀文化、蜀文化，天府文化生发的土壤和基础。

从汉赋的恢宏磅礴，到杜诗的清新闲适，再到花间词的雍容华美，西蜀画的富丽典雅，“蜀学”的思辨超越，苏轼诗文的千年而下，无不充分体现天府之国地域文化的先进性、示范性。

在5 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自然条件优越、历史积淀深厚、文化底蕴独特，一种以文化、美学为优先的生活方式，孕育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

一个贯通历史、当下和将来，具有开放性、发展性的地域文化。

对广袤、苍茫的长江上游蕴含的历史气韵、人伦风习，充满着复杂深邃的情感、多重历史文化哲学思辨，支撑着天府文化生生不息，携带着个人情感记忆，在新语境下的生活美学表达。

既是对古蜀文化、蜀文化精髓的凝练，也是对现代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引领。

古蜀文明是一个多源融合的文明。

“内循环”。大移民带来大交流、大开放。

“外循环”。大开放带来大发展、大交流。

21世纪的“成都人”，从天下来，再到天下去。

精神有光，灵魂有香。

一座融合历史与现代、充满生机与奇趣的美妙城市。

往往到了成都，就是成都人，自带归属感。

不断完成文化的蜕变和新生。

5 500年未变的“开放”基因。

从蚕丛，到开明氏，再到李冰、文翁入蜀；从刘备入川，到西晋的八王之乱，再到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从抗日战争，到进军西南，再到三线建设；从改革开放，再到“一带一路”；从在兴隆湖畔首次提出中国“公园城市”的理念，到天府新区生动践行“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营城理念，营造“出门即公园，处处皆场景”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典范。成都向上而达观，兼容南北，贯通东西，取各家之长，融以独特滋味，正逐渐形成一份独特的“中国方案”。

以生活为导向，3.0时代的城市建设样本。

让城市自然有序生长，筑城聚人之根，美好生活之本。

5 000年前，东亚大陆上有夏人、夷人，3 000年前有殷人、周人、楚人、羌人、犬戎人，2 000年前有匈奴人、鲜卑人、越人，1 000年前有契丹人、回纥人……如今大家都是中国人。

追溯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时，那些“松茂古道”曾经匆忙的古羌的背影，那些赶着牛羊将都城从“金沙城”，迁移到西北边“武担山”一带的“古成都人”的身姿，那些“灵关古道”上行色匆匆的流淌着成都平原血液的迁徙队伍，从“长城·藏羌彝”传播带，到“长江·沿海”半月形传播带，从“西北走廊”到“南岭走廊”，从“胡焕庸线”到“汤继强线”，那些曾经给成都平原带来光荣与梦想的先民，再次清晰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

无论远眺可以望见的雪山，还是绿荫环绕的城市景观；无论朴实、温暖的人情，还是对“蓉漂”的欢迎、包容；无论传统文化的深沉、内敛，还是“新时尚之都”的国际范……

天府之国，既是中国的“天府”，也是世界的“天府”。

从5 500年以前的古蜀文明开始，优先、富庶、巴适、安逸的成都生活就已成习惯。1 000年时间做探索，2 000年时间打基础，2 000年时间做传承，历史的沧桑，仍旧焕发着迷人的魅力。

现在，“汤继强线”柔性突破“胡焕庸线”。

世界觉得成都人，是中国“双循环”的“摆渡人”……

中国经济的“第四极”。“T型经济带”，以成都为原点，短线向北延伸至西安、向南是昆明，长线延伸至重庆，“枢纽点”变成“机遇点”，引领世界城市3.0时代的一次重要机遇。

留白增绿，执窄放宽。

成都从三星堆、金沙城的“小双城时代”，跃入成都地区、重庆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大双城时代”。

世界最大城市森林公园龙泉山，由成都平原的生态屏障，升级为世界最大的城市绿心，变“两山夹一城”的逼仄，为“一山连两翼”的宽阔，第一次突破“两江环抱、三城相重”的3 000多年的城市格局，无缝融合，平原、丘陵、山地“与水和谐”。

山的使命，城的时代命运。

锦江、岷江、牧马山表现历史与今天，沱江、嘉陵江、龙泉山昭示明天与未来。

宽窄成都，由窄到宽的晋级。

跨越龙泉山，城市能级“裂变式”提升。

再往东，“川东丘陵”，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另一极——重庆，成渝相向发展潜力无限，新兴极核正在酝酿；再向外，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新机场+泸州港，为向西向南开放提供想象。

西部中国双城记，中国双核经济区。

“雪山城市”，东京、加德满都、日内瓦、米兰、慕尼黑、洛杉矶、西雅图，还有国内的丽江、乌鲁木齐……经纬度、气象、地质差异等，每座城市观雪山，都有其独特的风光。

世界“雪山城市”中，成都高标独具。

拥有海拔落差超过7 000米的景观视野。

雪山之于成都，庄严、神秘的震撼一景。把雪山

雪山之于成都，庄严、神秘的震撼一景。把雪山映衬在层叠的现代建筑之上，城市便有了颇具仪式感的天际线，与自然也有和谐共处的平衡点。成都人的幸福感，就在抬头看天、偶然望远时。

映衬在层叠的现代建筑之上,城市便有了颇具仪式感的天际线,与自然也有和谐共处的平衡点。成都人的幸福感,就在抬头看天、偶然望远时。

东看朝霞,西望雪山。

青山为底、绿道为轴、江河为脉。

雪山见证着城市的生长,也留下5 500年文明的记忆。

享乐天堂,美女摇篮,美食故乡。

成都已拥有超过1 700万的常住人口,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 100万。市域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近1 000平方公里。城市规模庞大,让世界上大多数“雪山城市”黯然失色。

独一无二。2 000多万人同在一个城市里,遥望着绵延千里的雪峰天际线。

“汤继强线”与“T型经济带”。

空间经济视角。成都、重庆两市“硬核区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超强两极,先后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西安是国家明确建设的3个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国家中心城市、西南中心城市昆明,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龙头,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门户城市。

国际经济视角。区域经济发展“新大陆”,“T型经济带”以成都为原点,以省内数百个园区为支点,以“一带一路”为轴、“T型经济带”为面,打造点、轴、面带动的国际产业合作新模式。

“T”的上半部分,拉通成德绵乐,连接重庆,辐射西安和昆明;

“T”的下半部分则串起资阳、内江、宜宾、泸州等地,形成一个经济新格局,两条经济带。

“大T”中的“小T”：“一”,茂县、汶川、绵竹、什邡;“丨”,涪江经济(文化)带,无缝链接沱江经济(文化)带,彭州、新都、青白江、广汉、金堂、简阳、资阳……

成德、成资、成眉的平面距离几乎相等,构成以成都为圆心的外圆,分别辐射、带动三大子片区,即以德阳为支点辐射绵阳,以资阳为支点辐射遂宁和内江,以眉山为支点辐射乐山和雅安,层层交叉,环环相扣,资源互通,经济互补,文化互动。

“速度经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处在长江经济带,与长三角、珠三角两极,都能够有效联动,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开创了陆、海、国内外联

系，东西方双向互助、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成都也从腹地跃升到开放的前沿，从“后卫”变“前锋”，具有贯通全球的战略优势，在国际经济循环中也同是重要节点。

两种优势助力“双循环”。

世界“雪山下的公园城市”。

“源”从绿色生态来，“泉”从历史文化来。

拥抱世界、走向未来的鲜明特质、持久优势。

脚下，成都平原肥沃丰饶；抬头，眺望西岭雪山清新奇丽。成都是全球千万人以上城市中罕见的能看到雪山的一个。成都人，亲近雪山是本能，亲近绿道是习惯，亲近蓝天白云是喜好。

城市住在雪山下，公园就在家门口。

如田园诗般书写自己的生活。

田园、花园、生活的美感。

欣赏、参与、消费，烟火气也可浪漫到巴适。

“机遇之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从“公园城市首提地”，到“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战略规划的全面落地，寄予成都率先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时代使命。

成都人说：至死不“渝”。

重庆人说：乐不思“蜀”。

相向而行。成都“强势东进”，重庆“一路向西”。

“成”竹在胸，游刃有“渝”。

最终格局，“一家亲兄弟，成渝零距离”。

畅通“内循环”，加持“外循环”。

用“人民至上”的理念，书写中国的“制度优势”。

融入“双循环”，唱好“双城记”，建好“示范区”。

雪山、绿色、历史、公园，从城市的点缀，变为城市底色。

以5 500年历史的深厚底蕴、3 000年立城的文化积淀，打造中国“公园城市示范区”。

世界成都，“近者悦，远者来”。

21世纪，中华文明演进的缩影。

后 记 AFTERWORD

我愿意永远当成都的娃娃

易旭东

缘起崇州“三城论坛”

难忘之日。2020年5月16日，崇州“三城（爱情之城、创造之城、美酒之城）论坛”在崇州市川酒博物馆举行。来自省内的文化、策划、建筑等多个领域的代表40余人参加了论坛。

论坛由汤继强与我共同发起。

文化情缘。四川金盆地(集团)董事长余刚赞助。《方志四川》全程报道，连载了我的“主旨演讲”。

论坛上，汤继强说：“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公园城市’建设要在成都首提，就是成都太有条件了。我们研究‘公园城市’，专门做了5+1个指标，这个指标里我们体现了成都‘巴适’‘安逸’的独特性价值，成都为什么幸福指数高，因为成都巴适、安逸，我们要抢占话语权，我们要有这个自信，我们要让这个城市的人民自信，让人民幸福，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掷地有声。汤继强呼吁：文化人要有担当使命；应该站在天地之间发初心，站在天地之间谋未来。

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经济自信、地理自信，正本清源，能不能把被遗忘、误传的古蜀文化——天府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真诚、客观地“呈现”？

四年前，我就已在记叙“成都根魂”，虽有“计划”，仍属“小打小闹”。

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消化“继强呼吁”……

4500年以前，成都人和埃及人一样面对洪水。

3500年以前，成都人和古巴比伦人一样玩着青铜器。

2500年以前，成都人和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

2000年以前，成都人和罗马人一样四处征战。

1500年以前，成都人和阿拉伯人一

样无比富足。

现在，“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听主创揭秘，“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哪吒，也是成都；看汉服秀，从“冷门”到“热卖”，是生意，更是文化；探网红打卡地，评小吃必吃榜，“川西林盘”还能焕发新活力；蓉欧班列开路，连通发展新机，“慢城市”也可生出“二次元”。

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土更净、景更美，绝不是过眼云烟，从“产城人”到“人产城”，“成都式”幸福来自这座城市，大写的“成都人”清晰可见。

2020年8月，决定全情投入。

写作期间，得到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的指导，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传统文化促进会的支持，成都时代职工文学创作院的扶持，在中共成都市青羊区委宣传部统筹下，得以顺利完稿。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喻志强，成都经信局张文军，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陈欣，阿坝州陈刚，郭素梅，成都金牛区邓熠，作协杨君伟，都江堰市王国平，新都区谭宁君，郫都区李志能，成华区蒋松谷，四川东来文旅陈俊，四川杜甫酒业彭作权，四川和德儒雷邦，成都浣花雅集朱再炯，成都神鹤药业李明劲，成都亚林古建筑设计公司李亚林，崇州融媒体中心尹君等50多位老友新

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经济自信、地理自信，正本清源，能不能把被遗忘、误传的古蜀文化——天府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真诚、客观地“呈现”？

朋、媒体同行，刊发相关文章的《巴蜀史志》《方志四川》《成都方志》《现代艺术》《四川经济日报》《四川政协报》《四川文化网》，首发连载的《上风》杂志、自媒体《君伙库》等报刊、平台的众多读者留言，不少读者甚至“收藏”连载文章，希望并鼓励我“写成一本书”。

汤继强更是直言相告：“你有这个能力，通过新时代文化呈现方式，让西部文化呈现在中国舞台和世界舞台上，为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文化支持、思想助力。”

新闻从业的首任上司江功举，鼓励我：大好事，卸下负重，轻盈前行；我大学毕业论文的导师何开四，“热烈祝贺，煌煌大作”；时年《成都工人报》的分管领导李小新，希望我如当年一样，写出高质量文章。

同年10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冯卫东“闻风而动”，当即表示“尽全社之力出版”，并安排社长助理、策划编辑一直“跟踪”。

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庆宁、成都时代出版社副总编辑庞惊涛，一直关

注写作进度。

令我动容。2021年元月，远在北京的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辑董宽读了部分章节，赞美“仍是大手笔，激情不减当年”，希望在第一时间读到全文，并说“争取二月到成都出差，面谈出版其他图书事宜”……

资深媒体人、文创人、书法家刘光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

众多难以言表的鼓励、支持。

心中的“三个原乡”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岁月时光的积淀，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不知出处、来路，难以看清前路。身为成都人，关注每天生活的城市，既是尊重，也是责任。关注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历史，也是关注她的今天和明天。也只有用心、用情的关注、投入，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为今天丰富多彩的生活鼓与呼，体现出文化自信。

不是所有对成都的爱，都能天长地久。生命中有很多注定，都像一首美丽的诗，没有起始，没有终结、约定，也没有守候。不管年轻，还是年老，所做爱家乡的事，都是注定要做的事。

我，一个老成都人，心有“三个原乡”。

亲情原乡，在崇州黑石河畔。

母亲的出生地。承载厚重记忆。

父亲去世，遵照遗愿，与他的岳父、岳母葬在一起。一种传统的继承，崇州成为真正的老家。

亲情浓郁的文脉。

《华阳国志》的故乡。乡梓先贤常璩，中国地方志的鼻祖，提倡天府文化的第一人，见识广博、视野宏阔和格局高远，除了深厚的爱国情怀，还积极上进、勤奋专注。个性极为鲜明。

心灵原乡，在“瞿上城”。

父亲的出生地。满目苍绿的生命摇篮。如今牧马山西麓腹地的“九倒拐”一带。

父亲在这里出生，尽管6岁到了成都。少年时代，每次随父亲从双流走路到新津花源镇，绵绵起伏的牧马山，就一直在左边随行，回成都时，在右边陪伴，城垣一般，若隐若现的神秘。

写作期间，又两次“重走少年路”，经过曾经熟悉的杨柳河时，仿佛看见、听见“第一代成都人”，沿江迁徙的杂踏足音、围山狩猎的呼喝腾跃、江中渔获后的水花迸溅……

写作原乡，在龙泉山深处的山村。

成都门户，巴蜀文化的交会地。

在这片厚实、鲜亮的黄土地上，我生活了四个年头。20岁的我，在那间依山傍溪的屋里，开始了人生的写作。

“三个原乡”，内在动力。亲情原乡、心灵原乡、写作原乡，时不时在月白风清、星烁如晨的静夜，悄悄地从地下

升华而出，反射着微微的月光，如星如华，独立中宵。

少年时代，父母教我像个“男人”，“老大要有老大的样子，要带好弟弟妹妹”；后来看连环画，为《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水浒传》里的“好汉”、《岳母刺字》里的“岳家军”入迷；再大点，偷看外国“禁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在那个年龄段，“半真半假”知道了，“男人应该是个英雄、是个好汉”。

成人后，“建安风骨”让我明白了男人立世，“竹林七贤”使我知道了生活方式，“荆公风骨”“苏轼人格”教我懂得了“以礼法自持”，以儒家的独善内省，道家的心向自由，来完善自身人格，明白人生真正的价值。

“左手执剑，右手调琴”。一直想成为这样的“成都男人”。成不了，趁阳光正好、微风不噪，还有几分青春的力量、蓬勃的激情，做注定要做的事，在写《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中去完成。这，也是文风表面有成都人的“婉约”，本质上却溅下重庆人的“豪放”的始因。

“新闻记者”转身“史志记叙”。

我，就是换了一种名义来感恩父母、热爱家乡。

“史志记叙”与心中的“三个原乡”密不可分。更与35年记者生涯形成的职

业习惯无缝对接。

“爱成都”打上个人标签

一道极为复杂的综合类考题。

一次系统的古蜀文明“深度旅游”。

人们普遍陷入“信息过载”的困境中，每天似乎接触到大量的“新闻”，信息真真假假，甚至让一些新闻同行也越看越迷糊。究其本质，是因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是记者、小编”的时代。

泛滥而庸俗的历史改编的文艺作品，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传媒界，不惊爆眼球不收兵的各种炒作，各种低俗、八卦、恶搞、幼稚的文化，源源不绝地送去堵塞受众大脑和思路的咽喉要道。

目前史志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的悲哀。

难以避免的悲哀，让人无言以对。

众多的局外人、陌生人和不懂史志者，却是对评价、批判史志，充满难以想象的热情。围绕种种史志外围的社会学争吵、新媒体爆点和公众的猜信，史志记叙愈益重要，难度空前增加。

躬身盛世，“存史、育人、资政”。

我，必须“发声”，为“公园城市”恢复名誉。

从“史志旧闻”到“新闻特写”，把“公园城市记叙”当作责任。

心与时代互动。感恩谦卑，从历史的卷帙中，寻找成都的诗意。

逐梦前行。反复在成都平原上来回往返走、考证研究。

多次沿着古羌的足迹，在岷江上游的“松茂古道”的路上……

崇州到汶川，从“海窝子”到“九龙沟”。

辗转万里。成都到杭州，在“宝墩文化”到“良渚文明”的路上漂泊；成都到广州，再在“武担山”到“番禺山”的行程中徘徊，进行田野调查式的观察、思考，潜入历史内部，搜集、查阅相关资料，对既定的历史进行富有创见的探索，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追寻蕴藏在成都平原中的民族精魂。

投入大量时间来考证、研究，更难的是体品一个时代的氛围，难中之难，还要恰当地表达。真实客观、准确考据、依据充分，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增强、复原“古成都人”的生活场景。

归去来兮。从40年前的“文青”采写成都地方文化，到现在的“新老年人”记叙《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一如章夫在《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结尾所写，“历史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是传承，历史也是启蒙。我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写作中引用了大量史料和专家学者的成果，限于文章的随笔体例，未能一一标注，在此一并致歉”。

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年迈的母亲，世上唯一我不敢说“不”的成都

女人。老母亲怕影响我的“思维”，即使“身体不舒服”，也不给我打电话，让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心无旁骛的考勘、写作，不仅完成了本书，还完成了《三千年前“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33万字的初稿。本书留下的许多“？”“疑点”甚至“争议”，在该书中基本都有我给出的“解释”“答案”。

一个成都人，热爱自己家乡的史志文字呈现。人生路途中，新闻记者职业生涯的换道延续。

面对“学术自述”，感觉忐忑。

必须承认对成都的识解，功力不够，对历史的认知，亟需深入。学无止境。

我，爱生长的这块土地，爱生活的这座城市，历史、地理、人文“跨界”融合，首次全面记叙5 500年历史长河中，从“营盘山文化”到“宝墩文化”，从“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揭秘成都人的“根”，成都城的“魂”，为了生活更美好的“五千年梦”。

为“爱成都”打上个人标签。土生土长的经济学家汤继强，在《春望成都》中，深情地说：“我愿意永远做成都的孩子。”我，老城区街道长大的“老儿童”，“我愿意永远当成都的娃娃”。

是为后记。

易旭东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于成都

「双循环」的「摆渡人」

有去无回的文明出访

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

「川军」第二次出川

两个「超级大国」的较量



巴蜀城市传记大典系列

《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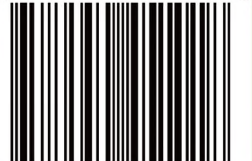
《大蜀道（上、下）》

统筹 中共成都市青羊区委宣传部

支持 成都时代职工文学创作院

上架建议：城市传记

ISBN 978-7-5504-5101-8



9 787550 451018 >



书内精彩片段配有音频

定价：168.00元(上、下)